

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

列夫·托洛茨基著

(供内部参考)

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

列夫·托洛茨基著

吳继淦、李潞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Leon Trotsky
THIRD INTERNATIONAL
AFTER LENIN

Translated by John G. Wright
Pioneer Publishers, New York, 1936

根據紐約先鋒出版社1936年英譯本轉譯

((143)(2)3KN. 1/T75)

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

列夫·托洛茨基著
吳繼淦、李滄譯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資料室編印

(北京朝陽門內大街166號)

新華書店(內部)發行

*

開本 850×1168 叢書 $\frac{1}{3}$ 印張10·字數237,000

1965年12月第1版

1965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統一書號3002·132 定價(七)1.25元

印數0,001—1,000

60/8-5

出版者說明

《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是托洛茨基的主要著作之一，包括他在一九二八年七月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所写的两篇文章：《共产国际綱領草案(对根本原則的批判)》和《現在怎么办?》(写給共产国际六大的信)。这两篇文章全面地攻击了共产国际的綱領，系統地闡述了托洛茨基自己的所謂“不断革命”的謬論，历来被各国托派的徒子徒孙奉为“基本文献”。

文章写作的背景是这样的：当时托洛茨基和他的同夥們的反党反列宁主义活动，已經被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彻底粉碎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托洛茨基和他的党徒已被联共(布)中央开除出党。共产国际贊同联共(布)中央的这个决定，撤銷了托洛茨基作为共产国际候补执行委員的职务。托洛茨基心有不甘，在共产国际召开六大的前夕，写成了这两篇文章，向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发动了猖狂的进攻，妄图为自己的反革命罪行翻案。

托洛茨基在第一篇文章中首先針对共产国际六大准备通过的《共产国际綱領草案》进行了全面的攻击。說什么这个綱領实行的不是“国际革命的路綫”，而是“民族改良主义的”“一国社会主义的路綫”；它不是从“世界經濟和世界政治体系的状况及其发展趋势”这一整体出发，而是“从自己本国的条件及其发展趋势”出发的。他认为以自力更生为方針的一国建設社会主义的理論，是“以孤立发展經濟本身作为目标而和世界經濟断絕联系”的，在这情况下建立的社会主义，将不是一种“以国际劳动分工为基础的世界社会主义

經濟，而是自給自足的社会主义公社按自得其乐的无政府主义精神組成的一個聯盟”。

他认为，既然苏联同資本主义世界之間的矛盾是根本性质的矛盾，那末在世界經濟和世界政治成为一个整体的历史条件下，就只有等待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才有可能“摆脱这个根本性质的矛盾”；苏联經濟的落后也只有在西方先进国家的技术援助下才能克服。強調只有先进国家胜利地进行了无产阶级革命，苏联“才会走上真正的社会主义建設的道路”。

托洛茨基在总结經驗以制訂新的战略方針的幌子下，攻击一九二三年以来共产国际的政策方針，把那个时期世界各国革命的失敗都归咎于共产国际的錯誤領導，同时吹嘘自己在一些关键問題上的“預見”。

托洛茨基对联共(布)的攻击則集中在《現在怎么办?》这封信里。他认为联共(布)“党内有势力集团”正在“和一切階級和平共处”。誣蔑党組織已蜕化变质、已官僚化，“机构的某些扈从，尽情干坏事”，“党的机构的許多环节已經同国家官僚主义、资产阶级知識分子、小资产阶级以及农村里的富农經濟結为一体”，如此等等。

托洛茨基还評述了二十年代的民族革命运动，并且特別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論述所謂中国革命的教訓和前景，对中国共产党人領導中国人民所进行的英勇斗争，作了种种的造謠誹謗，誣蔑广州起义“是領導人为了挽救自己的‘威信’而进行的冒险”，“它必然会由于自己的孤立而覆灭”。竭力否认当时中国革命的民主性质，胡說中国在一九一一年已經經過了“二月革命”，因此中国的革命是反对资产阶级的。說中国的“土地革命既具有反封建的性质，同样也具有反对资产阶级的性质”；在中国，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相互敌对”要比俄国当时“更加不可調和”，只能建立直接反对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在托洛茨基看来，中国的反帝斗争

只在于爭取“关稅自主”，实行“对外貿易的垄断”，而一旦成功，就意味着中国“从世界帝国主义的束縛中解放出来了”。

托洛茨基的这两篇文章曾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散发，并为大会所否决。当时参加大会的美国和加拿大的托派分子却奉为至宝，帶回国内后立即在一九二九年公开发表。中国的托派分子曾譯出前一篇中的“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景”一章，收入他們編譯出版的《中国革命問題》一书中，并且拿托洛茨基的这些論点来作为反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論依据”。一九三六年美国紐約先鋒出版社将这两篇文章譯成英文，冠以《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这个书名出版。本书就是根据这个英譯本轉譯的。托洛茨基以后写的另一篇文章：《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因内容同本书接近，也一并譯出，作为附录。

为了便于讀者查对譯文，我們將英譯本的頁次排印在頁边空白上。

目 录

共产国际綱領草案	1
——对根本原則的批判	
一 国际革命的綱領还是一国社会主义的綱領?	2
二 帝国主义时代的战略和策略	64
三 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景	139
现在怎么办?	193

· 附 录 ·

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	260
------------------	-----

共产国际綱領草案

1

——对根本原則的批判

綱領草案，即决定共产国际未来許多年的全部活动的根本文件，是在第五次代表大会开过四年以后，这次代表大会即将开幕的几个星期以前才发表的。第一个草案甚至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以前即已公布。这个事实并不能說明現在这种拖延是有理由的，因为从那时到現在已經隔了好几年。第二个草案的整个結構都和第一个草案有所不同，它力图总结过去几年的发展情况。不可能有任何做法比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上通过这个草案更为魯莽輕率的了。草案有着明显的仓猝从事甚至潦草拼凑的痕迹，事前沒有在报刊上进行任何严肃而科学的批判，也沒有在共产国际所属各党中展开广泛的討論。

在收到草案和发出这封信之間我們所能支配的短短几天里，我們只能就綱領必須解决的最重要的問題中間的少数問題加以論述。

由于缺乏時間，我們不得不略过綱領談到的許多最重要的問題，完全不能加以考虑。这些問題今天或許并不十分迫切，但是明天就可能变得特別重要。这样說，絲毫不是暗示对这些問題的批判不像对本书論及的綱領其他部分的批判那样必要。

此外，我們必須补充指出，我們不得不在无法取得必需材料的情况下研究新的草案。只要提一件事就够了：我們甚至連第一个綱領草案都得不到。在談到这个草案时，而且在談到其他两三个

問題時，我們只能依靠自己的記憶。不言而喻，所有的引文都是從原始資料中摘錄，並經過仔細核對的。

3

一 國際革命的綱領還是 一國社會主義的綱領？

第六次代表大會議程中最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通過綱領。綱領的性質可能長期決定並確立國際的面貌。綱領的重要性主要並不在於它表述一般理論概念的方式（歸根到底，這只是一個“概括成篇”的問題，也就是把已經肯定獲得的真理和概念用簡潔的方式加以闡述的問題）；一個重要得多的問題是要為過去一個時期在世界經濟和政治方面取得的經驗擬定一張損益表，特別是為過去五年的革命鬥爭擬定一張損益表。這個時期充滿了事件和錯誤。共產國際未來幾年的命運——從這個詞的本意來說——決定於綱領對這些事件、錯誤和爭論如何加以闡述並作出判斷。

1. 綱領的一般結構

我們的時代是帝國主義的時代，即財政資本在世界經濟和世界政治中處於統治地位的時代。在這個時代里，任何一個共產黨都不能僅僅或主要從自己本國的條件及其發展趨勢出發，來決定自己的綱領。這個論點對於在蘇聯疆域以內掌握政權的黨也完全適用。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已經永遠為民族性的綱領敲了喪鐘。無產階級的革命政黨只能以符合目前這個時代——資本主義發展到最高階段和資本主義崩潰的時代——的性質的國際綱領作為自己的基礎。國際共產主義的綱領決不是各國綱領的總和，也不是各國綱領共同特點的混合物。國際綱領必須直接從這樣一點出發：即以世界經濟和世界政治體系的狀況及其發展趨勢作為一個

整体加以分析，对它的各种联系和矛盾，也就是它的各个部分的相互冲突和相互依赖的关系加以分析。在目前这个时代，在比过去大得多的程度上，无产阶级必须而且只能从整个世界的方向中找到自己本民族的方向，而不能加以颠倒。共产主义国际主义和形形色色的民族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和主要区别正在于此。

以这些考虑作为依据，我们在今年一月曾经写道：“我们必须着手为共产国际草拟一个纲领（布哈林的纲领是属于共产国际一个民族支部的很糟糕的纲领，不是一个世界共产党的纲领）。”^①

我们从一九二三年——一九二四年以来就一直坚持这样考虑问题。在那个时候，美利坚合众国的问题已经作为世界政治——按照最直接的意义来说是欧洲政治——的一个问题而充分暴露出来。

《真理报》在推荐新草案时写道：一个共产主义的纲领“不仅从它的中心要求的实质来说，而且从它的结构所特有的国际主义性质来说，都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的纲领截然不同”。^②

5

这种比较含糊的说法显然表达了我們前面所说的、而过去曾被顽固地加以拒绝的那种思想。布哈林提出的第一个纲领草案甚至没有起到促使人们严肃地交换意见的作用。就这个问题来说，它也没有提供任何可供交换意见的基础。和这个纲领草案分道扬镳，人们只能表示欢迎。第一个草案只对一个抽象的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作了干巴巴的图解式的描绘；新的草案则试图把世界经济看成一个整体，作为决定各个部分的命运的基础。不幸的是，我们随后将要看到，它并没有贯彻这种做法，并没有成功。

世界经济把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大陆联结起来，成为

① 《真理报》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五日。

② 《真理报》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九日。

一个相互依賴而又相互敌对的体系，使它們在发展阶段上逐漸趋于一致，同时迅速加剧了它們之間的分歧，殘酷地使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这样一来，世界經濟就变成了主宰各个不同国家和大陆的經濟生活的一种强有力的现实因素。只是由于这个基本事实，才使世界共产党的概念具有无上的现实意义。帝国主义使整个世界經濟达到在私有财产基础上一般所能达到的最高发展水平，从而——正如綱領草案在导言中十分正确地指出的那样——“使世界經濟生产力的增长和民族国家的壁障之間的矛盾加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①

这个論断的含意已經在上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期間以生动的方式第一次向人类透露出来。不掌握这个論断的含意，我們就无法采取任何步驟来解决世界政治和革命斗争的重大問題。

6 对于新的綱領草案在关键問題上的这种根本变化，我們本来只能表示欢迎。但是，由于草案力图使这个唯一正确的立場和性质完全相反的傾向調和起来，結果就使自己变成了各种矛盾进行最殘酷的斗争的战场，从而完全勾銷了新的从根本方面看問題的方式的原則意义。

2. 美利坚合众国和欧洲

为了說明幸而已被抛弃的第一个草案的特点，只需要指出：就我們記憶所及，这个草案根本沒有提到美利坚合众国的名字。帝国主义时代的性质本身决定，对这个时代的主要問題不仅要从抽象的理論的角度，而且要从具体的历史横断面来加以考察。在第一个草案中，这些問題已經消失得无影无迹，变成了对一个“一般”資本主义国家的毫无生气的图解。但是，新的草案——当然这是

^① 参見《共产国际綱領》，东北书店一九四九年版，第2頁。——譯者注

認真向前邁了一步——現在談到了“世界經濟中心轉移到美利堅合眾國”^①和“‘美元共和國’變成了世界剝削者”^②的問題；最後還談到北美資本主義和歐洲資本主義主要是英國資本主義之間的對抗（草案籠統地稱之為“衝突”）“正在成為世界衝突的軸心”。^③今天已經十分清楚，對世界局勢中這些基本事實和因素缺乏明確概念的綱領是和國際革命政黨的綱領毫無共同之處的。

不幸的是，我們剛才指出的當代世界發展的主要事實和趨勢在草案正文中僅僅一筆帶過，彷彿是作為一種理論上的陪襯而嫁接上去的，和它的整個結構毫無內在的聯繫，也沒有從中得出任何關於前途或者關於戰略的結論。

自從德國共產黨投降以來，自從一九二三年德國無產階級失敗以來，對美國在歐洲扮演的**新角色**就從來沒有作過任何評價。從來沒有人作過任何努力，試圖說明歐洲得到“穩定”、“正常化”和“和平”的時期以及社會民主主義的“復興”，同美國開始干涉歐洲事務的步驟在物質上和思想上都具有密切的聯繫。

此外，並沒有人指出美國擴張的不可避免的進一步發展和包括歐洲市場在內的歐洲資本市場的收縮，勢將引起使過去發生的一切都相形遜色的空前巨大的軍事、經濟和革命的震蕩。

其次，也沒有明確指出，必將來自美國的進一步的壓力將不斷縮小資本主義歐洲在世界經濟中得到的份額；而這種情況當然不會緩和歐洲各國的關係。恰恰相反，它將使這些國家的關係尖銳化到可怕的程度，隨之爆發狂熱的軍事衝突，因為各個國家和各個階級在爭奪一個小得可憐而且越來越小的份額時，要比爭奪一個很大而且越來越大的份額時鬥爭得更為激烈。

草案沒有說明：歐洲各國對立所引起的內部混亂，使它不可能

①②③ 參見《共產國際綱領》，第24頁。——譯者注

对日益集中化的北美共和国实行任何认真的成功的抵抗；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8** 通过欧洲苏维埃联邦来解决欧洲的混乱。后者(正因为存在着各种壁障)在欧洲实现的可能性要比在美洲大得无可比拟，因此极有可能不得不抵御来自北美资产阶级的攻击。

另一方面，草案丝毫没有提到这个事实(这是同一个世界问题的一个同样重要的方面)：正因为美国在国际上拥有实力，而这种实力引起了不可抗拒的扩张，这就使美国不得不把整个世界的火药匣——东方和西方之间的一切对立，旧欧洲的阶级斗争，殖民地人民群众的起义以及一切战争和革命——作为本身结构的基础的一部分。这种情况一方面使北美资本主义变成对保持地球各个角落的“秩序”越来越关心的现代反革命的基本力量，另一方面则为已经居于支配地位而且还在继续扩张的这个世界帝国主义强国发生巨大的革命爆炸准备了条件。世界关系发展的逻辑表明，发生这种爆炸的时间不可能比欧洲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时间落后很久。

我们对美洲和欧洲相互之间的辩证关系的阐述，使我们最近几年来受到了形形色色无奇不有的指责，说我们用和平主义的观点否认欧洲矛盾的存在，接受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理论，还指责我们犯了其他许多罪行。这里没有必要详细谈论这些“指责”；说得**9** 好听一些，这些“指责”是由于对事物的真正发展过程以及我们采取的态度完全无知所造成的。但是，我们不能不指出，他们(附带说一句，正是纲领草案的作者们)在反对我们关于这个最重要的世界问题的论点的、无聊的斗争中已经浪费了许多精力；要在混淆这个问题方面比他们浪费更多精力是难乎其难的。然而我们的论点已经从事物发展进程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甚至直到最近，主要的共产党机关报刊还努力用暗示美国即

将发生工商业危机的方式来縮小——在紙面上縮小——美国霸权的意义。我們不可能在这里探討美国危机持續的时间和它可能达到的深度这个特殊問題。这是属于时局范围的問題，不是属于綱領范围的問題。不言而喻，按照我們看来，必将发生危机是毫无疑問的；而且考虑到美国資本主义目前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我們并不认为下次发生的危机絕對不可能达到极为深刻极为尖銳的程度。但是完全沒有理由企图从此得出結論，认为北美的霸权将受到限制或削弱。这样一个結論只能造成最严重的战略性錯誤。

情况刚好相反。在危机时期，美国的霸权将比在欣欣向荣的时期發揮更全面、更公开、更殘酷的作用。無論是在亚洲、加拿大、南美、澳大利亚还是在欧洲本土，無論是通过和平方式还是通过战争方式，美国将力图用主要是牺牲欧洲的利益的办法来克服自己的困难和弊病，把自己拯救出来。

我們必須清楚地了解：如果說美国干涉的第一个时期对欧洲起了稳定和鎮靜的作用，如果說这种作用今天在很大程度上还存在，甚至还可能作为插曲而重新出現并得到加强（特别是在无产阶级遭受新的失敗的情况下），那末美国政策的总路綫——特别是在它自己的經濟发生困难和危机的时候——則将在欧洲和整个世界引起最深刻的动蕩。

据此，我們就得出了一个并非无足輕重的結論：在未来的十年中，不会比过去十年更缺乏革命的形势。因此，正确地理解推动事物发展的主要因素，使我們不致被它們的作用弄得措手不及，是极为重要的。如果說过去十年的革命形势的主要源泉是帝国主义战争的直接后果，那末在战后第二个十年期間，造成革命激变的最重要的源泉将是欧洲和美洲的相互关系。美国发生一次重大危机，就将敲起預告新的战争和新的革命的警钟。我們再說一遍：革命

形势是不会缺乏的。整个問題取决于无产阶级的国际政党，取决于共产国际的成熟程度和它的战斗力，取决于它是否采取了正确的战略地位和策略手段。

在共产国际綱領草案中根本找不到这种思想趋势的表现。看来，像“世界经济中心轉移到美利坚合众国”这种极为重要的事实，都以一种記者式的随意評論的方式掩盖过去了。用缺乏篇幅作为理由来为这种做法辯解当然是完全說不通的。因为，一个綱領如果不为根本問題提供篇幅，那应当为什么問題提供篇幅呢？此外，应当补充一句，这个綱領为次要而又次要的問題耗費了太多的篇幅，且不用說整个文字結構的松散和无数重复堆砌之处。如果去掉这些毛病，綱領的篇幅至少可以縮減三分之一。

3. 欧洲苏維埃联邦的口号

新的綱領草案中不提欧洲苏維埃联邦的口号是沒有道理的。共产国际經過相当长期的內部斗争以后在一九二三年接受了这个口号。也許草案的作者們是想“回到”列宁在一九一五年对同一个問題表示的立場上去吧？如果是这样，他們必須首先正确地理解列宁的立場。

大家都知道，列宁在战争开始时对欧洲联邦的口号是犹豫不决的。这个口号原来包括在《社会民主党人报》（党在当时的中央机关报）的提綱里，后来遭到列宁的拒絕。这个事实本身說明：这里涉及的問題不是原則上一般是否能够接受这个口号的問題，而仅仅是从策略上予以評价，从具体情况观点来衡量它的积极和消极方面的問題。不用說，列宁拒絕认为有可能实现一个**資本主义的**欧洲联邦。当我完全作为未来欧洲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国家形式而提出欧洲联邦的口号时，对这个問題也采取了和列宁同样的态度。

当时我是这样写的：“通过资本主义政府間取得協議的方式自上而下地完成欧洲經濟的比較全面的統一是一种烏托邦的幻想。在这方面，最多只能得到局部的妥协和权宜的措施。但是，除了这种情况以外，将为生产者和消費者以及一般文化发展带来巨大益处的欧洲經濟統一，正在成为欧洲无产階級反对帝国主义保护貿易政策及其工具——軍国主义——的斗争的一項革命任务。”^①

我又写道：“欧洲联邦首先是欧洲无产階級专政的一种形式——唯一可以想象的形式。”^②

但是，列宁当时认为，甚至这样提問題也包含一定的危险性。由于沒有任何国家在无产階級专政方面拥有任何經驗，由于当时甚至社会民主党的左翼都对这个問題缺乏明确的理論概念，提出欧洲联邦的口号就可能使人认为无产階級革命必須同时开始，至少在整個欧洲大陆上必須同时开始。正是为了防止这种危险，列宁就提出了警告，然而就这一点來說，列宁和我之間并不存在絲毫分歧。当时我写道：“任何国家在斗争中都不必‘等待’其他的国家，为使国际間同时行动的思想不致为国际間消极等待的思想所代替，把这个道理反复加以說明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我們不等待其他国家而在本国的基础上开始斗争并且繼續下去，深信我們的倡导会推动其他各国的斗争。”^③

然后我又說了一段話——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上认为这段話是“托洛茨基主义”最恶毒的表現，也就是說，对革命的內在力量“缺乏信心”，希望取得外来的援助。我是这样說的：“假如事实并不如此，〔其他国家革命的发展——托洛茨基注〕（历史經驗和理論考虑都已經证明，）就休想革命的俄罗斯能在

① 《和平綱領》，《托洛茨基全集》俄文版，第三卷，第一分冊第 85 頁。

② 同上书，第 92 頁。

③ 同上书，第 89—90 頁。（參見《斯大林全集》第九卷第 29 頁。——譯者注）

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或社会主义的德意志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孑然独存”①。

第七次全会引用了这一段話和其他两三段类似的話，以此作为基础来譴責“托洛茨基主义”，指責它在这个“根本問題”上采取了“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立場。既然如此，就讓我們暫時安靜一下，听听列宁本人是怎样說的。

13 一九一八年三月七日，他在談到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約时說道：“这是一个教訓。因为，沒有德国的革命我們就灭亡了，这是一个絕对的真理。”②

一个星期以后，他說：“世界帝国主义不可能和胜利前进的社会革命安然相处。”

过了几个星期，在四月二十三日，列宁說道：“我們的落后鞭策我們前进，我們如果不能坚持到其他各国工人起义来大力支援我們，我們就一定会灭亡。”③

但是，或許这些話都是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危机的特殊影响下說的吧？不！在一九一九年三月，列宁再次指出：“我們不仅生活在一个国家里，而且生活在許多国家組成的体系里，苏維埃共和国和帝国主义国家长期并存是不可思議的。其結局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④

一年以后，在一九二〇年四月七日，列宁又說道：“如果就国际范围的資本來說，那末它現在不但在軍事上，而且在經濟上仍比苏

① 參見《斯大林全集》第九卷第 29 頁。——譯者注

② 《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 86 頁。——譯者注

③ 《在莫斯科工、农和紅軍代表苏維埃上的演說》，《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 213 頁。原文中无着重体。——譯者注

④ 參見《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 128 頁。着重体与此处所引有出入。——譯者注

維埃政權和蘇維埃制度強大。應當從這一基本情況出發，而且任何時候也不要忘記這一點。”^①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列寧在談到租讓問題時說道：“我們現在已由戰爭轉向和平，但是我們並沒有忘記，戰爭還會死灰復燃。只要存在着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它們就不能和平相處，最後不是這個勝利，就是那個勝利；不是為蘇維埃共和國唱挽歌，就是為世界資本主義唱挽歌。這是戰爭的延期。”^②

但是，蘇維埃共和國的繼續存在或許迫使列寧“承認自己的錯誤”，放棄自己對十月革命的“內在力量缺乏信心”的立場了吧？

一九二一年七月，在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上，列寧在關於俄國共產黨的策略的報告提綱里宣布：“这样就形成了这种虽然极不坚固、极不稳定，但总还是一种均势的状态，即社会主义共和国在资本主义包围下能够生存，当然不是长期的。”^③ 14

一九二一年七月五日，列寧又在第三次代表大會的一次會議上坦率地指出：“我們懂得，沒有國際的世界革命的支持，無產階級革命是不可能取得勝利的。還在革命以前，以及在革命以後，我們都是這樣想的：或者是其他資本主義比較發達的國家立刻或至少很快爆發革命，或者是與此相反，我們非失敗不可。儘管有這種想法，但我們還是盡力去做，以便在任何情況下保存蘇維埃制度，因為我們知道，我們的工作不僅是為了自己，而且是為了國際革命。”^④

① 參見《在全俄工會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列寧全集》第三十卷第463頁。——譯者注

② 《在俄共（布）莫斯科組織積極分子大會上的演說》，《列寧全集》第三十一卷第416頁。這篇演說發表於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六日，本文所說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是指舊曆。——譯者注

③ 《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在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上關於俄共的策略的報告提綱（草案初稿）》，《列寧全集》第三十二卷第442頁。——譯者注

④ 《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關於俄共的策略的報告》，《列寧全集》第三十二卷第467頁。原文中無着重體。——譯者注

这些无比地朴素而又充滿国际主义精神的話，和嘵嘵学舌者現在自以为得意的捏造真有天淵之別！

无論如何，我們有权利提出质問：列宁說的所有这些話，和我在一九一五年关于即将出現的俄国革命或社会主义德国如果“孤立地存在于資本主义世界当中”就不能单独支持下去的信念，差別究竟何在呢？時間的因素結果不仅和我的假定有所不同，而且和列宁的預言也有所不同；然而即使在今天，这个基本思想仍然保持着充分的力量——从当前的具体情况來說，或許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有力量。对于这个思想，不仅不应当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那样根据一篇拙劣的、絲毫不讲道理的演說就加以譴責，而且应当包括在共产国际綱領里面。

15 一九一五年，我們在为欧洲苏維埃联邦口号辯护时曾經指出，关于不平衡发展的規律本身并不能作为反对这个口号的理由，因为不同国家和不同大陆之間的历史发展的不平衡这个情况本身就是不平衡的。欧洲国家的发展相互之間是不平衡的。然而，可以像历史事实一样絕對肯定，至少在我們考察的这个历史时期內，这些国家里面不可能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以美洲超过欧洲的程度超过其他国家。对于美洲有一种衡量不平衡的尺度，而对于欧洲则需要另一种尺度。欧洲各国之間的紧密的有机联系是地理和历史条件决定的，是无法摆脱的。現代欧洲的資產階級政府像一伙綁在同一个車上的杀人犯。如前所述，欧洲的革命归根結蒂将会对美洲也发生决定性的影响。但是，从直接影响來說，从历史发展的直接順序來說，德国发生革命对法国比对美国的影响要大得无可比拟。欧洲苏維埃联邦这个口号的政治生命力正是来自这种历史上一脉相传的关系。我們談的是它的相对的生命力，因为这个联邦理所当然地将会通过苏联这个巨大的桥梁扩大到亚洲，从而实现一个世界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联盟。然而这将組成另一个时代，

或者說是继帝国主义时代以后出現的新的伟大的一章。当我们进一步接近这个时代的时候，我們也将发现与之相适应的規律。

一九一五年我們和列宁在欧洲联邦問題上的分歧属于一种局部的、策略分歧的性质；从本质上說，这种分歧是暂时性的。关于这一点，可以毫不費事地引用更多的話来加以证明。但是后来的事态发展已經为它提供了最好的证据。一九二三年，共产国际已經通过了这个引起爭論的口号。假設像綱領草案的作者們現在力图证明的那樣，欧洲联邦的口号在一九一五年真的是原則上无法接受的，那末共产国际就不可能通过这个口号。人們认为，不平衡发展的規律在这些年代里并没有失去效力。

16

前面概述的对这些問題的整个提法，是以作为一个整体的革命过程的动力学作为根据的。按照这种提法，国际革命是一个相互关联的过程。不可能預測这个过程的一切具体細节以及——譬如說——它出現的先后次序。但是，这个过程的一般历史輪廓却是絕對明确的。如果不了解这一点，就根本談不上什么正确的政治方向。

然而，如果我們从一个国家发展甚至完成社会主义的概念出发，事情就完全变样了。我們今天有一种“理論”，說什么在一个国家建成社会主义是可能的，說什么这个国家和資本主义世界的相互关系可以建立在“中立”世界資產阶级的基础上(斯大林)。如果采取这种基本上是民族改良主义而不是革命的国际主义的观点，那末就沒有必要、至少是不像原来那样必要提出欧洲联邦的口号。但是，从我們的观点来看，这个口号是重要的，十分必需的，因为它包含着对孤立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思想的譴責。对于每一个欧洲国家的无产阶级來說，使革命扩大到毗邻的国家并拿起武器支持这些国家的起义是极为必要的，甚至比对苏联更为必要——当然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这样說并不是出于任何有关国际团結的抽象的

考虑——仅仅这些考虑是不能使各个阶级行动起来——，而是出于列宁曾经千百次提出过的那些重要理由，也就是说，如果不能
17 及时得到国际革命的支持，我们就无法支持下去。苏维埃联邦的口号符合无产阶级革命的动力学。无产阶级革命不会在所有国家内同时爆发，但是它会从一个国家蔓延到另一个国家，要求这些国家——特别是在欧洲范围内——为了抵抗最强大的外部敌人和进行经济建设而建立最紧密的联系。

当然，人们可能试图提出异议，指出在为采用这个口号提供最新刺激的鲁尔危机时期^①过去以后，这个口号并没有在欧洲各国共产党的鼓动工作中起重大的作用，可以说并没有生根。但是，这种说法同样适用于工人国家、苏维埃等等口号，即一切革命前夕的口号。对这种情况的解释是：自从一九二三年结束以来，尽管第五次代表大会作出了错误的政治估计，欧洲大陆的革命运动就一直在走下坡路。然而这正说明，仅仅以那个时期得到的印象作为一个纲领的整个基础或部分基础是一种致命的做法。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偏见，欧洲苏维埃联邦的口号却正是在一九二三年通过的。这并非纯粹出于巧合。当时，德国的革命爆发已在预料之中，欧洲各国的相互关系问题已经具有极为迫切的性质。欧洲的危机——更不用说世界的危机——每加剧一分，都尖锐到足以使主要政治问题成为当前急务、并且使欧洲联邦的口号具有吸引力的程度。因此，纲领既没有拒绝这个口号而又一言不发地把它放过——也就是说，把它保留起来以供“不时之需”——的做法是根本错误的。在涉及原则的问题上，实行有所保留的政策是徒劳无益的。

① 一九二三年，法国突然进军鲁尔工业区，几乎引起战争，造成了物价的狂涨，在工人中激起了革命的情绪。这种情况导致了德国工人的罢工和起义。但是由于右翼社会民主党支持反动派，德国革命失败了。——译者注

我們已經知道，綱領草案在結構上試圖以世界經濟及其內在趨勢作為出發點——這是一種值得表揚的企圖。《真理報》十分正確地指出，這是我們和奉行民族愛國主義的社會民主黨之間的根本原則分歧。只有從對各個不同部分起支配作用的世界經濟的整體出發，才可能擬定無產階級的国际政黨的綱領。然而，正是在分析世界發展的主要趨勢時，綱領草案不僅像前面已經指出的那樣表現出降低其價值的缺陷，而且極為片面，以至造成嚴重的錯誤。

草案一再談到——有時是在不適當的地方談到——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的規律是資本主義發展的主要的、幾乎是決定一切的規律。草案有些錯誤，包括一處根本性的錯誤，就是以對發展不平衡的規律作出的片面而虛假的、非馬克思主義、非列寧主義的解釋作為理論基礎的。

草案在第一章裡面指出：“經濟和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是資本主義的絕對規律。這種不平衡在帝國主義時代變得更為尖銳，更為嚴重。”^①

說得對。這樣說就部分地譴責了斯大林最近對這個問題的提法，即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了解不平衡發展的規律，而列寧是第一個發現這個規律的。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五日，斯大林寫道：托洛茨基沒有任何理由引用恩格斯的話，因為恩格斯是“在根本談不上〔II〕資本主義國家發展不平衡的規律的”^②時候寫作的。這些話可能是令人難以置信的，然而作為綱領草案作者之一的斯大林却不止一次地重複這個說法。我們已經看到，草案的正文在這方

19

① 參見《共產國際綱領》，第32頁。——譯者注

② 《給葉爾馬柯夫斯基同志的信》，《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194頁。原文中無着重體。——譯者注

面已經向前跨进了一步。但是，如果我們把糾正这个基本錯誤的情况撇开不談，綱領草案談到不平衡发展的規律的話本质上仍然是片面的，有缺陷的。

首先，更正确的說法应当是：整个人类历史都受不平衡发展規律的支配。資本主义发现人类的各个部分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各有其深刻的內在矛盾。在各个时代中，人类的不同部分达到的水平极为不同，其发展速度也极不平衡。这是資本主义的出发点。資本主义通过它自己的手段和方法，只是逐步地控制它所继承下来的这种不平衡，打破并改变这种不平衡的状态。和以前的經濟制度不同，資本主义的本性决定它要不断地实行經濟扩张，滲入新的領土，克服經濟差别，把自給自足的地方經濟和民族經濟变成一个在財政上相互关联的体系，从而使它們相互接近，使最进步的国家 and 最落后的国家的經濟文化水平趋于一致。离开这个主要过程，就无法想象欧洲和英国以及美洲和欧洲之間的相对的平均化。各个殖民地的工业化，印度和英国之間的差距的日益縮小，以及上面列举的各种过程所引起的一切后果，也就无法想象了。而共产国际的綱領以至共产国际本身的存在都是以这一切作为基础的。

資本主义使各国的經濟关系日益接近，使它們的发展阶段趋于一致。但是，資本主义是以它自己的方法即无政府主义的方法进行活动的。这些方法經常破坏它自己的工作，使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发生对立，使一个工业部門和另一个工业部門发生对立，促进世界經濟的某些部分的发展，同时又阻碍和推后其他部分的发展。只有通过这两种根本趋势——这两种趋势都是資本主义的本性决定的——的相互关系，我們才能理解活生生的历史过程的組織結構。

由于作为帝国主义的推动力的財政資本是无所不在、无孔不入和灵活善变的，是以令人瞠目的速度形成起来的，所以帝国主义

使这两种趋势都得到了加强。帝国主义以空前的速度和深度把各个不同的民族单位和大陆单位联结成一个单一的整体，把它们置于最紧密、最必需的相互依赖的关系当中，使它们的经济方法、社会形式和发展水平日趋一致。同时，它又是以如此互不相容的方法，以虎跃之势，以袭击落后国家和落后地区的方式来达到这个“目的”，结果就比以前各个时代甚至更剧烈、更具有震动性地破坏了它所造成的世界经济统一化和平均化的趋势。只有像这样辩证地理解而不是纯粹机械地理解不平衡发展的规律，才有可能避免提交给第六次代表大会的纲领草案所未能避免的那种根本性的错误。

紧接着我们已经指出的对不平衡发展规律的片面表述之后，纲领草案又说：

“因此，决不能把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看成是单一的、普遍同时发生的行动。因此，社会主义首先在少数资本主义国家甚至在一个孤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内取得胜利是可能的。”^①

在有了十月革命的經驗以后，已经成年的人对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不可能是一次同时发生的行动这一点当然不能提出任何爭論。十月革命是一个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历史必要性的压力下完成的。它丝毫没有等待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来“拉平战线”。在这个范围以内来谈不平衡发展规律是绝对正确的，是完全适当的。但是结论的第二部分——即空洞地断言社会主义“在一个孤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是可能的——却完全是另一回事。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纲领草案只是说：“因此……”，给人的印象是这个结论得自不平衡发展的规律。但是这里根本得不出这个结论。“因此”只能得出某种完全相反的结论。如果某些国家不仅出现不

① 参見《共产国际纲领》，第32頁。——譯者注

平衡的发展，而且甚至是**相互独立**、**相互孤立**地发展，如果历史发展过程是这样的，那末，根据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无疑可以得出结论，认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建成社会主义是有可能的——首先在最先进的国家，然后在条件成熟的比较落后的国家。这就是战前社会民主党队伍中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习惯看法，也可以说是一般的看法。正是这种看法形成了社会爱国主义的理论基础。当然，綱領草案并没有这样看，然而它倾向于这样看。

22 綱領草案的理论错误在于：它力图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中得出它并不包括也不可能包括的某种结论。各个国家的不平衡发展或分散的发展经常破坏然而决没有消灭这些国家日益增长的经济联系和相互依赖。经过四年的空前残酷的大屠杀以后，一转眼这些国家就不得不相互交换煤炭、面包、石油、火药和背带。在这一点上，綱領草案提出问题的方式就好像历史的发展完全是在间歇式跳跃的基础上进行的。至于引起和发生这些跳跃的经济基础，草案的作者们不是完全不提就是硬加以抹煞。他们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一国社会主义这个站不住脚的理论辩解。

根据以上所说，不难理解，对这个问题的唯一正确的提法应当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在帝国主义时代以前就得出了结论，认为不平衡的即此起彼伏的历史发展使无产阶级革命要延续整整一个时代，在这个过程中，各个民族将相继卷入革命的洪流；而另一方面，向国际劳动分工发展的各国之间的有机的相互依赖关系排除了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这就是说，在帝国主义已经发展了、加深了和加剧了这两种对立的趋势的现代，断言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民族的基础上开始、然而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变得**加倍地甚至三倍地**真实，现在则更是如此。在这一点上，列宁只是发展了马克思自己的提法和马克思为这个问题提供的答案，使它们具体化了。

我們黨的綱領完全以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国际条件作为基础。只需要把我們的綱領中关于理論的一部分整个抄过来就可以证明这一点。这里我們仅仅指出：在我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期間，現已去世的波德別尔斯基表示綱領中的某些提法仅关系到俄国革命，列宁在关于党綱問題的总结演說中是这样回答的（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九日）：

“綱領的一条中談到了行将到来的社会革命，这一点也受到了波德別尔斯基同志的攻击。他……〔的〕論据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我們的綱領指的是世界范围内的社会革命。”^①

23

这里指出下列事实不是不适当的：大約在同一个时候，列宁曾經建議我們党不再叫做俄国共产党，而应当改称共产党，从而进一步強調它是一个进行国际革命的政党。在中央委员会里面，只有我投票贊成列宁的提議。但是，由于第三国际的建立，他沒有把这件事提交給代表大会。这种立場证明当时甚至不曾想到一国社会主义的問題。仅仅由于这个原因，所以党綱沒有譴責这种“理論”，只是把它排除在外。

然而两年以后通过的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綱領就不得不就国内在无产階級革命問題上产生的幻想和民族狹隘性提出直接的警告，以使用国际主义精神来培养青年。关于这一点，我們以后还要进一步加以闡述。

共产国际的新的綱領草案使事情完全变了样。草案和它的作者們从一九二四年以来发生的修正主义的变化是步調一致的。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样，它选择了完全相反的道路。但是，解决一国社会主义的問題的方式决定着整个草案的性质，决定它究竟是一个馬克思主义的文件还是一个修正主义的文件。

^①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綱問題的結論》，《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159—160頁。原文中末句无着重体。——譯者注

当然，綱領草案小心翼翼地、坚持不懈地从各个不同方面提出、強調和解释共产主义和改良主义对問題的提法的区别。但是这些保证并不解决問題。我們这里看到的情况，就像一艘船上装备着、甚至过多地装备着許多馬克思主义的机械設備，而它的主帆升起的角度却是故意让各种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的风来推动它前进。

24 凡是从过去三十年来的經驗，特别是近几年来中国的不同凡响的經驗中汲取了教訓的人，都懂得階級斗争和党的綱領性文件之間存在着强有力的、辯证的相互依賴关系。他們也会懂得我們所說的話，即新的修正主义的帆可以使一切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安全設施归于无效。由于这个原因，我們不得不对这个行将长期决定共产国际的发展及其命运的重大問題进行更詳尽的論述。

5. 党的理論传统

綱領草案在前面引用的那段話里面故意使用“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的胜利”的說法，以便和列宁在一九一五年写的那篇文章在表面上和純粹文字上有相似之处。在討論一个国家建設社会主义社会的問題时，列宁那篇文章曾經被殘酷地——且不說是罪恶地——加以濫用。草案在其他方面也使用了同样的方法，“引用”列宁的話来当作证明。这就是科学的“草案的方法”。

草案完全不顾列宁所說、所写和所做的一切，不顾党的綱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綱領，不顾十月革命时期当这个問題被明确地（多么明确地！）提出时党的全体领导人毫无例外地表示的意見，不顾綱領作者斯大林和布哈林本人在一九二四年以前并包括一九二四年在內所讲的話。在极为丰富的馬克思主义文献中，在列宁著作的宝庫中，它一共引用了列宁的两段話——一段引自一九一五年写的論欧洲联邦的文章，另一段引自写于一九二三年而在列宁

去世时还未写完的論合作制的文章——来替一九二四年底或一九二五年初为了进行反对所謂“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的紧急需要而創造的民族社会主义辯解。一切和这两段、每段不过几行的引文发生矛盾的东西——整个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都被干脆抛在一边。这两段人为地摘引出来并且明显地和拙劣地加以錯誤解釋的引文，被拿来当作新的、純粹是修正主义的、从其政治后果來說又是具有无限影响的理論的基础。我們現在看到的这种做法是力图用經院哲学和詭辯的手法把一种和本体絕不相容的树枝嫁接到馬克思主义的树干上去。如果嫁接成功，它将不可挽救地毒害和摧毁整棵树。

25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上，斯大林（不是第一次）宣称：“在一个国家內建設社会主义經濟的問題还在一九一五年就由列宁第一次在党内提出了。”^①

这就是承认在一九一五年以前从来没有提到过一国社会主义的問題。叶尔戈、斯大林和布哈林在无产階級革命的国际性質的問題上并不敢侵犯馬克思主义和党的整个传统。讓我們記住这一点。

但是，和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本人过去所說的話对照起来，讓我們看看列宁在一九一五年“第一次”說了些什么。

列宁在一九一五年是这样說的：“經濟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資本主义的絕對規律。由此就应得出結論：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資本主义国家內获得胜利。这个国家內获得胜利的无产階級既然剝夺了資本家并在本国組織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起来反对其余的資本主义的世界，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階級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掀起反对資本家的起义，必要

26

^① 《再論我們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傾向》，《斯大林全集》第九卷第 27 頁。原文中无着重体。——譯者注

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剥削阶级及其国家。”^①

列宁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呢？他想的只是：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上说的社会主义的胜利是有可能首先在一个国家取得的；而正由于这个事实，这个国家将和资本主义世界处于对立的地位。无产阶级的国家要能够抵抗攻击并主动采取革命攻势，首先必须“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也就是说，组织从资本家手中接管过来的工厂的生产。这就是列宁所讲的全部意思。事实表明：这样一种“社会主义的胜利”已经首先在俄国取得；第一个工人国家为了保卫自己，反对世界干涉，首先不得不“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或者建立“彻底的社会主义类型”的托拉斯。由此可知，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并不是建立——更不是在在一个落后国家建立——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幻想，而是指某种现实得多的状况，即通过十月革命已经在我国存在的第一个时期取得的东西。

这或许还需要加以证明吧？证明是如此之多，唯一的困难在于如何挑选最好的证明。

列宁在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论文（一九一八年一月七日）中谈到“为了使社会主义在俄国取得胜利，必须有一段至少是几个月的时间”。^②

同年——一九一八年——年初，列宁在《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这篇针对布哈林而写的文章中是这样说的：“如果国家资本主义在半年左右能在我国建立起来，那就是一个很大的胜利，那就真正能够保证社会主义一年以后在我国最终地巩固起来，

① 《论欧洲联邦口号》，《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321页。原文中只有“就会起来反对……”的“反对”二字为着重体。——译者注

② 《谈谈不幸的和约问题的历史》，《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第416页。原文中无着重体。——译者注

立于不败之地。”^①

列宁怎么能够为“社会主义……最终地巩固起来”确定一个如此短促的时期呢？他的这些话包含着什么物质生产和社会内容呢？

如果我们回忆一下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上关于苏维埃政权的报告中所说的话，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就立刻不同了。当时列宁是这样说的：“我们的下一代会更发达一些，但也不见得能完全过渡到社会主义。”^②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三日，列宁在公社和劳动组合代表大会上甚至说得更加坦率。他说：“我们知道现在我们还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劳动制，希望我们的儿子也许孙子能够把这种制度建成也就好了。”^③

列宁的这两种说法究竟是哪一种对呢？是说十二个月以内保证“社会主义……最终地巩固起来”对，还是把“实行社会主义劳动制”的任务不是交给我们的儿子而是交给我们的孙子对呢？

列宁的两种说法都对，因为他想到的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两个完全不同的、无法相提并论的阶段。

在第一种情况下，列宁说的“社会主义……最终地巩固起来”，并不是指一年以内甚至“几个月”以内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换句话说，他的意思并不是阶级将被消灭，城乡矛盾将被消灭；他指的是无产阶级国家掌握的工厂企业将恢复生产，从而保证有可能实行城乡产品的交换。他预计的时间是很短促的。这个事实本身就是理解他所想象的前景的可靠的钥匙。

① 《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309页。原文中无着重体。——译者注

② 《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275页。——译者注

③ 《在农业公社和农业劳动组合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175页。按这篇演说是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四日发表的。——译者注

当然，一九一八年初規定的这个時間，即使就这个起碼的任务來說也是太短促了。列宁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曾經加以嘲笑的正是这种属于純粹实践范围的“計算錯誤”。当时他說：“在說这段話的时候，我們当然比現在要愚蠢一些。”^①但是，“我們对总的前途的看法还是正确的。我們一刻也不相信可以在十二个月以內，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建立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劳动制’。”列宁把完成这个主要的最終目的的任务——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交給了整整三代人——我們自己，我們的儿子，还有我們的孙子。

列宁在一九一五年的文章中談到的組織“社会主义生产”并不是指創造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而是指我們在苏联現在已經实现的最最起碼的任务，这难道还不清楚嗎？否則人們就不能不得出一个荒謬的結論，认为按照列宁的意見，已經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政党要把革命战争“推迟”到第三代去进行。

就一九一五年那段引文來說，这就是新理論的主要堡垒的悲惨处境。然而更悲惨的是：列宁写这段話时并不是指俄国而言。他是在談欧洲的情况，和俄国加以比較。不仅从前面引用的专談欧洲联邦問題的文章的內容，而且从列宁当时的整个立場，都可以得出这个結論。几个月以后，在一九一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列宁專門談到俄国的問題。他說：

“无产阶级的任务显然是由这种实际情况产生的。对君主制进行英勇忘我的革命斗争（一九一二年一月代表会议的口号，即“三条鯨魚”）也就是爭取领导一切民主群众主要是农民的斗争。同时还要与沙文主义作无情的斗争，同欧洲无产阶级結成联盟进行**29 爭取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軍事危机加强了推动小资产**

① 《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378頁。——譯者注

階級——其中包括農民——左傾的經濟因素和政治因素。這就是俄國民主革命完全有可能取得勝利的客觀基礎。至於西歐社會主義革命的客觀條件已經完全成熟……還在大戰以前，各先進國家的一切有威信的社会黨人就承認了這一點。”^①

由此可知，在一九一五年，列寧明明講的是俄國的民主革命和西歐的社會主義革命。他順便地、仿佛談的是不言而喻的道理似地提到西歐——以別於俄國并和俄國作為對比——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已經“完全成熟”。但是，新理論的作者們，綱領草案的作者們，對直截了當地談到俄國的許多段話中的這一段話硬是不予理會，正如他們不理會其他幾百段話一樣，正如他們不理會列寧的全部著作一樣。我們已經看到，他們不但不注意這一段話，而且把另一段談西歐問題的話硬扯過來，給它賦予一種它不可能包含也沒有包含的意義，把這種附加的意義套在和這段話無關的俄國頭上，並且在這個“基礎”上建立他們的新理論。

在十月革命前夕的那個時期，列寧在這個問題上採取的是什麼立場呢？列寧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以後離開瑞士的時候，給瑞士工人寫了一封信。他說：

“俄國是一個農民國家，是歐洲最落後的國家之一。在這個國家里，社會主義不可能立刻直接取得勝利。但是，由於貴族地主還保持着大量土地，由於有了一九〇五年的經驗，俄國這個國家的農民性質能夠使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具有巨大的規模，而把我國革命變成全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序幕，變成進到全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級階梯……俄國無產階級單靠自己的力量不能勝利地完成社會主義革命。但它能使俄國革命具有很大的規模，為社會主義革命造成極好的條件，並在某種意義上開始社會主義革命。它

^① 《論革命的兩條路綫》，《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397—398頁。原文中僅“歐洲”和“加強了”數字用着重體。——譯者注

能使自己主要的、最忠实的、最可靠的同伴——欧洲和美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易于进入决战。”^①

这个问题的一切因素都包括在这短短几行话里。如果像他们现在力图使我们相信的那样，认为列宁在一九一五年，在那个战争和反动的时期，就相信俄国无产阶级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从而在完成这项工作以后就可以向各个资产阶级国家宣战，那末在一九一七年初，在二月革命以后，列宁怎么能够这样断然地谈到落后的农民的俄国不可能单靠自己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呢？一个人至少要讲点道理，说得干脆一些，至少要对列宁表示一点尊敬。

再引更多的话就是多余的了。如果要全面概括列宁以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性质为条件所表达的经济政治观点，就需要另写一本书。这本书将包括许多题目，但是不包括在一个国家建成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因为列宁不知道存在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感觉有必要在这里谈谈列宁的另一篇文章——《论合作制》——，因为纲领草案看来从这篇遗著中引用了大量的话，即利用它的某些说法来达到和这篇文章毫不相干的目的。我们想到的是纲领草案第五章所说的苏维埃共和国的工人“具有**一切必要的足够的物质前提……建设完全的社会主义**”。^②（着重体是我们用的。）

如果列宁病中口授并在他死后发表的这篇文章真的说过苏维埃国家具有**一切必要的物质前提首先是生产前提**来独立地建设完全的社会主义，那末人们就只能猜测，或者是列宁在口授过程中滑了边，或者是速记员在把速记符号变成文字时搞错了。无论如何，这两种猜测都比说列宁在仓猝挥笔的过程中放弃了马克思主

① 《给瑞士工人的告别信》，《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380—381页。——译者注

② 参见《共产国际纲领》，第58页。——译者注

义和他自己毕生的学說的可能性更大一些。然而，幸好絲毫沒有必要作出这样的解释。《論合作制》这篇卓越的虽然尚未完成的文章，和他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时期写的其他同样卓越的文章的思想是一致的，就好像是一本論述十月革命在西方和东方一系列革命中的地位的书里面的一章。《論合作制》这篇文章根本没有說过修正列宁主义的人輕率地强加于它的那些話。

列宁在这篇文章中解释說：做“买卖”的合作社在工人国家里能够而且必須完全改变其社会作用；通过正确的政策，它們就可能使私有农民的利益和整个国家的利益按照社会主义方式結合起来。为了证明这个不容爭辯的思想，列宁写道：

“的确，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資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权力，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最小农結成联盟，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領導已有保证等等，难道这不是我們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們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通过我們从前鄙視为买卖机关，并且現時在新經濟政策下我們从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視的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嗎？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①

32

这段話的本文包括一个未完成的短語〔“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从而无可爭辯地证明我們看到的是通过口授写下而未修改的草稿。因此，更不能容許死抱住这段話里面几个孤立的字眼不放，不去努力了解这篇文章的总的思想。然而，幸运的是，不仅这段引文的精神，甚至它的文字都沒有給任何人像綱領草案的作者那样加以濫用的权利。列宁在談到“必需而且足够的”前提时，他对这篇文章的主题是有严格限制的。他在这篇文章中只討

① 《論合作制》，《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 423 頁。——譯者注

論了这样一个問題，即在已經拥有苏維埃政权作为基础的前提下，我們將用什么方式方法，不引起新的階級动乱就通过細小分散的农民經濟达到社会主义的問題。这篇文章完全是談从私有的小商品經濟过渡到集体經濟的**社会組織形式**，而不是談实现这种过渡的**物质生产条件**的。即使欧洲无产階級今天就已經取得胜利，并且用他們的技术知識来援助我們，列宁作为一种协调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社会組織方法而提出的合作制的問題仍然具有充分的意义。合作制指出了一条道路；通过这条道路，在一旦出現苏維埃政权的时候，包括电气化在內的先进技术就可以对千百万小农业生产单位进行重新改組，使它們联合起来。但是合作制不能代替技术，也不能創造技术。列宁并不是仅仅談論一般的、必要而且足够的前提，而是像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样，明确地列举了这些前提，即（1）“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資料”（这是一句沒有經過修改的話）；（2）“无产階級掌握着国家权力”；（3）“无产階級和千百万小农……結成联盟”；（4）“无产階級对农民的領導已有保证”。只是在列举了这些純粹政治性的条件以后——这里完全沒有提物质条件——列宁就得出了他的結論，即：“这（即上述一切）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只是从政治角度來說，而沒有任何其他意思。但是，列宁立刻补充說：“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不是呢？因为单单有了政治条件，即使是足够的条件，并不解决問題。文化問題仍然存在。列宁說：“只要”^①如此。他特別強調“只要”这个詞，是为了說明我們缺乏的前提是极为重要的。列宁和我們同样清楚，文化是和技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使修正主义者回到現實中来。他說：

① 这里大概是指列宁在《論合作制》最后一段所說的“現在，只要实现了这文化革命，我們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了”。見《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430頁。——譯者注

“要成为文明国家，就……必須有相当的物质基础。”^① 只需要提一提电气化的問題就够了。附帶說一句，列宁有意識地把這個問題和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問題联系起来。如果不是存在一个在落后基础上建設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要对已經在走下坡路然而技术上仍然强大的世界資本主义进行不間断的和毫不調和的經濟、政治、軍事以及文化斗爭的問題，那末，在有了“必需而且足够的”政治（然而不是物质）前提以后，我們就会把全副精力投入爭取文化的斗爭。

〔列宁在这篇文章結尾处特別強調指出〕，“假如……不是因为必須为我們在国际范围内的陣地进行斗爭，我可以說，我們是应当把重心轉移到文化建設方面的。”^②

如果我們分析一下列宁論合作制的文章，即使抛开他的其他一切著作，也就知道这正是列宁的真正思想。綱領草案的作者們故意把列宁所說的我們具有“必要而且足够的”前提這句話拿出来，把基本的物质前提增加进去，尽管列宁另外明确地談到了物质前提的問題，指出这正是我們所沒有的，正是我們在“为我們在国际范围内的陣地”进行斗爭时——也就是說，在国际无产階級革命方面——仍然必須爭取的。对于綱領草案的作者們的提法，我們除了說是伪造以外还能够說什么呢？关于这种理論的第二个也就是最后一个堡垒，情况就是如此。

这里我們故意沒有談到列宁从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二三年写的无数文章和发表的无数演說。在这些文章和演說中，列宁以最直截了当的方式一再指出：如果沒有世界革命的胜利，我們就注定要失敗；一个国家特別是一个落后国家，是不可能从經濟上打敗資产

① 《論合作制》，《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 430 頁。——譯者注

② 同上书，第 429 頁。——譯者注

階級的；建設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本质上就是一项国际性的任务——列宁由此得出的結論，对于新的民族反动烏托邦的鼓吹者可能显得“悲观”，但是从革命的国际主义观点来看却是十分乐观的。我們在这里仅仅集中討論草案的作者們为了給自己的烏托邦創造“必要而且足够的”前提而挑选出来的几段話。而我們看到：他們的整个結構是一触即潰的。

但是，我們认为从列宁直接談到这个引起爭論的問題的話中至少引用一段是适当的。这段話不需要任何評論，不容許任何虛伪的解释。列宁說：

“我們在許許多多的著作中，在我們所有的演講中，在所有的报刊上面，都強調說，俄国的情况〔和先进的資本主义国家〕不同，这里产业工人仅占少数，而小农則占絕大多数。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两个条件下才能获得彻底的胜利。第一个条件是得到一个或几个先进国家里的社会主义革命对它的及时支持。……另一个条件，就是要使实现自己的专政或者說掌握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和大多数农民之間互相協議。……”

“我們知道，在其他国家的革命还没有到来时，只有同农民協議，才能拯救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①

我們希望这段話使大家得到足够的教益。首先，在这段話里，列宁本人強調指出他所提出的概念已經“在許許多多的著作中，在我們所有的演講中，在所有的报刊上面”加以發揮；其次，列宁不是在一九一五年即十月革命的两年以前，而是在一九二一年即十月革命的四年以后，指出这个前途的。

我們不揣冒昧地认为，就列宁來說，这个問題是十分清楚了。

①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以实物稅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 203—204 頁。（ ）內的話和着重体都未見諸中文版。——譯者注

还需要提出一个问题：在我们现在面临的这个基本问题上，纲领草案的作者们过去是怎样看的呢？

关于这一点，斯大林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说道：“党始终认为：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就是在这个国家内有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并且这个任务是可以用一个国家的力量来解决的。”^①

我们已经知道，党从来没有以此为出发点。^② 刚刚相反，正如列宁所说，“在许许多多的著作中，在我们所有的演讲中，在所有的报刊上面”，党都是从相反的立场出发的。这个立场在苏联共产党的纲领中得到了最高的表现。但是，人们会想象，至少斯大林本人“始终”是以“社会主义可以用一个国家的力量来建成”这个虚假的观念作为出发点的吧！让我们核对一下。

我们绝对无法知道斯大林在一九〇五年或一九一五年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因为没有任何有关的文件。但是，在一九二四年，斯大林在概括列宁对建设社会主义的看法时，说过下面这段话：

“在一个国家内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还不等于保证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即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任务尚待解决。没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能不能解决这个任务，能不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呢？不，不能。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一个国家的努力就够了，这是我国革命的历史给我们说明了的。为了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单靠一个国家的努力，特别是像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的努力就不够了，——为了达到这个目

① 《〈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报告的结论》，《斯大林全集》第八卷第294页。——译者注

② 按上段引文的第一句在英文中是：“党始终以此为出发点……”，故有此说。——译者注

的，必須有幾個先進國家中無產者的共同努力。……

“**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論的特征**大體上就是這樣。”^①

必須承認，這裡對“列寧主義的……理論的特征”概括得十分正確。在斯大林這本書的後來的版本中，這段話已經修改得和原來剛剛相反了。不過一年，“列寧主義的理論的特征”就被宣布為……托洛茨基主義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全會不是根據一九二四年的版本，而是根據一九二六年的版本，通過決議的。

斯大林的情況就是如此。再也沒有比這更悲慘的了。肯定地說，如果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情況不是同樣的悲慘，我們可能就罷休的。

37 還留下一縷希望：至少綱領草案的真正作者布哈林“始終”是從一個國家實現社會主義的可能性“出發”的吧！讓我們核對一下。

布哈林在一九一七年談到這個問題時是這樣說的：“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即使在落後的俄國，這個火車頭的不可替換的司機也只能是無產階級。但是，無產階級不能繼續停留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財產關係範圍以內。他們邁步走上政權，走向社會主義。然而在俄國正被‘提上日程’的這個任務，不可能在‘國家疆界以內’予以完成。工人階級在這裡碰見了一堵無法跨越的牆〔注意：“一堵無法跨越的牆”——托洛茨基注〕，只有國際工人革命的撞牆車能夠衝破這堵牆。”^②

布哈林把自己的看法說得再也清楚不過了。這就是布哈林在一九一七年即所謂列寧發生“變化”的一九一五年的兩年以後所持的看法。但是，也許是十月革命給布哈林上了不同的一課吧？還

① 《論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斯大林全集》第八卷第60頁。着重體是托洛茨基用的。——譯者注

② 布哈林：《階級鬥爭與俄國的革命》，一九一七年俄文版，第3頁起。

是讓我們來核對一下。

一九一九年，布哈林在共产國際的理論刊物上談到“俄國無產階級專政與世界革命”的問題時寫道：

“在現有的世界經濟以及世界經濟的各個部分相互聯系的狀況下，在各國資產階級集團相互依賴的狀況下，一個國家的鬥爭必然以幾個文明國家中這一方或那一方取得決定性勝利而結束。這是不言而喻的〔着重體是我們用的〕。”

當時，這甚至是“不言而喻的”。他接着又說：

“在戰前的馬克思主義和准馬克思主義文獻中，曾經多次提出社會主義是否能夠在一個國家取得勝利的問題。大多數作者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否定的〔列寧在一九一五年是怎樣的呢？——托洛茨基注〕。從這裡根本不能得出結論，認為在一個國家內發動革命並奪取政權是不可能或不能容許的。”

對極了！在同一篇文章中，我們讀到這樣一段話：

“只有當無產階級在幾個主要國家取得勝利的時候，才有可能開始增加生產力的時期。由此可以得出結論：世界革命的全面發展以及各個工業國家和蘇俄結成強有力的經濟同盟是必要的。”^①

布哈林斷言只有在歐洲各個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取得勝利以後，我們國家才會開始提高生產力，也就是說，開始真正的社會主義發展。事實上，這和被用來作為對“托洛茨基主義”提出一切控告——包括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全會提出的控告——的基礎的說法是一樣的。唯一的特点在於：靠健忘得救的布哈林是以控訴者的身份挺身而出的。和這種可笑的情況同時出現的還有一種可悲的情況：在受到控告的人當中也有曾經幾十次表達過同一

^① 布哈林：《俄國無產階級專政與世界革命》，《共產國際》，一九一九年第五期，第614頁。

个基本概念的列宁。

最后，在一九二一年，即所謂列宁已在一九一五年发生变化的六年以后，也就是十月革命的四年以后，以列宁为首的中央委员会批准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綱領。这个綱領是由布哈林領導的一个委员会拟訂的。綱領第四段說：

39 “苏联的国家政权已經掌握在工人階級手中。在和世界資本主义进行英勇斗争的三年期間，无产階級維護并加强了自己的苏維埃政府。俄国虽然拥有巨大的自然資源，但是从工业角度来看仍然是一个小資产階級人口占絕對多数的落后国家。它只有通过世界无产階級革命才能达到社会主义。我們現在已經进入这种革命发展的时代。”

仅仅从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綱領（不是一篇随手写成的文章，而是一个綱領）中引出这段話，就使綱領草案的作者們力图证明党“始終”认为一个国家——而且正是俄国——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企图变得荒唐可笑而且真正可耻。如果“始終”是这样看，那末布哈林为什么要在共产主义青年团綱領中写下这样一段話呢？斯大林当时把眼睛放到什么地方去了？列宁和整个中央委员会怎么可能批准这样一种异端邪說呢？党内怎么就沒有人注意到这件“瑣事”或表示反对呢？看来这岂不是一个恶毒的笑話而現在正变成对党、对党的历史以及对共产国际的赤裸裸的嘲弄嗎？难道現在不正是制止这一切的时候了嗎？难道現在不正是告訴修正主义者“你們竟胆敢用列宁和党的理論传统作擋箭牌”的时候了嗎？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上，为了給譴責“托洛茨基主义”的決議提供基础，依靠健忘保持安全的布哈林断言：

“在托洛茨基同志的不断革命論中——而托洛茨基同志甚至在今天还在鼓吹这个理論——还可以发现一种說法，认为由于我

們經濟落后，如果沒有世界革命我們就必然灭亡。”^①

在第七次全會上，我曾經談到我在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六年期間提出的不斷革命論的缺陷。但是，當然，我甚至從未考慮拋棄這個理論中的任何具有根本性的東西，正是這些東西曾經使我趨向并的確使我接近列寧，使我完全無法接受今天對列寧主義的修正。

40

不斷革命論有兩個基本論點。第一，儘管俄國在歷史上是落后的，通過革命可以在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能夠取得政權以前就把政權轉移到俄國無產階級的手裏去。其次，一個被無數資本主義敵人包圍的落后國家的無產階級專政所將碰到的那些矛盾，將在世界革命的戰場上找到出路。第一個論點是以對發展不平衡的規律的正確理解作為基礎的。第二個論點則依靠對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經濟政治紐帶的不可分割性具有正確的理解。布哈林說得對，甚至今天我仍然堅持不斷革命論的這兩個基本論點。今天比以前任何時候更堅持這些論點。因為，依我看來，它們已經完全得到證實：從理論上得到馬克思和列寧的著作的證實；在實踐中得到十月革命的經驗的證實。

6. “社會民主主義傾向”何在？

以上的引語已經足足有餘地說明了斯大林和布哈林昨天和今天的理論立場的特點。但是，為了確定他們所用的政治手段的性質，必須記得斯大林和布哈林從反對派所寫的文件中挑選出和他們自己直到一九二五年以前所說的話（就這些話來看是和列寧完全一致的）絕對相同的一些說法以後，就根據這些引語建立了關於我們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的理論。看來在十月革命和國際革命

^① 《記錄》，第115頁。

41 的关系这个中心問題上，反对派似乎和不承认俄国有建設社会主义可能性的奥托·鮑威尔^①奉行同样的观点。人們真要以为印刷机是一九二四年才发明的，以为在这以前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注定是要湮沒无聞的。全部賭注都押在健忘上了！

然而，在有关十月革命的性质的問題上，共产国际已經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和奥托·鮑威尔及第二国际的其他市僧算了帳。在中央委员会授权我提出的关于新經濟政策和世界革命前景的报告中，对于奥托·鮑威尔的立場已經以符合我們当时的中央委员会的意見的方式予以評价；在那次代表大会上，这种評价并没有遭到任何反对，我认为它在今天也是完全适合的。就布哈林本人來說，他拒絕澄清这个問題的政治方面，因为“包括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內的許多同志已經論述了这个問題”；換句話說，布哈林当时是同意我的演說的。下面就是我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所說的关于奥托·鮑威尔的話：

“社会民主党的理論家們一方面在应景文章中承认資本主义特别是欧洲的資本主义已經不再有用，已經成为历史发展的障碍；另一方面，他們又表示深信苏俄的演变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資產階級民主的胜利。这些愚蠢不堪而又自命不凡的胡扯家完全罪有应得地掉进了最可怜、最陈腐的矛盾。新經濟政策是为了适应某些具体的時間和地点条件而制定的。这是生存在資本主义包围中、肯定指望欧洲的革命发展的工人国家使用的一种策略……在政治計算中不能不考虑時間这样一个因素。如果我們承认資本主义真正能够在欧洲繼續存在一个或半个世紀，承认苏俄将不得不在經

42

① 奥托·鮑威尔 (Otto Bauer, 1881—1938)，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右翼领导人之一，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一九二一年二月，与弗里得里希·阿德勒等人在維也納創立了第二半国际。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特别是十月革命后，疯狂地反对无产階級革命和无产階級专政。——譯者注

济政策方面适应这个局面，那末問題就自行解决了。因为，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我們就是預先假定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将要垮台，假定将出现一个资本主义复兴的新时代。这种看法有什么根据呢？如果奥托·鮑威尔在今天奥地利的生活中发现了任何奇迹似的资本主义复活的迹象，那末就只能說俄国的命运已經預先注定了。但是到现在为止，我們并没有看到任何奇迹，也不相信有什么奇迹。从我們的观点来看，如果欧洲资产阶级能把自己的权力繼續維持几十年，那在目前的世界条件下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新繁荣，而意味着欧洲的經濟停滞和文化衰落。一般說来，不能否认这样一个过程有可能使苏俄掉进深淵。至于苏俄那时是否不得不經歷一个‘民主’阶段，或者遭到某种其他形式的毁灭，則是次要的問題。但是我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要采取斯本格勒^①的哲学。我們肯定指望欧洲的革命发展。新經濟政策只是适应这种发展速度的一种办法。”^②

这样提出問題就使我們回到了我們評价綱領草案的出发点，在帝国主义时代，不可能以任何其他方式来考虑一个国家的命运，而必須以世界发展的整个趋势作为出发点；一个国家不管具有什么民族特点，都是包括在这个整体以內并且从属于这个整体的。第二国际的理論家們把苏联排除在世界整体以外，排除在帝国主义时代以外；他們把苏联看成一个与世隔絕的国家，用經濟“成熟性”这个孤零零的尺度来衡量它；他們宣称苏联独立建設社会主义的条件尚未成熟，从而得出結論，认为工人国家不可避免地要发生资本主义的蜕化。

43

綱領草案的作者們采用了同样的理論根据，把社会民主党那

① 斯本格勒(Oswald Spengler, 1880—1936), 德国反动的历史家和哲学家, 否认历史的进步, 主要著作是《西方的沒落》。——譯者注

② 托洛茨基:《論社会民主党的批評》,《共产国际头五年》,第491頁。

些理論家的形而上学的方法論全盘接收过来。他們也从世界整体和帝国主义时代“脫身而出”。他們从孤立发展的幻想出发，用孤零零的經濟尺度来衡量世界革命的民族方面。但是他們作出的“判決”是不同的。草案作者的“左傾”在于把社会民主党人的評價翻了一个面。但是，無論你如何重新装扮它，第二国际理論家的立場仍然一錢不值。大家必須采取列宁的立場，也就是把鮑威尔的估計和預測仅仅当作幼儿园的游戏而一笔勾銷。

关于“社会民主主义傾向”的情况就是如此。应当认为和鮑威尔有联系的不是我們，而是草案的作者們自己。

7. 苏联对世界經濟的依賴

民族社会主义社会的現在那些預言家的先驅正是福尔馬尔先生^①。在一八七八年写的一篇題为《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The Isolated Socialist State)的文章里，福尔馬尔描述了德国——这个国家的无产階級比先进的英国的无产階級还要发达得多——独立建設社会主义的前景。在好几个地方，他肯定而且十分明确地談到据斯大林說連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了解的发展不平衡的規律。根据这个規律，福尔馬尔在一八七八年就得出了这个无法駁斥的結論：

44 “在当前普遍存在而且将来也会保持其力量的状况下，可以預見，社会主义在一切文明国家同时取得胜利是絕對談不上的。”

在进一步闡述这个思想时，福尔馬尔說：“这样我們就得出**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結論。我希望我已經证明这是**最有可能**虽然并不是唯一可能的方式。”

这里我們可以把“孤立的国家”这个詞理解为无产階級专政的

^① 福尔馬尔(Georg Heinrich von Vollmar, 1850—1922), 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机会主义领导人之一。——譯者注

国家。就这个意义来说，福尔馬尔表达了一个为馬克思和恩格斯熟知的、也是列宁在前面引用的一九一五年的文章中曾經表达过的不容駁斥的思想。

但是接着下来就純粹是福尔馬尔自己的思想了。附带說一句，和我們現在鼓吹一国社会主义理論的那些人的提法比較起来，福尔馬尔的提法远不是那样片面和錯誤。福尔馬尔在他的解释中以下列論点作为出发点之一：社会主义德国将和世界資本主义經濟保持活跃的經濟关系，同时具有技术远較发达而生产成本远較便宜的有利条件。这种解释以社会主义制度和資本主义制度和平共处的前景作为基础。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必須不断显示它在生产上的巨大优越性，世界革命的必要性就自行消失了；社会主义将以在市場用更低的价格銷售貨物的办法战胜資本主义。

布哈林是綱領第一个草案的作者，也是第二个草案的作者之一。他在解释一个国家建設社会主义問題时，完全从孤立的、自給自足的經濟这种思想出发。布哈林所写的一篇題为《論我們革命的性质和苏联建設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文章^①是經院哲学加詭辯的典范，一切推理都是在孤立的經濟的范围内进行的。它的主要理由也是唯一理由是这样的：

45

“既然我們具有建設社会主义‘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因此，建設社会主义的过程本身不可能存在什么到此为止、往后不能繼續建設的一个点。如果我們国家内部具有这样一种力量的联合，以至每次和前一年比較起来我們都向前迈进了，我們經濟中的社会主义成分的优势增加了，我們經濟中的各个社会化了的部門都比私有資本主义成分增长得更快，那末，我們在跨进每一个新的

^① 《布尔什維克》，一九二六年第 19—20 期。

年代的时候都是拥有优势力量的。”

“既然我們具有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因此，我們就行了。这种推理是无可指責的。从一个尚需证明的論点出发，布哈林建立了一个既沒有任何入口也沒有任何出口的自給自足的完整的社会主义經濟体系。至于外部环境即整个世界的問題，布哈林和斯大林一样，都仅从干涉角度提到它。当布哈林在文章中談到必須从国际因素中“脫身而出”的时候，他腦子中想的不是世界市場，而是軍事干涉。布哈林沒有必要从世界市場中脫身而出，因为他在整个解释中根本忘掉它了。根据这种方式，布哈林在俄国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鼓吹說：如果我們不受到干涉的阻碍，我們“即使用烏龟的速度”也将建成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之間的毫不間断的斗争問題，社会主义只能以最发达的生产力作为基础的事实，一言以蔽之，一种社会組織必須在日益增长的生产力的基础上取代另一种社会組織的馬克思主义的动力学——所有这一切都完全被一笔抹煞了。革命的和历史的辯证法已經被自給自足的社会主义这样一种吝嗇鬼的反动幻想取而代之；这种社会主义建立在技术很低的基礎上，在国家范围内用“烏龟的速度”发展，它和外界的联系仅仅在于害怕干涉。拒絕接受这种丑化馬克思和列宁的理論的可怜說法，就被宣布为“社会民主主义傾向”。对于我們的观点的这种描繪是在前面引用的布哈林的文章中第一次普遍提出并予以“证实”的。历史将会記載：我們因为拒絕接受根据福尔馬尔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論重新拼凑起来的更不象样的东西，就陷入了“社会民主主义傾向”。

如果俄国不是世界經濟鏈条中的一个环节——最薄弱的一环，然而仍然是一环——的話，沙皇俄国的无产階級就不可能在十月夺取政权。无产階級夺取政权这个事实絕對沒有把苏維埃共和国排除在資本主义造成的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以外。

就像仅在黄昏才飞出的聪明的蝙蝠一样，一国社会主义理論是在原有的固定資本日益耗尽的我們的工业——其中三分之二具体表現了我国工业对世界工业的依賴——已經显示迫切需要恢复和扩大和世界市場的联系时，是在对外貿易問題已經充分出現在我們的經濟領導人面前时突然提出的。

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也就是在他有机会向党发表演說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及时提出了警告，指出党将不得不經受另一次考試：“……俄国和国际市場举行的考試，我們依靠这个市場，同它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①

最近几年来，我們对外貿易的数字已經成为我們經濟計劃数字的關鍵。这个簡單事实給孤立地建立“完全的社会主义”的理論以无与伦比的致命打击。我們的經濟——包括工业在內——的“最紧张的部位”是我們的进口貿易，而进口貿易則完全依靠我們的出口。由于一根鏈条的抵抗力总是按照它最薄弱的一环来衡量的，所以我們的經濟計劃的規模就要适应我們进口貿易的規模。 47

在《計劃經濟》杂志（国家計劃委员会的理論刊物）上面，我們讀到一篇专談計劃制度問題的文章。文章說：

“……在拟訂当前年度的控制数字时，我們在方法上必須以我們的进出口計劃作为整个計劃的出发点；在为各个工业部門——从而也就是为一般工业特别是新工业企业的建設——拟訂的計劃中，我們必須遵循这个方向”^②，等等。

国家計劃委员会在方法上采取的这种态度說得很干脆，所有有耳朵的人都可听到：控制数字決定我們經濟发展的方向和速度，

① 《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 243 頁。原文中无着重体。——譯者注

② 《計劃經濟》，一九二七年一月号，第 27 頁。

但是这些控制数字已經受到世界經濟的控制；我們已經变得强大起来这个事实并没有使我們摆脱孤立的恶性循环。

資本主义世界通过它的进出口数字告訴我們：除了軍事干涉以外，它还拥有其他的說服工具。劳动生产率和整个社会制度的生产率在市場上是通过价格的相互关系予以衡量的。就这个意义來說，苏維埃經濟所面临的最巨大、最直接的威胁也許并不是軍事干涉，而是更廉价的資本主义商品的干涉。单单这个事实就說明：問題决不仅仅是对“本国”資產階級取得孤立的經濟胜利：“世界各国行将爆发的社会主义革命，决不会只是一个无产階級战胜本国資產階級的事情。”^① 这里涉及到两种社会制度的竞争，两种社会制度进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一种社会制度还是刚刚开始落在落后的生产力的基础上进行建設，而另一种社会制度今天仍然有大得无可衡量的生产力作为依据。

如果任何人认为承认我們依賴世界市場（列宁直率地談到过我們对世界市場的**依靠**）是一种“悲观”的表現，那就說明他自己在世界市場面前表現了土里土气的小資產階級的胆怯，說明他这种沒有見過世面的乐观——希望离开世界經濟，躲到一丛小树后面去設法用自己的資源敷衍一下——是极为可怜的。

新的理論把苏联可能由于軍事干涉而灭亡但决不会由于自己經濟落后而灭亡这个异想天开的論点当作有关荣誉的問題。但是，由于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劳苦大众保卫自己国家的积极性必然远远超过資本主义的奴隶进攻这个国家的积极性，这就产生了一个問題：为什么軍事干涉具有給我們带来灾难的威胁呢？因为敌人在技术上是无比强大的。布哈林仅仅在軍事技术方面承认生产力的优势。他不願意了解一台福特牌的拖拉机和一門克魯索

^① 《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組織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136頁。——譯者注

特^①制造的炮是同样危险的，唯一的区别在于大炮仅仅有时可以加以利用，而拖拉机则经常不断地对我们施加压力。此外，拖拉机知道在它无计可施的时候背后还有一门大炮可供使用。

我们是第一个工人国家，是世界无产阶级的一部分。我们和世界无产阶级都**依靠**世界资本。“联系”这个无足轻重的、中立的、受到官僚主义地阉割的词得到传播，其目的只是为了掩饰这些“联系”的沉重而危险的性质。如果我们按照世界市场的价格生产，我们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将远不像今天这样严重，虽然仍然是一种依赖。然而，不幸的是，情况并非如此。我们垄断对外贸易这个事实本身就证明我们的依赖具有严重而危险的性质。这种垄断之所以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决定性意义，正是因为目前力量对比是对我们不利的。但是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对外贸易的垄断只能调节我们对世界市场的依赖程度，不能消灭这种依赖。

[列宁说:]“只要我们苏维埃共和国还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一个孤立的边沿地区，那种认为我国经济完全可以独立和某种危险已经消失的想法，就是十分可笑的幻想和空想。”^②

因此，主要的危险是从苏联的客观地位、即作为敌视我们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孤立的边沿地区”的地位产生的。然而这些危险可能减少也可能增加。这决定于两个因素的作用：一方面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归根结蒂，第二个因素，即整个世界经济的命运，当然具有决定性意义。

是否会发生——在什么具体情况下可能发生——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生产率经常落后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生产率的情况，以

① 克鲁索特(Le Creusot)是法国的一个地方。施耐德公司(Schneider & Co.)在那里设立的钢铁和兵工厂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工厂之一。——译者注

② 《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447—448页。原文中无着重体。——译者注

至最后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灭亡呢？在有必要独立建立工业基础——从而对领导提出高得无可比拟的要求——的新阶段，如果我们善于管理经济，那末我们的劳动生产率就会增加。但是，资本主义国家、或者更正确地说是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将比我国劳动生产率增加得更快的情况是否无法想像呢？如果不明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就没有任何根据干巴巴地断言我们的速度“本身是”足够的（更不用提所谓“乌龟的速度”的荒谬哲学了）。但是，要回答两种制度竞争的问题这个企图本身，就使我们进入了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领域；也就是说，进入了由包括苏维埃共和国（但决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间或寻求国际支持的苏维埃共和国）在内的革命国际采取行动和作出决定的领域。

綱領草案在談到苏联的国家经济时，說它“正在以**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速度发展大规模工业”。我们必须承认，和綱領作者完全否认我们的发展和世界发展之间的相对系数问题的时期比较，这种把两种速度并列的企图是在原則上前进了一步。斯大林曾經說沒有必要“硬把国际因素插进来”。^①布哈林則說：讓我們建設社会主义，“即使用乌龟的速度”也行。几年的原則爭論正是在这方面进行的。**从形式上說**——我們已經在这方面取得胜利。但是，如果我们不仅在綱領中加进两种经济发展速度的比较，而是深入到根本问题去，那就显然不容許在綱領的另一部分和资本主义世界毫无联系地、仅仅从内部关系出发谈什么“足够的最低限度的工业”；就任何一个具体国家独立建成社会主义是“可能还是不可能”的问题作出决定，甚至只是提出这个问题，也是同样不能容許的。这个问题决定于两种制度、两个世界阶级之间的斗争的发展进程；而在这个斗争中，无论我們在**恢复时期**增长系数是多高，一个无可争辩的基本事实仍然是：

① 出处不詳。——譯者注

“如果就国际范围的資本來說，那末它現在不但在軍事上，而且在經濟上仍比苏維埃政权强大。应当从这一基本情况出发，而且任何时候也不要忘記这一点。”^①

不同发展速度的相互关系問題仍然是一个尚待解决的問題。它不仅决定于我們是否能够达到“結合”，保证粮食的征收和增加进出口；換句話說，它不仅决定于我們国内的胜利——当然，这些胜利在这場斗争中是极其重要的因素——，而且决定于世界資本主义的命运，决定于世界資本主义是停滯、上升还是崩潰，也就是說，决定于世界經濟和世界革命的发展。因此，这个問題不是在国家范围内、而是在世界經濟政治斗争的范围内加以解决。

8. 产生反动的烏托邦的“一国社会主义” 的理論根源：生产力和国家疆界的矛盾

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一国社会主义理論的基础可以归結为：一方面引用列宁一些話来加以詭辯的解释，另一方面則对“发展不平衡的規律”作經院哲学式的解释。如果正确地解释这个历史規律和有关的引語，我們就会得出一个根本相反的結論，也就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包括直到一九二五年以前的斯大林和布哈林在內的我們大家得出的結論。

由于資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此起彼伏的，所以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也是時間不一的、不平衡的、此起彼伏的；由于各国的相互依賴是极为紧密的，所以一国建設社会主义不仅在政治上而且

52

而且在經濟上也是不可能的。

讓我們从这个角度再一次比較仔細地看看綱領本文是怎样說的。我們已經在导言中看到这样一句話：

^① 《在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463頁。原文中无着重体；在“苏維埃政权”后面还有“和苏維埃制度”等字。——譯者注

“帝国主义……使世界經濟生产力的增长和民族国家的壁障之間的矛盾加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①

我們已經說过：这个論点是——毋宁說原来打算成为——国际綱領的基础。但是，正是这个論点先天就把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論作为一种反动理論而排斥、拒絕和拋到一边去了，因为这种理論不仅和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趋势**、而且和这一发展已經取得的**物质成果**是互相对立的，不可調和的。生产力和国家疆界是不相容的。結果不仅带来了对外貿易、人力和資本的輸出、强占領土、殖民政策和上次帝国主义战争，而且使建立一个自給自足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作在經濟上成为不可能的事。**資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早已打破国家疆界。但是社会主义社会只能建立在最先进的生产力的基础上，建立在包括农业在內的各种生产过程电气化和化学化的基础上，建立在使現代尖端技术結合起来、普遍化并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的基础上。从馬克思开始，我們不断重复指出資本主义不能适应它自己带来的新技术的精神；这种精神不仅撕破了資产階級私有制的外皮，而且正如一九一四年战争所表明的那样，打破了資产階級国家的国界的铁箍。然而社会主义不仅必須把資本主义最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接收过来，而且必須立刻推动生产力的进步，把生产力提高到更高的水平，使生产力达到資本主义制度下从未达到的发展状况。这就出現了一个問題：既然如此，社会主义怎么能够把生产力赶回到它們在資本主义制度下曾經猛烈企图冲破的民族国家的疆界中去呢？或者說，是否我們应当放弃使国家疆界从而使**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論的疆界**显得过分狹隘的、让生产力“肆意”发展的想法，而局限于——譬如說——受約束的、馴服的生产力即經濟落后的技术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末在許多工业部

^① 參見《共产国际綱領》，第2頁。这里指的是綱領草案。——譯者注

門我們現在就应当立即停止前進，而且逐漸降低到甚至比我們目前這樣可憐的技術水平更低的水平去，因為目前的水平曾經使資產階級的俄國和世界經濟結成不可分離的紐帶，使俄國卷入帝國主義為了擴張領土、使已經突破國家疆界的生產力獲得新的領域的戰爭漩渦中去。

在繼承和恢復這些生產力以後，工人國家就不得不開展進出口貿易。

困難在於：綱領草案把現代資本主義技術和國家疆界互不相容這一點機械地寫入自己的內容中去，然後推論下去又恍惚根本不存在這種互不相容的問題。整個草案基本上是從馬克思和列寧那裏搬來的一些現成的革命論點，加上和這些革命論點絕不相容的機會主義或中派主義的結論揉合而成的。因此必須密切注意綱領草案的主要傾向，而不要受草案所包含的孤立的革命論點的迷惑。

我們前面已經引用了草案第一章談到社會主義有可能“在一個孤立的資本主義國家內”^①取得勝利的話。這個思想在第四章裏面說得更為露骨、更為明確；

“世界無產階級專政〔？〕……只有在幾個個別國家內社會主義〔？〕取得勝利的時候，在新成立的無產階級共和國和已經存在的無產階級共和國結成聯盟的時候才能實現。”^②

如果我們把“社會主義取得勝利”這幾個字僅僅解釋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另一說法，那末這就是一種誰也无法駁斥的一般敘述，雖然應當說得更清楚一些。但是，綱領草案的作者們並不是這樣想的。他們所說的社會主義的勝利，不僅意味着奪取政權和生產資料的國有化，而且意味着在一個國家內建成社會主義社會。如果

① 參見《共產國際綱領》，第32頁。——譯者注

② 參見同上書，第33頁。——譯者注

我們接受这种解释，那末我們得到的将不是以国际劳动分工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經濟，而是自給自足的社会主义公社按自得其乐的无政府主义精神組成的一个联盟，其唯一区别在于这些公社将扩大到现在的民族国家的規模。

綱領草案亟于采取折衷的办法用旧的习惯的說法把新的說法掩盖起来，因此求助于下列論点：

“只在无产阶级得到完全的世界胜利与它的政权在全世界上巩固以后，才会跟着有长的尽力建設社会主义世界經濟的时期。”^①

把这个論据当作理論上的盾牌，实际上只能暴露其基本矛盾。如果我們把这个論点解释为真正建設社会主义的时代只有当无产阶级至少在几个先进国家取得胜利以后才能开始，那末这就根本否定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論，回到了馬克思和列宁的立場。但是，如果我們以綱領草案各节中包含的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新理論作为出发点，那末我們所看到的前景則是：在世界无产阶级在全世界取得完全胜利以前，就有一些国家在本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然后以孩子搭积木的方式通过这些国家来建立世界社会主义經濟。事实上，世界社会主义經濟决不会是民族社会主义經濟的总和。从根本方面來說，它只能在資本主义过去的整个发展所創造的世界劳动分工的土壤上形成。它的基本成分不会在一些单个国家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以后就形成和建立起来，而是将在需要几十年才能完成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风暴中形成和建立。第一批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在經濟上的胜利不是用它們接近自給自足的“完全的社会主义”的程度来衡量，而是用这种专政本身在政治上的稳定程度和它在为将来的世界社会主义經濟准备基本条件方

① 參見《共产国际綱領》，第 32 頁。——譯者注

面取得的成就来衡量。

这种修正主义的思想在第五章里面得到了——假設可能的話——更明确因而也就更露骨的表现。在第五章里，綱領草案的作者們躲在从列宁身后遗留的文章中摘出并且經過他們歪曲的一行半文的后面，宣称苏联：

“……国内具有必要而且足够的物质前提，不仅可以推翻封建地主和資產階級，而且可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①

究竟是由于什么情况我們就得到了这样特別优越的历史条件呢？关于这一点，我們在草案第二章找到了答案：56

〔十月革命使〕“帝国主义的战綫，在它最弱的据点上——在沙皇的俄国——被突破了。”^②（着重体是我們用的。）

这是列宁的光輝論点。它的意思是說：俄国是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当中最落后的，經濟上最軟弱的。这正是俄国統治階級首先垮台的原因，因為他們給这个国家原已不足的生产力加上了无法承受的負担。不平衡的間歇式的发展从而迫使最落后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首先起来夺取政权。在过去，人們教导我們說，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位于“最弱的据点”的工人階級和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比較起来，在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将碰到最大的困难。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是比較困难的，但是在他們——當我們还远未克服我們的落后性以前——夺取政权以后，不仅将要超过我們，而且将要携带我們前进，使我們逐漸接近在世界最高技术水平和国际劳动分工的基础上真正建設社会主义的阶段。當我們大胆举行十月革命时，我們就是这样想的。党曾經在报刊上和會議上不是几十次而是几百次几千次地提出这个思想。但是从一九二五年以来，有人却企图用完全相反的思想取而代之。現在

① 参見《共产国际綱領》，第 58 頁。——譯者注

② 参見同上书，第 16 頁。——譯者注

我們获悉：前沙皇俄国是“最弱的据点”，这个事实使作为沙皇俄国及其一切弱点的继承者的苏联无产阶级得到了无法估计的好处，也就是说，使他們不多不少恰好具有本国的为“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所必需的条件。

57 可怜的英国不具备这种有利条件，因为它的生产力过份发达，几乎需要全世界为它提供必需的原料和处理它的产品。如果大不列颠的生产力比较“有节制”，如果他們使工农业保持着相对平衡，那末英国无产阶级显然就可以在他們的受到海軍保护、不致遭受外国干涉的“孤”島上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了。

綱領草案第四章把资本主义国家分为三类：(1)“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国家(美国、德国、英国等)”；(2)“资本主义中等发展的国家(一九一七年以前的俄国、波兰等等)”；(3)“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国、印度等)”。^①

尽管“一九一七年以前的俄国”和今天的中国远比今天的美国更为接近，如果不是因为这种图解式的分类变成了草案其他部分所包括的虛假結論的来源的話，人們本来可以克制自己不提出任何严重的反对意見。由于草案宣称“中等”国家具有独立建設社会主义的“足够的、最低限度的工业”，那末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国家就更是如此了。只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需要外来援助。我們以后将要看到，綱領草案在另一章里面正是这样描述这些国家的。

但是，如果我們仅仅用这个标准来看待社会主义建設問題，抛开一个国家的自然資源、它的工农业的相互关系、它在世界經濟体系中的地位等其他条件不談，那末我們就会陷入新的同样严重的錯誤和矛盾。我們刚才談到英国。英国无疑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資

^① 參見《共产国际綱領》，第 53—54 頁。——譯者注

本主义国家。正因为如此，它根本不可能在本島的范围内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英国如果受到封锁，只要几个月它就会被扼杀。

在其他一切条件相等的情况下，生产力比较发达诚然对建设社会主义有很大好处，使经济生活即使在遭受封锁时也具有与众不同的灵活性。资产阶级德国战时的情况就是一个证明。但是在民族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对这些先进国家将意味着普遍走下坡路，意味着大规模削减生产力，也就是说，意味着某种和社会主义的任务完全相反的结果。

纲领草案忘记了目前的生产力和国家疆界互不相容这个根本论点。根据这个论点，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对一国建设社会主义所起的阻碍作用决不比不发达的生产力所起的阻碍作用小，虽然原因刚刚相反：后者不足以成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基础；而对前者来说，作为这种基础却是大材小用。正是在最需要运用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最需要重视这个规律的地方，这个规律却被置诸脑后。

仅仅从一个国家的工业是“成熟”还是“不成熟”来说，并不能解决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这种“不成熟”本身就是不平衡的。在苏联，某些工业部门极为不足，不能满足国内最起码的需要（特别是机械制造）；另一些工业部门却相反，如果不大量出口而且不断增加出口，它们在目前条件下就无法发展。这方面包括木材、石油和锰矿等非常重要的部门，农业更不用说了。另一方面，如果（相对）“过多”的部门不能出口的话，甚至“不足”的部门也不能认真发展。在我们现世经济的具体地理历史条件下，而不是在乌托邦或大西島^①上，建立一个孤立的社会主义社会之所以不可能，在不同

① 大西島(Atlantis)，神話中的島嶼，傳說位於大西洋中。柏拉圖及其他古代作家曾經提到過它，說它是在一次地震後沉沒的。——譯者注

国家是由不同的因素决定的——由于某些部門发展不足，也可能由于其他部門发展“过多”。整个看来，这就是說，現代生产力和国家疆界是不相容的。

“帝国主义战争是什么呢？它是生产力的革命。这个革命不仅反对资产阶级的财产形式，而且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疆界。帝国主义战争說明民族国家的疆界使生产力受到了无法忍受的限制。我們始終认为，资本主义不能控制它本身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只有社会主义能够使已經脹破资本主义国家疆界的生产力在一个更高的經濟实体中結合起来。一切往后退向孤立国家的道路都已經堵塞了。……”^①

在力图证明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論时，綱領草案犯了双重的、三重的以至四重的錯誤：它夸大了苏联的生产力；它故意不看各个工业部門发展不平衡的規律；它忽視国际劳动分工；最后，它还忘記了帝国主义时代內在的最重要的矛盾，即生产力和国家壁障的矛盾。

为了避免不加分析就放过任何一个論点，我們还需要追述布哈林为了捍卫新的理論而提出的另一个論点，一个具有概括性的論点。

布哈林說：从世界范围来看，无产阶级的相互关系丝毫不比苏联目前存在的关系强。因此，如果由于落后的原因苏联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那末在世界經濟范围内实现社会主义也就是同样不可能的了。

这个論点值得收入一切辯证法教科书里去，作为經院哲学思想方法的典型例子。

首先，整个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間的力量对比关系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记录》，托洛茨基的演說，第100頁。

很可能和苏联的情况沒有很大的区别。但是，世界革命决不是按照算术平均方法完成的。附带說一句，民族革命也不是这样完成的。所以十月革命首先是在无产阶级的彼得格勒发生和巩固地立定脚跟的，而并没有选择一个工农相互关系符合整个俄国一般情况的地区。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相继創立革命政府和革命军队以后，它們不得不花几年时间去推翻边远地区的资产阶级；苏联疆界以内建立的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现在这种相互关系仅仅是被叫做革命的这个过程的结果。革命并不是按照算术平均的方式发生的。它可以从一个比較不利的地区开始。但是，除非它在民族和世界战线的关键地区都已经立定脚跟，否則就不容許談什么革命的完全胜利。

其次，如果有了“一般的”技术水平，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并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因素。此外还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战争。包围苏联的不是工人和农民的世界，而是一个资本主义世界。如果全世界的资产阶级都被推翻，这件事本身还不能改变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也不能改变苏联以及全世界的一般技术水平。尽管如此，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将立即获得和目前完全不同、为目前情况绝对无法比拟的可能性，达到完全不同的无法比拟的规模。

61

第三，如果說每一个先进国家的生产力都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国家疆界所能容纳的范围，那末按照布哈林的意见就应得出結論，认为一切国家生产力的总和已经超过我們星球所能容纳的范围，因此必須在太阳系范围内才能建成社会主义。

我們再說一遍：以工人和农民的一般比例为出发点的布哈林式的論点必須收进一切政治启蒙課本，其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像現在这样维护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論，而是为了证明經院式的詭辯和馬克思主义辯证法是完全不相容的。

9. 这个問題只能在世界革命 戰場上解決

新的理論宣稱：只要不遭到干涉，就可以在民族國家的基礎上建設社會主義。從而就可以而且必須得出結論（不管綱領草案說得如何天花亂墜），就是應當實行和外國資產階級勾結的政策，以便避免干涉，因為這樣做就保證了社會主義的建設，也就是說，就可以解決主要的歷史問題。因此，屬於共產國際的各個政黨的任務在性質上是一種附屬品；它們的使命是保護蘇聯不遭受干涉，而不是為奪取政權而鬥爭。當然，這不是主觀意圖的問題，而是政治思想的客觀邏輯的問題。

62 斯大林說：“意見分歧在於：黨認為這些〔內部〕矛盾和可能發生的衝突用我國革命本身的力量是完全可以克服的，而托洛茨基和反對派則認為這些矛盾和衝突‘只有在國際範圍內即在無產階級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夠克服。”^①

不錯，這正是意見分歧所在。對民族改良主義和革命國際主義之間的分歧不可能有更好的更正確的說明了。如果基本上是世界矛盾的反映的我們的內部困難、障礙和矛盾可以僅僅用“我國革命本身的力量”而不必在“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舞台上”來解決，那末共產國際就成了一個部分是附屬性、部分是裝飾性的機構，共產國際的代表大會可以四年召開一次，十年召開一次，或許根本不必召開了。即使我們補充說，其他國家的無產階級必須保護我們的建設不遭受軍事干涉，按照這種論斷共產國際必須扮演和平主義的工具。這樣一來，它的主要作用，它作為世界革命工具的作用，不可避免會退居次要地位。我們再說一遍，這並不是由於任何人

^① 《〈論我們黨內的社会民主主義傾向〉報告的結論》，《斯大林全集》第八卷第312頁。着重體略有不同。——譯者注

的主观意图(刚刚相反,綱領里面有些論点证明它的作者們具有很好的意图),但是这的确是根据新的理論立場的內在邏輯得出的結論。这个立場比最恶劣的主观意图还要危險一千倍。

事实上,甚至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上,斯大林居然大胆地发展和維護了下列思想:

“正因为我們党沒有权利欺騙〔!〕工人階級,它就應該直截了当地說:对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缺乏信心**〔!〕,就会使我們党放弃政权,使我們党由执政党的地位轉到在野党的地位。”^①(着重体是我們用的。) 63

这句话的意思是說:我們只有权利相信民族經濟的微薄資源,但是决不能大胆对国际无产階級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資源寄予信心。如果不发生国际革命我們就不能繼續維持下去,那就放弃政权,放弃我們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而在十月革命中征服的政权。如果我們从一个錯誤透頂的論点出发,就会以这种意識形态的崩潰为結束!

当綱領草案說苏联的經濟成就是世界无产階級革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时,它表达的思想是无可非議的。但是,这个新理論在政治上的危險性在于对世界社会主义的两种杠杆——一种是我們的經濟成就,另一种是世界无产階級革命——作了錯誤的比較。沒有胜利的无产階級革命,我們就不能建設社会主义。欧洲工人和全世界工人都必須清楚地懂得这一点。經濟建設的杠杆是极为重要的。沒有正确的領導,无产階級专政就会削弱;它的垮台将使国际革命遭到許多年都无法复原的打击。但是,社会主义世界和資本主义世界之間的主要历史斗争的結局决定于第二种杠杆,即世界无产階級革命。苏联的巨大重要性在于它是世界革命爭夺的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再論我們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傾向》,《斯大林全集》第九卷第 21 頁。——譯者注

基地，根本不在于它能够独立于世界革命以外而建成社会主义的这个假設。

布哈林曾經不止一次以毫无根据地目空一切、唯我独尊的腔調質問我們：

64 “如果已經有了先决条件、出发点和足够的基础，甚至在建設社会主义的工作中已經取得一定的成就，那末，一超过就会使一切‘顛倒过来’的极限在哪里呢？这种极限是不存在的。”^①

这是糟糕的几何学，不是历史的辯证法。这种“极限”是可以有的，而且可以有好几条极限，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有政治的也有經濟的，此外还有軍事的。最重要和最可怕的“极限”有可能是世界資本主义的真正的长期的稳定和一次新的兴旺。結果，这个問題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就轉移到世界舞台上去了。资产階級能不能获得一个資本主义发展和統治的新时期呢？仅仅否认这种可能性，指望資本主义处于“毫无希望的地位”，那就完全是革命空談。“絕對毫无希望的情况是沒有的。”（列宁）^② 目前欧洲各国階級力量的不稳定的均势，正因为它是不稳定的，所以不可能无限期地繼續存在下去。

斯大林和布哈林认为，沒有其他国家无产階級的“国家”援助，也就是說，沒有其他国家的无产階級战胜资产階級，苏联也可以維持下去，因为工人群众現在表現的积极同情保护我們不致遭受干涉。这种看法和他們的原則錯誤所蔓衍出的一切看法一样，都表現了同样的盲目性。

在社会民主党破坏欧洲无产階級战后反对资产階級的起义以后，工人群众的积极同情拯救了苏維埃共和国。这是絕對无可爭辯的。在这些年代里，欧洲资产階級已經证明无力对工人国家进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記錄》，第 116 頁。

② 出处不詳。——譯者注

行大規模戰爭。但是，如果认为这种力量对比将继续存在許多年，譬如說，繼續保持到苏联建成社会主义，那就完全是鼠目寸光，只看到一个很小的局部情况就对整个发展曲綫作出判断。无产阶级不能夺取政权，资产阶级也沒有为所欲为的充分信心：像这样不稳定的局面迟早必然会以某种方式而突然結束，其結果不是有利于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有利于資本主义取得真正的长期的稳定，而这种稳定的基础将是人民群众遭到压制，殖民地人民遭到摧殘……或許我們自己也要遭到摧殘。“絕對毫无希望的情况是沒有的！”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失敗和革命領導的錯誤，欧洲资产阶级才能够找到摆脱自己的严重矛盾的持久的方法。但是翻过來說也是同样真实的。只有当无产阶级能够在革命道路上找到一条摆脱目前这种不稳定的均勢的出路时，才能阻止世界資本主义取得新的繁荣（当然，这种繁荣将会带来新的大动乱的时期）。

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九日，列宁在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上說：“現在各国的革命政党都应该用实际行动来‘证明’，他們有足够的觉悟性和組織性，他們与被剝削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足够的决心和本領利用这个危机来进行成功的、胜利的革命。”^①

然而，我們国内的矛盾直接决定于欧洲和世界斗争的趋势。如果以馬克思主义的預見性为基础采取正确的国内政策，可能对这些矛盾进行合理的控制，使它們有所緩和。但是只有在克服阶级矛盾以后才能最終克服这些矛盾，而沒有欧洲革命的胜利就談不上克服阶级矛盾。斯大林說得不錯。分歧正在于此。这是民族改良主义和革命国际主义的根本分歧。

^①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199頁。——譯者注

10. 引起一系列社会爱国主义錯誤的 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論

一国社会主义論的必然后果是低估必須加以克服的困难，夸大已經取得的成就。斯大林断言“社会主义已經在苏联实现了十分之九。”^①再也找不出比这种断言更加反社会主义和反对革命的說法了。这句话似乎是专门說給沾沾自喜的官僚听的。这样說只能彻底敗坏社会主义社会在劳苦大众眼里的声誉。如果我们考虑到苏联无产阶级是在什么条件下取得成就的，考虑到他們从过去继承下来的落后的文化水平，就应当說他們的成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用社会主义的理想来衡量，这些成就是极为微小的。在革命以后的第十一个年头，工人、农业劳动者和貧农看到他們周围的貧穷、困苦、失业、排队买面包的行列、文盲、流离失所的儿童、酗酒以及卖淫的現象并没有得到改善。为了加强他們的信心，需要的是严酷的真理，而不是甜蜜的謊言。我們不应当對他們胡說什么社会主义已經实现十分之九；我們必須告訴他們：我們今天的經濟水平以及社会和文化条件接近資本主义——而且是落后的不文明的資本主义——的程度远甚于接近社会主义的程度。我們必須對他們說：只有在最先进的国家的无产阶级夺得政权的时候，我們才会走上真正的社会主义建設的道路；必須不屈不撓地为这个目的而努力，同时使用两种杠杆——我們国内的經濟努力这个短杠杆，还有国际无产阶级斗争这个长杠杆。

67 总而言之，我們应当抛开斯大林所謂社会主义已經实现十分之九的話，而必須用列宁的話對他們說：

① 參見《論我們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傾向》报告的結論，《斯大林全集》第八卷第270頁。全集中的原話是：“我国革命已实现了这个綱領的十分之九”，“这个綱領”是指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綱領。——譯者注

“俄罗斯〔一个貧弱的国家〕一定会成为这样的国家〔富强的国家〕，只要它能拋掉一切頹丧情緒和空談，只要它能咬紧牙关，集中自己的一切力量，兢兢业业干起来，只要它能認識到唯有走我們已經走上的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才能得救。”^①

在共产国际的出色的领导人那里我們听到过这样一种理由：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論当然是沒有根据的，但是它为在困难条件下艰苦工作的俄国工人提供了奔头，从而使他們得到鼓舞。那些在綱領中不是为自己的階級路綫寻找科学根据而是寻找精神安慰的人的理論已經失敗到什么程度是很难探測的。违背事实的、安慰人心的理論属于宗教的范围，不属于科学的范围；而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鴉片。

我們的党已經用一个完全奉行国际革命路綫、而不是奉行一国社会主义的路綫的綱領，經歷了一个英勇的时期。在写着“落后的俄国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等大字的綱領性的旗帜下，共产主义青年团已經經歷了內战时期最艰苦的年代，經歷了飢餓、寒冷、艰苦的星期六和星期日的劳动、瘟疫和依靠不足糊口的配給維持学习的年代，也为每前进一步付出了无数的牺牲。党员和共青团員在前綫战斗或者往火車站拖运木材，不是因为他们希望用这些木材来建設民族社会主义，而是因为它们有利于国际革命的事业，因为国际革命要求苏維埃的堡垒必須坚持下去——而对于苏維埃堡垒來說，每增加一根木材都是重要的。这就是我們一貫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时代变了，事物也变了（然而并没有变得如此剧烈）。但是，这种原則性的态度甚至現在也保持着充分的力量。工人、貧农、游击队員以及青年共产党人直到一九二五年第一次宣布新的聖經以前，曾經以他們的全部行动表明他們

68

① 《当前的主要任务》，《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147頁。——譯者注

不需要这部新的聖經。但是，高高在上地卑視群众的干部需要它；不願意受人打扰的低級行政管理人員需要它；希望用一种包治一切的、安慰人心的公式作为掩护来作威作福的官僚机构的扈从們也需要它。正是他們这些人认为愚昧无知的人民需要“佳音”，认为离开安慰人心的理論就无法和人民打交道。正是他們这些人迫不急待地虛伪地談什么“十分之九的社会主义”，因为这个公式允許他們拥有特权地位，使他們可以发号施令，使他們可以消灭来自“怀疑派”和“缺乏信心”的人的批評。

所謂否认一国建設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就是泼冷水和扼杀积极性的抱怨和指責，在理論上和心理上很接近改良主义者一貫对革命者提出的指責，虽然这些指責产生的情况截然不同。改良主义者說：“你們告訴工人，說他們在資本主义社会范围以內不可能真正改善自己的命运；仅仅这一点就足以扼杀他們的斗争积极性。”事实是：仅仅在革命者的领导下，工人們才真正展开了爭取經濟利益和議會改革的斗争。

懂得在世界資本主义地獄里不可能建成一个沙漠綠洲似的社会主义天堂的工人，懂得苏維埃共和国的命运也就是他自己的命运完全决定于国际革命的工人，在完成自己对苏联应尽的責任时将比听說我們已經拥有所謂十分之九的社会主义的工人的干劲大得多。69 “如果真是那样，是不是值得努力爭取社会主义呢？”在这方面，改良主义的方針所起的作用也和它一貫起的作用一样，不仅反对革命，而且反对改革。

在前面已經引用过的一九一五年写的那篇关于欧洲联邦口号的文章里，我們写道：

“从民族范围内观察社会革命的前途，就会意味着成为构成社会爱国主义实质的那种民族狹隘性的牺牲品。瓦揚至死还认为法国是社会革命的福地；并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主张护国到底。連奇

之流(有的是虛偽地、有的是真誠地)认为,德国的失敗首先意味着摧毀社会革命的基础。……不应当全然忘記,除了最庸俗的改良主义,在社会爱国主义中还有民族一革命的救世主义在作祟,这种救世主义认为,正是自己的民族国家,由于工业水平、或者由于民主形式和革命成就,負有把人类引向社会主义或‘民主制’的使命。如果革命在一个比較有准备的民族的范围内取得胜利是真的可以想像的話,那末同护国綱領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救世主义就会有其相对的历史依据了。但是,事实上这是不存在的。用破坏无产阶级国际联系的方法来为保存革命的民族基地而斗争,这实际上意味着挖革命的牆脚。革命不能不在民族基地上开始,但是在目前欧洲各国經濟上和軍事政治上处于相互依賴的情况下(这种相互依賴正是在目前的这场战争中空前有力地暴露出来了。)革命是不可能民族基础上完成的。欧洲联邦口号也就是这种将直接促使欧洲无产阶级在革命中行动一致的相互依賴的表现。”^①

70

斯大林对一九一五年的論战作了虛假的解释,从这种解释出发,多次力图证明我在这里說的“民族狹隘性”是隱射列宁。真是荒謬已极。我在和列宁論战时总是公开提出自己的論点,因为我純粹是以意識形态考虑作为指导的。在这个具体例子中,根本沒有涉及列宁。文章指名提到它所指責的人——瓦揚、連奇,等等。必須記住:一九一五年是社会爱国主义猖獗一时的一年,是我們反对社会爱国主义的斗争遭到挫敗的一年。这是我們判断每一个問題的試金石。

前面一段話提出的基本問題的表述无疑是正确的: **一国社会主义的概念是一种社会爱国主义的概念。**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爱国主义开始时是忠实于他們自己的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三卷第一分册,第90頁起。

党——第二国际最强大的党——的一种合法的爱国主义。在德国高度发达的技术和德国人民的卓越組織才能的基础上，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准备建立它“自己的”社会主义社会。如果我们把頑固不化的官僚主义者、个人野心家、議會里的騙子手和一般政治恶棍撇开不談，普通的社会民主党人的社会爱国主义正是从建設德国的社会主义这个信念中产生的。不能設想几十万普通社会民主党人（更不用說千百万普通工人）要求保卫霍亨索伦^①家族或者是保卫資產階級。不是这样的。他們要求保卫的是作为建成社会主义的“必需而且足够的”民族条件的德国工业、德国的铁路和公路、德国的技术和文化，特別是德国工人階級的組織。

71 法国也出現了类似的情况。盖德、瓦揚、和他們在一起的数以千計的最优秀的黨員群众以及几十万普通工人都相信法国正是社会主义未来的福地，因为法国拥有革命的传统，英勇的无产階級，以及具有高度文化的、灵活而富有才能的人民。老盖德和巴黎公社社員瓦揚，以及和他們在一起的几十万真心誠意的工人，既不是为保卫銀行家也不是为保卫食利者而战斗的。他們衷心相信他們是在保卫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土地及其創造力。他們完全从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論出发，以这个概念的名义牺牲了国际团結，相信这种牺牲是“暫時性的”。

当然，拿社会爱国主义者来进行比較将引起爭論。人們会回答說：忠于苏維埃国家的爱国主义是一种革命的义务，而忠于資產階級国家的爱国主义則是叛卖行为。完全不假。在已經成长的革命者当中，难道对这个問題可能有任何爭論嗎？但是，我們随后就会发现，这种无可爭論的道理越来越成为掩飾故意弄虛作假的行为的一种經院哲学式的烟幕。

① 第一次大战时期的德国皇帝。——譯者注

革命的爱国主义只能是有阶级性的爱国主义。它开始的时候是一种忠于党组织、忠于工会的爱国主义，到无产阶级夺得政权时就发展为忠于国家的爱国主义。只要政权掌握在工人手中，爱国主义就是一种革命义务。但是这种爱国主义必须是革命国际主义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一向教导工人：即使是他们为争取提高工资和缩短工时而进行的斗争，如果不是作为一种国际斗争的话，也是无法取得胜利的。可是现在突然出现了这样一种看法，认为仅仅依靠民族的力量就可能达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这是对共产国际的致命打击。

根本的阶级目标甚至比局部的目的更无法用民族的手段或者在一个民族界限以内实现。这种不可动摇的信念正是革命的国际主义的核心。然而，如果可以通过民族的无产阶级在民族界限以内实现最终目的，那就摧毁了国际主义赖以成立的根据。关于一个国家有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论摧毁了已经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失败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尚在取得政权的途中。他们用什么方式方法向这个目标迈进，完全决定于他们把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当作一个国家的任务，还是当作国际性的任务。

72

如果有任何可能在一个国家实现社会主义，那末人们不仅在夺取政权以后，而且在夺取政权以前就可以相信这个理论。如果在落后的俄国的民族范围以内可以实现社会主义，那末就更有理由相信先进的德国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到明天，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就会着手鼓吹这个理论。纲领草案使他们有权利这样做。再隔一天，法国的党也会起而效之。这将是共产国际沿着社会爱国主义的路线分崩离析的开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如果认定它自己的这个特殊国家具有独立建设“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而且足够的”条件，这个共产党就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

沒有任何实质的区别了。社会民主党也并不是因为有了一个諾斯克才开始的；早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它正是在这个同样的問題上栽了一个决定性的跟头。

73 人們說由于忠于一个工人共和国的爱国主义是一种国际义务，因此苏联的存在本身就是防止社会爱国主义的保证。这种片面地运用一个正确思想的做法就包含了明显的民族狹隘性。說这些话的人只想到苏联，故意不看見整个世界的无产階級。要使无产階級在資产階級国家問題上采取失敗主义是可能的，唯一的办法是：綱領在这个中心問題上采取国际路綫，坚决拒絕社会爱国主义的私貨。到現在为止这种私貨还保持着伪装，但是它力图在列宁的国际的綱領中为自己建立一个理論障地。

現在要回到馬克思和列宁的道路上来还不算太晚。只有回到这条道路上来，才会开辟走向进步的唯一可以想象的道路。我們向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提出对綱領草案的这一批評，以便有可能实现这种轉变——而这正是救星所在。

75

二 帝国主义时代的战略和策略

1. 綱領草案主要一章的彻底破产

在共产国际綱領草案中，有一章專門討論革命战略的問題。必須承认，它的用意是十分正确的，并且符合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階級国际綱領的目的和精神。

革命战略的概念仅在战后年代才确立下来。在开始，它无疑受到軍事術語的影响。但它决不是偶然确立下来的。战前，我們仅談无产階級政党的策略；这一概念十分符合当时流行的、沒有超越日常要求和任务范围的工会和議會手段。策略概念被理解为，仅仅服务于一項眼前任务或階級斗争的一个方面的措施的体系。

相反地，革命战略則包括一个綜合的行动体系。这一行动体系，由于他們的相互联系、一致性和发展，必然会引导无产阶级去夺取政权。

从馬克思主义第一次把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夺取政权的任务摆在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面前的时候起，自然就已經制定了革命战略的基本原则。然而，正确地說，第一国际仅仅在理論上制定了这些原则，而且只能通过各国的經驗对它們进行部分的檢驗。第二国际时代产生了这样的方法和观点：用伯恩施坦的臭名昭著的話來說：“运动就是一切，最終目的是微不足道的”。換句話說，战略任务已化为烏有，消失在日常“运动”及其以解决日常問題为目的的局部性的策略之中。第三国际才重新确立共产主义革命战略的地位，使策略方法完全从属于战略。由于前两个国际的宝贵經驗——它們奠定了第三国际的基础——，由于这个时代所具有的革命性质和十月革命的丰富的历史經驗，第三国际的战略立即具有了生气勃勃的战斗性和最广泛的历史意义。在新的国际建立以后的最初十年中，我們不仅看到了伟大的战斗，而且看到了自一九一八年开始的无阶级的最重大的失敗。这就說明，战略和策略的問題，在某种意义上讲，本来應該构成共产国际綱領的中心內容。而在事实上，副題为“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的綱領草案中有关共产国际战略和策略的一章，是写得最差劲的几章中的一章，它几乎毫无意义。这一章里面討論东方問題的一节，实际上只是概括了过去所犯的錯誤，并且为新的錯誤准备了条件。

本章开头一节专门批評了无政府主义、革命工团主义、建設性社会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等。这完全是在模仿《共产党宣言》的文体。当时，《共产党宣言》通过对最重要的各种烏托邦社会主义的特点的巧妙的概述，开拓了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政策的紀元。但是在共产国际成立已經十年的現在，对科尔內利森、阿

图罗·拉布里奥拉和蕭伯納、或不見經传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理論”进行杂乱无章、軟弱无力的批判，这就意味着，不去滿足政治上的需要，反而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迂夫子。这种沒有价值的貨色能够輕而易举地从綱領搬到宣传文件上去。

就战略問題而論，就这一詞的正确意义来讲，綱領草案局限于下述起碼的常識范围：

“将它的影响扩大到本階級的大多数成員……。

“将它的影响扩大到一般劳动群众的广大阶层……。

“为夺取工会而进行的日常工作具有特別大的重要性……。

“爭取最貧苦的农民中的最广大部分（？）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有这些本身并沒有有什么可以爭辯的陈詞濫調，只是一条条地列举在这里。这就是說，它們被写在綱領草案中，而沒有联系时代的历史特点作任何闡述。所以，按照它們目前这样抽象的、学究式的提法，可以毫无困难地写进第二国际的決議中去。綱領的中心問題只在簡短的一段中十分枯燥地、粗略地进行了討論；这一段比論述“建設性”社会主义的一段要短得多。这就意味着，通过革命推翻政权的战略、武装起义本身的条件和道路、夺取政权——所有这一切都是被抽象地和学究式地提出的，而絲毫沒有注意到我們时代活生生的經驗。

78 我們发现，这里提到了芬兰、奥地利无产階級的伟大斗争，匈牙利苏維埃共和国、意大利的九月事件、一九二三年的德国事件、英国总罢工等等，所有这些仅仅是用光秃秃的編年史的形式列举出来的。甚至这样一些事件也不是写在論述无产階級战略的第六章中，而是写在討論“資本主义总危机和世界革命发展的第一阶段”的第二章中。換句話說，无产階級的伟大斗争仅仅是当作客观发生的事件或“資本主义总危机”的一种表現，而不是作为无产阶

級战略經驗而加以研究。指出下列事实足以說明問題：綱領拒絕革命的冒险主义（暴动）——拒絕是必要的——，但它完全沒有回答像爱沙尼亚起义、一九二四年向索非亚教堂投擲炸弹、上次的广州起义这一类事件究竟是革命冒险主义的英勇表現，抑或是无产阶级革命战略的有計劃的行動的問題。討論“暴动問題”而对这个十万火急的問題不予回答，这样的綱領草案只是玩弄外交辞令，而不成其为共产主义的战略文件。

显然，对于这个綱領草案來說，这种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問題的抽象的和超历史的提法并非偶然。这是因为，在討論一般問題时，它采取了舞文弄墨的、学究式的和教訓人的布哈林方式，而沒有采用生动活泼的革命方式。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綱領草案的作者們，由于容易理解的原因，一般不願太深入討論过去五年内的战略教訓。

但是，一个討論革命行动的綱領，自然不能被看成仅仅是和这些划时代的年代中已經发生的一切事件毫无联系的一系列的抽象命題。当然，一个綱領不能詳細叙述过去发生的事件，但它必須从这些事件出发，以这些事件作为基础，围绕并联系这些事件做文章。一个綱領必須通过它所采取的立場使人們可以理解无产阶级斗争的一切重大事实，以及和共产国际内部思想斗争有关的一切重要事实。如果就整个綱領而論这样說是正确的話，那么，綱領中特別論到战略和策略問題的那一部分就更是这样了。这里，用列宁的話來說：除了已經夺得的以外，还必須将已經喪失的、可以轉化为“收获物”的东西記錄下来，如若它已被理解和吸收。无产阶级先锋队需要的不是一张不辯自明的真理清單，而是一个行动手册。所以，我們將在这里最紧密地联系战后时期斗争的經驗，特别是过去五年，即領導发生可悲錯誤的时期的斗争經驗來討論“战略”这一章的問題。

2. 革命时代的战略固有的 根本特点和党的作用

战略和策略一章根本没有对帝国主义时代作为和战前时代截然不同的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战略”特点作任何有条理的阐述。

的确，纲领草案第一章说，整个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特点是“用瓜分和武力夺取尚未被占领的殖民地的方式，使资本主义相对地不断发展和扩大到全世界的时期。”

80 这种概括的确是十分矛盾的，它显然使工业资本主义的全部时期理想化了。这个时期是一个充满巨大的震荡、战争和革命的时期，其程度远远超过在此之前的全部人类历史上所发生的震荡、战争和革命。为了对纲领草案作者最近提出的荒谬的争辩至少提供部分理由，这种对特点进行牧歌式的描述显然是必要的。他们争辩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根本还谈不上”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将工业资本主义全部时期的特点说成是“继续发展”是不真实的，但是，另一方面，将一八七一年到一九一四年，或至少到一九〇五年划为一个欧洲的特别时期是极其重要的。这是一个矛盾的有机累积时期，就欧洲内部的阶级关系而论，这些矛盾几乎从未超出合法斗争的范围，就国际关系而论，这些矛盾都使它们自己适应一个武装的和平的局势。这是第二国际发生、发展和僵化的时期，它的进步的历史作用随着帝国主义战争的爆发而完全告終了。

在作为一种巨大的历史力量来考虑时，政治总是落后于经济的。因此，虽然金融资本和托辣斯垄断集团的统治在十九世纪末叶已经开始，反映这个事实的国际政治的新时代，在世界政治中首先却是以帝国主义战争、十月革命和第三国际的建立作为开始的。

由于政治局势的急剧变化和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经常

发生間歇性的階級斗争，这一新时代的爆炸性特点表现于，国际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已經筋疲力尽，整个說来是不能再前进了。这并不是說，个别的工业部門和个别的国家不能发展、不再发展和甚至不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了。然而，这是在損害而且必然損害其他工业部門和其他国家的情况下发展的。世界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支出，以空前未有的增长比例吞噬着它在世界范围内的收入。因此，由于战前飞速的和几乎不停頓的发展带来的慣性，新的力量对比、世界市場的重新瓜分和战争加深了的矛盾等原因，慣于对世界进行統治的欧洲，現在比其他各洲冲突得更加厉害。正是在欧洲，从“有組織的”时代到革命时代的过渡是特別急驟的。

81

确实，理論上，甚至并不排除资本主义有可能在最强大的、居于統治和主要地位的国家內取得新的普遍进展。但要做到这一点，资本主义必須首先扫除一个巨大的階級的障碍，和具有国家与国家之間性质的障碍。它必須絞杀无产阶级革命使其长期不再发生；它必須完全奴役中国，推翻苏維埃共和国，等等。我們距离这种境地仍然很远。理論上可能发生的事情同政治上估計会发生的事情根本是两回事。自然，这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决定于我們自己，即决定于共产国际的革命战略。归根結蒂，这个問題将取决于国际力量之間的斗争。虽然如此，但在作为草拟綱領着眼点的当代，总的讲，资本主义的发展仍面临着不可克服的障碍和矛盾，并瘋狂地企图扫除障碍和矛盾。正是这一事实使我們的时代具有革命的性质，使革命具有不断性。

时代的革命性质并不在于它容許完成革命，即在一切特定时刻都可以夺取政权。它的革命性在于这个时代存在着深刻的和急剧的波动，在于直接的革命形势——，換句話說，就是能使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那种局势，——經常会突然轉化为法西斯或半法西斯反革命的胜利，再从后者轉化为溫和的临时政权（“左派联盟”，社

82

会民主党进入联合政府，政权轉入麦克唐納的党的手中等等），由此立即迫使各种对抗再度达到頂点并尖銳地提出政权問題。

在战前的几十年內，欧洲局势是怎样的呢？經濟方面——生产力的突飞猛进伴随着时局的“正常”波动。政治方面——在牺牲自由主义和“民主”而又沒有发生重大动蕩的情况下，社会民主党发展了。换言之，这是一个經濟的和政治的矛盾經常不断地加剧的过程，在这种意义上讲，它为无产阶级革命准备了前提。

战后时期的欧洲局势又是怎样的呢？經濟方面——不定期的、痙攣性的生产萎縮和扩大。虽然若干工业部門在技术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生产大体上环繞着战前水平而波动。政治方面——政治局势时左时右地急剧摆动。十分明显，在一年、两年或三年內政治局势的陡变，并不是任何基本經濟因素的变化造成的，而是由完全属于上层建筑性质的原因和冲激所造成的，因此显示出整个制度的极端不稳定性，不可調和的矛盾腐蝕着这个制度的基础。

革命战略——和策略迥然不同——之所以具有重要意义，其原因正在于此。党和党的领导的新的意义也是由此产生的。

83 綱領草案对党下的定义完全限于形式方面（先鋒队、馬克思主义的理論、經驗的体现等），这一定义出现在战前左派社会民主党的綱領中也許听起来并不坏。但在今天，那是完全不够的。

在资本主义正在发展的时期，甚至最好的党的领导，除了加速工人政党的形成以外就不能有其他作为。相反地，领导的錯誤却能推迟这一过程。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前提成熟得很緩慢，党的工作仍然属于准备工作的性质。

反之，在今天，政治形势每一新的向左急剧的变化都給予革命政党一个作出决定的时机，倘使对这一千鈞一发的形势不加利用，它就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党的领导的作用具有

特別的重要性。列宁說，两三天內能够决定国际革命的命运。在第二国际时期，这句话几乎是不可理解的。相反，在我們的时代，列宁的这番話不断得到证实——除了十月革命之外，总是从反面得到证实。只有从这些总的情况来分析，才能了解共产国际和它的领导在当前历史时期的整个运轉中所占的特殊地位。

人們必須清楚地了解，最初的和基本的原因——所謂“穩定”——产生于以下的矛盾：一方面是資本主义欧洲和东方殖民地的經濟和社会地位的总解体；另一方面是各国共产党的軟弱无力、缺乏准备和迟疑不决以及它們领导上的严重錯誤。

并不是凌空而来的所謂穩定阻止了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 84
期間或近年来的革命形勢的发展。相反，未加利用的革命形勢轉变为它的反面，因此，保证了資產階級有机会为穩定进行斗争并取得相对的成功。这种为爭取“穩定”、說得更正确些是为爭取資本主义的繼續存在和发展而进行的斗争所包含的日益尖銳的矛盾，在每一新的阶段，为新的国际的和階級的动乱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就是說，为新的革命形勢准备了必要的条件，新的革命形勢的发展完全取决于无产階級政党。

在一个緩慢的、有机发展的时期，主观因素仍然能够起着全然从属的作用。这时就会出现各种漸进主义的說法，如“慢而穩”，“不能以卵击石”等等。这些說法集中表现了有机发展时代惧怕“跳越阶段”的策略思想。但是，一旦客观条件已經成熟，解决全部历史进程的钥匙落到了主观因素即党的手中。借助于前一时代的灵感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兴盛起来的机会主义，总是倾向于低估主观因素的作用，即党和革命领导的重要性。这一切在关于德国十月事件、英俄委员会和中国革命的教訓的討論中充分地暴露出来了。在所有这些和其他比較次要的事件中，机会主义的倾向都表现为采取一种仅仅依靠“群众”、因而完全蔑視革命的“上层”领导問題

的方針。这种态度总的說是錯誤的，而在帝国主义时代則产生了肯定是致命的后果。

85 十月革命是俄国和全世界階級力量的具体对比以及这些階級力量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取得的具体发展所造成的結果。这一总的命題对一个馬克思主义者是起碼的常識。然而，提出下面这一类問題是和馬克思主义沒有任何矛盾的：假若列宁沒有及时回到俄国，我們会在十月革命中夺得政权嗎？有很多情况表明，我們很可能夺不到政权。甚至在列宁的領導之下，党的首腦們的抗拒是很强烈的，这些首腦們碰巧絕大部分就是今天决定政策的那批人。如若沒有列宁，这种抗拒无疑会更加强烈得多。党或許就不能及时地采取必要的步驟，而我們所能利用的时间是微乎其微的。在这种时期，短短几天有时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当然，劳动群众会以极大的英雄主义自下而上地推动，但如果沒有一个有把握的領導，有意識地領導他們奔向目标，胜利的可能性是很小的。而在同时，資产階級可能将彼得堡拱手让給德国人，并且通过和德国人单独媾和或其他方式，在鎮压无产階級起义之后，很可能以波拿巴主义的形式重新巩固它的政权。事变的全部进程在若干年内可能朝着一个不同的方向发展。

一九一八年的德国革命，一九一九年的匈牙利革命，一九二〇年意大利无产階級的九月运动，一九二六年英国的总罢工，一九二七年的維也納起义和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在所有地区，在整个过去十年中，同一政治矛盾是显而易見的，即令这种矛盾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在客观上已經成熟的革命形势下——不但社会基础成熟了，而且群众斗争情緒往往也成熟了——不是缺乏主观因素即一个革命的群众的党，就是这个党缺乏一个有远見的和无畏的領導。

86 自然，共产党和它們的領導的弱点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

是欧洲整个历史的产物。但假若，在共产国际方面有一个能加速发展进程而不延迟这一进程的正确领导，在目前客观的革命矛盾成熟的情况下，各国共产党是能够以快速的步伐发展的。如若总的讲，矛盾是前进的最重要的动力，那么对于客观革命形势的普遍成熟（虽有高涨和低潮）和无产阶级国际党的不成熟之间的矛盾的理解，现在应该构成共产国际——至少它的欧洲支部——向前发展的动力。

对充满着急剧变化的目前的时代没有广泛的、概括的和辩证的理解，就不可能对年轻的党进行真正的教育，不可能对阶级斗争实行正确的战略领导，不可能把策略正确地结合起来，尤其是在局势连续发生转变时不可能在每一个转折点进行敏捷、勇敢和果断的重新武装。然而正是在发生这种急剧转折的时候，两三天的时间有时就会决定未来若干年内国际革命的命运。

纲领草案关于战略和策略的一章一般地谈到了党为无产阶级而斗争，谈到了总罢工和一般的武装起义。但它一点没有剖析现代的特殊性质及其内在的节奏。对这些问题缺乏理论上的认识和政治上的“感受”，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革命领导。

这就说明为什么这一章从头到尾都是那样的迂腐，缺乏内容和不值一顾。

3. 第三次大会以及列宁和布哈林对 革命过程的不间断性问题的看法

87

战后欧洲的政治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一年；第二时期从一九二一年三月到一九二三年十月；第三时期从一九二三年十月到英国总罢工，甚至现在。

战后群众革命运动强大得足以推翻资产阶级。但是没有任何人促进这样的局面的实现。领导传统的工人阶级组织的社会民主

党竭其全力拯救资产阶级政权。当我们在那个时期期望无产阶级立即夺取政权时，我们估计一个革命的政党是会在内战的炮火中很快地成熟起来的。但这两个条件没有同时出现。当共产党还没有在同社会民主党进行的斗争中成长和成熟起来以便对起义进行领导的时候，战后时期革命的浪潮已经退落了。

一九二一年三月，德国共产党试图利用这一退潮以便一击而推翻资产阶级国家。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这次起义中的指导思想是拯救苏维埃共和国（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当时还没有宣布）。但事实证明，领导的决心和群众的不满还不足以取得胜利。
88 还必须具备其他条件，首先是领导和群众的紧密联系和群众对领导的信任。这个条件在当时是不具备的。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是第一和第二时期的分界线。它把共产党在政治和组织方面的力量都不足以夺取政权这一事实记录下来。它提出“走向群众”的口号，就是说，通过在日常生活和斗争的基础上先争取群众而后夺取政权。因为群众在革命的时代仍然在继续过着日常的生活，即令方式有所不同。

这个问题的提法在受布哈林理论影响的大会上遇到疯狂的抵抗。当时，他持有他自己的不断革命的观点，而不是马克思的观点。“因为资本主义已经筋疲力尽，所以，必须通过不断的革命进攻以取得胜利。”布哈林的立场总是归结为这样的推论。

自然，我从来没有同意过布哈林的“不断”革命的理论。他认为，间断、停滞时期、退却、过渡性的要求等在革命过程中都是完全不可思议的。相反，自从十月革命的第一天起，我就反对对不断革命的这种歪曲。

当我同列宁一样谈到苏维埃俄国同帝国主义世界的对立性时，我想到的是，大的战略曲线，而不是策略性的曲折。布哈林则相反，在他转变为他的反面之前，他总在对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

概念作学究式的曲解。在他的“左派共产主义”^①的日子里，布哈林认为，革命既不允許退却，也不允許同敌人暫時妥协。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談問題发生之后很久，（我对和談的立場与布哈林毫无共同之处）布哈林同当时共产国际的整个极左翼，主张采取一九二一年三月德国武装起义的路綫。他們认为，除非欧洲的无产階級被“发动”起来，除非不断爆发新的革命，苏維埃政权就有必然毀灭的危險。对真正的危險的确在威胁着苏維埃政权的了解，并不能阻止我同列宁肩并肩地在第三次大会上展开一个反对对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概念进行盲动主义的歪曲的不調和的斗争。在第三次大会时期，我們几十次地向急躁的左翼分子宣布：“不要太急于拯救我們。那样做，你們将只能毀掉你們自己，当然也将使我們遭到毀灭。要有步驟地采取为群众进行斗争，以便进一步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道路。我們需要你們的胜利，但不需要你們在不利的条件下准备进行战斗。我們將設法在新經濟政策的帮助下，使我們自己在苏維埃共和国内繼續存在下去。我們將繼續前进。如若你們聚集你們的力量和利用有利的形势，你們仍然有时間在适当的时机帮助我們。”

虽然这发生在禁止派別活动的第十次党代会以后，而列宁在当时仍然主动地成立了新派系的领导核心，对当时强大的极端左翼分子进行斗争。在我們亲切的談話中，列宁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如果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接受布哈林的观点，則应如何进行斗争的問題。我們这“一派”当时沒有再发展下去，只是因为我們的反对者在大会期間有相当的“收敛”。

布哈林离开馬克思主义向左摆的程度当然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厉害。在这次大会上和其后，他带头反对我的关于欧洲經濟形势

① 指一九一八年布哈林集团站在假左派立場，反对簽訂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約。——譯者注

必然上升的观点,反对我的这种預計,即尽管无产階級遭受一系列的失敗,在不可避免的經濟上升之后,革命并不会遭到打击,相反地,革命斗争会得到新的推动力。他坚持經濟危机和整个革命不断发展的学究式的观点,对我在这方面的观点进行了长期的斗争,直到事实终于迫使他象往常一样承认他是錯了,承认得也太晚了。

在第三和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布哈林从他对革命过程不間断性的机械的理解出发,反对統一战綫政策和过渡性要求。

关于无产階級革命的不間断性的全面的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对于馬克思主义的学究式的歪曲(这决非布哈林一个人的詭辯)两种傾向之間的斗争,貫串着整整一系列的其他大大小小問題。但对这些問題一一叙述是多余的。布哈林今天的立場主要还是同一种极左的“不断革命”的煩瑣哲学,这一次只不过倒轉过来而已。例如,直到一九二三年,布哈林还认为如果欧洲不发生不断的經濟危机和內战,苏維埃共和国就会灭亡,而今天他却找到了一个沒有任何国际革命而能建設社会主义的妙方。共产国际現在的领导人总是把他們昨天的冒险主义同他們今天的机会主义立場联系起来,或把他們今天的机会主义立場同他們昨天的冒险主义联系起来。确实的,布哈林的乱七八糟的不断革命論并没有因为上述事实而有任何改进。

第三次代表大会是个屹立的灯塔。它的教导直到今天仍然是重要的和有成果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仅仅将这些教导具体化了。

91 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口号并不簡簡單单是“走向群众!”而是:“通过首先爭取群众而夺取政权!”在列宁领导的一派(列宁将它形象地說成是“右”翼)不得不在这一届大会的全部期間坚决对大会加以約束的情况发生后,列宁在大会接近結束时召集了一次秘密會議,他在会上預見性地警告說:“記着,这仅是一个使革命的跃进能够順利地迅速起跑的問題。爭取群众的斗争就是夺取政权的斗争。”

一九二三年的事件表明，这一列宁主义的立场不但没有为“被领导的那些人”所理解，而且也没有为许多领导人所理解。

4. 一九二三年的德国事件和十月的教训

一九二三年的德国事件，在共产国际的发展过程中，是新的时期开始和列宁主义时期终结的转折点。一九二三年初法国军队占领鲁尔标志着欧洲重新陷入混乱的战争状态。虽然这个疾病的第二次发作无可比拟地较第一次轻微些，但一开始就可以预期会产生强烈的革命后果，因为这疾病在侵袭着已经完全衰弱不堪的德国。共产国际的领导没有适时地考虑到这种情况。德国共产党仍然遵循着它对第三次大会口号所作的片面的解释。这种片面的解释使它决然地背离了一触即发的武装起义的道路。上面我们已经提到，在我们这一急剧变化的时代，革命领导的最大困难在于能否及时地探知政治形势脉搏的跳动，以便掌握急剧的事变并及时地转变方向。革命领导的这些品质并不能单单靠对共产国际的最新通告表示效忠而取得。如若具备必要的理论条件，这些品质能够依靠亲身的经验和真正的自我批评而取得。从一九二一年三月所采取的策略急剧地转变到在报刊上和集会上，在工会和国会中进行有系统的革命活动不是一件易事。在安全渡过这种转变的危机以后，又出现了发生一种新的、片面的、性质完全相反的偏向的危险。群众的日常斗争吸引着一切注意力，形成它自己的策略常规，使人们不去注意由客观形势的变化而产生的战略任务。

92

一九二三年夏，德国的国内形势，特别是由于消极抵抗策略的失败，具有了一种灾祸的性质。非常明显，倘若共产党不能及时地理解资产阶级的处境是“无望的”，如若党不能得出一切必要的革命结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德国资产阶级才能够从“无望的”处境中挣脱出来。然而，恰恰是手持钥匙的共产党，用这把钥匙为资产

階級打开了大門。

93 德国革命为什么沒有胜利？原因應該完全从策略方面寻找，而不是从当时的条件中寻找。我們在这里看到一个丧失革命时机的典型例子。在德国无产階級經歷过最近几年发生的一切事件以后，必須使他們深信这次問題会得到决定性的解决，深信共产党已經准备停当，要进行斗争并能取得胜利，才能够领导他們进行决定性的斗争。可是共产党对实行这一转变采取了非常迟疑不决的态度，并且拖延了很长时间。尽管右翼和左翼相互之間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但是，一直到一九二三年九、十月，它們都对革命发展的进程持着相当程度的宿命論的看法。

現在只有迂腐的人才会在事过境迁之后去調查研究：要是执行正确的政策，夺取政权会是如何有“保证”的問題。革命者不会这样做。我們在这里只引述一下《真理报》提出的关于这个問題的有名的論证。这一論证的提出完全出于偶然，也是独特的，因为它同这家机关报的其他一切言論是相互矛盾的：

“假若在一九二四年五月，当馬克比較稳定，資产階級的地位已經有一定程度的巩固，在中产階級和小資产階級投靠国社党之后，在党内发生深刻危机、无产階級遭到严重失敗之后，假若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还能爭得三百七十万张选票，那么在一九二二年十月，当經濟发生空前的危机、中产階級已完全瓦解，社会民主党队伍中因資产階級本身发生剧烈的和尖銳的矛盾，而出現可怕的混乱，工业地区无产階級群众具有空前的战斗意志的时候，人民的大多数显然都在共产党一边；共产党显然能够也应该进行战斗，而且有一切机会取得胜利。”^①

在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上，一个德国代表（姓名不詳）曾經这样讲过：

^① 《真理报》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五日。

“没有一个有阶级觉悟的德国工人不明白，党应该进行战斗而不应该逃避战斗。

“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完全忘记了党的独立作用；这是十月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①

关于德国党的上层领导和共产国际在一九二三年、特别是在那一年的后期发生了什么问题，已在讨论中说得很多了。尽管所提的许多事情并不符合事实真相。特别是库西宁给这些问题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库西宁从一九二六年某一天起就专心证明季诺维也夫的 leadership 具有灾难性；然而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六年期间，正是同一个库西宁曾经专门证明季诺维也夫的 leadership 是唯一的救星。他本人在一九一八年用尽了他的平庸的才智使芬兰无产阶级革命趋于覆灭。大概是这一事实赋予库西宁以必要的权威来作出上述负责的判断。 94

在德国革命失败之后，有人曾几度想把我说成是支持布兰德勒的路线的。在苏联，这种企图采取了隐蔽的方式，因为苏联了解事实真相的人是太多了。在德国，这种企图是公开的，因为在那里没有人丝毫了解内情，我很偶然地发现，我保存有一段关于当时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内部在德国革命问题上所进行的思想意识斗争的片断的文字记载。在一九二四年一月会议的文件里，政治局直接指责我对投降以前的德国中央委员会采取了敌对的不信任的态度。文件写道：

“……托洛茨基同志在离开中央委员会会议（一九二三年九月全会）之前，发表了使全体中央委员十分不安的讲话。他在讲话中说，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不值一文。他说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内充满着宿命论、浑浑噩噩的气氛等。托洛茨基同志于是宣称，德国

① 《真理报》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95 革命注定要失敗。这次講話使所有出席的人感到抑郁。但大多数同志认为,这种恶毒的攻击是由一个插曲(?)而引起的,与中央全会期間发生的德国革命毫无关系,这次講話不符合客观事实。”^①

不管中央委員們对我所提出的警告(这并非第一次)企图作何种解释,这个警告仅仅是由于我关心德国革命的命运才提出的。不幸,事变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我的論点;部分原因是,处于领导地位的党的大多数中央委員(根据他們自己所承认的)沒有及时地理解,我的警告完全“符合客观事实”。当然,我沒有提出迅即由別人取代布兰德勒的中央委員會的建議(在决定性事变发生的前夕,这一变动完全是冒险主义)。但我从一九二三年夏天起的确提出过,必須在准备武装起义和进行必要的动員来支持德国中央委員會的問題上采取更及时的和坚决的立場。后来人們之所以企图把我說成支持布兰德勒中央委員會,其主要原因是在德国党投降以后,我反对将布兰德勒当作替罪羊,虽然(更正确地說是因为)我认为德国失败的严重性远远超过中央委員會大多数委員們的判断。布兰德勒中央委員會的錯誤,仅仅是共产国际领导总的錯誤的反映。在这个事例中,和在其他事例中一样,我反对这样一种不能容許的制度:力图用定期撤換一国党的领导、使其遭受野蛮的迫害、甚至开除出党的办法,来維持中央领导完全不犯錯誤的說法。

96 在德国中央委員會投降的影响下,我写了《十月的教訓》,我在其中闡述了这样的思想:在当代条件下,几天之內会丧失一个革命的局勢,它在若干年內不会再来。也許很难使人相信:这个意見被扣上了“布朗基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帽子。无数反对《十月的教訓》的文章表明,十月革命的經驗是如何被忘得一干二淨,十月革命的教訓深入人的意識的程度是如此的小。这是一种典型的孟什維克式的逃避責任的做法:把領導上犯錯誤的責任推到群众身上,

^① 一九二四年一月俄国共产党代表會議文件第 14 頁。着重体是我們用的。

或者一般地尽量贬低领导的重要性，借此减轻领导的罪过。这是由于完全不能辩证地理解一般的“上层建筑”，作为阶级的上层建筑的党，和表现为中央领导机构的党的上层建筑。有这样的时代，在这些时代里甚至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能把历史向前推进一步；也有着其他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才能较小然而掌握舵盘的人能长期阻止国际革命的发展。

最近那些将问题说成是，如象我已经放弃了《十月的教训》的观点的企图是完全荒诞无稽的。的确，我已经“承认”了一个次要的“错误”。当我在一九二四年夏写《十月的教训》时，我觉得，在一九二三年秋天，斯大林采取的立场似乎比季诺维也夫所采取的立场更左（即中左）。我不完全了解起着多数派机构秘密核心作用的这个集团的内部生活。这一派别集团分裂以后发表的文件，特别是斯大林给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写的彻头彻尾的布兰德勒型的信件，使我相信，我对这些私人集团的估计是错了。但这与所提出的问题的实质并无任何关系。这种对个人的看法，即使错误，也不是主要的。确实，中派在绕了一些大弯子以后是十分可能发展成左派的。然而如同季诺维也夫的“发展”又一次表明的那样，它完全不能有计划地执行一个革命的路线。

97

我在《十月的教训》内阐述的看法至今完全适用，而且从一九二四年以来，它一次又一次地得到了证实。

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数不尽的困难中，有一个特殊的、具体的和显而易见的困难。它产生于在形势发生急剧变化时革命政党领导的处境和任务。甚至最革命的政党也会有落后的危险，或者有将昨天的斗争口号和手段同新的任务和新的紧急形势对立起来的危险。一般说来，没有比使无产阶级有必要举行武装起义的事变更陡然的事变了。这里存在着危险，即党的领导 and 整个党的政策有可能跟不上阶级的行动和紧急的形势。当政治生活相对不活跃的

时期，这些不协调的情况可以得到补救，即使会遭受损失，但不至于招致大的灾祸。但在极为紧急的革命时期，所缺少的正是消除不协调的时间，如同前方受到攻击时去救援一样。就其性质来说，一个革命危机最紧急的时期是短暂的。一个革命领导（迟疑，动摇，在资产阶级疯狂进攻的情况下观望等待）跟不上客观任务，就有可能在几个星期、甚至几天之内导致灾难，使多年的准备工作付诸东流。

98 当然，领导和党之间，或党和阶级之间的差距也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即在某些情况下，领导跑到了革命发展的前面，将怀孕的第五个月当作了第九个月。一九二一年三月的德国提供了这一差距的最明显的例子。在党内存在着“左派幼稚病”的极端表现，其结局是：暴动（革命的冒险主义）。这个危险对将来来说也是实际存在的。这就是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教训现在仍然完全适用的原因。但是，德国一九二三年的经验的严峻现实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相反的危险：形势成熟了，领导落了后。当领导能适应形势的时候，形势已经变化了；群众在退却，力量对比急剧地发生了不利情况。

一九二三年德国的失败，当然有许多一个国家的特点，但也存在着显示一种一般危险的非常典型的特点。这一危险可以叫做过渡到武装起义前夕的革命领导的危机。无产阶级政党的一般党员，由于他们的特性，比较不易感受资产阶级舆论的压力。但党的领导上的某些人和党的中间阶层，在关键时刻必然会在不同程度上屈服资产阶级的物质上和思想上的恫吓。不承认这一危险就不能对付这一危险。的确，没有适用于一切情况的防止这一危险的万灵妙方。但要与一种危险作斗争，首要步骤是了解它的来源和特性。在“十月之前”的一个时期，一个右翼集团在所有党内的不可避免的出现和发展，一方面反映了同这一“飞跃”俱生的巨大的

客观困难和危险，另一方面反映了资产阶级舆论的疯狂的压力。右翼集团的要旨和含义就在这里。这正说明为什么就在迟疑和动摇是最富危险性的那个时候，它们不可避免地会在共产党内产生。 99
一九一七年，在我们党内仅有少数领导人犹豫动摇，由于列宁的巨大的精力，他们的动摇被克服了。在德国，领导上全都犹豫不决。这种优柔寡断传染到党内，通过党传染到阶级。革命形势就是这样丧失的。在中国，工人和贫农为夺取政权而战斗，中央领导反对这一斗争。当然，所有这一切，还不是领导上在最有决定性的历史时刻的最后的危机。把这种不可避免的危机减少到最低限度是每一个共产党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也是整个共产国际最重要的任务之一。除非完全了解与一九二三年德国党的经验形成对比的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经验 and 当时我们党内的右翼反对派的政治内容，就不能把危机减少到最低限度。

《十月的教训》的要旨正在于此。

5. 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基本战略错误

从一九二三年年底开始，我们看到了整整一系列的共产国际的文件，和它的领导人的讲话，谈论一九二三年秋天所犯的“速度方面的错误”。这些文件和讲话总是提到马克思：你瞧，马克思也在时间方面有过错误的估计。同时，他们对共产国际关于“速度方面的错误”究竟是过低还是过高估计了夺取政权的关键时刻的到来的问题却故意保持缄默。按照近年来领导上传统采用的复式簿记的做法，账上留着一个空白，可以把过低的估计，也可以把过高的估计填上去。

但是，根据这一时期共产国际的整个政策是不难作出结论的。 100
一九二四年整整一年和一九二五年的大半年，共产国际的领导认为，德国危机的高潮还没有到来。所以，把马克思搬出来是完全不

适宜的。因为，由于馬克思的远見，他虽然偶而感到革命的到来比实际情况显得早些，但他从来没有当革命就在他的面前的时候，看不见革命的身影，或者当革命形势已經轉身他去之后，仍然頑固地认为革命的背影是革命的正面。

在俄共第十三次大会上，季諾維也夫在散布关于“速度的錯誤”的老一套含糊不清的說法之后宣称：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必須对你們說，万一发生相同的事件，我們在相同的形势下会做出相同的事情。”^①

这样說显然是在进行威胁。

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日，季諾維也夫在“赤色国际援助”(International Red Aid) 會議上說，整个欧洲的形势是这样：“現在連一个表面的宁靜和任何間歇，我們都必須不抱期望，不管这种表面的宁靜和間歇是多么的短暫。……欧洲正在进入决定性事件的时期。……德国显然正在向激烈的內战进军……”^②

一九二四年二月初，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在关于德国事件的教訓的決議中說：

“德国共产党絕對不能把起义和夺取政权从它的議程上取消掉。相反（！）我們必須面对这一問題的一切具体内容和紧急性……”^③

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六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写信給德国共产党：

101 “一九二三年十月，对事件进程的速度估計的錯誤（什么样的錯誤？——托洛茨基）給党带来很大的困难。然而这仅仅是一个

① 《真理报》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五日。

② 《真理报》一九二四年二月二日。（这里的日期显然有錯誤，二月二日不可能刊載二月二十日的講話。——譯者注）

③ 《真理报》一九二四年二月七日。

插曲。根本的估計仍然同以前一樣。”^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从这一切得出下列結論：

“德国共产党必須像以前那样繼續竭其全力进行武装工人階級的工作……”^②

一九二三年的巨大历史悲剧——不經過斗争就葬送了伟大的革命陣地——在六个月后被評为一个插曲。“仅仅是一个插曲！”直到今天，欧洲仍然由于这一“插曲”的最严重的后果而遭受苦难。共产国际在四年之內沒有召开大会的事实，如同参加共产国际的各国党內的左翼一个一个被粉碎一样，同样是一九二三年这个“插曲”的結果。

在德国无产阶级失敗八个月后，当这一灾难的一切后果都变得非常明显的时候，共产国际举行了第五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不必去預測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而应討論当前的問題。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根本任务是：（一）明确地和无情地承认这次失敗，揭露它的“主观”原因，不让任何人躲在客观条件的借口下；（二）确认一个新的阶段已經开始，在这一阶段內，群众会暂时散离，社会民主主义会有所发展，共产党的影响将会降低；（三）使共产国际对所有这一切有所准备，使其不致手足无措，并且用防御性斗争和巩固組織等必要的办法将它武装起来，以待形势发生新的变化。

但大会在所有这些問題上都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

季諾維也夫在大会上以下述方式闡述德国事件的意义：“我們 102
預期德国要发生革命，但它沒有来。”^③

但事实上，革命有权利回答：“我是来了，但閣下到达会晤地点的时候太迟了。”

① 《真理报》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日，着重体是我們用的。

② 《真理报》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九日。

③ 《真理报》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大会的領導人和布兰德勒认为，他們对形势“估計过高”，而实际上，“我們”把它估計得太輕易，也太晚了。季諾維也夫对他自己的所謂“过高估計”泰然自若。他认为主要毛病不出在这里。

“对形势估計过高还不是最坏的事情。薩克森的事例表明，比这坏得多的是在我們党的队伍内还存在着許多社会民主主义的殘余。”^①

季諾維也夫沒有看到这个灾禍。而且并不是他一个人是这样。整个第五次代表大会和他本人，对世界革命的这次最重大的失敗干脆不予理會。德国事件主要是从在薩克森議會中的共产党人的政策的角度来进行分析的。代表大会在它的決議中贊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已經“……譴責了德国中央委员会的机会主义的行为，尤其譴責它在薩克森政府的試驗时期中歪曲地运用了統一战綫的策略。”^②

这有些像譴責一个杀人犯，“尤其”譴責他在闖进被害人的家里时，沒有脫去帽子。

季諾維也夫坚持說，“薩克森的經驗造成了一个新的形势。它带来了开始清算共产国际革命策略的威胁”。^③

103 既然“薩克森的經驗”已經受到譴責，布兰德勒已被革职，这个问题就算了結，只有繼續討論議程上的下一个问题了。

季諾維也夫說，“总的政治前景基本上同过去一样。形势孕育着革命。新的阶级斗争已在重新展开。巨大的斗争正在向前挺进……”等。^④大会也跟着他这样說。

斤斤計較鸡毛蒜皮而对大問題却无动于衷的“左傾主义”是多么浅薄和不现实。

① 《真理报》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② 《真理报》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九日。

③④ 《真理报》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对于那些非常了解形势和强调十月起义失败的意义的人，对于指出随后不可避免会有长期的革命低潮和资本主义暂时巩固（“稳定”），（和随之发生的一切政治后果）的那些人，第五次代表大会的领导竭力想把他们说成是机会主义者和取消革命的人。这就是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给自己提出的主要任务。同他们一样低估一年以前的失败的路特·费舍认为，俄国的反对派“看不见世界革命的前景，对德国革命和欧洲革命的临近缺乏信心，是不可救药的悲观主义，对欧洲革命采取取消主义的态度等。”^①

不需要解释就可知道，正是对这次失败负有最直接的责任的那些人在反对“取消派”，即反对拒绝把失败说成是胜利的那些人的时候叫得最凶。因此，柯拉罗夫对胆敢把保加利亚党的失败看成是决定性的拉狄克咆哮如雷：

“不管在六月或者在九月，党的失败都不是决定性的。保加利亚共产党屹立不动，并在准备新的战斗。”（柯拉罗夫同志在第五次大会上的讲话）

不但没有对失败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倒是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的狂吹取得了全线的胜利。然而，布尔什维克战略是同沾沾自喜、没有灵魂的柯拉罗夫主义毫不相容的。 104

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许多工作是正确的和必要的。向企图抬头的右倾展开斗争是绝对急迫的。对形势的极端错误的估计使这一斗争离开了正轨，陷入混乱，遭到歪曲。结果，一切一切都被搅乱了，那些能够更好地、更清楚地看到昨天、今天或明天事变的人们都被列入右派阵营。倘若当时的左翼在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取得了胜利，列宁就会以同样的理由同列维和蔡特金等一起被列入右翼。第五次代表大会制定的错误的政治方向所造成的思想上的

^① 《真理报》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五日。

混乱，嗣后就变成了新的巨大灾祸的根源。

大会对政治形势的估计也完全移用到经济领域中来。已经历在目的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巩固的迹象不是遭到否认就是受到忽视。总是将经济事实说得娓娓动听以配合当时政治主导趋向的瓦尔加，这次又提出一个报告。报告说“……资本主义复苏的前景是不存在的。”^①

但在一年后，在“复苏”已被迟迟地重新定名为“稳定”以后，瓦尔加才颇为吃力地发现了这一事实。那个时候，反对派已不得不忍受不承认这一稳定的指控，因为反对派在一年半以前胆敢确定这一稳定已经开始，而在一九二五年，它已觉察出了破坏稳定的趋势。（《英国向何处去？》）

105

第五次代表大会看到的政治进程和思想意识集团是通过错误方向的哈哈镜反映出来的形象；它将俄国反对派列为“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决议就是这样产生的。历史以其独有的方式纠正了这个错误。它迫使第五次代表大会的首席检察官季诺维也夫在两年以后公开承认：一九二三年反对派的核心在争论中的所有根本问题上都是正确的。

由于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基本战略错误，对德国和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内部进程就必然缺乏认识。大会上所谈的只是它的腐朽、分崩离析和瓦解。关于上次的德国国会选举——共产党在这次选举中得到三百七十万票——季诺维也夫曾经这样讲过：

“如果说，我们共产党人同社会民主党人在德国国会中的席位是六十二与一百之比，那么对任何人来说这都表明：我们是多么接近赢得德国工人阶级的多数。”^②

季诺维也夫对这一进程的规律一无所知。德国共产党的影响

① 《真理报》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八日。

② 《真理报》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在那一年和以后几年內不是增长而是下降了。三百七十万票所代表的仅是这个党在一九二三年底对德国无产阶级的多数所具有的决定性影响的可观的残余而已。这个数目在随后的选举中一定要减少。

同时，在一九二三年象一条破烂的草席一样变得支离破碎的社会民主党，到一九二三年底革命失败以后，开始有计划地恢复了，开始活动起来并且得到发展。这种发展主要是靠损害共产主义取得的。因为我们预见到了这一点——人们怎能不预见到这一点呢？——我们的预见就被归因于我们的“悲观主义”。在一九二四年初，我们在讲话和文章中說，以后在一定时期內社会民主党必然会有所恢复。在社会民主党赢得九百万以上选票的一九二八年五月最后一次选举举行以后，现在还有必要去证明我们是正确的嗎？现在还有必要去证明当时已经在为社会民主党唱安魂歌的“乐观主义者”是大错而特错的嗎？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尤其是大错而特错的。

106

显示着一切年老力衰迹象的社会民主主义所遇到的第二次好时光自然是不能持久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衰亡是不可避免的。但它究竟还要多久才会死去是无从断言的。这同样取决于我们。要想加速它的死亡，我们必须面对现实，适时地认出政治形势的转折点，是失败就承认失败，并学会预见未来。

如果说德国社会民主主义今天仍然代表着几百万张选票的力量，而且在工人阶级內也具有这种代表性，那是由两个直接原因形成的。第一，一九二三年秋投降了的德国党的失败；第二，第五次代表大会的错误战略方针。

一九二四年一月，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拥有的选民的比例差不多是二比三。但四个月以后，这一比例甚至急骤下降到略超过一比三；换句话说，在这一整个时期，我们并没有一步步地接近赢

得工人阶级的多数，而是愈来愈远了。而这种情况是发生在我们的党在过去一年内得到明显加强的时期——如果采取正确的政策，这个时期本来能够而且必然会成为取得工人阶级多数的出发点。

107 我们将在以后讨论第五次代表大会所持态度的政治后果。但是现在已经很清楚：如果没有能力通盘考虑我们整个时代发展的基本曲线和它的个别部分，就不能认真谈什么布尔什维克的战略——在每一个特定的时刻，这些个别部分对党的领导就如同铁路转弯对火车司机一样重要。在坡度很大的转弯处开足马力必定要将火车开离轨道的。

然而，仅在几个月之前，《真理报》不得不多少比较清楚地承认我们早在一九二三年底所作的估计的正确性。《真理报》在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写道：

“一九二三年失败以后开始的、使德国资本得以巩固它的阵地的一定程度的(！)冷漠和沮丧时期正在开始成为过去。”

一九二三年秋开始的“一定程度的”沮丧直到一九二八年才开始成为过去。延迟四年以后才发表这些话，是对第五次代表大会所确定的错误方针的无情谴责，也是对领导制度的无情谴责。这个领导不暴露和阐明所犯的错误，而是掩饰错误，因而扩大了思想混乱的规模。

对一九二三年的事变或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基本错误不作评价的纲领草案，完全是在逃避帝国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战略的真正问题。

6. “民主主义——和平主义纪元” 和法西斯主义

一九二三年秋，德国共产主义的投降，以最低限度的内战消除了无产阶级的具有威胁性的危险。投降不可避免要削弱共产党的

障地，也要削弱法西斯主义的障地。因为，即若是一场资产阶级取得胜利的內战，也要破坏资本主义剥削的条件。在当时，即一九二三年年底，我們已經在为反对夸大德国法西斯的力量和危险而斗争。我們坚持說，法西斯主义会退到幕后，而整个欧洲的政治舞台将在一定时期內被民主主义和和平主义集团——法国的左派集团和英国的工党——所占据。而这些集团的力量增长会随之刺激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的新的發展。官方领导不但不去了解这一必然的进程和在一条新的战綫上組織斗争去反对它，反而繼續将法西斯主义同社会民主主义等量齐观，并且預料它們会在一場迫在眉睫的內战中同归于尽。

美国同欧洲的內在关系问题是同法西斯与社会民主主义问题紧密联結在一起的。只有在一九二三年德国革命失敗后，美国資本才有可能开始实现它的(暫时的)“和平”征服欧洲的計劃。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问题本来应受到充分的考虑。相反，第五次代表大会的领导根本把这个問題放过了。这个领导完全从欧洲內部形势出发，甚至沒有注意到，欧洲革命的长期迁延已經直接将国际关系的軸心移轉到美国进攻欧洲方面来了。这一攻势表现为：欧洲經濟的“巩固”、欧洲正常化和宁靖，和民主原則的“恢复”。不但是破產的小资产阶级，就是一般的工人也认为，既然共产党沒有取得胜利，那么也許社会民主党帶給我們的不是胜利(任何人也沒有对它存有这种奢望)，而是通过美国黄金的援助使工业“恢复”，从而帶給我們一片面包。了解以下情况是必要的：具有美元內容的关于美国和平主义的可鄙的虛构——在德国革命失敗以后——会变成、实际上的确变成了欧洲生活中的最重要的因素。由于这一影响，不但德国社会民主党重新起来了，法国激进派和英国工党也有很大的发展。

为了对付这个新的敌方陣綫，本来应该指出资产阶级的欧洲

只有充当美国的金融附庸才能存在和保存自己，美国的和平主义力图将欧洲放在接受饥饿舍施的地位上。共产国际的领导不以这一前景作为新的斗争的出发点去反对信奉美国主义新宗教的社会民主党，反而向相反方向开火。它硬说我们倡导没有战争、没有革命、依靠美国口粮的正常化的帝国主义的愚蠢的理论。

就在这一次二月会议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主席团（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四个月）宣布，武装起义“具体地和急迫地”摆在德国党的日程上。它还对正要举行“左的”议会选举的法国的形势作了如下的估计：

“这种选举前的狂热还仅仅影响到最不足轻重的和最弱小的政党和死亡了的政治团体。在即将到来的选举的光辉照耀下，社会党已被唤醒和重新活动起来……”^①

当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左倾主义的浪潮很明显地在法国高涨的时候，当这一浪潮夺去了广大的工人并削弱了无产阶级政党和资本的法西斯队伍时；总而言之，在面对着“左翼集团”胜利时，
110 共产国际的领导却从完全相反的角度来看问题。它断然拒绝承认存在着和平主义时期的可能性，并在一九二四年五月选举的前夕，它将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左翼旗手法国社会党说成是一个已经“死亡的政治团体”。当时，我们在一封给俄共代表团的特别信件内，抗议对社会爱国党作出的这种不负责任的估计。但一切都是白费力气。共产国际的领导执拗地认为，他们对这些事实的置之不理就是“左倾主义”。如同近年来常常发生的情况一样，这一来就产生了关于民主和平主义的、歪曲性的卑鄙的论战，在共产国际的党内引起如此严重的混乱。反对派的发言人被指责怀有和平主义的偏见。这仅仅是因为，他们不同意共产国际领导上的偏见，并

^① 《真理报》一九二四年二月七日。

且适时地預見到，德国无产階級不进行斗争而遭到的失敗（在法西斯趋向稍稍增强后），必将使小資产階級政党挤到前边来，并增强社会民主主义。

我們在前面已經讲过，在英国工党和法国左翼集团取得胜利之前三四个月举行的“赤色国际援助”會議上，季諾維也夫以一种明显地向我挑起論战的口吻宣称：

“实际上整个欧洲的形势是这样的：現在我們連一个外部和平主义的时期或任何的間歇时期都不需要去期望，不管这些时期是多么短暫……欧洲正在进入发生决定性事件的阶段……德国明显地在向猛烈的內战的方向发展……”^①

季諾維也夫显然已經完全忘記了，在一九二二年的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一个委員會上，我成功地对大会的決議提出过一項修正案（尽管經過了很大的修改），虽然曾遭到季諾維也夫本人和布哈林的頑强反对。这一修正案提到“和平主义——民主主义”时期的即将来临，指出这一时期大概是資产階級国家政治衰落道路上的一个阶段，是走向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統治的第一步。 111

在英国和法国“左翼”政府已經兴起以后所召开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季諾維也夫回忆起——非常適切地——我的这个修正案，并且高声宣布：

“目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法西斯主义、戒严法以及反对无产階級的白色恐怖浪潮的高涨。但这并不排除这样的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資产階級的公开反动将在最重要国家內被‘民主主义——和平主义紀元’所取代。”

季諾維也夫滿意地接着說：

“这些話是一九二二年說的。因此，共产国际在一年半以前明

① 《真理报》一九二四年二月二日。

确地预料到了这一民主主义——和平主义纪元。”^①

事实就是这样。由于作了这一预测，我长期以来被人说成是一个有和平主义倾向的人（是我的倾向而不是历史发展方向的倾向）。在麦克唐纳和赫里欧内阁蜜月期间，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这一预测却被信手拈来加以运用了。不幸，过去进行预测一般总会碰到这种情况。

我们应该再说一句，季诺维也夫和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多数在解释过去所说的作为资产阶级衰落道路上的一个阶段的“民主主义——和平主义纪元”的前景时，是太拘泥于文字了。季诺维也夫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说：“民主主义——和平主义纪元是资本主义衰落的迹象。”

他在结论中又说：“我再说一遍，民主主义——和平主义纪元正是〔资本主义〕衰落和难以医治的危机的迹象。”^②

112 如若鲁尔危机不曾发生，如若事变的发展更顺利一些，不出现这一历史的“飞跃”，这样讲可能是正确的。如若德国无产阶级在一九二三年取得了胜利，这种说法会是两倍和三倍的正确。在这种情况下，麦克唐纳和赫里欧政权仅仅意味着英国和法国的“克伦斯基时期”。可是，鲁尔危机的确爆发了，并且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谁是主人的问题。德国无产阶级没有赢得胜利，反而遭到决定性的失败，失败的结果是，德国资产阶级必定要得到最高度地鼓舞和巩固。在若干年内，全欧洲的革命信心破灭了。在这种情况下，麦克唐纳政府和赫里欧政府决非意味着克伦斯基时期或一般的资产阶级衰落。相反，它们仅仅会变成和能够变成更加认真、更加巩固和更加自信的资产阶级政府的短命的先驱。第五次代表大会没有了解这一点，因为它对于德国灾祸的规模缺乏估计，并将这一灾祸

① 《真理报》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② 《真理报》一九二四年七月一日。

仅仅看成是薩克森議會喜劇的問題，所以它仍然对下列事实一无所知：欧洲的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已在全綫退却，而我們的任务不該是武装起义，而是采取新的方針、打后卫战和加强党的組織障地，特別是在工会中。

和“紀元”这个問題有关的是，在法西斯主义問題上也发生了采取同样歪曲的和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进行的論战。反对派认为，只有在革命的危險直接威胁着它的政权基础、和在资产阶级的正常国家机器被证明为力量不足时，资产阶级才肯运用它的法西斯这一支持物。在这种意义上，法西斯主义的猖獗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对造反的无产阶级进行内战的状态。相反，在内战以前一个时期，为了欺騙无产阶级，使他們丧失警觉和瓦解无产阶级的士气，或在同无产阶级的較量中取得了重大的和持久的胜利之后的一个时期，即当资产阶级被迫用議會的方式去控制广大人民——其中也有对革命感到失望的工人——的时候，资产阶级为了建立正常的政权会被迫使用它的左的即社会民主的支持物。共产国际的领导反对在理論上绝对駁不倒的而且为整个斗争过程所证实了的这一分析。它提出了将社会民主主义同法西斯主义等同起来的、缺乏意义的、过分簡單化的論点。社会民主主义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与法西斯主义一样是卑躬屈节的，总是准备在危险的时刻主动推荐出自己的諾斯克。从这一事实出发，共产国际领导完全抹煞了社会民主主义同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差别，同时还抹煞了公开内战时期同阶级斗争“正常化”时期的差别。总之，一切問題都弄得顛三倒四、糾纏不清、乱作一团，唯一的目的是要維持一个立即展开内战的所謂方針。就好像在一九二三年秋的德国和欧洲，任何不平常的事情都不曾发生过一样，一个插曲——仅此而已！

113

为了說明这一論战的进程和水平，我們必須引述斯大林的《論国际形势》这篇文章：

斯大林以論战的方式反对我說，“有些人认为資產階級奉行‘和平主义’和‘民主主义’不是由于必要，而是出于自願，出自所謂自己的选择。”^①

在这个詳細論述起来的确令人难堪的、基本的历史—哲学論点后面提出了两个主要結論：

114 “第一，认为法西斯主义只是資產階級的战斗組織是不对的。法西斯主义不只是一种軍事技术范疇[?!]。”^②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資產階級社会的战斗組織一定要被认为是一个“技术的”而不是一个“政治的”“范疇”。但什么叫做法西斯主义？斯大林的間接答案是：“社会民主党在客观上是法西斯主义的溫和派。”^③

人們也許會說，社会民主党是資產階級社会的左翼。这个定义是十分正确的，倘若作这种解释不是企图把它过分簡單化，从而忘記了社会民主党仍然在領導着好几百万工人，而且在一定范围内，它不但不得不考虑它的資產階級主子的意志，而且不得不考虑被它蒙蔽的无产階級选民的利益。但将社会民主党的性质說成是“法西斯主义的溫和派”是絕對沒有意义的。如若是这样，資產階級社会本身又該是什么呢？一个人为了在政治中保持最起碼的方向，就一定不能将一切东西都堆成一团，相反，应将代表資產階級陣綫两个极端的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主义区别开来。它們在危险时刻联合起来，但仍然是两个极端。在一九二八年五月的选举后，难道还有必要再強調說明这一点嗎？这次选举既表明法西斯主义的衰落，同时也表明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而且，順便說一句，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也曾向社会民主党提出了建立工人階級联合陣綫的建議。

① 《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 245 頁。——譯者注

②③ 同上书，第 246 頁。——譯者注

文章繼續写道：“其次，认为决定性的战斗已經发生过了，无产階級在这些战斗中已被击潰，資产階級政权因此巩固了，这是不对的。这至少〔？〕是因为还不曾有群众性的真正布尔什維克党。”^①

这样說来，資产階級不能巩固它自己，是因为战斗还没有发生过，“至少”是因为还不曾有一个布尔什維克党。所以，妨碍資产階級巩固它自己的是……不存在一个布尔什維克党。然而事实上，正是这种不存在（与其說是党的不存在，不如說是布尔什維克的領導的不存在）帮助資产階級巩固了它自己。如若一支軍队在紧急情势下不战而向敌人投降，那么这一投降就完全取代了“决定性”的战斗，战争如此，政治上也是这样。早在一八五〇年，恩格斯就教导說，一个错过革命形势的党会在一个长时期内銷声匿迹。难道还有人不知道，生活在“帝国主义时期以前”的恩格斯今天已經过时了嗎？于是斯大林写道：“沒有这样的（布尔什維克）党，要在帝国主义条件下进行爭取专政的决定性战斗是不可能的。”^②

所以，人們被迫作出假定，在发展不平衡的規律还没有被发现以前，在恩格斯的时代，这种战斗是十分可能的。

这一思想脉絡很适当地归結为一个政治預測：

“最后，……认为实行‘和平主义’一定会使資产階級政权巩固而使革命无限期地延迟，这也是不对的。”^③

然而，这一延迟的确发生了——当然，这不是按照斯大林的說法，而是按照恩格斯的說法。一年以后，当瞎子也会看到，資产階級的地位已經变得較为巩固，革命无限期地延迟时，斯大林指責我們拒絕承认这一稳定。在这一“稳定”已經重新开始垮台，在英国

① 參見《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 246 頁。后一句原文是：“这至少是因为还不曾有能够引导无产階級实行专政的群众性的真正布尔什維克党。”——譯者注

② 同上书，第 246 頁。——譯者注

③ 同上书，第 247 頁。——譯者注

116 和中国，一个新的革命浪潮临近的时期，这一指責变得特別坚决了。这一完全一塌糊塗的思想起着領導路綫的作用！應該提一提，綱領草案（第二章）中的关于法西斯主义和它同社会民主主义的关系的定义，比上述斯大林的概念（基本上就是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概念）要合理和正确得多，虽然这个定义故意写得含糊其詞（以便与过去銜接）。但这一无足輕重的前进一步並沒有解决問題。在取得过去十年的經驗以后，共产国际的綱領不能不对革命形势、它的根源和消失的特点加以闡述，不能不指出在估計这一形势时所犯的有名的錯誤，不能不說明火車司机在轉弯时应怎样操作，不能不將真理諄諄告誡各党：两三天內的斗争决定世界革命成敗的形势是存在的。

7. 极左政策中的右傾因素

一九二三年的狂风疾雨的高潮时期过后，一个长时期的低潮时期开始了。用战略術語來說，这意味着有組織的退却，打后卫战，加强我們在群众組織中的地位，重新檢閱我們自己的队伍，擦拭和磨利我們的理論和政治武器。这一立場被扣上了取消主义的帽子。近年来，取消主义以及布尔什維克辞汇中的其他概念遭到了极其恶劣的濫用；不再进行任何教育和訓練，仅仅播种混乱和錯誤。取消主义背弃革命，企图以改良主义的道路和方法代替革命的道路和方法。列宁主义的政策与取消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但它同下述情况也毫不相干：不顾客观情势的变化；当革命已經背弃我們而去，当有必要在群众中間重新采取长期、頑强、有組織的和艰苦的工作的道路，以便使党对新的革命有所准备的情况发生以后，在口头上談論保持武装起义的方針。

117 上樓的姿势与下樓的姿势应有所不同。最危險的情势是：在黑暗中，一个人抬起脚来要上樓去，而他面前的樓梯却是通向樓下

去的。跌跤子、受伤和摔脱关节就不可免了。一九二四年共产国际的领导用尽一切办法压制对德国十月起义經驗的批評和一切一般的批評。它頑固地重复說：工人們徑直奔向革命——楼梯是通向上的。毫不奇怪，在革命低潮时期运用第五次代表大会发出的指示，結果导致了政治上摔跌和摔脱了关节！

一九二七年三月一日第五和第六号德国反对派公报說：

“这次党代会〔他們取得领导权的、一九二四年春法兰克福党代会〕上，左派最大的錯誤是，他們沒有向党毫不容情地讲明一九二三年失败的严重性；他們沒有作出必要的結論；他們沒有头脑清醒地、毫不掩飾地向党解释資本主义相对稳定的趋势；沒有为即将到来的时期及其斗争制定相应的綱領和口号。做到这些并且高度強調这个綱領中的論点是完全可能的，也是正确的和絕對必要的。”（着重体是我們用的）

这些话在当时向我們表明，在第五次大会期間，参加过反对所謂我們的“取消主义”的一部分德国的左派已經严肃地理解了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的教訓。后来，这就使我們在原則的基础上接近了。

一九二四年是局势发生急剧变化的关键年头。然而只是在一年半以后，情势的急剧变化（“稳定”）才被承认。所以，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內发生了左傾的錯誤和起义的尝试是不足为怪的。保加利亚的恐怖主义的冒险，如同一九二四年十二月爱沙尼亚武装起义的悲惨历史一样，是謬誤的方針引起的絕望情緒突然爆发造成的。在通过暴动以强制的办法加速历史进程的这些尝试之后，沒有去进行严格的調查，結果在一九二七年底广州又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在政治上，即若是最小的錯誤也不能不受处罰，更不要說重大的政治錯誤。最大的錯誤是掩盖錯誤，企图机械地压制批評和压制对錯誤进行正确的馬克思主义的估价。

我們不是在为过去五年的共产国际写历史。我們仅仅就这一时期的主要阶段的两种战略路綫在这里作事实的陈述，同时就綱領草案缺乏生命力的情况加以說明。綱領草案甚至都沒有提到这些問題。所以，我們在这里不能对夹在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指示和政治现实之間的共产国际各党所遭到的无法摆脱的矛盾作一叙述，不管这一叙述是如何的概略。当然，不是一切地方的矛盾都是以一九二四年在保加利亚和爱沙尼亚所发生的致命的动乱的方式解决的。但是，各地的党总是感到它們受到束縛，不能滿足群众的願望，盲目行事，跌了跤。在純粹属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中、在工会工作中、在議会的讲坛上——在一切地方，共产党人不得不拖着第五次代表大会的錯誤立場这副沉重的脚镣。每一个党或多或少地成了这一錯誤出发点的牺牲品。每一个党都在追逐幻影、忽視了真正的过程、把革命的口号变成吵鬧喧嚷的詞句、損毀了它在群众心目中的声名、并丧失了自己的一切立脚点。加之，和現在的情况一样，当时的共产国际的报刊被剝夺了搜集、組織和刊登有关近几年来各国共产党工作的事实和数字的一切可能性。在失利、錯誤和失敗之后，这个不成器的領導宁願退却，在一片漆黑中和对手周旋。

置身于同真实因素存在着无情的和經常加剧着的矛盾中的領導，不得不更加抓住虛假的因素不放。日益失去立足点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被迫向不存在任何革命力量和迹象的地方去发现革命力量和迹象。为了不致摔倒，它不得不抓住一根腐爛的繩索。

随着无产階級內部明显的和增长着的右傾，共产国际开始进入一个把农民階級理想化、完全不加批判地夸大它与資產階級社会“决裂”的每一迹象，把一切生命短暫的农民組織加以美化并对“农民”煽动家进行露骨的奉承的时期。

无产階級先鋒队为反对資產階級和冒牌农民煽动家在毫无产

业的貧苦农民阶层中散布影响而进行的长期、頑强的斗争任务，日益为这样一种希望所代替：即农民阶级会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起直接的和独立的革命作用。

一九二四年，即在“稳定”时期的主要年头内，共产党的报刊登满了关于最近組織起来的“农民国际”力量的极其异想天开的材料。“农民国际”的代表湯姆鮑尔报告說，“农民国际”在成立六个月后已經拥有几百万的成員。

于是就演出了可耻的拉迪奇事件。拉迪奇是克罗地亚“农民”党的领导人。他从“綠色的薩格勒布”而来，认为在紅色的莫斯科露露面是可取的，因为这样做可以增加他成为白色貝尔格莱德的部长的机会。一九二四年七月九日，季諾維也夫在他向列宁格勒党的工作者报告第五次代表大会的結果时談到了他的新“胜利”：

120

“目前，在农民阶级中間正在发生重大的轉变。你們也許已經听见过拉迪奇的克罗地亚农民党。拉迪奇現在在莫斯科。他——是一个真正的人民領袖……克罗地亚的全体貧农和中农团结一致地支持拉迪奇。……現在，拉迪奇已經决定代表他的党参加‘农民国际’。我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农民国际’的成立是一件最重大的事件。某些同志不相信它会发展成为一个大規模的組織……現在我們正在得到一个人数众多的輔助性的群众——农民……”^①

如此等等，而且还不止这些。

海洋彼岸的领导人拉弗勒特相当于“真正的人民領袖”拉迪奇。共产国际的代表佩珀为了使“輔助群众”——美国的农民——加快步伐开始行动，就将年輕的和嫩弱的美国共产党拖上了在拉弗勒特周围創立“农民一劳工党”的冒险道路，为的是迅速推翻美

^① 《真理报》一九二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國資本主義。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官方领导人的讲话和文章中充满了以农民为基础的美国革命行将来临的鼓舞人心的消息。柯拉罗夫在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一次会议上报告说：

121 “美国的小农们已经创立了一个农民一劳工党。这个党愈来愈激进、向共产党靠拢、和充满了在美国建立工农政府的思想。”①

格林——拉弗勒特组织的领导人之一——自内布拉斯卡②来到莫斯科出席农民代表大会。格林还“参加”了别的什么组织，像往常一样，他后来在圣·保罗会议上，当共产党软弱无力地企图着手实现佩珀的伟大计划时，格林协助挫败了共产党。这位佩珀是卡洛利③伯爵的顾问，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一个极端左派，一位马克思主义的改良者，是扼杀匈牙利革命那些人其中的一个。

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九日的《真理报》抱怨说：

“美国无产阶级的全体的觉悟水平还没有达到像英国工党那样一个合作主义的政党所需要的水平。”

大约在一个半月以前，季诺维也夫向列宁格勒党的工作者报告说：

“几百万的农民正在自愿地或不自愿地被农业危机一下子〔！〕推到工人阶级这边来。”④

柯拉罗夫马上接着说，“推向工农政府！”

报纸继续不断地宣传说，一个农民一劳工党很快就会在美国成立了，“不是纯粹无产阶级的，而是一个阶级的”以推翻资本主义为宗旨的农民一劳工党。“不是一个无产阶级的，而是阶级的”性

① 《真理报》一九二四年七月六日。

② 内布拉斯卡，美国一州名。——译者注

③ 卡洛利(Karolyi)，一九一八年匈牙利革命时的共和国总统，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译者注

④ 《真理报》一九二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质,其意义何在,这是大西洋两岸星相学者不能加以解释的。从长远来看,那不过是“工农两个阶级的政党”思想的佩珀版罢了。我们将有机会在讨论中国革命的教训时再比较详细地谈一谈这个问题。这里只需指出这一非无产阶级的而是阶级的政党的反动思想完全产生于一九二四年的冒牌的“左的”政策就够了。这一站不住脚的政策死抓住拉迪奇、拉弗勒特和夸大了的农民国际的数字不放。

科学院院士米留丁这个庸才到处宣扬说:“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着一个异常重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农民群众从资产阶级分裂出去;农民正在反对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民和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正在日益加强,向资本主义制度作斗争。”^①

在一九二四年整个一年内,共产国际的报刊不厌其烦地谈论“农民群众的普遍激进化”,当工人们明显地右倾、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在增长、资产阶级巩固它的地位的时候,好像这种在许多情况下仅仅出于想像的农民激进化能够起什么独立作用似的!

我们在一九二七年底和一九二八年初,在中国问题上碰到了同样缺乏政治眼光的情况。在一切巨大的和深刻的革命危机之后——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危机中遭受了决定性的、旷日持久的失败——,动乱的余波要在城乡半无产阶级群众中持续很长时间,就好像石子投入水中,一圈圈的水纹向外荡漾一样。不论什么时候,如果一个领导认为这些水圈有什么独立的意义,并且违反工人阶级内部的发展进程,将它们解释为革命即将到来的征候,那末就要记住,这就是这个领导正在走向冒险道路的必然的迹象,如同一九二四年爱沙尼亚和保加利亚或一九二七年广州的冒险一样。

在这一极端左倾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若干年内被逼进了

^① 《真理报》一九二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123 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将国民党的性质說成是一个“同情政党”^①，而对它的阶级性不作任何严肃的闡明。在后面，我们会发现把“民族革命资产阶级”理想化的程度越来越大了。所以，在东方，盲目的、急躁的、错误的左倾方针为以后的机会主义奠定了基础。制定机会主义路线的任务正落在馬蒂諾夫身上。由于馬蒂諾夫在三次俄国革命中都跟着小资产阶级后边跑过，他就更加有资格成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可靠的顾问了。

为了人为地加速这些时期的发展过程，他们不但抓住了拉迪奇、拉弗勒特、有几百万农民的湯姆鮑尔、甚至佩珀，而且为英格兰规划出了一个基本上错误的前景。英国共产党的虚弱产生了尽可能快地以一个更为显赫的因素去代替它的必要性。就在那个时候发生了对英国工会主义各种倾向的错误估计。季諾維也夫要我們了解，他指望革命将从工会这个寬闊的正門登堂入室，而不通过英国共产党这个窄小的門徑。通过共产党爭取組織在工会內的群众的斗争，被一个为了革命的目的尽可能迅速地利用現成的工会工具的希望所代替。从这一错误的立場产生了后来关于英俄委员会的政策。这个委员会給苏联和英国工人一个打击，其严重性仅次于中国革命的失敗。

在早在一九二四年夏所写的《十月的教訓》中，这种走捷徑的思想——这一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表明，是把同柏塞尔和庫克保持友誼当作捷徑的——被駁斥如下：

124 “沒有党、独立于党之外、越过党、用其它組織来代替党，无产阶级革命就决不能成功。这是过去十年中的主要教訓。的确，英国的工会能够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强有力的杠杆。例如，它們在某种条件下、在某一时期，甚至能够代替工人苏維埃。但是，倘使

① 《真理报》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五日。

沒有共产党它們就不能起这一作用；它們如若反对共产党，肯定不能起这一作用，只有当共产党在工会中的影响成为决定性时，它們才能起这样的作用。关于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和意义，我們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才得出結論的，因此决不能使它受到削弱，更不能如此輕易地加以放弃。”^①

我所写的《英国向何处去？》一书对这一問題作了更广泛的闡述。这本书从头至尾在证明这一思想：英国革命也不能避免走共产主义的大門；英国共产党如若采取正确、勇敢和不妥协的、对抄小路不抱任何幻想的政策，就能飞跃地发展和成熟，以便在不几年內胜任它所面临的任務。

一九二四年左傾幻想的产生是由于右傾因素。为了掩飾一九二三年的錯誤和失敗的意义以自欺欺人，就不得不否认无产阶级內部发生的右傾，不得不乐观地夸大其他階級內部的革命进程。这就是从无产阶级路綫滑向中派路綫即小資产階級路綫的开端。在稳定加强的过程中，这一中派路綫将从极左的軀壳中解脫出来，在苏联、中国、英国、德国以及其他各地暴露自己是一条赤裸裸的合作主义的路綫。

8. 滑向中間偏右的时期

125

与第五次代表大会采取一致步調的最主要的共产党的政策，很快就暴露出它完全不灵驗了。妨碍共产党发展的假“左傾主义”的錯誤后来助长了新經驗主义的左右搖摆：即加速滑到右边去。一个被热牛奶燙过的猫看到冷水也要避开。一些党的“左的”中央委员会被粗暴地撤換了，其粗暴程度就像它們在第五次代表大会前設立起来时一样。冒险主义的左傾主义让位于中右型的公开机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三卷，第一分冊，第9頁。

会主义。为了解这一組織上的右傾的性质和速度，必須回溯到这一演变的导演斯大林早在一九二四年九月把馬斯洛夫^①、路特·費舍、^②特伦、修占努·日罗^③等取得党的領導权这件事評价为党的布尔什維克化的表現、是对向革命进軍和“需要革命領袖”的布尔什維克工人們的要求的答复。

斯大林写道：“最近半年来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就肃清社会民主主义的殘余來說，就党的干部布尔什維克化來說，就孤立机会主义分子來說，在西方共产党的生活中起了根本变化。”^④

但十个月后，真正的“布尔什維克”和“革命領袖”被宣布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叛徒，被逐出領導集团，从党内被赶出来。

126 虽然这次撤換領導的性质是慌乱的——常常是通过粗暴的、不忠誠的党机器的机械措施进行的——，要在极左政策时期和随之发生的滑向机会主义的时期之間划一条严格的思想上的分界綫是不可能的。

在苏联的工业和农民、殖民地資產階級、資本主义国家的“农民”政党、一国社会主义和党在无产階級革命中的作用等問題上，这些打着向“托洛茨基主义”进行斗争旗号的修正主义傾向已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充分地显露出来了。这些机会主义还极其清楚地表現在一九二五年俄共會議的決議中。

总的說来，这一右傾是企图半盲目地、純粹經驗主义地和迟誤地适应一九二三年的失敗所造成的革命发展的挫折。如前所述，布哈林最初的提法是以完全从字面上机械地理解的革命“不断”发展作为基础的。布哈林不允許有“喘息時間”、間歇或任何种类的

① 馬斯洛夫是继拉迪克、布兰德勒之后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譯者注

② 路特·費舍，參見《斯大林全集》第八卷第106—107頁。——譯者注

③ 特伦，修占努·日罗，參見同上书，第98—99頁。——譯者注

④ 《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254頁。——譯者注

退却；他认为，在一切情况之下继续进攻是一种革命责任。

上面引述的斯大林的文章《論国际形势》——这是一篇綱領性的文章，标志着斯大林在国际問題上的初次露面——证明这一綱領草案的第二名作者，在向“托洛茨基主义”进行斗争的最初时期，也公然具有这一純粹机械的“左”的概念。按照这一概念，总是一成不变地存在着而且仅仅存在着；社会民主主义正在“瓦解”；工人们正在变为激进；共产党正在“发展”；革命正在到来。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观察形势和试图分辨事物的人都是一个“取消派”。

一九二三年欧洲形势发生变化以后，这一“倾向”需要一年半的时间，才觉察出发生了一些新情况，从而在惊惶失措之中转变为它的反面。领导在决定自己的方针时，对我们的时代和它的内在趋向不进行任何全面的了解，仅仅依靠摸索（斯大林），依靠补充通过摸索而获得的支离破碎的結論，并按照不同情况对学究式的概念加以修飾（布哈林）。所以，整个政治路线是一系列的左右摇摆。思想意识的路线是一个趋向于将斯大林主义的左右摇摆的每一部分推向荒謬程度的各种概念的大杂燴。

127

第六次代表大会如若决定选出一个特別委员会，把布哈林創造的并打算使其成为譬如說英俄委员会所有阶段的基础的一切理論編纂起来，那它就做对了。这些理論必須按年月編排得井井有条，以便为这些理論所包含的思想划出一个溫度升降图。这会成为一个最有教育意义的战略图表。对中国革命，俄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其他一切次要問題也应该这样做。盲目的經驗主义加上煩瑣哲学——这就是仍待无情譴責的方针。

这种方针在三个最重要的問題上产生了最致命的影响：俄国的国内政策；中国革命和英俄委员会。总的說来，在有关共产国际的政策的其他一切問題上，这种影响的方向是相同的，但它們所产生的直接后果較不明显，危害性較小。

关于俄国国内問題，《布尔什維克——列宁主义者(反对派)的綱領》已經对滑向右傾和中派的政策的特点作了充分而詳尽的叙述。在这里我們必須仅限于提一提这个布尔什維克——列宁主义者的綱領。这一綱領現在从下列事实得到了显然是最出乎預料的确认：目前俄国共产党的領導为逃避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八年所执行的政策的后果所作的一切嘗試，都是以从这个綱領中几乎逐字照抄出来的引文作为根据的。而这个綱領的草拟者和支持者却被分別关入監獄，或被驅逐到国外。当前的領導人仅仅枝枝节节地引用綱領上的話而不根据事实作出結論，这一事实使新的左轉显得极其不穩定和不可靠；但同时，它赋予这一綱領以較前为大的价值，說明它是真正的列宁主义方針的概括表現。

在这个綱領中，季諾維也夫对于中国革命問題的闡述是很不充分和很不完全的，有的部分肯定是錯誤的。因为這個問題对于共产国际有决定意义，我們不能不在另一章中作更为詳尽的探討。（見第三节）

关于近几年共产国际战略經驗中第三个最重要的問題，即英俄委员会問題，在反对派于一系列的文章、講話和論文中都已經談过以后，我們所要做的不过是一个簡單的小結而已。

如同我們已經知道的，英俄委员会的出发点是急躁地要求越过年輕的和發展过于緩慢的共产党。这就使整个經驗甚至在大罢工之前就具有錯誤性质。

英俄委员会不是被視为一个必須解散、并且为了搞臭总委员会^①就不可避免地要在最初的严重考驗中大张旗鼓地予以解散的、偶然性的上层集团。不，不但斯大林、布哈林、托姆斯基和其他人，而且連季諾維也夫也认为英俄委员会是一个长期性的“伙伴”，

① 总委员会是英国工联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第一届于一九二一年选出。見《斯大林全集》第九卷第 328 頁。——譯者注

是使英国工人阶级有计划革命化的工具，而且如若不是大门，至少也是导向英国无产阶级革命要跨进的大门的一条通道。愈到后来，英俄委员会就从一个偶然的联盟变成一个驾乎真正阶级斗争之上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原则。这在总罢工期间就显露了出来。

129

从群众运动过渡到公开革命的阶段，把一度变得有些左的那些自由派的工党政客抛回了资产阶级反动阵营。他们公开地、有意识地叛卖了总罢工；之后，他们破坏和叛卖了矿工的罢工。改良主义总含有叛卖的可能。但这并不等于说，改良主义和叛卖在有的时候都是一个东西。不完全是这样。当改良主义者前进一步时，同他们达成暂时的协议是可能的。但当他们由于害怕运动的发展而从事卖国时，还同他们站在一堆，那就等于是对卖国贼的罪恶的容忍和掩饰叛卖行为。

总罢工的任务是以五百万工人的力量对雇主和国家施加联合的压力，因为煤矿工业的问题已经变成国家政策的最重要的问题了。由于领导上的叛卖，罢工在第一阶段就垮台了。对矿工们孤立进行的经济罢工会单独得到总罢工所没有得到的东西继续抱有信心是一个很大的幻想。这正是总委员会的权力的所在。总委员会的目的是处心积虑地使矿工遭到失败，从而使大部分的工人相信总委员会的叛卖性的指示是“正确的”和“合理的”。

同总委员会维持亲密集团的关系，同时支持总委员会反对的矿工的曠日持久和孤立的经济罢工，这似乎是事先计划好了的行为，其目的是让工会领袖们仅以最低限度的损失作为代价通过这一最严重的考验。

130

从革命观点来看，俄国工会在这方面扮演的角色证明是非常有害的和确实可怜而又可笑的。诚然，对一次经济罢工，即若是一次孤立的经济罢工表示支持是绝对必要的。革命者对这一点不可能有不同意见。但这种支持不但应具有经济性质，而且应具有革

命的政治性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本来应当公开向英国矿工工会和英国全体工人阶级宣布：只有当它以自己的顽强、不屈不挠和规模能够为新的总罢工的重新爆发铺平道路的时候，矿工的罢工才能够认真指望得到成功。只有向作为政府和矿主的代理人的总委员会进行公开的和直接的斗争，罢工才能胜利。所以，使经济罢工转变为政治性罢工的斗争本来应该意味着一次猛烈的、从政治上和组织上反对总委员会的战斗。走向这次战斗的第一步必须同已经变成反动障碍和工人阶级脚上的一条锁链的英俄委员会决裂。

没有一个发言审慎的革命者会争辩说，按照这一路线做去就保证会取得胜利。但只有顺着这条道路，胜利才有可能。在这一道路上所遭到的失败是以后能够导致胜利的道路上的失败。这一失败具有教育意义，即能够加强工人阶级的革命思想。同时，对于拖延时日的和没有希望的工会罢工（它的方法是工会罢工，它的目的是政治革命性的），仅仅给予财政上的支持，只能有利于若无其事地等待罢工因饥饿而失败，从而证明它自己“正确”的总委员会。当然，如果以公开的罢工破坏者的身份，总委员会想要等待几个月的时机是不易做到的。正当这一非常严重的时期，总委员会需要英俄委员会成为欺骗群众的政治掩护。因此，英国资本和无产阶级之间、总委员会和矿工之间的生命攸关的阶级斗争的问题，似乎变成了属于同一集团的同盟者——英国总委员会和全俄工会中央委员会——之间就两条道路中哪一条是当时较好的道路这一主题进行友好讨论的问题。这两条道路是：达成协议的道路或孤立的经济斗争的道路。罢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是达成协议，也就是以有利于总委员会的方式悲惨地结束了友好“讨论”。

由于它的错误路线，英俄委员会的全部政策自始至终只能有助于总委员会。虽然俄国工人阶级通过巨大自我牺牲对罢工进行

了长期的財政上的支持，这个事实并没有使矿工或英国共产党得到好处。而只有利于这个总委员会。作为宪章运动以后英国最大的革命运动的产物的英国共产党几乎没有发展，而总委员会的地位却比大罢工以前更为稳固了。

这就是这种独一无二的“战略手段”的结果。

在同总委员会保持集团的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顽固不化，被常常提到的那个“稳定性”搪塞过去了。这种顽固不化在一九二七年四月不光彩的柏林会议上发展成了彻底的奴颜婢膝。倘若革命的发展遭受了挫折，那么，瞧，你就会被迫死抱住柏塞尔不放。这种对于一个俄国官员或墨尔尼谦斯基型的工会工作者似乎很深奥的论点，实际上是盲目经验主义——被烦琐哲学所篡改过的——最好的例子。对于英国的、特别是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英国的经济和政治来说，“稳定”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生产力的发展吗？是经济形势的改善吗？前景较为乐观吗？决非如此。整个所谓英国资本主义的稳定，完全是依靠老朽的工会组织的保守力量才得以维持的。这些老朽的工人组织的保守力量在英国共产党弱小和优柔寡断的面前有形形色色的表现。在英国经济和社会关系的领域内，革命已经完全成熟了。这是一个纯属政治性的问题。稳定的基本支柱是工党和工会的头子们。英国的工党和工会是一回事，但它们在进行工作时是有所分工的。

132

当劳动群众处于大罢工所显示出来的那种状况中的时候，使资本主义保持稳定的机构中的最高位置不再属于麦克唐纳和托马斯^①，而属于皮尤^②、柏塞尔、库克^③之流。他们做工作，托马斯进行最后的加工。如若没有柏塞尔，托马斯就会悬在半空中，伙同托

① 托马斯——英国总罢工时铁路工会的领导人。——译者注

② 皮尤——英国总罢工时的工会理事会的主席。——译者注

③ 库克——英国总罢工时矿工工会的领导人。——译者注

馬斯的还有鮑尔溫^①。柏塞尔的那种虚伪的、玩弄外交手腕的冒牌“左傾主义”是妨碍英国革命前进的主要障碍。柏塞尔的“左傾主义”有时輪流、有时同时与教会人士和布尔什維克表示友好。而它不但随时准备退却，而且准备叛卖。稳定就是柏塞尔主义。从这里我們可以看出，为了替同柏塞尔結成政治集团这件事辯解而提出的存在“稳定”的說法，所表現的理論上的荒謬性和盲目的机会主义达到了何等深度。然而，正是为了粉碎这一“稳定”，必須首先摧毁柏塞尔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即令同总委员会有一絲一毫的团結也是最大的罪恶和丢了工人群众的脸。

即若是最正确的路綫，光靠战略本身并不是永远能导致胜利的。战略計劃是否正确要看它是否符合阶级力量实际发展的路綫，是否实事求是地估計到这一发展的因素。最严重、最可耻、对运动产生最严重后果的失敗，是由于对各阶级进行了錯誤估計、低估了革命因素和把敌人的力量理想化所造成的典型的孟什維克式的失敗。这些就是我們在中国和英国的失敗。

俄国能从英俄委员会得到些什么呢？

斯大林在一九二六年七月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監察委员会全体联席會議上教訓我們說：

“这个联盟〔英俄委员会〕的任务是組織广泛的工人阶级运动反对一般的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具体說来，反对对我国的武装干涉，（特别是）欧洲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英国对我国的武装干涉。”

当他教訓我們反对者“应当关心保卫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共和国使它免受武装干涉”（我們当然不知道这一点罗）的时候，斯大林接着說：

“英国反动的工会如果願意和我国革命的工会結成联盟，反对

^① 鮑尔溫——英国总罢工时英国的首相。——譯者注

本国反革命的帝国主义者，那末，为什么不欢迎这个联盟呢？”^①

倘若“反动的工会”能进行反对它們自己的帝国主义者的斗争，它們就不会是反动的了。斯大林不再能区别反动和革命概念了。他按照老一套的說法，把英国工会的性质說成是反动的，但事实上，他对它們的“革命精神”抱着可怜的幻想。

继斯大林之后，我們党的莫斯科委员会向莫斯科的工人們讲道：

“英俄委员会能够、必定并且毫无疑问会在反对对苏联的任何可能干涉的斗争中发生巨大的作用。它将变成国际无产阶级力量的組織中心，向国际资产阶级挑起一場新战争的一切企图进行斗争。”（《莫斯科委员会提綱》）

反对派怎样回答？我們說：

“国际局势变得愈紧张，英俄委员会就更变成英国和国际帝国主义的一个武器。”

斯大林在同一次全会^②上把对斯大林主义者将希望寄托在作为工人国家的守护神的柏塞尔身上的批評說成是“从列宁主义发展到托洛茨基主义”的偏向。

伏罗希洛夫：“对。”

有人說：“伏罗希洛夫已經在上面签字划押了。”

托洛茨基：“所幸的是，所有这些都將載入記錄。”

是的，所有这些都能够在七月全会的記錄里找得到。在这次全会上，盲目的、粗暴的和忠实的机会主义者們竟敢指責反对派为“失敗主义”。

我被迫从我早些时候所写的《我們給予什么和得到什么》一书

① 参見《斯大林全集》第八卷第166頁。——譯者注

② 指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五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联席会议。——譯者注

135 中簡單引述的这些對話，作為一個戰略教訓，要比綱領草案中關於戰略的肤淺的整個一章有用得多。我們給予(和企望)什麼和我們得到什麼的問題，一般說來，是戰略的主要准則。這一准則必須在第六次代表大會上運用到近几年擺在議程上的一切問題。屆時將確切地暴露出，特別從一九二六年以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戰略是想像的總和，錯誤的策劃，對敵人抱幻想和迫害最可靠、最不動搖的戰士的戰略。總而言之，那是一個腐敗透頂的右傾——中派主義的戰略。

9. 革命戰略的機動性質

乍一看，似乎不可理解的是，綱領草案中為什麼只字不提布爾什維克戰略的“機動性”和“靈活性”問題。在這麼一個巨大的問題上，只提到一點，即同殖民地資產階級達成協議的問題。

然而，最近這個時期，向右搖擺的程度越來越大的機會主義，主要是在機動戰略的旗幟下前進的。正是因為這一事實，無原則的妥協在實踐上是有害的。然而，拒絕同意無原則的妥協被說成是缺乏“靈活性”。多數派宣稱，它的基本原則是機動。季諾維也夫在一九二五年對拉迪奇和拉弗勒特運用機動手段。後來，斯大林和布哈林又對蔣介石、柏塞爾和富農運用機動手段。官僚機構不斷對黨運用機動手段。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現在正在對官僚機構運用機動手段。

136 為了適應官僚機構的需要，產生了一支由機動專家組成的大軍。這支大軍的成員的絕大多數，從來不是革命戰士，因此在革命已經取得政權之後，顯得更加熱心地服從革命。鮑羅廷在廣州，拉費斯(Rafes)在北京，彼得羅夫斯基在英吉利海峽附近，佩珀在美國，他們都在運用機動手段。但是，佩珀也可以在波利尼西亞運用機動手段；馬丁諾夫從遠處運用機動手段，但他在世界各地從事這

个活动,以补不足。整窩整窩的年輕的机动专家被培养出来了。他們主要靠他們自己脊骨的伸縮性来对待布尔什維克的灵活性。这一派的战略任务包括通过机动以获得只有靠革命階級力量才能得到的东西。正如所有中世紀的炼金术士不顾別人的失敗希望炼出金来,今天的机动的战略家,在他們各自的地位上也希望欺騙历史。当然,就事物的性质来看,他們不是战略家,仅仅是高矮不等的官僚主义的权术家,然而不包括雄才大略的人。他們之中的一些人,在观察了主子怎样处理小問題之后,就认为,他們已經掌握了战略的秘密。这正是模仿主义的本质。此外,別的人从第二手或第三手得到了玩弄权术的秘密。他們在相信了运用这些秘密在細小問題上有时会获得奇迹之后就得出結論:这些方法更加可以适用于重大問題。为了解决重大問題,把官僚主义的权术作为比革命斗争“更經濟”的方法而运用的一切企图总是毫无例外导致可耻的失敗。除此之外,以党和国家机器武装起来的权术每次都折断了年輕的党和年輕革命的脊骨。蔣介石、汪精卫、柏塞尔和富农——到現在为止,在企图通过“机动手段”的方法同他們打交道的嘗試中,都是这些人取得了胜利。

自然,这并不是說,机动手段是根本不許可使用的,是与工人階級的革命战略不相容的。但是,必須弄清楚,机动手段对于革命的斗争基本方法說来,只能属于从属的、輔助的、权宜的性质。必須永远記住,一种机动手段决不能在大事中决定任何問題。如果施用計策似乎能够在小事上解决一些問題,那总是以損害大事为代价的。一个正确的机动手段能有助于問題的解决,仅仅是因为它提供了贏得時間和用較少力量取得較大效果的可能性。依靠机动手段来逃避根本性的困难是不可能的。 137

无产階級同資产階級之間的矛盾是根本性的矛盾。正因如此,企图靠組織和个人施用計策把中国資产階級控制住并迫使它

屈从于計謀家的計劃，这并不是什么机动手段，而是可鄙的自欺，即使它的規模很龐大，也还是如此。階級是不能靠施用計策来战胜的。从历史上看，这适用于一切階級，而对于統治的、有产的、剝削的和有教养的階級說来，尤其正确。这些階級的經驗非常丰富，他們的階級本能非常灵敏，他們的偵察机构的种类非常繁多，以致想用装模做样的办法騙过他們必定造成这样的結果：实际上中圈套的不是敌人，而是自己人。

苏联同資本主义世界之間的矛盾是根本性的矛盾。这个矛盾靠机动手段是逃避不了的。依靠对資本实行明确的、坦率承认的让步，依靠利用它的各个部分之間的矛盾，可以延长喘息机会，可以贏得時間，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也只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而不是在任何的和所有的情况下。如果相信国际資產階級能够被“中立化”，直到社会主义建成，也就是說，相信根本矛盾能借助于机动手段克服，那完全是自欺。这种自欺可以使苏維埃共和国灭亡。只有国际无产階級革命才能使我們摆脱这个根本性的矛盾。

138 机动手段所能包含的内容是：对敌人让步，或同一个暫时的因而也永远是不可靠的同盟者达成協議，或者为了阻止敌人进逼我們的要害而实行适时的退却，以及提出局部的要求和口号，使之有利于分裂敌人。这些办法就是各种机动手段中最主要的。还可以提出一些，那都是次要的。但是每一种机动手段从它的性质来讲，对于斗争的根本战略路綫說来，都只是个小插曲。在同国民党和英俄委员会周旋当中，必須时刻記住这些办法都是彻头彻尾的孟什維克式的办法，而不是布尔什維克式的机动手段。而发生的事却恰恰相反。本来應該仅仅是一种策略性的临时办法，却被发展成了战略路綫，而真正的战略性任务（反对資產階級和改良主义者的斗争）被分割成一系列次要的临时性的小策略，而且这些小策略也只是属于裝飾性质的。

在运用机动手段时，对于向之作让步的敌人，或与之达成协议
的不可靠的同盟者，应该从最坏的而不是最好的设想出发。必须
常常记在心上，同盟者可能明天就变成敌人。这甚至适用于像农
民这样的同盟者。

“如果农民作为反动的或反无产阶级的农民而行动，就对他們
采取不信任态度，摆脱他們而单独組織起来，并准备同他們作斗
爭。”^①

这同列宁以极富天才的深刻性在理論上和在实践中首先制定
的无产阶级的伟大战略任务——使被剝削的貧农阶层摆脱资产阶
级的影响和领导他們跟着我們走的任务——并无丝毫矛盾。但
是，无产阶级与农民之間的联盟决不是历史上現成的东西，它不能
用油滑的机动手段，用甜言蜜語进行欺騙的可鄙企图和感人的雄
辯制造出来。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是政治上的力量对比問題，
因此也就是无产阶级对一切其他阶级保持完全独立的問題。这个
同盟者首先必須受教育。这是可以达到的。一方面靠对它的一切
进步的和历史的需要給予极大的注意；另一方面，对这个同盟者表
示有組織的不信任，对它的一切反无产阶级的傾向和习惯进行不
倦的和无情的斗爭。

139

机动手段的意义和界限必須自始至終予以清楚的考虑和划
分。必須将让步叫做让步，把退却叫做退却。夸大自己的让步和
退却比起低估它們，其危險是极小的。必須保持阶级的警惕性和
我們自己党的有組織的不信任，而不应放松。

一般說来，在工人阶级的一切历史行为中，运用机动手段的主
要工具是党。但是，党并不是运用手段的“主子們”手中的馴順工
具，而是一个自觉的自我行动的工具，是无产阶级一般自我行动的

① 《无产阶级和农民》，《列宁全集》第八卷第206—207頁。——譯者注

最高表現。所以，在运用机动手段的全部期間，所有机动手段都必須被党清楚地理解。这里討論的当然不是外交、軍事或陰謀的秘密，即是說，不是无产階級国家或处在資本主义条件下的无产階級政党的斗争技术問題，而是机动手段的政治內容。因此，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八年对于富农的方針是一次伟大的机动手段的那种悄悄的解釋是荒謬的和罪惡的。富农沒有受騙。他不是凭言詞而是凭行动、稅收、物价和純利作出判断的。然而，自己的党——工人階級和貧农——倒很可能受騙。沒有別的东西能比无原則的运用机动手段和背着无产階級政党玩弄权术的做法更适于瓦解无产階級政党的革命精神了。

适用于一切机动手段的最重要、公认的和最不能改变的規律是：你决不能大胆将你自己的党組織同一个异党合并、混合或联結在一起，虽然这个异党今天是最“同情”你的。不要采取这样的步驟，如果这种步驟使你的党直接地或間接地、公开地或隱蔽地隶属于別的党或其他階級的組織，或縮小你自己进行鼓动的自由，或者使你对其他政党的政治路綫負責，即令只負一部分責任。你不应将你的旗帜同別的旗帜混杂起来，更不用說跪在別的旗帜之前了。

如若机动产生于急躁的机会主义的努力——即企图用欺騙手段和外交手腕，利用权术和詭計将朝着相反方向跑的組織和人物表面上維系、联結和团結在一起，而超越自己党的发展和跳过它的发展的必要阶段（这里恰恰不能跳过任何阶段）——那就是最坏的和最危險的事了。这种試驗永远是有危險的，而对于年輕的和弱小的党則是致命的。

在运用机动手段的过程中，如同战斗中一样，起决定作用的不单是战略上的智慧（更不是权术家的狡黠），而是力量的对比。一般說来，如果同它的敌人、同盟者和半同盟者比較，一个革命政党越是年輕和弱小，那末机动手段可能給它带来的危險也就越大，即使

这种机动手段是正确地策划出来的也是一样。因此——我們在这里接触到对共产国际极其重要的問題——布尔什維克党根本不是一开始就将机动手段当作万灵妙方，而是随着它在工人阶级中的根越扎越深，随着它在政治上日益强大和思想上日益成熟的情况，才开始使用并越来越多地使用机动手段。

不幸之事正在于，掌握布尔什維克战略的余孽向年轻的共产党夸耀說，机动性和灵活性是这一战略的精华，于是就使它們脱离了它們的历史軸心和原則基础，使它們轉向无原則的权术，往往就像籠子里团团轉的松鼠一样。布尔什維主义的基本特点不是灵活性(今天也不应该是)而是**花崗石般的坚硬**。布尔什維主义一直正当地引为自豪的正是这一被它的敌人和反对者斥責的品质。不是非常愉快的“乐观主义”，而是不妥协、警惕、革命的不信任和为絲毫的独立而进行的斗争——这些是布尔什維主义的主要特性。这不但是西方共产党而且必須是东方共产党的出发点。它們必須首先从政治上和物质上为实现机动手段准备条件，才能取得执行大机动手段的权利。这种条件就是它們自己的組織的力量和它的稳固性和坚定性。

141

孟什維克同国民党和总委员会打交道时运用的机动手段是十倍罪恶的，因为这些机动手段被擲在中国和英国共产党仍然脆弱的肩头上去了。这些机动手段不但使革命和工人阶级遭受失敗，而且在以后的长时间内粉碎了、削弱了和破坏了未来斗争的基本工具——年幼的共产党。同时，它們也将政治上涣散士气的因素带进共产国际最老的党、苏联共产党的队伍中来。

綱領草案关于战略的一章仍然对于机动性——近年来人們喜欢玩的一种把戏——固执地保持緘默，好像它的嘴里含滿了水一样。寬大为怀的批評家会說：緘默已經够好了。但是，这种辯解会是一个很大的錯誤。不幸的是，正如我們曾經多次举例說明，而在

后面还要再次提到的那样，綱領本身也具有在坏的意义上——即在玩弄权术的意义上——的机动性。綱領草案对它自己的党运用了机动手段。它用据“列宁說”的公式掩盖它的某些弱点；其他地方它則以緘默来躲避。这就是它在今天用以論述机动战略的方式。在討論这一主题时，不触及中国和英国的新的經驗是不可能的。但一提起机动手段，蔣介石和柏塞尔的形象就要出現。写草案的人不希望这样。他們宁願在这个喜爱的主题上保持緘默，使共产国际的領導可以任所欲为。这正是絕對不能允許的事情。有必要束縛住权术家和准备接替他們的人的手脚。这正是这一綱領所应起的作用。否則，綱領就是多余的。

在关于战略一章中必須写进这样一些根本規則：这些規則决定和限定机动手段只是向階級敌人进行革命斗争的一个輔助方法，这一革命斗争只能是一次生死的斗争。以上所述基于馬克思和列宁的教导的規則无疑可以用更加簡洁和更加确切的方式加以陈述。但它們一定必須写进共产国际的綱領中。

10. 內战的战略

关于武装起义的問題，綱領草案随便地說道：

“斗争应按照軍事艺术的規則进行。它以軍事計劃、战斗行动的进攻性和无产階級的无限牺牲和英雄主义为前提。”

綱領草案在这里仅仅是簡短地重复了馬克思偶然讲过的一些話。同时，我們一方面已經有了十月革命的經驗，另一方面又有匈牙利和巴伐利亚革命失敗的經驗，以及一九二〇年意大利斗争、一九二三年九月保加利亚起义、一九二三年德国的运动、一九二四年的爱沙尼亚、一九二六年英国总罢工、一九二七年維也納无产階級起义和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第二次中国革命等經驗。共产国际的綱領必須对武装起义的社会和政治前提条件以及能保证胜利

的軍事的和战略的条件和方法的特点給予明确和具体得多的表述。下列事实最能揭露这个文件的肤浅和玩弄文字的性质：专门論述革命战略的一章大談科内利森和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特別举出了奥里季、霍布森、柯尔的姓名），但是既沒有对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階級战略的特点作总的表述，也沒有根据活生生的历史資料为夺取政权的斗争方法作明确的闡述。

一九二四年，德国悲惨經驗发生以后，我們重新提出了这个問題，并要求共产国际将武装起义的战略和策略問題以及一般內战問題提上議事日程，予以解决。

“有必要坦率地說出，武装起义的期間問題往往具有石蕊試紙的性质，它可以用来試驗非常多的西欧共产党人的革命觉悟，他們至今還沒有从对于革命根本任务的消极和宿命态度中解放出来。这一态度最深刻地表現在有才能的卢森堡的身上。在心理上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她的成长时期主要是在向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官僚机构进行斗争中度过的。她不倦地证明，这一机构窒息了群众的創造性，她认为出路和解救办法在于来自下面的自发运动，以推翻所有社会民主主义的阻遏和障碍。淹沒資产階級社会所有堤岸的革命总罢工对卢森堡来讲是无产階級革命的同义語。但是，即令是一次以群众力量聞名的总罢工也仍然不能决定政权問題，而仅能提出政权問題。为了夺取政权有必要在总罢工的基础上組織武装起义。的确，卢森堡的全部发展过程是朝着这一方向的；她最后一个字，甚至倒数第二个字沒有讲完就离开了舞台。然而，直到最近期間，非常强烈的革命宿命論的傾向一直盛行在德国共产党內。革命在途中，革命临近了，随革命而来的是武装起义，它将給我們政权，而党……在此期間将进行革命鼓动，等待結果。在这些情况下，直截了当地提出起义的日期問題将把党从宿命主义的消极状态中喚醒过来，使它轉向基本的革命任务，即轉向为了

144

自敌人手中夺取政权而有意識地組織武装起义。”^①

“我們在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問題上花費了相当多的時間和理論上的劳动，但完全忽視了已經取得內战宝貴經驗的德国无产階級的斗爭；例如，我們几乎根本沒有从事于去年九月保加利亚起义經驗的研究；最后，最使人吃惊的是，我們已經完全将十月的經驗归入档案了……

145 “十月革命——迄今为止仅有的一次胜利的无产階級革命——的經驗必須辛勤地去研究。十月的战略战术日历必須編出。必須一层一层地說明：事态是怎样发展的，它們在党、苏維埃、中央委员会和軍事組織內得到了怎样的反映？党內的动摇不定是什么意思？这种动摇不定在事态的总的发展中占了什么比重？軍事組織的作用是什么？这是一項有难以估計的重要性的工作。繼續拖延這項工作肯定是罪恶的。”(同上)

“那么正确地讲這項任务是什么？這項任务是就內战問題、特别是作为革命頂峰的武装起义問題編輯一本带普遍性的参考书，或一本指南，或一本手册或一本規章汇编。必須从經驗中作出一张胜败对照表，彻底分析起始的情况，检查錯誤，把最正确的行动挑选出来，并作出必要的結論。我們这样做究竟是丰富科学，即历史发展規律的知識呢，还是丰富作为从經驗总结出来的全部行动規律的艺术呢？我相信，两者都将得到丰富。因为我們的目的是一个严格地切实可行的目的；即丰富革命的軍事艺术。”(同上)

“这些規章在結構上必然是非常复杂的。首先，它們有必要对无产階級夺取政权的根本前提的特点有所表述。这里我們仍然处于革命政治的領域內；因为起义是政治的繼續——仅仅是通过特別的方法。对武装起义前提的分析必須适应不同类型的国家。有

^① 一九二四年七月二十九日托洛茨基在軍事科学协会理事会會議上的講話，《真理报》一九二四年九月六日。

的国家无产阶级占人口的多数，也有的国家，无产阶级占微不足道的少数而农民处于绝对优势。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存在着中间类型的国家。所以，至少有三种‘典型’的国家必须作为分析的基础：工业国；农业国和介乎两者之间的国家。序论（论述革命的前提和条件）必须从内战的观点对这些形式的每一形式的特点加以论述。我们从两个角度来考虑起义。一方面，把起义看作历史过程的一定阶段，看作阶级斗争客观规律的一定反映；另一方面，从主观或主动的观点考虑；为了更好地保证胜利怎样准备和进行起义。”（同上）

146

在一九二四年，围绕着军事科学协会，有一大批人开始集体研究内战指示，即一个关于公开的阶级冲突以及为争取专政而进行的武装斗争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南。但是，这一工作不久就遭到了共产国际的反对——这种反对是向所谓托洛茨基主义作斗争的总体系的一部分；这一工作以后就完全被取消了。再不能想像出比这更轻率和更罪恶的措施了。在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上述意义的内战规律必须是全体革命干部——更不必说党的领袖们——的铁定的财产清单的一部分。这些“规章”应当时常加以研究，并以本国的新的经验加以补充。只有这一研究才能确实保证在需要最大的勇气和果断时不致于采取惊惶失措的、投降的步骤，在需要慎重和耐心的时期，防止冒进。

倘若这些条例包括在一些书册内，倘若所有共产党员都将严肃研究这些条例当作和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基本思想一样的义务，我们很可能会避免最近几年所遭到的失败。这些失败特别像幼稚和轻率的广州起义的失败决不是不可避免的。纲领草案用不几行文字来对待这些问题，几乎像谈到印度的甘地主义那样简单。当然一个纲领不能够专注于细节。但必须将问题全面地提出来，并提出它的基本方案，举出最重要的成就和错误。

147

撇开这一問題不論，我們认为，第六次代表大会必須通过特別決議，指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过去胜利和失敗的經驗作为基础，将內战規則写成手册。

11. 党内制度問題

布尔什維主义的組織問題是与綱領和策略問題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綱領草案在提到“維護民主集中制的最严格的革命秩序”的需要时，才順便触及这一主题。这是規定党内制度的唯一方案，而且它是一个相当新的方案。我們知道，党的制度基于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在理論上（并且在实践上也被实行），民主集中制意味着党有充分机会討論、批評、表示不滿意、选举和罢免，正像它包含着在完全被授权的、由选举产生的、能被免职的指揮机关的領導下的铁的行動紀律一样。如若民主被理解为党对党的一切机构具有主权，那么，集中意味着保证党的战斗力的、正确建立的自觉紀律。然而，現在除了在整个过去时期已經受过考驗的党内制度的这一方案外，又有了一个完全新的准則——“最严格的革命秩序。”

148 好像对党說来，仅仅民主集中制已不再够用了，而現在需要某种民主集中制的**革命秩序**。这一方案干脆将新的、独立的“革命秩序”的概念置于民主集中制之上即党之上。

駕乎民主和集中思想之上的这一革命秩序的思想——而且是一个“最严格”的秩序——的意义何在？它意味着完全独立于党之外的、或者热望得到这种独立性的党机器——一个独立的官僚机构，它應該独立于党员群众之外，以保持“秩序”；无论何时，如果“秩序”需要这样做，它就能暂时不理睬或违反党的意志、蹂躪它的規章、拖延党代表大会、或将党代表大会变成形同虛設。

这一机器长期以来采取不正当的途徑，企图得到这一駕乎民主和集中之上的“革命秩序”的提法。在过去两年內党的領導的最

負責的代表們已經給我們提供了整整一系列的党的民主的定义。这些定义使民主和集中淪为对上級机关的簡單服从。在实践中，所做的一切事情已經朝这一方向走得很远。但是，伴随着被絞杀的和空洞的民主的集中是官僚主义的集中。当然，这一“秩序”必須披上民主形式和仪式的伪装。这一秩序一定要被上面发出的通报鞭策，下面被命令在五十八条^①的威胁下进行“自我检讨”；这一秩序必須不断证明，对民主的违反不是来自领导中心，而是来自所謂“执行者”。但并没有对“执行者”进行处理，因为，所有的“执行者”到头来又是他的所有下属的领导。

因此，这个新的提法在理論上完全是荒謬的。由于它的新奇和荒謬，它证明，它的产生仅仅是为了滿足某种成熟了的需要。它使創立这种秩序的官僚机器成为神圣不可侵犯。

这个問題是与派系和集团的問題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149
在所有的爭論問題上和所有的意見分歧上，不但俄国共产党而且共产国际和它的所有支部的官方报刊都立即將爭論轉移到派系和集团的問題上。沒有暫时的思想意識集团，党的思想生活是不可想像的。到現在还没有人发现任何其他的方法。那些企图发现它的人仅仅表明，他們的补救办法等于絞杀党的思想生活。

集团和意見分歧当然是一种“禍害”。但这一禍害构成党的发展的辯证法的必要的不可分割的部分，正如毒素对于人的机体的生存是必要的一样。

集团轉变为有組織的，甚而是秘密的派系是一个更大的禍害。党的领导艺术正在于阻止这一发展。单凭禁止不可能达到这一目的。俄国共产党的經驗最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在喀琅施塔得叛乱和富农騷乱的影

^① 指苏联刑法第五十八条，这一条規定了惩办反革命分子的办法。——譯者注

响下，列宁促使大会通过了一项禁止派别和集团的决议。集团被理解为不是在党的生活中必定产生的暂时的趋向，而是那些冒充为集团的派别。广大党员清楚地了解当时生死攸关的危险，并且通过在形式上严峻的和硬性的决议以支持他们的领袖：禁止派别活动和派别主义。但是党也很了解，这一方法将被列宁领导下的中央委员会所解释；既不会有粗鲁的解释，也不会有不忠实的解释，更不会滥用权力（参见列宁《遗嘱》）^①。党知道，不过一年以后，而且在党的三分之一的请求下，甚至一个月以后，党就可以举行一次新的党代表会来检查这些经验，并作出任何必要的限制。第十次党代表大会的决定是一项非常严厉的措施。作出这一决定是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变到新经济政策的最危险的转折时期执政党的危险处境所引起的。这一严峻的措施证明是完全正当的，因为它仅仅补充了一个正确的、有远见的政策，使在过渡到新经济政策时期之前已经产生的集团站不住脚。

但即在当时也需要审慎加以解释和运用的第十次党代表大会关于派别和集团的决定，决不是独立于国家、局势和时间之外的、驾乎党的发展的其他一切需要之上的一个绝对原则。

为了保护它本身不受一切批评，党领导在列宁逝世以后，在形式上拿第十次党代表大会关于派别和集团的决定作为它的根据。它这样做是为了更加窒息党内民主，同时更加不能完成它的真正目的——消灭派别主义。因为这一任务不是禁止派别，而是将它们消灭。同时，自从列宁离开领导以来，派别对党的破坏和瓦解党的团结的情况从来没有比现在更甚。同时，百分之百的磐石般的团结过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在党内盛行过——这种团结完全是欺骗，仅仅起到掩盖那些绞杀党的生活的方法的作用。

^① 指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第615页。——译者注

一个瞞着党的机器派別甚至在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以前就在俄国共产党內建立起来了。嗣后,它具有了阴谋組織的性质,有它自己的非法中央委员会(“七人集团”),自己的传閱信件、代理人、密碼等。党机器从它的队伍中挑选了一些人組成一个私党。这个私党不受約束,不但支配党的而且支配国家机器的极为巨大的資財,将党员群众变成不过是一种掩盖它的玩弄权术活动的幌子和輔助工具。 151

但是,这个在党的机器內部出現的秘密派別愈是脱离党员群众的监督——党员群众被各式各样的“运动”弄得更加零零星星了——派別分裂过程的进展就更为深刻和尖銳,不但下层是这样,机器內部也是这样。在这个机器对党进行完全的和无限制的統治的情况下——十三次党代表大会时已經形成——机器內部发生的分歧无法解决,因为要求党作出真正的决定就意味着又使这个机器隶属于党。只有当这个机器集团在事先确有把握占有多数时,它才倾向于訴諸**机器民主**的方法,即让这个秘密派別的成員投票的方法,对爭論的問題作出决定。其結果是,在統治全党的机器派別中,敌对派別产生了,它們对于爭取机器派別中的多数所作的努力,不如在国家机器的机关中寻求支持的劲头来得大。至于党代表大会的多数,那不成問題是有把握的,因为党代表大会能在最方便的时候和准备适应机器派別的需要的时候召开。这就是党机器被篡夺的过程,这一篡夺对党和无产阶级专政都形成了最可怕的危險。

在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期間,在这一机器派別的帮助下进行了第一次“反托洛茨基”运动后,七人集团領導的地下派別发生了深刻的分裂。分裂的根本原因是列宁格勒无产阶级先鋒队对于在国内国际政策問題上初发的向下滑傾向产生了阶级不滿。列宁格勒的先进工人在一九二五年繼續进行莫斯科先进工人在一九

152 二三年开始了的工作。但是，这种深刻的阶级倾向在党内不能公开地表示出来。它们表现在机器派别内部的无声斗争中。

一九二五年四月，中央委员会向全党发出一项通报，否认据说是“托洛茨基分子”(!!)散布的关于“列宁主义者”的核心——即进行派别活动的七人集团——在农民问题上存在着意见分歧。只是由于这个通报，较多的党的干部才知道这些分歧意见的确是存在的。但这根本没能阻止领导干部继续欺骗党员说，“反对派”在所谓破坏“列宁主义的卫队”的磐石般的团结。当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将统治派别中的两个集团之间存在的无形的、混乱的分歧猛然摆在党的面前时，这种宣传以连珠炮的方式传播开来。然而，这些分歧在阶级根源上是深刻的。在党代会召开以前的最后一分钟，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党组织，即党的两个主要堡垒，在它们的地区会议上通过了两个性质完全相反的决议。不言而喻，两项决议都是一致通过的。莫斯科党组织指责列宁格勒党机器使用武力，借以解释这种“革命秩序”的奇迹，列宁格勒党组织以同样的指责来还击莫斯科党组织。好像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党组织间存在着一种穿不透的墙一样！在这两件事例中，党机器自始至终在作决定，以其百分之百的磐石般的一致性来证明，在党的生活的一切根本问题上党是不存在的。

153 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被迫去解决在各种基本问题上存在的新的意见分歧，以背着党不去征询党的意见的方式，决定新的领导的组成。党代表大会无别的办法，只有立即将这一决定交给经过严格挑选的党的书记们这一特权集团去处理。在用“秩序”的方法，即用隐蔽的机器派别的专断权力以取消党的民主的道路上，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是个新的里程碑。斗争的次一阶段才刚过去不久。统治派别的艺术总是在于使党面临一项已经通过的决定，一种不可挽救的局势，一个既成事实。

但,这种新的、更高级的“革命秩序”决不能表明派别和集团的消灭。相反,它们在党员群众中间和党机器的内部有了极大的发展和尖锐化起来。对党说来,对“集团”进行的官僚主义的惩戒愈来愈尖锐了,这就证明了它的虚弱,堕落到做出这种丑事:制造弗兰格尔军官案和运用刑法第五十八条。同时,在统治派别内部产生了新的分裂,这一分裂过程甚至现在还在进一步发展。说实在的,即令现在也不缺乏关于磐石般的团结和保证领导上完全一致的通报的虚伪表示。事实上,一切迹象表明,不公开的机器派别内部的无声斗争——斗争是猛烈的,因为这一派别是外界无法接触的——已经具有极端紧张的性质,并且正在将党推向某种新的爆炸的地步。

这就是“革命秩序”的理论和实践。这种理论和实践正在不可避免地转变为篡夺的理论和实践。

然而,这些情况并不限于俄国。一九二三年,反对派别主义的斗争,是从派别代表着新的政党的萌芽这一论点出发的;在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被资本主义包围的国家内,无产阶级专政不容许有多党的自由。这一假定本身是绝对正确的。但是它还需要有正确的政策和正确的制度。然而很明显,这一问题的提法排除了把掌握政权的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扩大适用于资产阶级国家的共产党的可能性。但一个官僚制度有它自己的贪婪的逻辑。如果它不容忍俄国党内有民主的监督,那么它更不容忍在形式上位于俄国共产党之上的共产国际内有民主监督。这就是这个领导将它对第十次党代表大会决议(这一决议是符合俄国当时的具体需要的)所作的粗暴的和不忠实的解释和应用当作一种普遍的原则,并将它扩大到地球上所有共产党组织的原因。

154

由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在精心制定组织形式问题上具有历史的具体性,所以它总是强大的。它不诉诸枯燥的概念。布尔什维克

在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阶段时都要将組織結構作激劇的改变。然而在今天，同一个“革命秩序”的原則既运用于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党，运用于代表一个重大的政治力量的德国共产党，也运用于被立即拖入革命斗争漩渦的年輕的中国党，也运用于仅仅是一个小規模宣传团体的美国党。在美国党内，对佩珀（当时的领导人）偷偷加在党的头上的方法的正确性一发生怀疑，“怀疑者”就由于鬧派別主义而受到惩戒。作为一个完全处于初期阶段的政治机体的年輕的党，与群众沒有任何真正的联系、沒有革命领导的經驗、不具备理論的訓練，而已經从头到脚被“革命秩序”的一切特点所武装起来了，这个党就像一个六岁的孩子穿上了他爸爸的衣服。

155

俄国共产党在思想和革命的領域里有极其丰富的經驗。但过去五年表明，即使是俄国共产党，連一天也不能光靠它的資本所生的利息安然无事的过日子，而不得不經常地更新和发展这些經驗，而且只有通过党的集体智慧才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对于其他国家的，不几年以前才建立起来的、还处在积累理論知識和实际能力的初期阶段的共产党还有什么需要說的呢？沒有真正自由的生活，沒有自由討論，沒有通过成立集团而集体制定它們的方針的自由，这些党决不能成为一支决定性的革命力量。

在禁止建立派別的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之前，俄国共产党已經存在了二十年而沒有这一禁止的規定。正是这二十年鍛炼了它，为它作了准备，它才能够在最困难的轉折时期接受和忍受住第十次代表大会的严峻决定。但西方共产党一开始就从这一点起步前进了。

我們同列宁所最怕的是，被国家丰饒的資源武装起来的俄国共产党会将过分的、压倒一切的影响加在西方刚刚建立的年輕党的身上。列宁曾不倦地对过早地沿着集中主义的道路迈进提出警告，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主席团过分地向这一方向发展的傾

向，并且特別对足以变成无处上訴的直接命令的进行帮助的方式和方法提出警告。

在“布尔什維克化”的名义下，一九二四年开始发生了变化。如果布尔什維克化被理解为肃清党内的异己分子和习惯，肃清死抱住他們的职位不放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官吏，肃清互济会会员、和平主义民主主义者和唯心主义的笨蛋等等，那么，这一工作早在共产国际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在进行了。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对于法国党所进行的这一工作甚至采取了极端尖銳的斗争形式。但在以前，这种真正的布尔什維克化是与共产国际各国支部本身的經驗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是从这些經驗发展起来的，并且以一个国家的党的政策发展为国际任务的問題作为批評斗争的标准。一九二四年的“布尔什維克化”完全具有滑稽戏的性质。一支左輪手枪对准各国共产党领导机构的額角，要求它們在不了解任何情况和不經過任何討論的情况下，对俄共的内部爭論立即采取最后的立場；而且，它們事先知道，它們能否留在共产国际内取决于它們所采取的立場。然而，一九二四年，欧洲共产党决沒有具备对俄国正在討論的問題作出迅速决定的条件。在那个时候，俄国的两个原則性的趋向正在形成阶段，它們是从无产阶级专政的新时期产生的。当然，一九二四年以后，清党工作还是必要的，异己分子从許多支部中很正确地被清除掉了。但总的来看，“布尔什維克化”的情况是这样的：在国家机器自上而下的打击下，俄国的爭論这个楔子使西方共产党当时正在形成的领导机构一再解体。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反对派別主义的旗帜下进行的。

156

如果一个使党的战斗力有长期瘫痪危险的派別的确在无产阶级先鋒队的党内形成了，那么党自然随时都有必要作出决定：或者化更多的時間进行补充性的重新考虑，或者立即承认分裂的不可避免。一个战斗的党决不可能是几个南轅北轍的派別的复合体。

157

如若以这种一般的方式来看，这个說法无可爭辯是正确的，但利用分裂作为防止意見分歧的措施，并且砍掉一切提出批評的派別和集团，就是使党内生活成为一系列的組織上的流产。这种方法促进不了人类的延續和发展，只能耗尽物质机体——即党。反对派別主义的斗争比建立派別本身变得更加无限危險。

目前，我們面临的局势是，几乎世界上所有共产党的真正发起人和創造者，甚至包括共产国际的前主席，都被排斥在共产国际之外。几乎在所有的党里面，在党的发展的两个連續阶段中形成的領導集团不是被开除了，就是被解除了領導职务。德国的布兰德勒集团今天仍然处于半党员状态。馬斯洛夫集团在党外。法国的罗斯墨、孟納特、洛利阿和苏瓦林等老集团被开除了，后一时期的希罗—特伦領導集团也被开除了。比利时的范欧維尔斯特拉坦^①基本集团被开除了。如果說意大利共产党的締造者博尔迪加集团仅仅处于半开除状态，那是由于处在法西斯政权統治的情况下。在列宁逝世以后，我們在捷克斯洛伐克、瑞典、挪威、美国，簡言之，在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党内，都看到了大同小异的現象。

毋庸置疑，許多被开除的人犯了极大的錯誤；我們并不是事后才指出他們的錯誤的。同样真实的是：許多被开除的人，在他們同共产国际的关系被切断以后，大部分回到他們原来的出发点——
158 左翼社会民主主义或工团主义。但共产国际領導的任务决不應該是将各国党的幼年的領導每次都赶进死胡同，从而使它們的各个代表人物必然陷入思想墮落的境地。在共产国际的所有的党的发展道路上，官僚主义領導的“革命秩序”是一个可怕的障碍。

* * *

組織問題与綱領和策略問題是不可分的。我們必須清楚地考

^① 罗斯墨、孟納特、洛利阿、苏瓦林、希罗—特伦、范欧維尔斯特拉坦，都是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期間清除的各国党的机会主义领导人。——譯者注

考虑到，共产国际机会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根源是，共产国际的机构和它的领导党的机构实行的官僚主义统治。在有了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八年的经验以后，丝毫用不着怀疑，俄国的官僚主义是非无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施加压力的表现和工具。共产国际的纲领草案在这一问题上有一个正确的提法，它写道，官僚主义的堕落“不可避免地产生在群众文化水平不够和非无产阶级的阶级影响的土壤上。”我们在这里找到了不仅了解一般官僚主义、而且了解过去五年中官僚主义取得的不平常的发展的钥匙。群众的文化水平虽然仍然是低的，但在这一时期却一直在提高（这是无可争辩的）；因此，官僚主义发展的原因只能从非无产阶级的阶级影响的发展方面去寻找。欧洲的共产党——主要是它们的领导机构——在组织上随着俄共机器的变动和改组而变动和改组；在同样程度上，外国共产党的官僚主义大都仅仅是俄共内部官僚主义的反映和补充。

挑选这些共产党的领导人过去主要从、现在仍然主要从他们是否随时准备接受和赞同俄共最新机器集团这一点出发。拒绝服从纯粹以行政方式进行改组和再改组的外国党的领导中比较有独立性和有责任心的人，不是完全被开除出党，就是被迫加入右翼（常常是假的右翼），或者，最后参加左翼反对派的行列。这一来，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进行无产阶级斗争的基础上从事选拔和聚积革命干部的有机过程就受到阻碍、被篡改和歪曲了，而且部分地直接被来自上边的、行政的和官僚主义的选择所取而代之。非常自然，那些随时随刻都准备通过现成的决定和副署任何和一切决议的共产党领导人，往往比浸透着革命责任感的那些人要占上风。我们往往选择了最能随机应变的官僚主义者，而不能选拔受过考验的、不动摇的革命者。

一切国内和国际政策问题总会将我们引回党内制度问题上去。的确，在中国革命和英国工人运动问题上，在俄国经济、工资

和稅收等問題上背离階級路綫，这本身形成了严重的威胁。但由于官僚主义的制度束縛了党的手脚，并且夺去了以正常方式改正党的領導人的路綫的机会，这就有十倍的危險。共产国际的情况也是一样。俄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有必要使共产国际更加强民主更加强集体領導的決議，实际上已經变成了它的反面。共产国际內部制度的变化正在成为国际革命运动的生死問題。达到这一变化可通过两种方式：或者通过俄共內部制度的变化，或者进行反对俄共在共产国际中的領導作用的斗争。一切努力都应该确保采取第一种方法。为改变俄共內部制度而进行的斗争是一场使共产国际的制度获得新生和为保持我們党在共产国际內的思想領導作用的斗争。

因此，必須从綱領中无情地删去这样一种思想，即认为那些有生气的、有活力的党可以隶属于一个不能罢免的执政党的官僚机关的“革命秩序”控制之下的想法。党本身的权利必須恢复。党必須再次变成一个党。这必須在綱領中用明确的文字肯定下来，使为官僚主义和篡夺傾向寻找理論借口的努力无隙可乘。

12. 反对派失敗的原因和它的前景

党的无产阶级左翼在一些文件中記述了它的观点，其中主要的文件是《布尔什維克——列宁主义者(反对派)的綱領》。这一无产阶级左翼从一九二三年秋开始就成为有系統的、有組織的消灭运动的打击对象。镇压方法决定于党的內部統治制度的性质，这一統治的官僚主义性质，随着非无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施加的压力的增长而增长。这些方法获得成功的可能性是由这一时期的一般政治性质造成的。在这一时期，无产阶级遭到最大的失敗，社会民主主义重新活跃起来，而在共产党內，中派机会主义的趋向增强了。此外，中派主义有系統地向右滑去，最近几个月还在向右滑。

德国革命失败以后，立即向反对派发动了第一次进攻，好像是对这次失败火上加油。如果德国无产阶级取得胜利，本来会使这次进攻完全不可能发生，胜利会大大增强俄国无产阶级的自信，因此也会增强他们抵抗国内外资产阶级压力的能力和抵抗传送这一压力的党的官僚机构的能力。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自一九二三年底以后共产国际内发生的领导改组的意义，逐步地研究一下领导集团怎样解释它在向下滑的不同阶段战胜反对派的、组织上的“胜利”是非常重要的。在批评纲领草案的范围内，我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但是，研究一下他们如何看待和解释一九二四年九月战胜反对派的第一次“胜利”就足以达到我们的目的。斯大林在他的关于国际政策问题的第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共产党内革命派的决定性的胜利是工人阶级内部极深刻的革命过程的一个最可靠的标志……”^①

这篇文章在另一处写道：

“如果再加上俄共(布)内的机会主义派别完全孤立的事实，那么情况就全面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只会确认了共产国际各主要支部的革命派的胜利。”^②

于是，俄共反对派的失败被宣布为下列事实的结果：欧洲无产阶级正向左转，正直接奔向革命，并使革命派在共产国际的一切支部内胜过机会主义者。在大约五年以后的今天，在一九二三年秋国际无产阶级遭受最大失败以后，《真理报》被迫承认：“在一九二三年失败以后开始的、允许德国资本巩固它的阵地的某种冷漠和灰心丧气的浪潮，”^③现在才开始消散。

162

① 《论国际形势》，《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244页。——译者注

② 同上书，第254页。——译者注

③ 《真理报》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但，这就产生了对共产国际现在的领导说来是新的，而对我們却不新奇的一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岂不是应当把一九二三年和以后几年内反对派的失败解释为工人阶级**向右摆**而不是**向左摆**的结果吗？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具有决定一切的意义。

一九二四年第五次代表大会和以后的各种文章和讲话所提供的答案是明白无疑的：欧洲工人运动内部革命分子的加强、新的高潮的浪潮、即将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这一切造成了反对派的“溃败”。

然而，一九二三年后政治局势急剧地和长期向右而不是向左转的事实现在已经得到肯定和普遍的承认，成为不可争辩的了。因此，另一事实也同样是不可争辩的，即反对反对派的斗争的开始和加剧，以及这一斗争加剧到开除和流放的程度是与欧洲资产阶级稳定的政治进程最密切关联的。的确，这一进程在过去四年中被重大革命事件打乱了。但是，领导上的新的错误，甚至比一九二三年在德国发生的更加令人痛心的错误，每次都在对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不能再坏的条件下，将胜利给与了敌人，因此为资产阶级稳定创造了新的汲取营养的来源。国际革命运动遭到失败，俄共和共产国际内的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左翼也随之失败了。

如若我们忽略了由这一世界局势而产生的俄国经济政治生活的内部进程，这一解释就会不完整。这一进程表现为在新经济政策基础上出现的矛盾在增长，而领导上却没有正确地理解城乡之间经济“结合”的问题，低估了平衡失调的影响和工业化的任务，不理解计划经济的意义等。

在欧洲和亚洲无产阶级革命遭受失败的基础上，国内官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经济政治压力增长了——这是在这四年当中紧紧地缠在反对派脖子上的历史锁链。谁不了解这一点，将什么也无

从了解。

* * *

在这样的分析中，我們几乎在一切重要的阶段都被迫以在托洛茨基主义的名义下被摺弃的路綫，去对抗实际执行的路綫。从一般方面来看，这一斗争的意义对所有馬克思主义者都是十分清楚的。如若靠引用过去二十五年內的一大堆真真假假的引語以证实对“托洛茨基主义”进行的偶发的、带有偏見的指責能够暂时引起混乱的話，那么对过去五年內思想斗争进行首尾一貫的概括的估价就可以证明存在着下列两条路綫：一条是自觉的和一貫性的路綫，它是运用在俄国国内問題和世界革命問題上的列宁的理論和战略原則的繼續和发展；这是反对派的路綫。第二条是不自觉的、自相矛盾的和游移不定的路綫，它是在国际政治的逆流时期、在敌对阶级势力的压力下从列宁主义弯弯曲曲地向下滑去的路綫；这是官方领导的路綫。在重大的轉折点，人們常常发现放弃他們的概念比放弃习惯用語还来得容易。这是所有思想褪色的人的一般規律。这个领导几乎在所有問題上修正了列宁的論点，同时将这一修正主义冒充为列宁主义的发展，并把列宁主义的国际革命的实质說成是托洛茨基主义。它这样做，不但是为了从外部和内部掩飾它自己，而且是为了使它自己更容易适应它本身的向下滑的过程。

164

誰要是想了解这一点，誰就不会对我們提出廉价的指責，說我們把对綱領草案的批評同揭露关于托洛茨基主义的神話联系起来。目前的这个綱領草案是充滿这种神話的思想时代的产物。綱領草案的作者是最积极散布这种神話的那些人，他們总是从这一神話出发，并用这种神話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全部草案正是这个时代的反映。

政治历史已經增加了新的、特別有教育意义的一章。这一章

也許可以叫做“神話的力量”，或者簡單地称为“思想毀謗——一个政治武器”。經驗告訴我們，不容許低估这件武器。我們还远远沒有“从必然的王国飞跃到自由的王国”，我們仍然生活在一个階級社会里，不能想象这样一个社会沒有蒙昧主义、偏見和迷信。一个符合某些利益或传统习惯的神話总能掌握巨大的力量。但仅仅在神話的基础上，即令这个神話是精心組成的并且有一切国家权力供其支配，也是无法执行任何重大政策的，更不用說一个革命的政策，在我們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特别是这样。神話不可避免地一定要陷入它自身矛盾的罗网中。我們已經提到了一小部分矛盾，也許是这些矛盾中的最重要的一部分。姑且不論外界环境是否允許我們將我們的分析进行到底，我們坚决地考虑到，我們的主观分析将为历史事件所提供的客观分析所证实。

在上届国会选举中表現出来的欧洲工人階級的激进化是无可爭辯的事实。但这一激进化正处在初期阶段。像最近中国革命的失敗这样一些因素，是不利于这一激进化的，这些因素大都納入了社会民主主义的軌道。我們在这里决无意預料这一进程在不远的将来的发展速度。無論如何，事实很明显：只有在趋向共产党的傾向开始增长、社会民主主义的巨大后备力量开始削弱的时候，这一激进化才能成为新的革命形势的先驅。現在的情况还不是这样。但这种情况必然是会发生的。

共产国际領導上現在的方針是不明确的，它所作的努力缺乏內在的协调：想向左轉舵，而又不改变整个制度和停止对經受过最多考驗的革命者的組織上的斗争。这种自相矛盾的方針不仅产生于俄国内部經濟困难的打击——这完全证实了反对派的預料——；而且完全符合欧洲工人群众激进化第一阶段的情况。共产国际領導所推行的政策的折衷主义、綱領草案的折衷主义好像是国际工人階級目前状况的写照。国际工人階級被事变的发展进

程推向左边,但还没有确定它的道路,它投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九百多万张选票。

再次发生的真正的革命高潮将表明工人阶级内部——包括共产国际在内的所有的工人阶级组织——的大规模改组。这一进程的速度仍然是不清楚的。但是可以清楚地觉察到改组具体化所遵循的路线。劳动群众将一部分一部分地从社会民主党转向共产党。共产党的轴心将从右向左转得更多些。同时,尽管自从一九二三年年底德国无产阶级失败以后曾经遭到狂风暴雨似的指控和迫害,然而要求采取能够抵得住逆流的那一派的、坚持不渝的布尔什维克路线的人将日益增多。

能够使真正的、非冒充的列宁主义思想在共产国际、继而在整个国际无产阶级内取得胜利的组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目前共产国际的领导、因而直接决定于第六次代表大会。

然而,不论这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如何——我们作最坏的准备——对当前时代及其内在趋势的总估计,特别是对过去五年内的经验的评介,向我们表明,除了共产国际以外,反对派不需要别的门径。没有人能够将我们从共产国际推开。我们所捍卫的思想将变成它的思想。这些思想将表现在共产国际的纲领中。

三 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景

167

它对东方各国和整个共产国际的教训

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孟什维克主义,以及德国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的左翼,在对一九〇五年革命的經驗、錯誤和傾向的分析上形成了鮮明的壁壘。关于中国革命經驗的分析,今天对国际无产阶级也具有同样的重要性。

但是,这种分析现在甚至尚未开始——它遭到了禁止。官方

文件只是仓猝拼凑事实以适应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其空洞性已暴露无遗的决议。纲领草案尽可能使中国问题当中最尖锐的问题失去棱角，然而它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中国问题上奉行的致命路线的主要论点则正式表示赞同。对已经破产的论点的文字上的辩护，代替了对伟大历史进程的分析。

1. 論殖民地資產階級的性質

168 綱領草案說：“〔和殖民地國家的民族資產階級達成〕暫時協議只有在資產階級不妨礙工人和農民的革命組織、並且真正和帝國主義進行鬥爭的條件下，才是可以容許的。”

這個公式虽然是故意作为一个附带的论点加上去的，实际上是綱領草案的主要论点之一，至少对东方各国說来是如此。不言而喻，主要论点談的是“〔使工人和农民〕从民族資產階級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但是我們并不是从文法上，而是从政治上，特别是根据經驗作出判断的。因此我們說：主要论点在这里只是附带的，而附带的论点却包含着最重要的内容。整个說来，这个公式是为东方的无产階級安排的一个典型的孟什維克的圈套。

这里所說的“暫時協議”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在政治中，正如在自然界，一切事物都是“暫時”的。或許我們这里討論的是从一个时机到另一时机之間純粹属于实用范围的協議吧？不言而喻，我們不能事先拒絕經過严加界說的、严格属于实用范围的、每次为一个十分明确的目的服务的協議。例如为了举行一次反帝示威游行而和国民党青年学生达成協議，或者是为了使中国商人援助外国租界內的罢工者而达成協議，等等。即使在中国，将来并不能根本排除这种情况。但是，在那种情况下，有什么理由在这里举出“在資產階級不妨礙工人和農民的革命組織、並且真正〔！〕和帝國主義進行鬥爭的條件下”这种一般的政治条件呢？

和資產階級達成任何協議的唯一“條件”，為了適應某一具體情況而達成的任何單獨的、屬於實用範圍的、作為權宜之計的協議所需要的唯一“條件”，在於一天也不容許、甚至片刻也不容許組織上或旗幟上的混淆，無論是直接還是間接的混淆；在於區分紅色力量和藍色力量，在於一分鐘也不相信資產階級能夠或準備領導真正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或不去妨礙工人和農民。就作為權宜之計的實用的協議而言，我們絕對不需要上述那種條件。相反地，它只能給我們造成危害，和我們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即使在存在“協議”的短暫時期，這個鬥爭也不會中斷——的總路線背道而馳。過去早就說過，如果在當時這種協議是有利的話，即使和魔鬼本身也可以達成純屬實用範圍的協議，例如對我們不會有任何政治上的約束、也不會使我們承擔任何政治義務的協議。但是，在這種情況下，要求魔鬼完全皈依基督教，要求他不用自己的角來反對工人和農民而專門為虔誠的目的服務，這種要求是荒謬的。我們提出這種條件，實際上是在給魔鬼當保鏢，祈求他讓我們充當他的教父。

通過它所提出的、預先為資產階級塗脂抹粉的荒謬條件，綱領草案（儘管它的提法具有外交辭令和附帶的性質）肯定而明確地說明這裡牽涉到的正是長期的政治聯盟，而不是出於實際理由、嚴格限於實用目的而達成的、僅適用於特定时機的協議。但是在這種情況下，要求資產階級“真正”進行鬥爭並且“不要妨礙”工人究竟是什麼意思呢？我們是否向資產階級本身提出這些條件，要求它公開作出諾言呢？資產階級會作出你所需要的任何諾言！它甚至會派代表到莫斯科來，參加農民國際，作為一個“同情的”黨依附於共產國際，並窺視紅色工會國際。簡單地說，它將作出任何諾言，只要這種諾言使它有機會（在我們的幫助下）欺騙工人和農民，使它能夠更有效地、更輕易地、更徹底地蒙蔽他們的眼睛——直到開

始出現上海所提供的那种机会为止。^①

但是，这里涉及的或許并不是要資產階級承担政治义务的問題吧？我們再說一遍，为了把我們变成它在劳动群众面前的保证人，資產階級是会立刻同意承担这种义务的。这里涉及的或許是对某一民族資產階級作出“客观”而“科学”的評價、仿佛是由专家用演繹方法对資產階級是否能够进行斗争和不进行妨碍作出“社会学的”預測的問題吧？可悲的是，正如最近取得的最新的經驗所证明的那样，这种演繹式的預測总是使专家也受到愚弄。如果这里仅仅涉及专家的話，問題倒不会这样糟……

綱領草案談的正是长期的政治联盟，这不可能有絲毫疑問。如果把偶然为实用目的达成協議的問題包括在綱領中，那完全是多此一举。就这个目的來說，通过一个《論我們当前的任务》的实事求是的战术性決議就够了。这里涉及的是为过去对待国民党的方針进行辯护并以綱領的形式正式予以批准的問題——这个方針已經使中国第二次革命遭到毀灭，并且有可能使将来的革命也遭到毀灭。

根据草案的真正作者布哈林提出的概念，一切賭注正是押在对殖民地資產階級的总估价上；殖民地資產階級是否能够进行斗争和不进行阻撓，不能由它自己发誓加以证明，而必須以严格的“社会学的”方式——也就是用无数适合机会主义目的的学究式的概念——加以证明。

为了更清楚地說明这一点，讓我們回头看看布哈林对殖民地資產階級的評價。在列举殖民地革命的“反帝內容”和（毫无理由地）引用列宁的話以后，布哈林宣称：

171

“中国自由資產階級在几年而不是几个月的时期中，起了客观

^① 据英譯本注，这里指的是一九二七年蔣介石进行的反革命政变。——譯者注

上是革命的作用。然后它的作用就耗尽了。这并不完全是属于一九〇五年俄国自由主义革命那种类型的‘二十四小时’政治假日。”

这里讲的一切都是彻头彻尾錯誤的。

列宁事实上曾經教导我們要严格划分被压迫的和实行压迫的资产阶级国家。由此可以得出极为重要的結論。例如我們对待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之間的战争的态度：对于一个和平主义者來說，这样一場战争就和其他任何战争一样；而对一个共产党人來說，殖民地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战争則是一場资产阶级革命战争。这样一来，列宁就把民族解放运动、殖民地起义和被压迫国家的战争提高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水平，特別是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的水平。但是，列宁根本没有像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以后的布哈林現在所做的那样，把民族解放战争置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上。列宁坚持要区分被压迫的资产阶级国家和资产阶级实行压迫的国家。但是列宁在任何地方也沒有提出过，也絕不可能提出这样的問題，仿佛处在民族解放斗争时代的一个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必定比处在民主革命时代的一个非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更进步和更革命。这既不能从理論上找到任何根据，也不能从历史上得到任何证实。举例來說，尽管俄国的自由主义是很可怜的，尽管它的左面一半——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是个大杂燴，但是未必能够說中国的自由主义和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达到了比它們的俄国原型更高的水平，或者更为革命。

把問題說成仿佛殖民地压迫必然会使民族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那就是彻底重犯那种认为俄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是封建和专制压迫的必然产物的、孟什維主义的根本錯誤。 172

资产阶级的性质及其政策問題决定于一个进行革命斗争的国家的整个内部阶级结构，决定于这个斗争的发展所处的历史时代，

决定于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依赖整个世界帝国主义或它的某一特定部分的程度，最后，最重要的是，决定于当地无产阶级的阶级活动程度、这个无产阶级和国际革命运动联系的情况。

一个民主或民族解放运动也许会给资产阶级提供机会来加深和扩大进行剥削的可能性。无产阶级在革命舞台上进行的独立的干预则有使资产阶级完全丧失剥削可能性的危险。

让我们比较深入地看看某些事实吧。

共产国际现在的鼓舞者毫不倦怠地反复指出：蒋介石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而克伦斯基则和帝国主义携手并进。因此：对克伦斯基必须进行无情的斗争，而对蒋介石则必须给予支持。

克伦斯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联系是无可争论的。人们甚至可以追溯更远些，指出俄国资产阶级是在英国和法国帝国主义的庇佑下“废去”尼古拉第二的王位的。不仅米留可夫——克伦斯基支持劳合·乔治——庞卡莱的战争，劳合·乔治和庞卡莱也支持米留可夫和克伦斯基的革命——起初是支持他们反对沙皇，后来又支持他们反对工人和农民。这是绝对无可争论的。

173 但是，就这方面来说，中国的情况如何呢？中国的“二月”革命发生在一九一一年。这次革命是一个伟大的进步的事件，虽然它是在帝国主义者直接干预下完成的。孙逸仙在回忆录中谈到他的组织如何在一切工作中依靠帝国主义国家——日本、法国或美国——的“支持”。如果说克伦斯基在一九一七年还在继续参加帝国主义战争，那末中国的资产阶级，这个如此具有“民族”性、如此“革命”和具有诸如此类性质的资产阶级，却支持威尔逊对战争的干涉，希望协约国会帮助解放中国。一九一八年，孙逸仙向协约国各国政府提出了他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解放拟订的计划。没

有任何根据可以断言对清朝进行斗争的中国资产阶级比对沙皇进行斗争的俄国资产阶级表现了更高的革命品质，或者断言蒋介石和克伦斯基在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上存在原则上的区别。

然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说，尽管如此，蒋介石的确进行过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以这种方式说明形势就是过分粗暴地掩盖现实。蒋介石对某些中国军阀——帝国主义国家之一的代理人——进行过战争。这和对帝国主义进行战争根本不是一回事。甚至谭平山也懂得这一点。他在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一九二六年底）作报告时谈到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政策的特点。他是这样说的：

“在国际政策方面，它采取完全消极的立场……它倾向于仅仅对英国帝国主义作斗争；但是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它准备在一定条件下和他们妥协。”^①

国民党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从一开始就不是革命的，而完全是机会主义的。它力图粉碎和孤立某些帝国主义国家的代理人，以便在对中国资产阶级更有利的条件下和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本身或者是其他帝国主义国家进行交易。情况就是如此。但是问题的中心在于：对这个问题的整个提法是错误的。 174

不能就每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的“一般的”态度来衡量，必须就这个资产阶级对本民族当前的革命历史任务的态度来衡量。俄国资产阶级是一个帝国主义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中国资产阶级则是一个被压迫的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推翻封建沙皇制度在旧俄是一项进步的任务。推翻帝国主义的羁绊在中国是一项进步的历史任务。但是，中国资产阶级对待帝国主义、对待无产阶级以及对待农民的态度，并不比俄国资产阶级对待沙皇制度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记录》，第一卷，第406页。

和对待俄国各革命阶级的态度更革命，如果要加以区别的话，倒是更为恶劣、更为反动。关于这个问题，只能这样提。

175 中国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和它对世界帝国主义本性了解的程度都足以使它懂得：要对世界帝国主义进行真正严肃的斗争，就要使革命群众来一次首先将对资产阶级本身造成威胁的大变动。如果说反对清朝的斗争是一个比推翻沙皇制度规模较小的历史任务，那末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斗争则是一个规模大得多的任务；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教导俄国工人不要相信自由主义准备推翻沙皇制度和摧毁封建主义，也不要相信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有能力这样做，那末我们就应当作出同样的努力，使中国工人从一开始就充满同样的不信任的精神。斯大林—布哈林颁布的关于殖民地资产阶级“固有的”革命精神的新的、绝对错误的理论，实质上是把孟什维主义翻译成中国政治的语言。这种理论唯一的作用是把中国所处的受压迫的地位变成有利于中国资产阶级的内部政治因素，格外加重了资产阶级的份量，而相对降低了遭受三重压迫的中国无产阶级的份量。

但是，纲领草案的作者斯大林和布哈林对我们说，蒋介石的北伐在工农群众当中激起了一个强大的运动。这是无可争辩的。然而，古契柯夫和舒尔金到彼得格勒去造成了尼古拉第二的退位，这个事实不是也起了革命的作用吗？难道这个事实不是把人口当中最受践踏、被弄得最筋疲力竭、最胆小的阶层也激发起来了吗？昨天还是一个劳动派的克伦斯基变成了部长会议主席和总司令，难道这个事实不曾激发士兵群众，使他们纷纷集会吗？难道这个事实不曾激发农村居民，使他们起而反对地主吗？这个问题甚至可以提得更广泛些。难道资本主义的整个活动不曾激发群众，把他们——用《共产党宣言》的话来说——从愚昧的乡村生活中拯救出来吗？难道资产阶级不曾迫使无产阶级的队伍进行斗争吗？但

是，我們对整个資本主义的客观作用、特别是对資產階級的某些行动的历史评价，能够代替我們对待資本主义或者对待資產階級的行动所应采取的积极的階級革命的态度嗎？机会主义的政策总是以这种非辯证的、保守的、尾巴主义的“客观主义”作为依据。相反地，馬克思主义总是教导說：在和資產階級的关系中，无產階級先鋒队越保持独立性，越拒絕把自己的指头放入資產階級的虎口，越拒絕把資產階級看成非常美妙，越拒絕过高估計它的革命精神及其准备建立“联合陣綫”和进行反帝斗争的意願，那末，資產階級由于它所处的地位而不得不采取的这一或那一行动所带来的革命的后果将会更加充实，更具有决定意义，更无庸怀疑，而且更坚定。

斯大林主义的和布哈林主义的对殖民地資產階級的评价是經不住批判的，無論是理論上的批判、历史上的批判还是政治上的批判。然而，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綱領草案正是力图把这一评价奉为圣典。

* * *

一个未予揭露和譴責的錯誤总是会导致另一个錯誤，或者为另一錯誤鋪平道路。

如果說中国資產階級昨天还被收納在革命联合陣綫里面，那末今天它却被宣布为已經“肯定跑到反革命陣营中去了”。要揭露这种种变迁和收納是多么沒有根据并不困难。这些变迁和收納都是以一种純粹行政的方式进行的，缺乏任何严肃的馬克思主义的分析。

資產階級参加革命陣营并非偶然，并不是因为資產階級的輕率，而是由于它的本階級的利益的壓力。这是完全不言而喻的。由于害怕群众，資產階級后来会抛弃革命，或者公开显示它对革命的隐藏的仇恨。但是，只有在資產階級的根本階級願望通过革命或以其他方式（例如俾斯麦方式）得到滿足的情况下，它才有可能

“肯定”跑入“反革命陣营”，也就是說，使自己不再有必要重新“支持”革命，至少是不再有必要和革命調情。讓我們回顧一下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七一年那个时期的历史吧。讓我們回顧这一事实：俄国資產階級之所以能够如此断然地背弃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只是因为革命使它得到了国家杜馬，也就是說，它得到了可以借以对官僚机构直接施加压力和进行交易的手段。尽管如此，当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七年的战争說明“現代化”的政权仍不能保证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时，資產階級就再次轉向革命，而这次轉变比一九〇五年的轉变更為急驟。

是否有任何人能够认为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至少已經部分地滿足中国資本主义的根本利益呢？沒有。今天的中国和一九二五年以前一样，距离真正的民族統一和关税自主还远得很。然而，創造一个統一的国内市場以及保护这个市場使它不受廉价的外国貨的侵犯，对于中国資產階級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問題，其重要性仅次于保持它对无产阶级和貧苦农民的階級統治基础的問題。但是，对于日本和英国資產階級來說，保持中国的殖民地地位的重要性不亚于經濟自主对中国資產階級的重要性。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国資產階級的政策将来仍然会出现一些向左摆的曲折。对于“民族統一战綫”的业余爱好者來說，将来不会缺乏引誘。今天如果告訴中国共产党人，說他們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底和資產階級結成的联盟是正确的，然而由于資產階級已經肯定跑到反革命陣营中去，現在这个联盟是一錢不值了，这样說就是在面临形势即将发生客观变化、中国資產階級必然会发生向左摆的曲折的时候，再次解除中国共产党人的武装。蔣介石現在对北方进行的战争已經完全推翻了綱領草案作者的机械的概念。

但是，如果我們回顧一下對我們是記憶猶新的一个很重要的事实，那末官方對這個問題的提法的原則錯誤無疑就會顯得更为突出、更有說服力、更无可爭辯。这个事实就是：沙皇俄国是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結合，即大俄罗斯人和“外国人”的結合，許多“外国人”完全处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地位。列宁不仅要求对沙皇俄国境内各族人民的民族問題予以最大的注意，而且（和布哈林等相反）宣布支持被压迫民族爭取民族自决——直到分离并包括分离在內——的斗争是占统治地位的民族的无产阶级的基本义务。但是党是否由此得出結論，认为受沙皇制度压迫的各个民族（波兰人、乌克兰人、鞑靼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等等）的资产阶级比俄罗斯资产阶级更进步、更激进、更革命呢？历史經驗证明，波兰资产阶级——虽然它既受专制制度的压迫，又受民族压迫——比俄罗斯资产阶级更为反动；在国家杜馬中，它总是傾向十月党人，而不是傾向立宪民主党人。鞑靼资产阶级也是如此。犹太人根本沒有任何权利，这个事实並沒有妨碍犹太资产阶级甚至比俄罗斯资产阶级更为卑怯、更为反动而且更为恶劣。或許爱沙尼亚资产阶级、拉脫維亞资产阶级、格魯吉亞资产阶级或亚美尼亚资产阶级要比大俄罗斯资产阶级更为革命吧？任何人怎么能够忘掉这种历史教訓呢？

同崩得分子、Dashnak分子、P. P. S. 分子^①、以及格魯吉亞和其他孟什維克分子截然不同，布尔什維克号召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工人、沙俄境内一切殖民地民族的工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分离开来，成立他們自己的独立自主的阶级組織，不仅同自由资产阶级的政党、而且同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政党毅然决然地断絕一切組織上的联系，在反对这些政党的斗争中把工人阶

^① 据英譯本注，Dashnak（即 Dashnak-Tsutiun）和 P.P.S.（波兰社会党）是亚美尼亚和波兰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組織。——譯者注

級爭取过来，并且通过工人对这些政党进行斗争，以争取对农民的影响。今天，我們或許应当事后承认这样做是錯誤的吧？我們在这里不是犯了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的”錯誤嗎？在有关这些被压迫、在許多情况下是非常落后的民族的問題上，我們不是跳越了和国民党相应的发展阶段嗎？

事实上，要建立一种理論，把 P. P. S. Dashnak-Tsutiun、崩得等等說成是各个阶级在反对专制制度，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中必須建立的联合的“特殊”形式，这真不費吹灰之力！这种历史教訓怎么能够忘掉呢？

甚至在过去三年来的中国事态发展出現以前，馬克思主义者就清楚地知道——而今天甚至瞎子都應該清楚地知道——作为中国内部生活的一个直接因素的外国帝国主义，使中国的米留可夫們和中国的克伦斯基們归根結蒂甚至要比他們的俄国原型更加卑劣。我們党在发表得最早的一个宣言中不是毫无原因地指出过：我們越往东方去，资产阶级就越下賤、越卑劣，落在无产阶级肩上的任务也就越重大^①。这个历史“規律”对中国也是完全适用的。

“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因此工人應該贊助资产阶级——来自取消派陣营的一錢不值的政客們这样說道。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我們馬克思主义者說道，——因此工人應該使人民看清资产阶级政客的騙局，教导人民不要相信諾言，只能依靠本身的力量，本身的組織，本身的团结，本身的武器。”^②

180 这个列宁主义的論点对整个东方都具有强制性。共产国际網領无論如何必須給这个論点一席之地。

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原文是：“在欧洲，越往东去，资产阶级在政治方面也越軟弱，越怯懦，越卑劣，无产阶级所担負的文化和政治任务也越大”。——譯者注

② 參見《远方来信》，《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 314 頁。——譯者注

2. 中国革命的阶段

国民党的第一个阶段是民族资产阶级在“四个阶级的联盟”这个辩护性的招牌下实行统治的时期。在蒋介石政变后开始的第二个时期，是中国的克伦斯基主义在“左派”汪精卫的汉口政府的形式下进行平行的和“独立的”统治的一种试验。俄国的民粹派和孟什维克一起给他们那种短命的“专政”赋予了一种公开的双重政权的形式，中国的“革命民主主义”则甚至还没有达到这个阶段。由于历史一般并不是按部就班的，所以我们只能这样理解：除了一九二五年以来国民党实行的那种专政以外，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任何其他的“民主专政”。无论国民党完成的中国半统一状态在不久的将来是否能够保持下去，无论中国是否会重新四分五裂，情况都是如此。但是，正是在革命的阶级辩证法——在使尽其他一切办法以后——明确无误地把领导城乡千百万受压迫、被剥夺的人民的无产阶级专政提上日程的时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却提出了工农民主（即资产阶级民主）专政的口号。广州起义就是对这个公式的回答。这次起义尽管很不成熟，尽管它的领导是冒险主义的，但是它揭开了一个新的阶段的帷幕，说得正确些，是揭开了即将到来的第三次中国革命的帷幕。关于这一点，必须进行详细充分的论述。

为了使自己不因为过去的罪过而受到报应，领导集团在去年年底荒谬地以强迫手段加快了事态的发展过程，造成了广州的流产。但是，即使是一次流产也能够使我们学到许多关于母亲的机体和妊娠过程的知识。广州事件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之所以具有重大的、从理论上说是真正决定性的意义，正是因为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历史上和政治上一种罕见的现象，可以说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实验室试验。我们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然而这就使我们

181

更應該吸收教訓。

根据《真理报》(第三十一号)的报道,广州起义的战斗口号之一就是“打倒国民党!”国民党的旗帜和徽号被扯下来放在脚下践踏。但是,即使在蔣介石“叛变”以及后来的汪精卫“叛变”(不是背叛他們自己的階級,而是背叛了我們的……幻想)以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还庄严地宣誓說:“我們不会放弃国民党的旗帜!”广州的工人已經宣布国民党为非法, **宣布国民党的一切傾向都是不合法的**。这就意味着:为了解决根本的民族任务,不仅大資产階級,就是小資产階級也无法产生一种政治力量、一个党或一个派,使无产階級的政党可以和它一起来解决資产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务。这个局势的关键正在于:**把貧苦农民的运动爭取过来的任务已經完全落在无产階級的肩上,直接就落在共产党的肩上**;为了真正解决革命的資产階級民主任务,就必须把一切权力集中在无产階級的手里。

《真理报》刊載了关于短命的广州苏維埃政府的政策的下述报道:

182 “为了工人的利益,广州苏維埃发布命令,建立……工人通过工厂委员会对工业的控制……把大工业、运输业和銀行收归国有。”

接着,又提到这样一些措施:“为了劳动者的利益而对大資产階級的一切住宅实行沒收……”

由此可知,当权的是广州工人,而且政府实际上掌握在共产党手中。新政权的綱領不仅包括一般地沒收广东可能存在的一切封建财产,不仅包括建立工人对生产的控制,而且包括把大工业、銀行和运输业收归国有,甚至包括为了劳动者的利益而沒收資产階級的住宅和資产階級的一切财产。这就出現了一个問題:如果这都是資产階級革命的方法,那末中国的无产階級革命应当是什么

样的呢？

尽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根本没有谈到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措施的问题，尽管广州比上海、汉口和中国其他工业中心更具有小资产阶级的性质，然而针对国民党进行的革命自然而然地导致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在最初采取的步骤中，发现整个形势迫使它不得不采取比十月革命开始时更为激进的措施。而这个事实看起来虽然荒谬，然而却是中国的社会关系和革命的整个发展十分合乎道理的结果。

大规模和中等规模的地产（正如中国普遍存在的那种地产），多数和包括外国资本在内的城市资本有密切的相互联系。中国不存在和资产阶级对垒的封建地主阶级。农村中最广泛、最普遍、最受人憎恨的剥削者是富农兼高利贷者，是城市金融资本的代理人。因此，土地革命既具有反封建的性质，同样也具有反对资产阶级的性质。中国实际上将不会出现我们的十月革命曾经出现过的第一阶段，即富农同中农和贫农一起、常常是带头反对地主的阶段。中国的土地革命，从一开始就意味着、而且以后仍然会意味着是一场不仅反对少数真正的封建地主和官僚制度，而且是一场反对富农和高利贷者的起义。如果在我国只是在十月革命的第二阶段即一九一八年年中才出现贫农委员会，那末中国的情况则是相反，只要土地运动一恢复，贫农委员会就会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出现在舞台上。反对富农的斗争将是中国的十月革命的第一步，而不是第二步。

183

然而土地革命并不是中国目前进行的历史斗争的唯一内容。最极端的土地革命，即普遍分配土地（共产党对这件事自然要支持到底），本身并不能提供一条走出经济上的死胡同的出路。中国同样迫切地需要全国统一和经济主权，即关税自主，更正确地说是对外贸易的垄断。这就意味着要从世界帝国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

来——对于帝国主义来说，中国仍然是它所能看到的不仅是使它发财致富、而且是使它真正生存下去的最重要的源泉，是今天的欧洲资本主义和明天的美国资本主义防止内部爆炸的安全活塞。正是这种情况，预先决定了中国群众面临的斗争必然具有巨大的规模和极端尖锐性。现在的情况更是如此，因为斗争的一切参加者都已经探测出并感觉到这个斗争潮流的深度。

184 外国资本在中国工业中起的巨大作用，及其直接依赖本“民族的”刺刀来保卫自己的掠夺的方式，使建立工人控制的计划在中国甚至比在我国更难以实现。斗争的过程极有可能使得在起义胜利以后的那一天，就有必要首先直接剥夺外国资本主义企业，然后剥夺中国资本主义企业。

曾经在俄国革命中预先决定“十月”的成果的那些客观的社会历史原因，在中国以更为强调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在中国民族里面，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极对立的情况甚至比俄国的情况（如果可能的话）更加不可调和，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直接和外国帝国主义及其军事机器联系在一起，而另一方面，中国无产阶级则从一开始就同共产国际和苏联建立了密切的纽带。从数字上说，中国的农民是一个甚至比俄国农民更占压倒优势的群体。但是，由于世界矛盾的夹攻而苦难重重的中国农民（他们的命运取决于这些矛盾的某种方式的解决），甚至比俄国农民更不能扮演领导的角色。现在这已经不再是理论上的预测，而是在一切方面均已得到证实的事实。

第三次中国革命所必需的这些根本的、同时也是无可争论的社会政治前提，不仅说明民主专政的公式是一个已经毫无希望的过时的公式，而且说明尽管（更正确地说是正因为）和俄国比较起来中国极为落后，第三次中国革命不会出现一个“民主”时期，甚至像十月革命曾经有过的六个月（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到一九一八

年七月)的时期也不会有;相反地,这次革命从一开始就不能不最坚决地打乱和取消城乡资产阶级的财产。

185

诚然,这个前景同关于经济和政治的相互关系的学究式的、直觉的概念是不一致的。但是,使最近才生根而已经受到十月革命不小的打击的偏见感到如此震动的这种不一致,不能由“托洛茨基主义”负责,而必须由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负责。这个规律特别适用于这一具体情况。

如果认为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倘若实行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就一定已经掌握政权,这就是愚蠢的学究式的看法。但是,如果说这种可能性根本不值一谈,那就是可耻的市僧主义。工农群众运动的规模和统治阶级瓦解的程度都完全足以提供这种可能性。民族资产阶级之所以把蒋介石和汪精卫一类的人作为特使派到莫斯科去,并且通过胡汉民之流来敲共产国际的门,正是因为这个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群众面前是无比地软弱的;它认识到自己的弱点,力图得到保障。无论是工人还是农民都不会跟着民族资产阶级走,如果不是我们自己硬逼着他们那样干的话。倘若共产国际奉行任何一种正确的政策,共产党争取群众的斗争的结果是先就可以确定的——中国无产阶级就会支持共产党人,而农民战争本来也可以为革命的无产阶级提供支持。

如果在北伐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着手在“解放”区组织苏维埃(群众出于本能是一心一意希望这样做的),那末我们就可以取得必要的基础和一个迅速的革命的开端,使农村的起义团结在我们周围,建立起我们自己的军队,瓦解敌人的军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虽然年轻,仍有可能在共产国际的适当领导下在这些不平凡的年月中成熟起来,并取得政权——即使不是立刻在整个中国,至少是在其中很大一部分地区取得政权。此外,最重要的是,我们将有一个党。

186

但是，正是在領導方面出現了某種荒謬絕倫的情況——出現了一個真正的歷史性的災難。蘇聯、布爾什維克黨以及共產國際的權威所起的整個作用，首先是支持蔣介石反對共產黨採取獨立的政策，然後又支持汪精衛作為土地革命的領袖。在踐踏了列寧主義政策的根本基礎和折斷年輕的中國共產黨的脊骨以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預先決定了中國的克倫斯基主義將戰勝布爾什維主義，中國的米留可夫將戰勝中國的克倫斯基，而英日帝國主義將戰勝中國的米留可夫。

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期間中國發生的情況，其意義就在於此，而且僅僅在於此。

3. 是民主專政還是無產階級專政？

然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上一次全會怎樣評價包括廣州起義的經驗在內的中國革命經驗呢？它概括出什麼進一步的前景呢？（一九二八年）二月全會的決議是了解綱領草案關於這個問題的相應部分的關鍵。在中國革命方面，決議說：

187 “把這場革命說成是‘不斷’革命〔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的立場〕是不正確的。在把革命說成是‘不斷’革命的同時〔？〕，又想跳越〔？〕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階段，這種傾向是一個錯誤，其性質類似托洛茨基在一九〇五年〔？〕所犯的錯誤。”

自從列寧離開共產國際的領導以來，即自從一九二三年以來，共產國際思想生活的主要內容就是對所謂“托洛茨基主義”、特別是對“不斷革命”進行鬥爭。那末，在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上，為什麼中國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會和共產國際的官方代表——一個帶着特別指令被派去的領導人——碰巧都犯了現在有數以百計的人正因之被放逐到西伯利亞和投入監獄的那種同樣的“錯誤”呢？圍繞中國問題發生的鬥爭已經激烈進行兩年半左右。當反對派指出中

五 五

国共产党的旧的中央委员会（陈独秀），在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的影响下采取了机会主义的政策，这一评价被宣布为“诬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被宣布为无可指责的。鼎鼎大名的谭平山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的普遍赞同下宣称：

“在托洛茨基主义刚刚露头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就一致通过了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决议。”①

但是，尽管有了这些“成就”，当事态本身具有的悲剧性的逻辑表现出来，使革命遭到第一次、接着是第二次甚至更可怕的失败时，过去毫无瑕疵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被重新命名，被称为孟什维克，并于二十四小时内撤消了职务。与此同时，又颁布了一道命令，说新的领导充分反映了共产国际的路线。但是，刚刚出现一次新的严重的考验，立刻就发现中国共产党新的中央委员会犯了（正如我们不是在言词方面而是在行动方面已经看到的那样）倒向所谓“不断革命”立场的错误。共产国际的代表走的是同一条路。这个令人惊讶而又实在费解的事实只能有一种解释，即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和革命的真正发展之间的“剪刀差”越来越大了。

188

这里我们不详细谈为了制造混乱和惶惑而在一九二四年拿来传播的关于一九〇五年“不断革命”的神话。我们仅限于考察一下这个神话在中国革命问题上遭到破产的情况。

二月决议的第一段话——前面引用的一段话就是从这里来的——说明它之所以对所谓“不断革命”采取否定态度是出于下述动机：

“中国革命当前所处的时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无论从经济观点（土地革命和废除封建关系）、还是从民族反帝斗争的观点（统一中国和建立民族独立）、还是从国家的阶级性质（无产阶

① 《记录》，第 205 页。

級和农民的专政)的观点来看,这个革命都尚未完成……”

关于动机的这一陈述是一連串的錯誤和矛盾。

18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教导說,中国革命必須使中国有机会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发展。这个目标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能够达到:革命不是仅仅停留在解决资产階級民主任务方面,而是繼續开展,从一个阶段轉入另一个阶段,也就是說,要繼續毫无間歇地(即不断地)发展下去,从而把中国引导上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馬克思正是这样理解“不断革命”这个詞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們怎么能够一方面談論中国非資本主义发展道路,而另一方面却一般地否认革命的不断性呢?

但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決議坚持說——,无论是从土地革命的观点、还是从民族反帝斗争的观点来看,这个革命都尚未完成。因此,決議得出了“中国革命当前所处的时期”属于资产階級民主性质的結論。事实上,“当前所处的时期”是一个反革命的时期。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无疑是要說明:中国革命的重新抬头,也就是**第三次中国革命**,将具有资产階級民主的性质,因为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第二次中国革命既沒有解决土地問題,也沒有解决民族問題。然而,即使作了这种修改,这种推理的基础仍然是对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經驗教訓都完全缺乏了解。

俄国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把导致革命的一切国内和国际問題都留下来未予解决——农村的农奴制度,旧的官僚制度,战争問題,以及經濟失敗問題。从这一点出发,不仅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而且我們自己的党的領導中也有相当多的人,力图向列宁证明“革命当前所处的时期是资产階級民主革命时期”。在这一点上,从它的基本考虑来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決議仅仅是抄襲了机会主义者针对列宁在一九一七年进行的爭取无产階級专政的斗争而提出的反对意見。

不仅如此，不仅从經濟和民族观点来看，而且从“国家的階級性质(无产階級和农民的专政)的观点”来看，資产階級民主革命似乎都尚未完成。这只能有一个意义，即只要中国还没有一个“真正的”民主政府来掌握舵盘，中国无产階級就不得为夺取政权而进行斗争。不幸的是，没有什么指示說明我們从什么地方可以得到这样一个政府。

在这两年当中，苏維埃的口号被认为是不适用于中国的，理由是大概只有在向无产階級革命过渡的时候才容許建立苏維埃（斯大林的“理論”）。这个事实进一步增加了混乱。但是，当广州的苏維埃革命爆发时，当这次革命的参加者作出結論，认为这正是向无产階級革命的过渡的时候，他們却被指責为“托洛茨基主义”。难道能够用这种方法来教育党嗎？难道这是帮助它解决最重要的任务的方式嗎？

为了摆脱絕望的境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決議仓猝万分地提出了自己最后一个論据——取自帝国主义的論据。跳越資产階級民主阶段的傾向似乎

“……更〔！〕具有危害性，因为对問題的这种提法取消了〔？〕中国革命作为半殖民地革命的最重要的民族特点。”

这些沒头沒腦的話只能有一个意义，即帝国主义的压迫将由某种非无产階級的专政予以推翻。然而这意味着：在最后一分钟把“最重要的民族特点”拖出来是为了給中国民族資产階級或中国小資产階級“民主”塗脂抹粉。这个論据不可能有其他任何意义。但是这个唯一的“意义”，我們已經在《論殖民地資产階級的性質》那一章中充分加以考察，沒有必要重新討論这个題目。

为了取消最典型的“亞細亞式的”奴役形式、取得民族解放、統一全国这样一些最基本的任务，中国仍然面临一場广泛的、艰苦的、流血的、持久的斗争。但是，正如事态发展已經說明的那样，恰

恰是这种情况使将来的革命中不可能存在任何小资产阶级领导地位、甚至半领导地位。中国的统一和解放在今天是一项国际任务，其程度不下于苏联的生存。这项任务要得到解决，就只有由被踩在脚下的、饥饿的、受迫害的群众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决死斗争——这场斗争不仅要反对世界帝国主义，而且要反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經濟和政治代理机构，反对资产阶级，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一切民主走卒在内。而这正是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而不是任何别的道路。

从一九一七年四月开始，列宁就向那些指责他采取了“不断革命”立场的反对人士解释说，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在双重政权时期得到了部分的实现。后来他又解释说：在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起到一九一八年七月为止的苏维埃政权的第一个时期，这个专政进一步扩大了。在这个时期里，全体农民和工人一起实行了土地革命，而工人阶级则尚未着手没收工厂企业，只是试行了工人监督。就“国家的阶级性质”来说，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民主“专政”作出了它所能作出的一切贡献——使双重政权流产。至于土地革命，这场革命诞生了一个十分健壮的婴儿，但是起产婆作用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换句话说，被关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的理論公式结合在一起的事物，在实际的阶级斗争过程中又分解开来。半政权性质的空壳暂时被委托给克伦斯基—策烈铁里，而土地——民主革命的真正核心则属于胜利的工人阶级。民主专政的这种辩证的分解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人所不理解的。他们机械地谴责任何“跳越资产阶级民主阶段”的做法，力图按照通告来指导历史过程，从而把自己赶入了政治上的死胡同。如果我们把资产阶级民主阶段理解为通过“民主专政”实现土地革命，那末十月革命本身正是大胆地“跳越了”资产阶级民主阶段。岂不是应当因此对十月革命加以谴责吗？

那末，在俄国是布尔什維主义的最高表现的、事物的历史必然发展过程，为什么在中国就必然成为“托洛茨基主义”呢？毫无疑问，这同把馬尔丁諾夫之流的理論——布尔什維主义二十年来在俄国曾經与之斗争的那种理論——宣布为适合中国情况是出于同样的邏輯。

但是，这里是否容許和俄国进行类比呢？我們的答复是：无产階級和农民的民主专政这个口号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人完全純粹按照类比的方法訂出来的，但只是形式上的、文字上的类比，而不是唯物主义的、历史的类比。如果我們找到适当的門徑，拿中国和俄国进行类比是完全可以容許的。列宁就曾經卓越地利用这种类比。不仅如此，列宁并不是事后而是事前这样做的，仿佛他已經預見到这些不肖子弟将来的錯誤。列宁在无数場合下不得不为尽管資产階級民主任务尚未解决、却胆敢夺取政权的无产階級的十月革命进行辯护。列宁回答說：正是由于这种情况，正是为了要这样做。博学的先生們在反对夺取政权时提出，要建設社会主义，俄国在經濟上尚不成熟。对于列宁來說，这是“无可爭辯的”^①。一九二三年一月十六日，他針对这些博学的先生們写道：

193

“他們甚至沒有想到，例如，俄国是个介乎文明国家和初次被这次战争完全拖进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各国或欧洲以外各国之間的国家，所以俄国能够而且應該表现出某些特点，这些特点固然并不越出世界发展的共同路綫，但是使俄国革命显得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而且在轉向东方国家时这些特点又会带有某些局部的东西。”^②

年輕的无产階級在一个早期阶段，必須拿起扫帚，把封建野蛮和一切垃圾从自己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清除掉。列宁正是从这

① 《論我国革命》，《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 433 頁。——譯者注

② 同上书，第 432 頁。——譯者注

个事实中看到了使俄国和东方各国更接近的“特点”。

因此，如果我們要以中国和俄国之間的列宁主义的类比作为出发点，那末我們必須說：从“国家的政治性质”的观点来看，在中国通过民主专政可能得到的一切东西都受到了考驗：首先是在孙中山的广州；其次是在从广州到上海的道路上，而以上海的政变为結束；后来又在武汉，那里的左派国民党，以化学上是純粹的形式——按照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也就是以土地革命組織者的身份——出現的，然而实际上則是土地革命的劊子手。但是，将来的中国无产阶级和貧苦农民的专政的最初阶段，将充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社会內容。在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民主”的作用都已經受到彻底考驗以后，在“民主”将在未来的战斗中甚至起比过去更大的劊子手的作用这个事实已經成为絕對无可爭辯以后，現在来提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口号，不过是为掩飾国民党主义的新变种創造条件，为无产阶级准备絞索。

为了完整起見，讓我們追叙一下列宁簡洁地談到那些坚持以“真正的”民主专政的口号同社会革命党——孟什維克的經驗对抗的布尔什維克时所說的話：

“現在誰只是說‘工农革命民主专政’，那就是脫离了生活，从而在实际上跑到小资产阶级方面去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因此，就应当把他送到‘布尔什維克’革命前古董博物館去（或者叫做‘老布尔什維克’博物館。”^①

这些话听起来真像是今天說的。

当然，这根本不是号召中国共产党立刻起义夺取政权的问题。步調完全取决于环境。失敗的后果并不是仅仅通过改变策略就可以消除的。現在，革命正在退潮。在无数人民正在遭到处决、惊人

^① 參見《論策略书》，《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第25頁。——譯者注

的商业和工业危机在中国猖獗一时的時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半吞半吐的決議和关于革命攻势迫在眉睫的大吵大嚷只能是罪恶的輕率行为，而不可能是任何別的东西。在三次重大失敗以后，一場經濟危机并不会激发无产阶级，相反地倒是使无产阶级意气消沉——这个无产阶级实际上已經被压榨到油尽灯灭的程度了——，而处决則只会摧毁这个政治上已被削弱的党。我們在中国正在进入一个退潮时期，因此，也就是进入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党要在理論方面更深入地扎根，用批判的方法教育自己，在工人阶级运动的一切方面建立和巩固坚强的組織联系，組織农村核心，领导和統一工人和农村貧民进行的局部的、起初是防御性而后是进攻性的战斗。

195

什么东西将会扭轉群众运动的局面呢？什么情况会使站在千百万群众前列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得到必要的革命推动呢？这是无法預言的。未来将表明仅仅依靠內部的变化过程是否就够了，是否必要增加外来的推动力。

現在有足够的根据設想，由于领导錯誤直接造成的中国革命的被粉碎，将使中国和外国资产阶级有可能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克服目前在中国猖獗一时的可怕的经济危机。当然，这将以工农遭受更沉重的苦难和牺牲为代价。这个“稳定”局面将使工人再次聚集起来，熔鑄为一体，恢复他們的阶级自信心，从而在后来使他們和敌人发生更尖銳的冲突，然而这种冲突将在一个較高的历史阶段进行。只有在无产阶级运动的攻势出現新的高涨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认真談論土地革命的前景。

不能排斥出現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未来的第三次革命的第一个阶段，可能以一种大为压缩和修改的形式重新再現已經过去的几个阶段，举例來說，可能出現某种新的、仿效“民族統一战綫”的东西。但是，这个第一阶段将仅足以使共产党有一个机会向人民

大众提出和宣布自己的“四月”提綱，即自己夺取政权的綱領和策略。

然而綱領草案在这一点上是怎样說的呢？

196 “在这里〔中国〕，只有在經過一系列准备阶段〔？〕以后，只有作为资产阶級民主革命长入〔??〕社会主义革命的整个时期的結果，才有可能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

換句話說，过去經歷过的一切“阶段”都不算数。綱領草案預見到的仍然是那些已經被抛在后面的东西。所謂尾巴主义的提法正是指的这种情况。它为按照国民党的方針的精神进行新的試驗敞开了大門。由此可知，掩飾旧的錯誤必然会为新的錯誤鋪平道路。

如果我們帶着已經过时的“民主专政”的蓝图，进入将以比前次高涨大得无可比拟的速度向前发展的新的高涨时期，那末，毫無疑問，第三次中国革命就会和第二次革命一样被导向毁灭。

4. 作为机会主义的产物的冒險主义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二月全会的同一決議的第二段說道：

“主要是在这些口号下、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广泛的工农革命运动的第一陣浪潮已經过去。在革命运动的許多中心，它是以工农遭到最沉重的失敗、共产党人和工农运动的一般革命干部遭到肉体上的消灭而宣告結束的。”（着重体是我們用的。）

197 当“浪潮”高涨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說整个运动完全处在国民党的蓝色旗帜之下和領導之下，国民党甚至取代了苏維埃的地位。正是出于这个理由，共产党才被置于从属国民党的地位。然而这正是革命运动以“最沉重的失敗”作为結束的原因。現在，当这些失敗已得到承认时，人們却企图把国民党从过去一笔抹掉，仿佛它从来沒有存在过，仿佛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不曾把国民党

的藍色旗幟宣布為自己的旗幟。

無論是在上海還是在武漢，過去都不曾有過失敗；有的只是革命“向一個較高階段”的過渡——這就是我們一直得到的教導。現在，整個過渡突然被宣布為“工農遭到最沉重的失敗”。然而，為了在某種程度上掩飾這些預言和估計所遭到的前所未有的政治破產，決議在最後一段宣稱：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認為共產國際的一切支部，均有義務對社會民主黨和托洛茨基主義者所謂中國革命已被取消〔？〕的誣蔑進行鬥爭。”

決議的第一段告訴我們，“托洛茨基主義”就是中國革命不斷論，就是認為中國革命現在正在從資產階級階段長入社會主義階段的思想。但是我們從最後一段得知：按照“托洛茨基主義者”的說法，“中國革命已被取消。”一場“已被取消”的革命怎麼能夠是一場不斷的革命呢？這裡我們看到了布哈林最神氣活現的表現。

只有完全不負責任、恣意妄為，才會出現這種徹底腐蝕一切革命思想的矛盾。

如果我們把革命的“取消”理解為工農的攻勢已被擊退並淹沒在血泊中，理解為群眾處在後撤和衰退的狀態中，理解為在另一次進攻以前，除了其他許多條件以外，還必須有一個群眾的形成分子的过程(molecular process)，而這個過程需要一定的時間，其長短無法預先確定——如果對“取消”作這樣的理解，那末它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最後被迫承認的“最沉重的失敗”就沒有任何差別。我們是否應當從字面來理解取消，認為取消意味著真正鏟除了中國革命、也就是鏟除了中國革命在一個新的水平上重新誕生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呢？只有在兩種情況下，才能够嚴肅地談論這種前景而不造成混亂——假設中國注定會遭到分割和徹底消滅（這是一種毫無根據的假設），或者假設中國資產階級將能夠以它自己的

不革命的方式解决中国生活中的基本問題。那些直接把共产党驅入資產階級的枷鎖之下的、主张“四个階級的联盟”的理論家，現在不是力图把最后那种說法推到我們頭上來嗎？

历史是会重演的。那些不理解一九二三年失敗的規模的盲人們，曾經用一年半的時間來指責我們对德国革命采取“取消主义”的态度。然而，即使这个曾經使国际付出沉重代价的教訓也沒有能够使他們学到任何东西。現在他們又在使用他們的旧的橡皮图章了，不过这次是用中国代替了德国。誠然，他們今天比四年以前更迫切需要找到一个“取消派”，因为这一次情况是清楚得无以复加的；如果真有任何人“取消”第二次中国革命，那就是“国民党”方針的制定者。

馬克思主义的力量在于能够預見。在这个意义上，反对派能够指出，經驗已經絕對证明了他們的預測：起初是关于整个国民党，其后是关于国民党“左派”和武汉政府，最后是关于第三次革命的“押金”即广州起义。关于理論上的正确性，还可能有什么更进一步的证明呢？

通过向資產階級投降的政策已經使革命在最初两个阶段遭到最沉重的失敗的机会主义路綫，在第三个阶段又“发展”成为冒险襲击資產階級的政策，从而使失敗无可挽回。

199 如果領導机构昨天不是匆忙地跳过它自己造成的失敗，它就应当首先向中国共产党解释：胜利不是一举可得的；在通向武装起义的道路上，还有一个进行紧张的、不断的、殘酷的斗争以爭取对工农施加政治影响的时期。

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我們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說：

“今天的报纸报导，革命軍已經占領汕头。賀龙和叶挺的軍隊已經向前挺进了好几个星期。《真理报》把这些軍隊称为革命

軍……但是，我問你們：占領汕头的革命軍的运动为中国革命提供了什么前景呢？这个运动的口号是什么？綱領是什么？应当采取什么組織形式？七月間《真理报》陡然提出过一天的中国苏維埃的口号怎么样了呢？”

不首先用共产党来对抗整个国民党，沒有党在群众当中进行的建立苏維埃和苏維埃政府的鼓动，不在土地革命和民族解放的口号下独立地动員群众，沒有地方工兵农代表苏維埃的創立、扩大和加强，那末，賀龙和叶挺的起义，即使不談他們的机会主义政策，必然也只能是一次孤立的冒险，一个冒充共产党的馬赫諾^①式的成就；它必然会由于自己的孤立而复灭。而它已經复灭了。

广州起义是在更广泛、更深刻的程度上重复了賀龙和叶挺的冒险，只是其結果要更为悲惨得多。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二月決議反对中国共产党內的暴动情緒、即举行武装起义的傾向。但是，它並沒有指出这些傾向是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整个机会主义政策引起的反应，是来自上面的純粹軍事命令的必然后果。这个命令要求“改变步調”，然而沒有对过去所作的一切予以評价，沒有对策略基础进行公开的重新估計，沒有明确的前景。賀龙的战斗和广州起义都是——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下必然是——暴动主义的温床。

真正消除暴动主义以及机会主义毒素的唯一办法是明确地認識这一真理：領導工人和貧农的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和实行革命专政的責任，今后整个落在中国共产党的肩上。如果后者彻底認識到这一前景，它就不会傾向于仓猝从事地对城市发动軍事襲击或在敌人包围中举行武装起义，也不会卑躬曲节地追逐敌人的旗帜。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決議在以最抽象的方式討論不容許跳

① 馬赫諾是十月革命后乌克兰的富农匪帮头子，无政府主义者，他領導的匪帮經常对苏維埃政权进行反革命武装騷扰。——譯者注

越阶段問題和暴动主义的危害时，完全忽視了广州起义和这次起义建立的短命的苏維埃政权所具有的階級內容。仅仅这个事实就使決議完全陷于无能为力的境地。我們反对派人士认为这次起义是领导人为了挽救自己的“威信”而进行的冒险。但是，我們認識到，即使是一次冒险，其发展也得符合由社会环境的結構决定的規律。正因为如此，我們要从广州起义找到中国革命未来阶段的特点。这些特点完全符合我們在广州起义以前作出的理論分析。但是，更为迫切得多的是，认为广州起义是斗争鎖鏈中一个正确的、正常的环节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应当明确說明广州起义的階級特点。可是，尽管它是在广州事件以后立刻举行全会的，它的決議却对这一点只字不提。这难道不是最令人信服的证据，說明共产国际目前的领导由于頑固地奉行錯誤的政策，不得不就一九〇五年和其他年代的假想的錯誤大做文章，而不敢碰一碰使綱領草案制定的东方革命的蓝图完全被推翻的一九二七年广州起义問題嗎？

5. 苏維埃和革命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二月決議认为共产国际代表“N 同志等人”要对“广州缺乏一个**选举产生的**苏維埃作为起义机构”（着重体是原有的）的情况負責。这个指責背后实际上隱藏着一个令人驚訝的承认。

《真理报》（第三十一号）根据第一手文件写的报道說，广州曾經建立一个苏維埃政府。但是，它沒有談到任何东西來說明广州的苏維埃**并不是**一个选举产生的机构，也就是說，并不是一个苏維埃——因为，怎么可能有一个不經過选举产生的苏維埃呢？我們从決議上知道了这一点。讓我們想一想这个事实的意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現在告訴我們，要实行武装起义就必须有一个苏維

埃，但决不是在此以前。可是，瞧吧！当起义的日子确定时，还没有苏维埃。建立一个选举产生的苏维埃并非易举。群众必须从经验中懂得苏维埃是怎么回事，了解苏维埃的形式，并且在过去就有了某些知识，使他们习惯于一个选举产生的苏维埃组织。当时在中国，甚至连这种迹象也没有，因为正是在苏维埃应当成为整个运动的神經中樞的时期，苏维埃的口号被宣布为托洛茨基主义的口号了。但是，当他们仓皇失措地为起义规定了一个日子以便跳出自己的失败时，他们同时就不得不指派一个苏维埃。如果不彻底揭露这个错误，苏维埃的口号就可能被变成一根扼杀革命的绞索。

列宁活着的时候曾经向孟什维克解释说：苏维埃的根本历史任务是组织或者帮助组织夺取政权，以便在取得胜利后的那一天成为这个政权的机构。不肖子孙们——不是那些门生们——从这里得出结论，认为只有在宣布起义开始的钟声已经敲响时才能组织苏维埃。列宁的广泛的概括，被他们在事后变成了一个不是为革命的利益服务、而是危害革命的小小的处方。

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夺得政权以前，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苏维埃已经存在了九个月。十二年前，彼得堡、莫斯科和其他几十个城市里就存在过第一批革命苏维埃。在一九〇五年的苏维埃扩大到把首都的工厂企业包括进去以前，莫斯科在罢工期间曾经建立一个印刷工人代表苏维埃。而在这以前好几个月，即一九〇五年五月，伊万诺沃-沃兹列先斯克的一次群众罢工建立的领导机构已经包含工人代表苏维埃的一切基本特点。从成立一个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最初试验到建立苏维埃政府的规模庞大的试验，其间已经过了十二年以上。当然，绝不是所有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需要这样一个时期。但是，如果认为中国工人能够在用来代替列宁的广泛概括的那个小小的处方的基础上建立苏维埃，那就是用无济于事的、罗嗦的咬文嚼字代替革命行

动的辩证法。苏维埃决不能等到起义前夕、在立刻夺取政权的口号下建立起来——因为，如果事态已经发展到夺取政权的程度，如果群众准备在**沒有苏维埃**的情况下举行武装起义，那就意味着已经有了其他的組織形式和方法，所以才有可能进行准备工作，保证起义的成功。这样一来，苏维埃問題就成了一个次要問題，被降低为一个組織技术或仅仅是名称的問題。苏维埃的任务不仅仅是发出起义的号召或实行起义，而且是要**领导群众通过必要的阶段走向起义**。在开始时，苏维埃不是把群众集合在武装起义的口号下，而是把他們集合在局部性口号下，只是在以后才逐步把群众引向起义的口号，而不至把他們抛在路上，也不让先鋒队脱离阶级而孤立。苏维埃通常主要是在罢工斗争中出現的，这种斗争具有革命发展的前景，但在当时仅限于经济上的要求。群众必須在行动中感觉到并懂得苏维埃是他們的組織，是一个調配力量进行斗争、抵抗、自卫和进攻的組織。他們能够感觉和懂得这一点，不是从仅仅一天的行动、一般說来也不是从任何一件行动中感觉和懂得这一点，而是从几个星期、几个月或許几年的間断或不間断的經驗中感觉和懂得这一点。因此，当国家正在经历革命动乱的时期，当工人阶级和貧苦农民面临夺取政权的前景——即使这是属于以后某一阶段的前景，即使在一定时期只有少数人能看到这个前景——的时候，只有蜕化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才会約束日益觉醒和日益站起来的群众，不讓他們建立苏维埃。这一向是我們关于苏维埃的概念。我們认为苏维埃是这样一种广泛而灵活的組織形式，这种形式是在革命高涨的第一阶段刚刚觉醒起来的群众所能达到的，是能够团结整个工人阶级的，無論在某一具体时期已经成熟到能够理解夺取政权的任务的那一部分工人有多少。

难道真需要任何文件证据嗎？举例來說，列宁在談到第一次革命时期的苏维埃的时候是这样說的：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在当时的名称〕在出现**或大或小的革命高涨的时刻**，从来不拒绝利用属于工人代表苏维埃一类的某些非党组织，来加强社会民主党人对工人阶级的影响，巩固社会民主工人运动。”^①

人们可以连篇累牍地列举这种文字上和历史上的证明。但是，人们认为没有这些证明，问题已经足够清楚了。

与此相反，不肖之徒却把苏维埃变成了一种检阅时用的制服似的组织，党只是在夺取政权的前夕才给无产阶级穿上这种制服。但是，现在正是我们应当发现，不能为了举行武装起义这个直接目的，而通过命令在二十四小时以内临时拼凑苏维埃的时候了。这种试验必然会具有虚假的性质，虚有其表的苏维埃制度会掩盖缺乏为夺取政权所最必需的条件的事实。这就是广州发生的情况；在那里，为了遵守仪式就简单地指派了一个苏维埃。这就是不肖之徒关于这个问题的提法导致的结果。

* * *

在讨论中国事件的论战中，反对派受到指责，据说他们有着下述的所谓令人触目的矛盾：从一九二六年起，反对派就为中国提出了苏维埃的口号，然而在一九二三年秋天，反对派的代表却发言反对为德国提出苏维埃的口号。学究式的政治思想在任何其他问题上或许都没有像在这种指责中表现得如此明显。是的，**当革命浪潮正在高潮的时候**，我们曾经要求在中国及时开始建立苏维埃，作为工人和农民的独立组织。

苏维埃的主要意义是**使工农同国民党资产阶级以及这个资产阶级的左派国民党代理机构相对抗**。在中国，苏维埃的口号首先意味着和自杀性的、名誉扫地的“四个阶级的联盟”断绝关系，意味

^① 《列宁全集》俄文版第八卷第 215 页。

着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因此，重点不在于单纯的組織形式，而在于階級路綫。

在一九二三年秋天的德国，这只是組織形式的問題。由于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的领导极为被动、落后和迟緩，因此错过了及时发出組織苏維埃的号召的时刻。到一九二三年秋天，工厂委员会由于来自下层的压力和自己的要求，已經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占据了这样一种地位——如果共产党采取正确的大胆的政策，这种地位无疑会由苏維埃更加胜任得多地加以占据的。在此期間，紧张的局势发展到最尖銳的程度。再丧失任何時間就肯定意味着错过革命形势。起义终于被提到日程上来，所剩的时间已寥寥无几。在这种情况下提出苏維埃的口号就是迂腐愚蠢到极点。苏維埃并不是万能的救命符。在当时已經形成的局面中，匆匆忙忙地建立苏維埃只会和工厂委员会重叠。那样做就必须剥夺后者的革命职能，把这些职能轉交给新建立的、还完全缺乏权威的苏維埃。而且，在每一天時間都很宝贵的情况下，什么时候办这件事呢？这样做就意味着用最有害的、玩弄廉价的組織花样的把戏来代替革命行动。

苏維埃的組織形式可能非常重要，这是无可爭論的；但只有在这种組織形式及时反映正确的政治路綫时才是如此。反过来说，如果把苏維埃变成一种幻象、一个偶像或者是一种小玩意，那末它就可能获得同等程度的否定意义。如果在一九二三年秋天最后的时刻建立德国的苏維埃，这些苏維埃并不会增加任何政治份量，只会造成組織上的混乱。广州发生的情况甚至更糟。为了遵守規矩而匆匆建立的苏維埃只是冒险主义暴动的一个幌子。因此我們事后发现，广州的苏維埃就好像只是画在紙上的一条中国古代的龙。在幕后瞎操纵、玩弄紙龙的政策不是我們的政策。我們反对在一九二三年九月通过电报在德国草草建立苏維埃。我們贊成一九二

六年在中国建立苏維埃。我們反对一九二七年广州的冒牌苏維埃。这里不存在矛盾。相反地，我們在这里看到的是革命运动的力学概念及其組織形式的深刻統一。

被近年来的理論和实践搞得歪曲、混乱和面目不清的苏維埃的作用和意义問題，在綱領草案中沒有得到絲毫的闡明。

6. 未来中国革命的性质問題

領導貧苦农民的无产階級专政的口号和中国未来的第三次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問題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由于不仅历史会重演，而且人們违背历史要求的錯誤也会重演，因此我們已經可以听到說中国尚未成熟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程度的反对意見。但是，对于問題的这种提法是抽象的、沒有生命的。因为，就俄国本身來說，它是否已經成熟到搞社会主义的程度了呢？据列宁說：沒有！它已經成熟到能够实行无产階級专政，作为解决刻不容緩的民族任务的唯一方法。但是，整个专政的命运，归根到底决定于世界发展的趨勢。当然，这并不排除——相反地倒是預先假設——无产階級专政要实行正确的政策，工农联盟要得到巩固和发展，一方面全面适应本国的条件，另一方面又适应世界发展的趨勢。这对中国也完全适用。

在題为《論我国革命》的同一篇文章中（一九二三年一月十六日），列宁证明俄国的特点是沿着东方各国特殊发展的路綫发展的。他把欧洲社会民主党的下述論据說成是“陈腐不堪”。这条論据就是：“我們还没有成长到实现社会主义的地步，或像他們的各种‘博学的’先生們所說的那样，我們还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的經濟前提。”^①但是列宁嘲笑这些“博学的”先生們，并不是因为

^① 《論我国革命》，《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 433 頁。——譯者注

他本人认为俄国**存在**实现社会主义的經濟前提，而是因为他认为，和学究們和市儉們的想法不同，缺乏为**独立建設**社会主义所必需的这些前提根本得不出拒絕夺取政权的結論。他在这篇文章中第一百零一次地、甚至第一千零一次地回答第二国际的英雄們的詭辯說：“这个**无可爭辯的道理**〔俄国还没有成长到实现社会主义的地步〕……对于评价我国革命并无决定意义”。^①这就是綱領草案的作者們不願也不能理解的。关于中国在經濟上和文化上都和俄国一样不成熟——当然，中国比俄国更不成熟——的論点本身是无可爭辯的。但是根本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认为当一个国家的整个历史条件和革命形势都要求夺取政权时，无产阶级必須放弃夺取政权。

这个具体的、历史的、政治的、实际的問題不能归結为中国是否已經在經濟上成熟到建立“自己的”社会主义的程度，而应归結为中国在政治上是否已經成熟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程度。这两个問題根本不是一回事。如果不存在发展不平衡規律的話，或許倒可以把它們看成一回事。这个規律正适用于这种情况，并且充分适用于經濟和政治的相互关系。那末，是不是說中国已經成熟到能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程度呢？只有斗争的經驗才能为这个問題提供确切的答案。同样地，只有斗争才能决定中国将在什么时候并在什么条件下取得真正的統一、解放和复兴。任何人如果說中国尚未成熟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程度，那就是宣布第三次中国革命还得推迟許多年。

当然，如果封建残余真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決議断言的那样統治着中国的經濟生活，事情就簡直毫无希望了。但是，幸运的是，残余一般說来是不能起統治作用的。在这一点上，綱領草案也

① 《論我国革命》，《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 433 頁。——譯者注

沒有糾正已犯的錯誤，而是以一種委婉曲折、含糊其辭的方式重新予以肯定。綱領草案說：“在這個國家的經濟和政治上層建築中，中世紀的封建關係都占優勢……”這是徹頭徹尾錯誤的。占優勢究竟是什麼意思呢？是指涉及的人數呢？還是指在這個國家的經濟上所佔的統治和主導地位呢？在商業和銀行資本所起的無所不包的作用的基礎上，本國工業的異常迅速的發展，最重要的農業地區對市場的完全依賴，對外貿易所起的巨大的而且日益增長的作用，中國農村全面隸屬於城市——所有這一切都說明，資本主義關係在中國占有無條件的優勢，進行着直接的統治。農奴制和半農奴制的社會關係無可否認是非常強大的。這些關係部分地淵源於封建時期；它們也部分地形成一種新的結構，這就是說，是舊的關係在生產力發展遲緩、農村存在剩餘人口、商業和高利貸資本活躍等等基礎上的復活。但是，占統治地位的是資本主義關係，而不是“封建”關係（更正確地說是農奴制的關係，一般地說是資本主義前的關係）。只是由於資本主義關係所佔的這種統治地位，我們才能認真談論無產階級在民族革命中的領導權的前景。否則就談不上首尾相符了。

209

• “在任何一个資本主義國家中，無產階級的力量，要比無產階級在人口總數中所佔的比重大得多。這是因為無產階級在經濟上控制着整個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中心和神經，同時還因為無產階級在經濟上和政治上代表資本主義制度下絕大多數勞動者的真正利益。

“因此，甚至當無產階級占少數人口時（或者當覺悟的和真正革命的無產階級先鋒隊占少數人口時），它也能推翻資產階級，然後從半無產階級群眾和小資產階級群眾中吸收許多同盟者到自己方面來，但是這些群眾始終不會預先擁護無產階級統治，不會懂得無產階級統治的條件和任務，而只是根據自己以後的經驗才確信

210

无产階級專政是必然的、正确的和合乎規律的。”^①

中国无产階級在生产中所起的作用已經很大。在未来几年中，这种作用只会进一步增加。事实表明，中国无产階級在政治中本来也可以起很大的作用。但是領導上的整个路綫完全是为了反对让无产階級夺取領導地位。

綱領草案說，“只有在得到无产階級專政国家的直接支持的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胜利地建設社会主义。由此可知，党在俄国問題上一直承认的原則，在这里，在关于中国的问题上，也同样得到了承认。但是，如果中国缺乏足够的內部力量来独立地建設社会主义社会，那末，根据斯大林—布哈林的理論，中国无产階級就不应当夺取政权，在革命的任何阶段都是如此。或許苏联的存在可能使这个问题得到刚刚相反的解决吧！那末就可以得出結論，认为我們的技术不仅足以在苏联，而且足以在中国——也就是說，在这两个經濟上最落后的、人口合計达六亿的国家里——建設社会主义社会了。或許中国的不可避免的无产階級專政是“不能容許的”，因为这个專政将包括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鎖鏈中，从而不仅成为这个鎖鏈中的一个环节，而且成为它的推动力？但是，这正是列宁对十月革命的根本提法，这次革命的“特点”正符合东方各国发展的路綫。这样一来，我們就看到为了同托洛茨基主义进行斗争而在一九二五年发展出来的一国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理論，

211 在討論每一个新的重大革命問題时是如何歪曲和混淆事实的。

綱領草案沿着这同一条路走得更远。它把中国和印度同“一九一七年以前的俄国”和波兰（“等等”？）对立起来，认为后者是具有“足以胜利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某种最低限度的工业”的国家，或者說（正如在其他地方更明确、因此也就更錯誤地說过的那样）是

^① 《立宪會議选举和无产階級專政》，《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243頁。原文中无着重体。——譯者注

具有“必需和足够的物质前提……来建成社会主义”的国家。我們已經知道，这不过是玩弄列宁說过的“必需和足够的”前提的辞句；这是一种騙人的、不能容許的把戏，因为列宁明确地列举了政治上和組織上的前提，包括技术上、文化上和國際上的前提在內。但是，主要問題仍然是：既然建成社会主义是两种經濟制度、两种社会秩序之間进行不間断的世界斗争的問題，而且在这场斗争中我們的經濟基础又弱小得多，怎么能够用推理的方法确定足以建成社会主义的“最低限度的工业”呢？

如果我們仅仅考虑經濟杠杆，我們苏联掌握的杠杆显然比世界資本主义的杠杆短得多。中国和印度的情况則更加是这样。然而整个問題要由两种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革命斗争来解决。在政治斗争中，杠杆的长端是在我們这边；更正确些說，如果我們的政策正确，它就可能而且必然会在我們手中。

在題为《論我国革命》的同一篇文章中，列宁在指出“建設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以后，接着又說：“虽然誰也說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怎样”。^①为什么誰也說不出呢？因为这个问题决定于斗争，决定于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文化在国际范围内的竞争。綱領草案完全背弃了列宁从问题的本质中得出的这个思想，断言俄国在一九一七年恰好具有一国建設社会主义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技术”，从而也就具有为此必需的文化。草案的作者們企图在綱領中說出用演譯方法“誰也說不出”的东西。

212

当整个問題要由国际动力学来解决时，想找出民族国家（“一九一七年以前的俄国”）范围内的“足够的最低限度”的标准是不能容許的、不可能的、荒謬的。这种錯誤的、专断的、孤立的民族标准是政治上的民族狹隘性的理論基础，是将来不可避免要犯民族一改良主义和社会爱国主义錯誤的前提条件。

^① 《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 433 頁。——譯者注

7. 关于在东方建立“工农两个阶级的政党”的反动思想

第二次中国革命的教训是整个共产国际的教训，但首先是东方一切国家的教训。

一切为中国革命中的孟什维克路线辩护的论据，如果我们认真加以看待的话，必然三倍适用于印度。在印度这个古典式的殖民地，帝国主义的枷锁比在中国采取了更加直接得多、明显得多的形式。在印度，封建和农奴制关系的残余更加根深蒂固得多，更加巨大得多。尽管如此，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运用于中国使革命遭到破坏的方法，在印度必然会造成更加致命的后果。推翻印度封建制度、推翻英印官僚制度和英国军国主义的任务，只有人民群众的规模巨大、不屈不挠的运动才能完成。正因为这个运动的强大发展和不可抗拒，由于它具有的国际目标和国际联系，它不能容忍领导上采取任何半途而废的、妥协的机会主义措施。

213 共产国际的领导在印度已经犯了不少错误。条件还不允许这些错误以在中国的那种规模暴露出来。因此，人们可以希望中国事件的教训将使在印度和其他东方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政策路线得到更及时的纠正。

在这里，正如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我们的主要问题是共产党、党的完全独立以及党的不可调和的阶级性的问题。这条道路上最大的危险就是在东方各国组织所谓“工农党”。

一九二四年将作为公开修正马克思和列宁的若干根本论点的一年载诸史册。从一九二四年起，斯大林提出了“为东方国家建立工农两个阶级的政党”的公式。这个公式的基础是曾经在东方用来掩盖机会主义的同一个民族压迫，正如“稳定”曾经在西方起这一作用。来自印度以及来自不存在民族压迫的日本的电报，近来

都頻繁地提到各省的“工农政党”的活动，把它們說成是同共产国际接近和友好的組織，仿佛它們和我們“自己的”組織差不多，然而沒有對它們的政治面貌作任何具体說明；一句話，寫到和談到它們的方式和不久以前對待国民党的方式一样。

早在一九二四年，《真理报》就报导說：“迹象表明，朝鮮的民族解放运动正逐步以創立工农政党的形式出現。”^①

在此期間，斯大林在給东方共产党人講話時說：

“共产党人应当从民族統一戰綫的政策改行……工人和小資产階級革命联盟的政策。在这类国家中，这一联盟可以采取类似国民党的統一政党的形式即工农政党的形式……”^②

后面就共产党的独立（显然是和先知約拿在鯨魚腹中一样的“独立”^③）問題所作的小小的保留只是一个幌子。我們深信，第六次代表大会必須指出：在这方面任何一点点含糊其辞都是致命的，都将遭到拒絕。

这里的問題是：对党以及党同本階級和其他階級的关系这个根本問題出現了一种絕對新鮮的、完全錯誤的、彻底反馬克思主义的提法。

为中国共产党参加国民党的必要性辯护提出的理由是：在社会成分上，国民党是一个工农政党，国民党的十分之九——这个比例曾經被反复指出过千百次——都属于革命派，都願意和共产党携手前进。但是，在上海和武汉政变期間以及自那以后，国民党的

① 《真理报》一九二四年三月二日。

② 參見《論东方民族大学的政治任务》，《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124頁。原文中无“类似国民党的”几个字。——譯者注

③ 見《旧約全书》：《約拿书》第一章。亚米太的儿子約拿因违抗耶和华，乘船逃遁，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使船几乎遭到破坏。后来众人將約拿抛在海中，海浪就平息了。“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魚吞了約拿，他在魚腹中三日三夜”。——譯者注

这个革命的十分之九就好像变戏法一样无影无踪了。誰也找不到他們的影子。而主张在中国实行階級合作的理論家，斯大林、布哈林等等，甚至不解释一下国民党十分之九的成員——十分之九的工人和农民、革命家、同情者、完全属于我們“自己”的人們——都怎样了。但是，如果我們要了解斯大林鼓吹的所有这些“两个階級的”政党的命运，如果我們要搞清楚这个不仅把我們远远抛在一九一九年俄共綱領后面、而且把我們远远抛在一八四七年《共产党宣言》后面的概念本身，那末回答这个問題就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

215 只有在我們了解下列两点的时候，才有可能弄清楚著名的十分之九究竟消失到哪儿去了的問題：第一，同时表达两种相互排斥的历史路綫——无产階級路綫和小資产階級路綫——的双重組合（即两个階級的政党）是不可能有的；第二，在資本主义社会中，独立的农民党，即表現农民的利益、同时又独立于无产階級和資产階級以外的政党，是不可能實現的。

馬克思主义一直教导我們，布尔什維主义也承认并教导說，农民和无产階級是两个不同的階級；在資本主义社会中，以任何方式把它們的利益視为一体都是錯誤的；一个农民只有从財產观点上采取无产階級的观点才能参加共产党。无产階級专政下的工农联盟並沒有推翻这个論点，而是以不同方式在不同情况下证实了这个論点。如果不存在具有不同利益的不同階級，那就連**联盟**也談不上了。这种联盟只有在无产階級专政的铁定范围内才符合于社会主义革命。在我国，专政之所以和一个所謂农民同盟的存在不能并立，正是因为冀图解决一切民族政治問題的任何一個“独立的”农民組織，到头来不可避免会成为資产階級手中的工具。

資本主义国家里自己标榜为农民政党的那些組織，实际上是資产階級政党的一个变种。每一个农民，如果沒有采取无产階級

立場，并抛弃自己的产业所有者的心理，在碰到根本政治問題时必然会追随资产階級。当然，每一个依靠或者希望依靠农民并在可能条件下依靠工人的资产階級政党都不得不披上伪装，也就是說，塗上两三种适当的顏色。著名的“工农政党”的思想似乎是特別为了掩盖那些被迫寻求农民的支持、而且願意把工人吸收到它們队伍中去的资产階級政党而創造的。国民党就是作为这种政党的一个典型而永載史册的。

216

大家知道，资产階級社会是这样构成的：家徒四壁、心怀不滿的、受欺騙的群众在底层，而心滿意足的伪造者則留在頂层。每一个资产階級政党，如果是一个真正的政党（也就是說，如果它拥有大量群众）的話，都是按照同一个原則建立起来的。剝削者、伪造者和暴君在階級社会中是少数。因此，每一个資本主义政党都不得不在它的內部关系上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重現和反映整个资产階級社会的关系。因此，在每一个群众性的资产階級政党中，下层成員要比頂层成員更民主，更“左”一些。这种情况适用于德国的中派，法国的激进党人，特別适用于社会民主党。斯大林、布哈林等等經常抱怨上层人士不能反映“左”派国民党普通黨員、“絕大多数人”，“十分之九的人”等等的情緒。这些抱怨之所以如此天真、如此不可原宥，其原因正在于此。在他們的古怪的抱怨中，被他們說成是可以通过組織措施、指命和通告等方法予以消灭的一种暫时的、不愉快的誤解，实际上是资产階級政党、特別是革命时期的资产階級政党的一个主要的、根本的特点。

綱領草案作者一般地为一切机会主义联盟——在英国和在中国都是如此——辯解的基本論点，必須从这个角度来加以判断。按照这些論点的說法，和上层人士友善完全是为了下层群众的利益。大家知道，反对派坚持党必須撤出国民党；

217

“問題出現了”，布哈林說，“为什么呢？难道是因为国民党的

领导人摇摆不定嗎？国民党的群众呢？难道他們仅仅是‘牛馬’？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待一个群众組織的态度要决定于最‘高’层发生的事情呢！”（《中国革命的目前形势》）

居然可能提出这样一个理由，这在一个革命政党中似乎是不可能的。布哈林問道：“国民党的群众呢？难道他們仅仅是牛馬？”他們当然是牛馬。任何資產階級政党的群众从来都是牛馬，虽然程度有所不同。但是，对我们來說，群众并不是牛馬，不是嗎？不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我们不得把他們驅入資產階級的怀抱，用工农政党的幌子把資產階級伪装起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我们不得使无产阶级政党从属于資產階級政党，而是相反，必須随时随地以前者和后者对抗。布哈林以如此冷嘲的口气当作某种次要的、偶然的、暫时的东西談到的国民党的最“高”层，事实上是国民党的灵魂，是它的社会本质。当然，資產階級在党内和在社会里面都只是最“高层”。但是这个最高层拥有强有力的資本、知識和联系；它永远可以退而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最重要的是，它永远可以訴諸真正的政治軍事力量，这种力量和国民党本身的領導是密切地融合在一起的。正是这个最高层制定了反对罢工的法律，扼杀了农民的起义，把共产党人推入黑暗的角落，最多只讓他們在党内占三分之一的地位，迫使他們作出把小資產階級的孙逸仙主义置于馬克思主义之上的誓言。普通黨員是由这个最高层挑选出来、受其駕馭、和莫斯科一样充当它的“左翼”支持物的，正如將軍們、买办們和帝国主义者充当它的右翼支持物一样。把国民党不看成是一个資產階級政党，而看成是一个中立的、爭取群众的角逐場，玩弄所謂左派普通黨員占十分之九的字眼来掩盖究竟誰是真正的主人的問題，就意味着增加最高层的实力和权力，帮助它把更多的群众变成“牛馬”，而且是在最便利它准备上海政变的条件下这样做。斯大林和布哈林根据两个階級的政党这种反动的思

想，幻想共产党人加上“左派”会在国民党内取得多数，从而在国家中取得政权，因为中国的政权是掌握在国民党手中的。換句話說，他們幻想通过国民党各次代表大会的通常的选举，权力就会从资产阶级手中轉入无产阶级手中。人們能够想像对“党的民主”——而且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还可以进行比这更动人、更唯心主义的偶像化嗎？因为军队、官僚机构、报刊和資本肯定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正是由于而且仅仅由于这个原因，它才得以掌握执政党的舵盘。只是在左派不敢大胆冒犯军队、官僚机构、报刊和資本的情况下，资产阶级的“最高层”才容忍或者說曾經容忍占“十分之九”的左派（而且是这样一种左派）。通过这些强有力的工具，资产阶级最上层不仅使所謂占十分之九的“左派”党员，而且使整个群众都处于从属地位。在这方面，阶级联盟的理論，說国民党是一个工农政党的理論，为资产阶级提供了最好的帮助。当资产阶级后来和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并枪杀群众时，在两种真正的力量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間发生的这种冲突中，甚至连著名的十分之九的废话也听不到了。可怜的民主幻想在阶级斗争的血腥现实面前消失得无影无踪。

219

这就是“为东方建立工农两个阶级的政党”所起的真正的、唯一可能的政治作用。現在不存在，将来也不会存在其他的作用。

* * *

虽然关于两个阶级的政党的思想淵源于民族压迫——据說这种压迫取消了馬克思的阶级理論——，我們却已經听到根本不存在民族压迫的日本也有了“工人和农民的”混血儿。然而問題并非到此为止，并不仅限于东方。“两个阶级”的思想力图具有普遍性。前面提到的美国共产党在这方面具有最古怪的特点，它努力支持资产阶级的、“反托拉斯的”参議員拉弗勒特竞选总统，以使用这种方法把美国农民套在社会革命的車上。主张这种策略的理論家佩

珀是曾經使匈牙利革命陷于毀灭的人当中的一个，因为他忽視了匈牙利的农民。他极为努力地(无疑是作为一种补偿)用使美国共产党融解于农民之中的方法来摧毁这个党。佩珀的理論是：美国資本主义的超額利潤把美国无产階級变成了世界工人貴族，而农业危机却使农民破产，把他們驅上社会革命的道路。按照佩珀的概念，一个只有几千成員、主要由移民組成的党必須通过一个資产階級政党作为媒介和农民融为一体，用这种成立“两个階級的”政党的办法，在受超額利潤腐蝕的无产階級表示消极或中立的情况下保证社会主义革命。这个瘋狂的想法在共产国际的上层領導中找到了支持者和半支持者。这个問題有好几个星期悬而未决，最后才对馬克思主义的起碼的常識让步(幕后的評論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偏見)。当时，必須給美国共产党套上套索，才能使它和拉弗勒特的党分开。拉弗勒特的党甚至比它的創办人死得更早。

現代修正主义为东方創造的一切东西后来都搬到西方去了。如果說佩珀曾經在大西洋的一边試圖通过两个階級的政党来催促历史前进，那末，报刊上的最新消息則告訴我們，国民党的經驗在意大利找到了模仿者。在意大利，显然有一种企图要用欺騙的方法使我們党接受“在工农委員會的基础[?!]上建立共和議會”这个荒謬絕倫的口号。在这个口号中，蔣介石的阴魂和希法亭的阴魂拥抱在一起了。我們当真会落到这个地步嗎？

* * *

在結束时，我們还需要做的只是追叙一下：工农政党的思想把反对民粹党的整个斗爭都从布尔什維主义的历史上抹掉了，而沒有这场斗爭就不会有布尔什維克党。这场历史斗爭的意义何在呢？一九〇九年，列宁在談到社会革命党人时說过下面一段話：

“他們的綱領的基本思想根本不是认为需要无产階級和农民这两种‘力量的联盟’，而是否认两者之間的階級差別，认为不需要

在他們之間划一条階級界限，說社会民主党人认为农民同无产階級不同，农民有小資产階級性，是根本錯誤的。”^①

換句話說，工农两个階級的政党是俄国民粹派的中心思想。在农民的俄国，只有和这种思想进行斗争，无产階級先鋒队的政党才能发展。

列宁在一九〇五年革命时期坚持不懈地、毫不倦怠地重复指出：

“如果农民作为一种反动的或反无产階級的力量而出現，我們就必须对他們采取不信任的态度，**摆脱他們而单独組織起来**，并准备同他們作斗争。”^②（着重体是我們用的。）

一九〇六年，列宁写道：

“最后一个建議：城市和农村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你們要单独組織起来。不要信賴任何小业主，哪怕是极小的业主，是‘劳动的’业主。……我們要对农民运动支持到底，但是我們必須記住，这是另一个階級的运动，而不是那个能够实现并且定会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階級的运动。”^③

这个思想重复出现在列宁数以百計的重要和不重要的著作中。一九〇八年，列宁解释說：

“决不能把无产階級和农民的联盟解释为无产階級和农民的不同的階級或政党的合并。不要說是合并，就是任何长期的协定，都会严重危害工人階級的社会主义政党，**削弱革命的民主斗争**。”^④（着重体是我們用的。）

对工农政党这个思想，能够进行比这更严厉、更无情、更具有

① 參見《社会革命党人怎样总结革命，革命又怎样給社会革命党人作了总结》，《列宁全集》第十五卷第304頁。——譯者注

② 參見《无产階級和农民》，《列宁全集》第八卷第206—207頁。——譯者注

③ 參見《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綱領》，《列宁全集》第十卷第163頁。——譯者注

④ 參見《談談对俄国革命的估計》，《列宁全集》第十五卷第39頁。——譯者注

摧毀性的譴責嗎？

另一方面，斯大林却教導說：

“革命的反帝聯盟可以采取表面上〔？〕由統一的綱領联系起来的統一的工农政党的形式，但不是永远〔！〕必須〔！〕采取这种形式。”^①

222 列宁教導我們，工农聯盟在任何情況下都絕不能導致政党的合并。然而斯大林对列宁仅仅作了一个让步：据斯大林說，虽然階級的聯盟必須采取“一个統一政党的形式”，但是像国民党这样的工农政党——并不是永远必要的。我們应当感謝他至少作了这个让步。

列宁在十月革命时期曾經以同样不可調和的精神提出這個問題。从一九一八年开始，列宁在概括三次俄国革命的經驗时，从来不放过任何机会来重复指出：在資本主义关系占主要地位的社会里有两种决定性力量——資產階級和无產階級。

“农民不是跟工人走，就是跟資產階級走。中間道路是沒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②

然而“工农政党”正是一种創造中間道路的企图。

如果俄国无產階級先鋒队沒有使自己和农民相对抗，沒有对农民的无孔不入的小資產階級无組織状态进行无情的斗争，它就必然会通过社会革命党或其他某个“两个階級的政党”的媒介而溶解在小資產階級分子当中，而这个政党則必然使无產階級先鋒队从属于資產階級的領導。为了和农民結成革命的聯盟——这不会是毫无代价的——，首先必須把无產階級先鋒队，从而把整个工人

① 參見《論東方民族大学的政治任务》，《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125頁。〔！〕和〔？〕是托洛茨基加的。——譯者注

② 《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2. 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騙人民》，《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333頁。——譯者注

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群眾分隔開來。只有以堅定的階級不可調和性的精神訓練無產階級的黨，才能做到這一點。

無產階級越年輕，它和農民的“血緣關係”越近、越直接，農民在整個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越大，那末，反對任何形式的“兩個階級”的政治融合的鬥爭也就越為重要。在西方，工農政黨的思想簡直是笑話的。在東方，這個思想是致命的。在中國、印度和日本，這個思想不僅和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權誓不兩立，而且和無產階級先鋒隊最起碼的獨立也誓不兩立。工農政黨只能為資產階級提供基地、屏障和跳板。

223

在這個對整個東方說來都帶根本性的問題上，現代修正主義僅僅重復着革命以前舊的社會民主機會主義的錯誤，這是極為有害的。歐洲社會民主黨的多數領導人都認為我黨反對社會革命黨的鬥爭是錯誤的。他們堅持不懈地主張兩黨合併，認為對於俄羅斯“東方”，成立工農兩個階級的政黨是完全合適的。如果我們聽從他們的勸告，我們已經得到的工農聯盟和無產階級專政都絕不能實現。社會革命黨人的工農“兩個階級”的政黨在我們已經成為、也不能不成為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代理機構。這就是說，它毫無成效地試圖起國民黨曾經在中國以不同的、“特殊的”中國方式，由於修正布爾什維主義的人的幫助而富有成效地起過的同一種歷史作用。不無情地譴責為東方建立工農政黨的思想，就沒有也不可能具有共產國際的綱領。

8. 從農民國際得到的好處必須加以考察

對反對派提出的主要指責之一（如果不是最主要的指責的話），就是說反對派“低估”了農民。在這一點上，生活也提供了考驗，並在民族和國際範圍內作出了判決。每一個事例都說明官方領導人犯了低估無產階級在和農民的關係上的作用和意義的罪

224

过。因此，在經濟和政治領域中，以及在国际上，就发生了最大的变动和錯誤。一九二三年以来国内錯誤的根源，是低估了无产阶级經營的国有工业对整个国民經济，对和农民的联盟的意义。在中国，由于不能了解无产阶级在土地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和决定性作用，革命就必然遭到了覆灭。

从同一立場出发，必須检查和評价从一开始就只是一种試驗——而且是需要极为小心、极为严格地遵守原則的一种試驗——的农民国际的整个工作。这样做的原因是不难理解的。

农民，由于它的全部历史和它存在的条件，是一切阶级当中最缺乏国际性的。通常所謂的民族特点主要正是来自农民。在农民当中，只有半无产阶级的貧苦农民群众能够被引导上国际主义的道路，而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引导他們。任何走捷徑的企图都只不过是同各阶级做游戏而已，而这从来都是有害于无产阶级的游戏。只有在无产阶级把农民从资产阶级的影响下拉开的情况下，只有在农民認識到无产阶级不仅是他們的盟友、而且是他們的領袖时，才能把农民吸引到国际主义政治中来。相反地，越过无产阶级，不理睬各国共产党，而企图把各国农民組織成一个独立的国际团体，
225 这种企图預先注定是要失败的。归根結底，这种企图只能損害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爭取对农业劳动者和貧农的领导权的斗争。

从十六世紀的农民战争开始甚至在那以前，在一切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反革命中，农民的各个阶层就曾經起过巨大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农民从来没有起过独立的作用。农民总是直接或間接地支持一种政治力量反对另一种政治力量。他們本身从来没有成为能够解决民族政治任务的一种独立力量。在金融資本时代，和資本主义发展的前一些阶段相比，資本主义社会两极化的过程已大大加快。这意味着农民的比重縮小了，而不是增加了。无论如何，在帝国主义时代，农民在全国范围——更不用說国

际范围——采取**独立政治行动**的能力，比他們在工业資本主义时期的能力要小。今天的美国农民起独立政治作用的能力远不如四五十年以前，当时他們，正如民粹运动的經驗說明的那樣，不能也不會組織一个独立的全国性政党。

战争造成的經濟下降給欧洲的农业带来了暫時然而尖銳的刺
激，从而在“农民”、即装腔作势地和資產階級政党对立的資產階級
伪农民党可能起的作用方面产生了幻想。如果說在战后年代农民
动乱风起云涌的时期，还可以冒险进行組織农民国际的試驗，来考
驗无产階級和农民之間以及农民和資產階級之間的新关系，那末
现在就正是为农民国际五年来的試驗从理論上和政治上作出決算
的时候了，是揭露农民国际的严重缺点并努力指出其积极面的时
候了。

226

至少有一个結論是不可爭辯的。保加利亚、波兰、羅馬尼亚和南斯拉夫(即所有落后国家)的“农民”政党的經驗，我国社会革命党人的老經驗以及国民党的新經驗(血犹未凉)，先进的資本主义国家的插曲式的試驗，特別是拉弗勒特—佩珀在美国的試驗——这一切都不庸置疑地证明：在資本主义下降时期甚至比在資本主义上升时期更沒有理由寻求**独立的、革命的、反資產階級的农民政党**。

“城市不可能和农村平等。在这个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农村也不可能和城市平等。城市必然要**领导农村**。农村必然要跟城市走。問題仅仅在于，城市階級中的**哪个階級**将领导农村。”^①

在东方的革命中，农民仍将起决定性作用，但是，这种作用再一次既不会是领导作用，也不会是独立的作用。湖北、广东或者是孟加拉的貧苦农民不仅能在全国范围内、而且在国际范围内起作

① 參見《立宪會議选举和无产階級专政》，《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225頁。——譯者注

用，但是只有当他們支持上海、广州、汉口和加尔各答的工人时才能起作用。这是革命农民在**国际道路**上的唯一出路。企图在湖北的农民、加里西亚或多布魯賈的农民、埃及的农民和美国农民之間造成直接的联系，是毫无希望的。

227 按照政治的性质，任何事物不为一种直接目的服务，則必然成为其他目的——常常是和希望达到的目的相反的目的——的工具。难道我們不曾有过这种**资产階級政党**的例子：这个政党依靠或力图依靠农民，认为必須从农民国际得到长期或短期的保证——如果它不能从共产国际得到这种保证的話——，从而得到保护，以免受到本国共产党的打击，就像在工会方面，柏塞尔通过英俄委员会取得保护一样？如果說拉弗勒特并未试图向农民国际挂个号，那只是因为美国共产党极其虚弱。他无此必要。尽管他沒有这样做，佩珀也不請自来地和他拥抱了。但是，克罗地亚富农的銀行家——領袖拉迪奇却发现有必要在他走向內閣的途中給农民国际留下一张名片。国民党更走得令人望尘莫及地远。它不仅**在农民国际和反帝同盟中**为自己謀得地位，甚至还敲了共产国际的門，在俄共政治局的庇佑下受到了共产国际的欢迎，美中不足的只是有一票反对。

当贊成取消紅色工会国际的傾向非常强烈（苏联工会甚至把这个国际的名字从章程中刪掉）时，就我們回忆所及，官方报刊在任何地方都沒有提出过农民国际究竟取得了什么成果的問題。这非常能够說明近年来的主要政治潮流的特点。

第六次代表大会必須从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的立場出发，认真检查农民“国际”的工作。現在正是为这个穷年累月、历时已久的試驗作出馬克思主义的決算的时候了。这种決算必須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包括在共产国际的綱領中。現在这个草案对农民国际的“千百万人”以至这个国际的存在本身都絕口不提。

我們對綱領草案某些基本論點進行了批判；由於時間極為緊迫，不能對所有問題一一加以討論。我們只有兩個星期的時間來進行這項工作。因此，不得不僅限於最迫切的問題，僅限於和最近這個時期的革命的、內部的黨的鬥爭最息息相關的那些問題。

由於我們過去有過所謂“討論”的經驗，我們事先就知道：斷章取義地摘引出來的話和一時的筆誤都可能被變成對“托洛茨基主義”大張撻伐的各種新理論的沸騰的源泉。整個時期都充滿了這種耀武揚威的吠影吠聲。但是，我們極為冷靜地看待這次也可能降臨到我們頭上來的廉價的、理論上的惡毒攻擊的前景。

附帶說一句，綱領草案的作者們很可能寧願對舊的第五十八條作進一步闡述，而不增加新的批判解釋的條款。不用說，這種論點對我們更加不適用。

第六次世界代表大會面臨着通過一個綱領的任務。我們這裡做的全部工作完全是要證明，由布哈林和斯大林精心撰寫的草案作為綱領的基礎是毫無可能的。

目前是俄共和整個共產國際生命中的轉折點。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二月全會最近採取的決定和措施都是證明。這些措施完全不適當，決議是矛盾的，其中某些決議，就像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關於中國革命的二月決議，是徹底錯誤的。儘管如此，所有這些決議都貫穿着一種向左轉的傾向。我們沒有任何理由要過高估計這一點，特別是伴隨着這一傾向還在對革命的一翼進行殲滅戰，而右翼則受到了保護。儘管存在這一切情況，我們一刻也不想忽視由於舊的路綫造成的絕境而不得不出現的左的傾向。每一個真正的革命者都會在自己的崗位上盡力促進這些向左迂迴的跡象，以盡量不引起黨內的困難和震動的方式發展成

为革命的列宁主义的路綫。但是，我們今天还离此很远。共产国际目前或許正在經歷它最剧烈的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旧的方針远未遭到清算，而新的方針又带来了异己分子的突起。綱領草案反映了这种过渡状况的整体和局部。然而这种时期，就其性质來說，最不利于制定必将决定我們国际党在未来若干年中的活动的文件。我們必須等待时机——在已經失去这么多時間以后——，虽然这样做可能是困难的。我們必須让混水澄清下来。混乱必須过去，矛盾必須消除，新的方針才会明确地形成。

代表大会已有四年不曾召开。九年来，共产国际都沒有一个明确的綱領。目前唯一的出路在于：从今天算起的一年以后召开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一劳永逸地制止篡夺整个共产国际的最高权力的企图，重新建立正常的制度，建立一种将容許对綱領草案进行真正的討論，并且容許我們提出另一个草案，一个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草案来和这个折衷主义的草案对抗的制度。对于共产国际，对于它的各个支部的會議以及它的报刊，不能有什么不許討論的問題。在这一年期間，全部土壤必須用馬克思主义的犁来进行深翻。只有經過这样一番劳动，无产阶级的国际党才能获得一个綱領，一个灯塔，这个灯塔将发出穿透一切的可靠的光芒，照亮遙远的未来。

一九二八年六月，于阿拉木图

現在怎么办？^①

231

一 这封信的目的

这封信的目的是为了闡明情况，既不掩盖任何事实，也不夸大任何事实。闡明情况是制定革命政策必不可少的条件。

企图了解情况，必須摆脱一切吞吞吐吐、口是心非和玩弄外交手腕的做法，否則毫无意义的。这就需要一切事实——包括对党來說最不愉快、最痛心的事实——都直言无諱。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慣于大吵大嚷，說敌人将抓住这种批評加以利用。究竟是已經使中国革命受到最残酷的失败的领导集团的政策，还是使所謂永远正确的虛假威信受到影响的反对派所提出的遭到压制的警告，将使阶级敌人檢到最大的便宜呢？現在提出这样一个問題是愚蠢的。

关于英俄委员会問題、粮食收购問題、整个富农問題以及一切共产党领导集团奉行的路綫問題，也都可以这样說。不，过去五年来并不是反对派的批評阻碍了共产国际的发展。在若干具体事例中，社会民主党无疑曾經企图从反对派提出的批評中檢一点点便宜。它仍然具有足够的头脑和狡黠来这样做。倘若它不这样做，那倒真令人奇怪。从广泛的历史意义上說，目前的社会民主党是一个寄生性的政党。社会民主党起着自下而上地維護资产阶级社会、也就是从主要方面保卫这个社会的作用。在战后的年代里，特

232

① 这是托洛茨基写給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一封信。——譯者注

別是在一九二三年以後，由於各國共產黨的錯誤和疏忽，由於共產黨在決定性時刻屈服投降，而另一方面又採取冒險主義的行動，企圖使已經成為明日黃花的革命形勢死灰復燃，顯然已經日益微不足道的社會民主黨因此得到了蓬蓬勃勃的發展。一九二三年秋天共產國際的投降，後來領導集團又堅決拒絕理解這場巨大失敗的意義，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採取的冒險主義的過左的路綫，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奉行的極端機會主義的政策——正是由於這些原因，才使社會民主黨得以獲得新生，在上次德國選舉中獲得了九百多萬張選票。在這種情況下爭論說，社會民主黨有時會斷章取義地摘引反對派提出的這種或那種批評，大放厥詞，然後拿去給工人看：這種爭論實際上是用無聊的瑣事來浪費時間。如果社會民主黨不是比這走得更遠，如果它不用左翼的偽裝——社會民主黨需要這種偽裝作為安全活塞正如資產階級社會需要社會民主黨作為安全活塞一樣——不時對反對派表示虛假的“同情”，那末社會民主黨就不成其為社會民主黨了。當然，只有在反對派仍然是一個人數很少的受到壓制的少數派的時候，只有在表示這種“同情”不需要社會民主黨人付出任何代價而同時卻可以在工人當中引起同情的反應的時候，它才會這樣做。

233 目前的社会民主党在根本問題上沒有也不可能有自己獨樹一幟的路綫。在這方面，它的路綫完全聽命於資產階級。但是，如果社會民主黨只是簡單地充當資產階級政黨的應聲蟲，它對資產階級就不再有什麼用處了。在次要的、難以捉摸的、或者是遙遠的問題上，社會民主黨不僅可以而且必須玩弄各種花樣，給自己塗上應有盡有的顏色，包括鮮艷的紅色在內。不僅如此，社會民主黨還冀圖抓住反對派的這種或那種意見，在共產黨內製造分裂。如果有人提出社會民主黨的某些右翼騙子手或左翼後生小子會從我們的批評中引出一句什麼話來表示贊同，如果他們企圖利用這個事實

使反对派名誉扫地，那末，从思想意識上說，在任何懂得这种把戏的人看来，这种企图不能不說是十分可怜的。尽管如此，在一切具有任何严重意义的**政治問題**上，特别是在中国問題和英俄委员会問題上，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同情基本上一直是在领导集团的“现实主义”政策方面，而絕不是在我們这方面。

但是，比这种情况重要得多的是资产阶级本身对正在苏联和共产国际范围内进行斗争的各种倾向作出的总的判断。资产阶级在这个問題上沒有任何理由要閃爍其辞或弄虛作假。然而正是在这个問題上，必須指出，大洋两岸的世界帝国主义在一切严肃的、重要的和有权威性的——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机构都把反对派当作它們的死敌看待。在最近这个时期，自始至終，它們不是对官方领导集团的一些措施直接表示有条件的、謹慎的同情，就是表示只有在完全摧毁反对派、对反对派施行整个肉体消灭(奥斯丁·张伯伦^①甚至要求使用行刑队)的前提下，苏維埃政权才有可能向资产阶级政权“正常地演变”。虽然我們手头毫无資料可供参考，即使仅仅根据記憶，我們也可以指出許多属于这一类的言論：法国重工业《新聞公报》(一九二七年一月)，伦敦《泰晤士报》和《紐約时报》的言論，包括美国《民族》周刊在內的許多出版物曾經加以轉載的奥斯丁·张伯伦的讲话，等等。单单这个事实就足以迫使我党官方报刊在开始企图加以利用而不完全成功以后，整个停止轉載阶级敌人对我党过去数月經歷的并且現在仍在經歷的危机作出的判断。这些言論把反对派的革命的阶级性強調得太突出了。

234

因此，我們认为，如果在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出版两种經過认真校閱的书，对于闡明情况将有很大的裨益：一种《白皮书》，

① 奥斯丁·张伯伦 (Austen Chamberlain 1863—1937) 是簽訂慕尼黑条約的前英国首相张伯伦 (Neville Chamberlain) 的异母哥哥，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九年期間担任英国外交大臣。——譯者注

內容包括严肃的資本主义报刊就共产国际的爭論发表的意見；一种《黄皮书》，內容包括社会民主党相同的意見。

無論怎么說，故意杜撰出来吓人的、所謂社会民主党人可能企图卷入我們的爭論的說法，絲毫不能阻止我們明确指出照我們看来对共产国际的政策是致命伤的地方，以及照我們看来对这种政策有所裨益之处。我們是可以粉碎这个怪物的，办法不是玩弄外交手腕，也不是玩捉迷藏的把戏，而是奉行正确的革命政策。这种政策現在尙待制定。

* * *

現在，随着綱領草案的公布，国际无产階級革命的一切根本理論和实践問題当然都必須根据新的草案加以考察。事实上，除了从理論上指出如何处理需要考虑的問題的方法以外，新的草案的任务就是对共产国际已經取得的全部經驗給以概括的驗證和評价。只有这样看問題，我們才能檢驗草案本身并作出正确的判断，确定草案对原則的闡述精确到什么程度，判断它具有多大的完整性和生命力。我們在可供我們支配的极为有限的时间所能做到的范围内，在專門討論綱領草案的一份文件中提出了这种批判。照我們看来最需要在我們的批判中加以闡述的根本問題，已經分別列入以下三章：（一）国际革命的綱領还是一国社会主义的綱領？（二）帝国主义时代的战略和策略。（三）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景，它对东方各国和整个共产国际的教訓。

我們力图以我們对国际工人运动特别是共产国际过去五年来的活生生的經驗的考察作为依据来分析这些問題。我們从这种分析中得出了結論，认为新的草案前后极为矛盾，在原則論点上充滿了折衷主义，缺乏系統，缺乏完整性，对問題的闡述是拉拉扯扯，东拼西凑。討論战略問題的一章的主要特点在于：它有一种迴避过去几年的革命經驗提出的深刻而富有悲剧意味的問題的傾向。

我們在这里不准备回头討論在已經提交給代表大会的文件中考察过的那些問題。从以上所說不难看出，現在这封信具有完全不同的目的。它要談的可以說是局勢和政策問題：我們必須找出現在正式实行的向左轉的方針在整个前景中所占的具体地位，从而以此作为起点，使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内部直到昨天为止还日趋分裂的各种傾向取得**和解**。十分明显，只有在思想完全明确的基础上，而絕不是在阿諛奉迎或官僚主义的、拜占廷主义的歌功頌德的基础上，才談得上**和解**的問題。

这种轉变在苏联国内問題上无疑表現得最为明显。促进这种轉变的动力就是从這些問題中产生的。因此，我們打算在这封信里主要討論俄国革命危机引起的苏联共产党的危机問題。但是在研究有关工人国家演变的重大問題时，我們絕不能絲毫“脱离”對我們的内部发展和問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国际因素”。所以我們在这封信里也不能不简单地介紹一下共产国际的状况及其工作方法，重述我們在討論綱領草案时提出的某些論点。

236

作为这些序論性质的意見的結論，我願意表示自己坚定的信念：对綱領草案的批判和現在这封写給代表大会的信都将提交給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第五次代表大会曾經选举我担任候补执行委員。仅仅由于这个原因，我也拥有提出这个要求的不可抹煞的权利。从形式上說，这封信是我为了反对剝夺我的权利和义务的不公正的决定而提出的申訴书——这些权利和义务是根据共产国际至高无上的命令授予我的。

二 为什么四年多不召开 共产国际代表大会？

自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召开以来，時間已經过去四年多了。在

此期間，領導集團奉行的路綫以及各个支部和整个共产国际領導机构的組成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第五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主席不仅已遭废黜，甚至已被开除出党，仅在第六次代表大会开幕前夕才恢复党籍。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沒有代表大会参預的情况下发生的，
237 的，虽然并没有任何客观障碍阻止代表大会的召开。在世界工人阶级运动和苏維埃共和国的最重要的問題上，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显得是多余的；它被当作一种障碍和一种累贅，年复一年地推迟召开。只是在已經作出結論、认为代表大会将面对完全既成事实的时候，才召开代表大会。

根据民主集中制的文字和精神，代表大会应当在党的生活中占有决定性的地位。党的生活一向是从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的筹备及其工作中得到最高表现的。而在目前，代表大会已經变成了沉重的負担，变成了一种累贅的形式。苏联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被任意地推迟了一年多。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則过了四年才召开。这是些什么样的年代呢！在这充滿最伟大的历史事件和最深刻的意見分歧的四年当中，有很充裕的时间召开无数的官僚主义的代表大会和會議，召开腐烂透頂的英俄委员会會議，召开用来裝飾門面的“反帝斗争同盟”的代表大会，召开庆祝苏联之友协会的戏剧性的代表大会——但是单单找不到时间和地点来召开共产国际的三次例行代表大会。

在內战和封鎖时期，外国代表必須克服空前的困难才能参加大会，其中某些人在赴会途中丧失了生命。而在那个时期，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代表大会都是遵守章程的規定，按照无产阶级政党的精神定期举行的。为什么現在不这样做呢？如果假装說我們現在过分忙于“实际”工作，这就等于承认党的思想和意志妨碍領導集团的工作，承认代表大会对于最严肃最重要的事务是一种枷鎖。这是官僚主义取消党的道路。
238

从形式上看，过去四年多来，一切問題都是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或主席团决定的；但是，事实上，这些問題是苏联共产党政治局，更准确一些說是書記处决定的。書記处以党的机构作为基础，党的机构却依附于書記处。当然，这里討論的不是苏联共产党的思想影响問題。在列宁担任领导时，这种影响要比今天大无数倍，而且具有极为重大的、创造性的意义。不，这里談的是苏联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独攬大权的書記处。書記处完全躲在幕后活动。这种現象在列宁担任领导时是連影子也找不到的。列宁在向党提出的最后忠告中曾經为防止这种現象而提出过严厉的警告。

共产国际被宣布为唯一具有国际性的党，一切国家支部必須完全从属于它。在这个問題上，列宁直到他的生命的最后一天，一直起着調节者的作用。他不止一次针对领导集团的集中主义的嗜好提出过警告，担心在政治前提尚不具备时，集中主义可能会蜕化为官僚主义。各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日趋成熟的过程有它本身內在的节奏，是以各国党自己的經驗作为基础的。共产国际的存在和苏联共产党在共产国际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能够加快这种节奏。但是，只有在一定的、不可缺少的限度以內才有可能起这种加速作用。超过这个限度，企图用严厉的行政措施来代替独立的活动，代替自我批評，代替自行决定方針的能力，那就有可能达到完全相反的结果，而且在一系列事例中的确已經达到完全相反的结果。尽管如此，当列宁停止工作时，极端集中主义的处理問題的方式却占了上风。执行委员会被說成是統一的世界政党里面掌握全权的中央委员会，仅仅对这个世界政党的代表大会負責。但是，我們看到的实际情况如何呢？恰恰是在最需要召开代表大会的时候，并没有召开代表大会；仅仅为了討論中国革命問題就有理由召开两次代表大会。从理論上說，执行委员会是世界工人运动的一个强有力的中心；而实际上，在过去几年內，它曾經一再进行

无情的改組。第五次代表大会选出的、在其中起领导作用的某些委員遭到廢黜。在共产国际的所有支部里，至少是在最重要的支部里，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既然沒有召开代表大会，那末仅对代表大会負責的执行委員會是由誰来改組的呢？答案十分明显。随着苏联共产党领导核心的改变，每一次它都要重新挑选执行委員會的委員，完全不顾共产国际的章程和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決議。

苏联共产党领导核心本身的改变也总是以某种出人意料的方式，不仅背着共产国际、而且背着苏联共产党进行的；它总是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間，在不受代表大会控制的情况下，由党的机构通过强力实现的。

领导的“艺术”在于使党面对既成事实。其次，代表大会——由于在幕后活动的机构所起的作用而延期召开的代表大会——的代表也是严格按照领导机构新的組成状况挑选出来的。与此同时，对上届代表大会选举的过去的领导核心，則干脆給它戴上“反党头子”的帽子。

如果把这个过程的一切最重要的阶段都列举出来，就未免太冗长了。我仅仅提出一个事实，但是其价值可以等于一打事实。240 不仅从形式上看，而且从事实上看，第五次代表大会是由季諾維也夫集团领导的。正是这个集团通过反对所謂“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为代表大会定下了基調。从幕后酿成的需要和这场斗争的阴谋对代表大会整个方針出現的偏向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后来的年代里，这种情况造成了最严重的錯誤的根源。这些錯誤已經在別的地方詳加討論。这里我們只需要指出一个事实：第五次代表大会的领导集团在属于共产国际的任何一个党内都沒有能够把自己的地位保持到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时候。至于这个集团的核心分子，它在一九二六年七月以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索科里尼可夫等等为代表发表的宣言中肯定地說：“一九二三年反对派的主要核

心曾經針對脫離無產階級路線的危險和機構統治的具有威脅性的發展正確地提出過警告。這一點，現在已經不可能有任何疑問了。”

但是，問題並沒有到此為止。在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體會議上（一九二六年七月十四日至二十三日），第五次代表大會的指揮者和鼓舞者季諾維也夫宣稱——中央委員會在第十五次黨代表大會以前又重新發表了這篇講話的速記稿——他，季諾維也夫，認為“他一生所犯的主要錯誤”有以下兩點：一點是他在一九一七年犯的錯誤，一點是他在一九二三年對反對派進行的鬥爭。

季諾維也夫說：“我認為第二個錯誤具有更大的危險性，因為一九一七年的錯誤是列寧在世時犯下的，得到了列寧的糾正……而我一九二三年犯的錯誤在於……”

奧爾忠尼啟澤說：“那末你過去為什麼要欺騙黨內每一個人呢？……”

季諾維也夫說：“是的，在偏向問題和機構實行官僚主義壓迫的問題上，托洛茨基原來是對的，而你們是錯的。”

但是，倒行逆施的問題——也就是違背政治路線的問題——241
和黨的統治的問題正是整個分歧的所在。季諾維也夫在一九二六年已經得出結論，認為一九二三年的反對派在這些問題上是對的，並且認為他畢生最大的錯誤，甚至比抗拒十月革命起義的事更嚴重的錯誤，就是他在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五年期間進行的反對“托洛茨基主義”的鬥爭。但是，過去幾天來，報紙上發表了中央監察委員會重新吸收季諾維也夫一伙入黨的決定，認為他們已經“放棄了自己的托洛茨基主義的愚蠢思想”。這整個絕對無法相信的插曲，讓我們的孫子和曾孫聽起來會以為是某一位諷刺家的作品——儘管這件事從頭到尾是有文件證明的。如果這個插曲僅僅牽涉到一個人或一群人，如果它和過去幾年來共產國際內部進行

的思想斗争并无密切联系，如果它并不是在容许四年不召开代表大会的状况存在的同样的条件下——也就是说，由于官僚手段的无限权力——有机地发展起来的，或许本来不值得在这封信里提到它。

在目前，共产国际在思想意识问题上并不是受到指导，而是按照命令依样画葫芦。理论已经不是认识事物和预见事物的工具；它已经变成了一种技术性的行政手段。某些观点被说成是反对派的观点，然后根据这些“观点”对反对派进行审判。某些人被说成是“托洛茨基主义”一伙，然后就把他们罢免，仿佛这只是一个衙门里的官吏任免问题。季诺维也夫决不是绝无仅有的例子。它不过是比其他例子更为突出罢了，因为这里涉及的毕竟是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指挥者和鼓舞者、共产国际的前任主席这样一位人物。

242 这种思想上的剧变必然伴随组织上的剧变而来，而组织上的剧变总是来自上面，已经成为一种制度，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苏联共产党和属于共产国际的其他各党所使用的正常统治方法。在废黜某个不如人意的领导集团的时候，官方宣布的理由和真正的动机是很少一致的。思想领域内的口是心非，是政权完全官僚主义化的必然结果。这些年来，德国、法国、英国、美国、波兰等等国家的共产党的领导成员不止一次地采取了极端机会主义的措施。但是他们完全逍遥法外，因为他们在苏联共产党的内部问题上采取的立场使他们受到了庇护。投票反对反对派，甚至大声詈骂反对派，这样做就保证自己不会遭受任何来自上面的打击。由于机构是不受任何监督的，这样也就保证他们不会受到可能来自下层的打击。

最近的一些例子对每个人都是记忆犹新的。中国的陈独秀、谭平山一伙纯粹孟什维克的领导集团直到不久以前还享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充分支持，使他们不受反对派的批评。这种事一

一点也不奇怪：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上，譚平山曾經发誓說：

“……在托洛茨基主义刚刚出現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就通过了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決議。”^①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本身及其机构中起很大作用的是一些曾經极力抗拒和阻撓俄国、芬兰、德国、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和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分子。这些人由于在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中表示忠誠而及时作了弥补。譚平山只是这些分子的門徒；如果說他被罵得狗血淋头而他的老师們却能够免遭辱罵，那是因为不負責任的統治机构有时需要一头替罪羊。

243

不仅在苏联共产党内，而且在整个共产国际内部，过去五年来最突出、最普遍、同时又最危险的特点是**官僚主义**以及和官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独断独行的做法的逐步的、日益加速的**增长**。不幸的是，对这一明确的断言，不仅要想提出异議是不可能的，就是力图加以緩和也是办不到的。

对章程的忽視和践踏，在組織上和思想上不断制造动乱的情况，代表大会的延期，每次使各种會議面对既成事实的做法，独断独行之风的增长——所有这一切不可能是出于偶然的，所有这一切必然具有深刻的原因。

如果仅仅用、或主要用各个集团爭夺权力等等个人原因来解释这些現象，就不配叫做馬克思主义了。不言而喻，所有这一类因素都起着重要的作用（見列宁遺囑）。但是，这里涉及的是一个极为深刻极为漫长的过程，因此产生这个过程的原因必然而且确实不仅是心理上的，而且是政治上的。

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整个制度官僚化的根源，主要在于領

① 《記錄》，第 805 頁。

领导集团的政治路线和无产阶级的历史路线之间的鸿沟正在不断扩大。这两条路线越不一致，领导集团的路线和实际事物进程的矛盾就越发暴露，通过党的措施、通过让大家进行批评的方式来实行这条路线就越加困难，因此越来越有必要通过机构、甚至通过国家采取措施，自上而下地把这条路线强加于党。

244 但是，只有在非无产阶级的各个阶级的压力下才有可能出现领导集团的路线和无产阶级的历史路线即布尔什维克路线之间的鸿沟日益加深的情况。一般地说，过去五年来，无论是在苏联内部还是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这种压力都已经增加到异乎寻常的程度，造成了剧烈的左右摇摆的现象。党的机构越脱离本党的批评和监督，党的领导集团就相应地越容易受到非无产阶级通过这个机构表达的愿望和建议的影响，并且对这种愿望和建议采取调和态度。这种情况使政治路线进一步向右转，结果就需要采取甚至更严厉的官僚主义措施，以便把这条路线强加于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这样一来，政治上倒行逆施的过程就必然要依靠组织上的镇压措施来完成。在这种情况下，领导集团绝对不能继续容忍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官僚主义制度是“形式主义的”制度；经院哲学是对它最合适的哲学。整个看来，过去五年是一个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进行经院哲学的歪曲的时期，是一个任意篡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借以适应政治上倒行逆施和官僚篡权精神的需要时期。“让富农长入社会主义”，“发财吧”，“不要跳越阶段”的建议，“四个阶级的结合”，“两个阶级的政党”，“一国社会主义”——所有这些属于向右转的中派主义的思想 and 口号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就是引用刑法条文来惩办马克思和列宁的真正信徒。

不言而喻，对经院哲学贫困化的原因、对官僚主义以及独断独行之风日益发展的原因所做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丝毫不会免除领导成员个人应负的责任；相反地，它倒是加重了这种责任。

毫無疑問，一再推遲召開第六次代表大會的主要動機之一是希望等待取得某種偉大的國際性的勝利。如果取得了勝利，人們就比較容易忘却最近的敗績。但是，眼前還看不到勝利的跡跡。這也不是偶然的。

在此期間，歐洲和世界資本主義發現自己得到了一個新的、可以認真喘一口氣的緩和時期。社會民主黨在一九二三年以後大大加強了自己的力量。共產黨的發展是微不足道的——無論怎麼說，這種發展和曾經使第五次代表大會感到歡欣鼓舞的那些預言所設想的發展有天淵之別。我們必須指出，不僅對共產國際的各個組織，而且對這些組織在群眾中的影響而言，這樣說都是適用的。總的說來，這種影響從一九二三年秋天開始、在我們所討論的整個時期當中都在不斷下降。有什麼人胆敢斷言各國共產黨在這四、五年期間保持了自己的領導的繼承性和穩定性呢？是否能夠找到這樣一個人是值得懷疑的。相反地，人們發現這種繼承性和穩定性即使在過去最有保證的黨即蘇聯共產黨內也完全遭到了破壞。

在過去這一段時間內，蘇維埃共和國從經濟和文化角度來說，已經取得了重要的進展，第一次向世界證明了社會主義管理方法的威力及其重要性，特別是這種方法所蘊藏的巨大可能性。但是，這些成就是所謂資本主義穩定的基礎上出現的，而這種穩定本身是世界革命遭到一系列失敗的結果。這個事實不僅使蘇維埃共和國的外部形勢顯著惡化，而且對國內各種力量的對比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使它向不利於無產階級的方向發展。

由於錯誤的領導，蘇聯繼續作為——用列寧的話來說——“整 246

个资本主义世界一个孤立的边沿地区”^①而存在的事实，使国民經济采取了容許资本主义势力和傾向获得严重的、說得更确切些是惊人的活动余地的发展形式。和各种乐观的說法相反，經济和政治方面各种力量的內在对比已經起了不利于无产阶级的变化。这样就出現了一系列令人痛心的危机。苏联共产党一直沒有能够从这些危机中掙脫出来。

（德国）十月革命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世界革命的延宕，而这种延宕又是无产阶级遭受的一系列残酷的失敗引起的。在一九二三年以前，战后各种运动和起义的失敗，起初是由于共产党还不存在，后来則是由于共产党的年青和軟弱。从一九二三年起，情况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我們所看到的已經不只是无产阶级的失敗，而是共产国际政策的失敗。这种政策在德国、英国和中国造成的严重錯誤，以及它在一系列其他国家所犯的程度較輕的錯誤，其性质都是在布尔什維克党的历史上从所未有的；如果要找到类似的例子，就只有翻看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七年期間的孟什維主义的历史，或者是这个时期以前几十年的历史。

共产国际成长的迟緩是过去五年来它所采取的錯誤政策的直接結果。不能认为这种迟緩是“穩定”局面造成的，除非人們用純粹經院哲学的方式来看待这种“穩定”的性质，特别是，除非人們想要推卸責任。穩定并不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它并不是因为世界资本主义經济的生存条件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变化而产生的。它是各种政治方面的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不利的变化的結果。在德
247 国，由于一九二三年领导集团的投降，无产阶级发现自己的力量已被消耗殆尽；在英国，无产阶级受到共产国际直到一九二六年还繼續和它保持同盟关系的一个领导集团的欺騙和出卖；在中国，共产

^① 《全俄苏維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447頁。——譯者注

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政策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期間把无产阶级驅进了国民党的圈套。这是造成失败的直接的、无可争辩的原因。同样重要的是：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这种失败就具有了涣散人心的性质。如果企图证明即使政策正确也不可避免会出现这些失败，那就是掉进了丑恶的宿命論的泥坑，那就是抛弃了布尔什维克关于革命领导的作用及其重要性的概念。

从政治观点上說，由于政策錯誤而造成的无产阶级的潰败使资产阶级获得了喘息的时间。资产阶级利用这段喘息时间来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这些原因为〔资本主义〕稳定时期提供了起点：这个时期是从一九二三年十月德国共产党投降的那一天开始的。毫无疑问，资产阶级经济地位的巩固反过来又起了“稳定”政治环境的作用。但是，在过去五年的稳定时期中，资本主义上升的根本原因在于共产国际的领导从任何观点來說都没有达到事态发展所要求的水平。当时并不缺乏革命形势。但是领导者长期没有能够利用这种形势。这种缺点并不属于个人的或偶然的性质；它是奉行中派主义路綫的必然結果。在暂时平静的时期，中派主义路綫还可以掩飾自己搖摆不定的状况。但是在革命时期事物发生剧变的时候，这种路綫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巨大的灾难。

苏联及其领导党的内部演变完全反映了国际形势的变化，从而以实际事例駁斥了关于孤立发展和一国社会主义的新的反动理論。苏联内部领导集团奉行的路綫当然也就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奉行的路綫，即滑向右翼的中派主义。这种路綫在国内政策上和在国际范围内都造成了同样深刻的危害，削弱了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

248

为了理解目前正在实行的向左轉的行動的意义，不仅必需全面而明确地認識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期間彻底揭露出来的、导致右傾中派主义的总的行动路綫，而且必需全面而明确地認識

在此以前、即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五年的极端左倾时期所奉行的、为这种倒行逆施铺平了道路的路綫。因此，現在的問題是对列宁死后五年的情况作出判断的問題。在这五年当中，由于敌对阶级势力的压力，由于领导集团的动摇不定和鼠目寸光，在国内和国际問題上都出現了改正、修改而实际上是修正列宁主义的情况。

249 早在一九二三年春天俄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时期，在苏联經濟問題上就出現了两种鮮明的、令人注目的立場；这两种立場在后来五年当中都得到了发展，現在可以用去年冬天发生的粮食收购危机所提供的事实来加以审查。中央委员会认为和农民結成的联盟受到的主要威胁是因为过早地发展工业引起的；它从一九二三年秋天出現的所謂“銷售危机”中为这个观点找到了证明。尽管这次危机具有插曲的性质，它在官方领导集团的經濟政策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記。我在(一九二三年春天)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發揮的論点中提出了相反的估計，认为使“結合”和无产阶级专政受到威胁的主要危險在于象征着工农业产品价格悬殊的“剪刀差”。这种差别反映了工业的落后性。保持甚至加强这种不均衡的状况势必造成农业和手工业中的分化，并导致资本主义势力的普遍发展。早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我就很明确地發揮了这个观点。当时我提出的概念中还有一个概念是这样的：**如果工业保持落后状态**，丰收将成为促进资本主义倾向而不是促进社会主义倾向发展的主要原因，使资本主义分子获得瓦解社会主义經濟的工具。

双方提出的这些具有根本性的公式貫穿于其后五年的斗争中。在这五年期間，对反对派提出的各种本质上是荒謬而反动的指責連綿不絕、响彻云霄，說反对派“害怕庄稼汉”，說“它害怕丰收”，說“它害怕农村会富裕起来”，更妙的是說“它想要掠夺农民”。由此可知，早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期間，特别是在一九二三年秋天

的討論中，当权派就抛弃了阶级标准，而籠统地談“农民”，籠统地談“丰收”，籠统地談“富裕”，并按照这些概念行事。从这种处理問題的方式中，已經可以感觉到正在新經濟政策的基础上形成的新的資產阶级阶层的压力。这些阶层把自己和国家机构联系起来，对鎮压实行抗拒，力图躲开列宁主义的照妖鏡。

在这个过程中，国际性的事件获得了决定性的意义。一九二三年下半年是紧张地期待德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

对形势的估計做得太晚，而且举棋不定。在当权的斯大林—季諾維也夫领导集团内部产生了巨大的磨擦；当然，这种磨擦仍然停留在共同的中派主义路綫的范围以内。尽管提出了各种警告，仍然直到最后一分钟才改变步調；一切都以德国共产党领导集团的駭人听聞的投降告終。德国共产党的领导集团一枪不发就把决定性的陣地交給了敌人。

250

这场失败本身就具有令人震动的性质。而由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领导集团——它的跟在事态发展后面跑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这次失败——不了解失败的程度及其巨大的深度，由于它根本不承认这场失败，所以这场失败就具有了更加令人痛心的意义。

领导集团頑固地认为革命形势尚在繼續发展，认为不久以后即将出現决定性的战斗。一九二四年接近年中的时候，第五次代表大会正是以这种根本錯誤的估計作为基础而建立自己的方針的。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一九二三年下半年，反对派已經就日益临近的政治結局敲起了警鐘。反对派要求奉行真正准备武装起义的路綫，并且不断提出警告，指出在这种历史性的时刻，几个星期的時間、有时是几天的時間就会决定未来許多年中革命的命运。另一方面，在后来六个月当中，也就是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以前的那

一段時間里，反對派曾經堅持不懈地一再指出：革命的形勢已被錯過；必須落下船帆，準備迎擊逆風。反對派指出：現在提到日程上來的問題已經不是起義的問題，而是在已經轉入攻勢的敵人面前進行防禦戰的問題——團結群眾為實現部分要求而鬥爭，在工會中建立據點，等等。

但是，對已經發生和即將發生的事情的這種明確的理解卻被戴上“托洛茨基主義”的帽子，被譴責為“取消主義”。面臨着政治上的退潮，第五次代表大會卻示威性地採取了準備起義的方針。這次代表大會在各國共產黨中間造成了混亂，從而一下子就使所有的共產黨都迷失了方向。

251 一九二四年是局勢急劇而顯著地趨向穩定的一年。這一年變成了在保加利亞和愛沙尼亞進行冒險的一年，變成了普遍奉行極端左傾路線的一年。這條路線以日益巨大的力量與事物進程背道而馳。從這時起就開始了在無產階級以外尋求現成的革命力量的努力，其結果是：把各國的冒牌農民政黨理想化；同拉迪奇和拉弗勒特眉來眼去；不惜損害紅色工會國際的利益而誇大農民國際的作用；對英國工會領導集團作出了錯誤的估計；和國民黨保持超階級的友誼，等等。極端左傾路線不顧危險地力圖用這些拐杖來支持自己，而所有這些拐杖後來都變成了明顯的右傾路線的主要支柱。右傾路線是在極左派發現他們面臨的形勢已經發生變化、原來的形勢已經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日趨穩定的過程中破滅以後取代極端左傾路線的。

德國無產階級的失敗是一個震動，它促成了一九二三年秋天的爭論。按照俄國共產黨當權的領導集團的概念，這次爭論的任務是批准在對內政策上採取消極地適應自發性的經濟發展的方針（對“超工業化”進行鬥爭，嘲笑計劃原則，等等）。就國際問題來說，最重要的任務是掩飾已經錯過最可靠的革命形勢的事實。

尽管如此，德国无产阶级的溃败已经深深影响到由于一九二三年焦急的等待而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的群众的觉悟。德国领导集团的投降不仅给德国工人群众、而且给苏联和其他国家的工人群众带来了总的对世界革命的严重怀疑态度。保加利亚和爱沙尼亚的失败加重了这种怀疑。在接近一九二五年年中的时候（在稳定时期已经明显地开始一年半以后），终于不得不正式承认这个稳定时期的存在，而这已经是稳定局面（在英国和中国）出现了深刻裂痕的时候。对世界革命的某种失望情绪也部分地攫住了群众，把中派主义领导集团推向严格属于民族性质的前景。不久以后，这一前景由于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的提出而达到可鄙的登峰造极的程度。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期间根本不能理解局势的极端左倾主义以更加野蛮的方式为右倾趋势取而代之。在“不超越阶段”的理论的保护下，这种趋势带来了以维护“秩序”和“纪律”的名义适应殖民地资产阶级、适应小资产阶级民主和工会官僚主义、适应被称为“强大的中农”的富农以及适应干部的需要政策。

右倾中派主义的政策在次要问题上还保持着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门面，碰到巨大的事变则随波逐流，而在中国革命和英俄委员会的问题上，它的完全属于孟什维克的性质和巨大的破坏性达到了极点。在那以前，在一切革命历史的过程中，中派主义还从来没有把升降的曲线划得如此完整；它今后是否能够再划一个类似的曲线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在这个例子中它在物质上和思想上都拥有共产国际的强大资源可供支配；它还可以在事前用无产阶级国家所能支配的全部资源把自己武装起来，借以对付任何抗拒和一切批评。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政策所造成的客观后果是促进稳定状态的新的主要原因，进一步迟误了革命，严重损害了苏联的国际

地位。

253 社会主义建設的速度問題是在一九二三年开始的两种傾向的斗争过程中提出的。从理論上說，这个問題和国内国际問題上的意見分歧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

官方領導集团受到以取自資產階級的現成資本作为基础而實現的恢复时期（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幻象的欺騙，越来越朝着以孤立发展經濟本身作为目标的立場滑下去。而正是在这种最严重的錯誤的基础上，由于国际上的失敗的打击，后来就出現了仅仅一个国家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論。正是在恢复时期結束，从而使和世界經濟保持联系的需要日益迫切的时候，和世界經濟断絕联系的理論却得到了宣揚。

我們的經濟发展速度問題根本不是官方領導集团提出来的。这个領導集团絲毫也不理解苏联經濟受到世界市場更加严格的节制，其程度和苏联經濟不得不通过进出口貿易和这个市場保持联系的程度是一致的。

当我们坚持不懈地指出苏联建設的速度以世界經濟和世界政治为条件的时候，官方路綫的指导者和鼓舞者回答我們說：“沒有必要把国际因素塞到我們的社会主义发展中来”（斯大林），另一方面又說：“即使用蝸牛的速度我們也要建設社会主义”（布哈林）。如果人們敢于把这种思想按照邏輯引导到它的結論，即“沒有必要把国际因素塞到”我們的經濟发展速度問題中去，那末人們就会发现它的意思不过是說沒有必要把共产国际“塞到”（德国的）十月革命的命运中去，因为共产国际正是“国际因素”的革命表現，而不是任何其他的东西。但是，問題在于中派主义对自己的思想是从来不彻底追究的。

254 速度問題显然不仅在經濟中，而且特別在作为“經濟的集中表

現”的政治中，都具有帶決定性的重要意義。

如果說在國內問題上我們之所以遲緩是因為對經濟採取了錯誤的態度，是因為害怕往前走得太遠，所以使經濟的發展越來越慢，那末在國際革命問題上則剛剛相反，在這方面，速度之所以一貫降低是因為中派主義不能充分估計革命形勢，不能在關鍵時刻利用這種形勢。當然，不能說德國無產階級有了正確的領導就一定會贏得並保持政權；不能說如果領導正確，英國無產階級就一定會推翻總委員會，從而大大加快無產階級勝利的到來；也不能說中國無產階級如果不是受到欺騙，如果不是被迫站到國民黨的旗幟下去，就會勝利地完成土地革命，就一定會領導貧苦農民奪得政權。如果這樣說，那就是為了炫耀自己而賣弄學問。但是，**導向這三種可能性的門都是敞開着的，而在德國更是大大敞開着的。**面對着這種情況，領導集團卻採取了背棄階級鬥爭的行動，犧牲本階級的利益去加強敵人的力量，從而竭力保證了失敗。

在任何鬥爭中，特別是在世界範圍的鬥爭中，速度問題是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不可能把蘇維埃共和國的命運和世界革命的命運分割開來。並沒有任何人給我們提供幾百年、即使是幾十年的時間，使我們可以随心所欲地加以支配。這個問題決定於鬥爭的發展進程。在這場鬥爭中，敵人將從我們的每一個錯誤和疏忽中得到好處；他們將占領每一寸不加防禦的領土。缺乏正確的經濟政策，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就會垮台，就無法支持到國外援助到來的時刻，從而將給國際無產階級造成無限的損害。共產國際缺乏正

255

期，那末它就可以凭借自己在技术上的强大优势，凭借它在财富方面、在陆军和海军方面的强大优势，推翻苏维埃专政；至于它是用经济手段、政治手段、军事手段还是三种手段都用来达到这个目的，则是次要问题。

时间不仅是一个重要因素，而且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一九二三年德国党的投降，一九二四年爱沙尼亚的起义，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所犯的极端左倾的错误，一九二六年英俄委员会的丑恶喜剧，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使中国革命遭到覆灭的层出不穷的错误，这都是共产国际政策的表现。所谓如果共产国际继续奉行这种政策，我们就能够建设“完全的社会主义”的说法是违背事实的。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使我们习惯于用放纵的态度看待这些错误，就好像我们一直拥有我们所要求的东西。一个多么深重的错误！在政治中，特别是在两种制度之间正在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的历史急剧转变时期，时间是一个决定性因素。我们必须最节约地使用时间：像一九二三年以来共产国际领导集团所犯的那种错误如果再继续五年，共产国际就无法存在了。由于十月革命对群众具有的吸引力，共产国际仍然保持着马克思和列宁的旗帜；但是在过去这一个时期，它一直是在吃老本。**共产国际再犯五年类似的错误，就不会继续存在下去。**但是，如果共产国际垮台，苏联也不会长久支持下去。官僚主义的颂诗所宣布的社会主义已经在我国实现了十分之九（斯大林），这番话也就成了愚蠢的废话。毫无疑问，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革命总有一天是可以开辟出通往胜利的新路的。但是要等到什么时候呢？要以多大的牺牲和多么不计其数的受害者作为代价呢？新一代国际革命者将不得不重新接上已断的线头，重新赢得群众对历史上最伟大的旗帜的信任。这种信任可能由于思想方面层出不穷的错误、混乱和曲解而受到伤害。

這些話必須以明確無誤的方式告訴國際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絲毫也不要害怕某些人必然會發出的咆哮和狂叫，和他們必然會實行的迫害。這些人之所以現在還保持樂觀，只是因為他們出於懦弱而閉上了自己的眼睛，不敢正視現實。

因此我們認為共產國際的政策是主宰其他一切問題的因素。如果缺乏正確的国际政策，蘇聯可能取得的一切經濟成就都不可能保住十月革命的成果，都不可能導致社會主義的實現。說得更確切一些：如果缺乏正確的国际政策，也就不可能在國內事務中奉行正確的政策，因為路綫是一致的。一個蘇維埃區委主席對待富農的錯誤態度只是整個鏈條中的一個很小的環節。在這根鏈條中，最大的環節是紅色工會對待總委員會的態度，是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對待蔣介石和柏塞爾的態度。

歐洲資產階級的穩定，社會民主黨的加強，各國共產黨的發展的延宕，蘇聯資本主義傾向的增長，蘇聯共產黨和共產國際領導集團的政策右傾，整個統治制度的官僚化，針對被迫成為反對派的左翼進行的瘋狂運動——所有這些過程都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一起，成為無產階級革命障地削弱——肯定是暫時性的、然而範圍深遠的削弱——時期的特點。這個時期也是敵對勢力對無產階級先鋒隊施加壓力的時期。

四 群眾的激進化和領導問題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二月全會（一九二八年）在兩個極其重要的問題即英國共產黨和法國共產黨的政策問題上，無可否認地曾經企圖向左轉，也就是說，趨向於採納反對派所維護的意見。儘管這種轉變缺乏連貫性，但是，如果隨著這種轉變同時實行列寧戰略思想的根本原則，即**譴責錯誤的政策是為實行正確的政策鋪平道**

路，那末人們或許可以說這種轉變不止是一種朕兆，而且具有決定性的重要意義。法國、德國和其他國家里的統一戰綫都是按照英俄委員會的方式辦事的。而英俄委員會的方針給英國共產黨帶來的後果和國民黨的方針給中國共產黨帶來的後果幾乎具有同樣程度的災難性。

就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來說，它不僅贊同所犯的一切錯誤，而且為新的、同樣殘酷的錯誤準備了條件。

二月全會關於俄國問題的決議比其他任何一種政治路綫都更好地反映了共產國際的統治制度。只需要指出一點就夠了：這個決議包含下面這種論斷：

“托派分子和社會民主黨都把希望寄托在推翻蘇維埃政權上面。”^①

258

某些人雖然絲毫不相信這種論斷（因為只有一個徹頭徹尾的白痴才可能相信反對派把希望寄托在推翻蘇維埃政權上面），但是由於馴服成性而舉手贊成這種論斷。經驗證明，這種人在反對階級敵人的殊死鬥爭中並非總是有勇氣奮起反抗的。

總起來說，二月全會象徵着一種矛盾的、向左轉的企圖。從政治觀點來看，這種企圖決定於廣大的工人階級群眾、主要是歐洲而特別是德國的工人階級群眾的情緒正在發生的無可否認的轉變。對這種轉變的性質和它開辟的前景缺乏明確的了解，就談不上什麼正確的領導。

台爾曼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二月全會上發表演說時，更準確些說是在對反對派發動放肆的攻擊時，曾經說道：

“托派分子沒有看見國際工人階級的激進化，沒有注意到形勢越來越具有革命性。”^②

① 《真理報》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九日。

② 《真理報》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七日。

然后他就按照慣例若有其事地进行論证，力图证明我們正在和希法亭^①一起埋葬世界革命。如果这里涉及的不是台尔曼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所代表的共产国际第二大党，那末对这种信口雌黃的說法也許可以置之不理。这里所說的反对派沒有看到的工人阶级激进化是怎么一回事呢？它就是台尔曼以及和他一伙的許多人在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五年、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也曾称之为“激进化”的东西。对于他們來說，共产党在一九二三年投降以后影响的衰退和社会民主党得到发展的事实都是不存在的。他們甚至也不問問自己这些現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和一个連最起碼的政治常識都不願了解的人是很难談話的。不幸的是，这不仅是台尔曼的問題；台尔曼这个人本身甚至是无足輕重的。謝馬德(Semard)也是无足輕重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确是学习革命战略的学校。它教导人們如何区别事物。無論什么工作，首要条件就是善于区别事物。有高潮时期，也有退潮时期。但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这两者是交替而至的。从策略观点上說，必須使政策适应所經歷的每一个阶段，同时在总的行动路綫上則要保持夺取政权的方針，随时随地都要有所准备，以免在形势发生急剧变化时措手不及。第五次代表大会把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教訓完全顛倒过来。它完全不顾客观形势，用蠱惑人心的、千篇一律的詞句代替对事物的分析，认为“工人阶级越来越激进化，形势越来越具有革命性”。

实际上，德国工人阶级只是在过去一年当中才开始从一九二三年失败的后果中恢复过来。反对派是首先注意到这一点的。在我們所发表而曾經为台尔曼所引用的一份文件中，我們說过下面这段話：

① 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 1877—1941)，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派首領之一，是考茨基的战友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策主要代表人。——譯者注

“欧洲工人阶级当中正在出现无可否认的向左转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为罢工斗争的尖锐化和共产党获得的选票的增加。但是，这只是转变的最初阶段。投社会民主党的票的选民人数也在增加，其速度可以和共产党选票的增加并驾齐驱，并且部分地超过了后者。如果这个过程发展加深，我们将进入下一个阶段，即〔群众〕开始从社会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阶段。”^①

260 根据德国和法国最近的选举提供的资料，我们可以断言：我们对欧洲工人阶级的状况、特别是对德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所作的上述估计几乎可以说是不容争辩的。不幸的是，共产国际的报刊，包括苏联共产党的报刊在内，对无产阶级队伍中存在的情绪和倾向根本没有提供任何严肃而透彻的、言之有据的、用数字加以证明的分析。就已经提供的统计数字来说，这些数字都是为了适应以维护领导“威信”为目的的一种特殊的倾向。对于说明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八年工人运动发展状况的极其重要的事实资料，如果这些资料驳斥了错误的判断和指令的话，他们一贯是悄悄放过而不置一词的。由于这一切原因，要判断群众激进化的力量、速度、范围及其可能性是极端困难的。

台尔曼没有任何权利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二月全会说：“……托洛茨基分子没有看见国际工人阶级的激进化。”我们不仅看到了欧洲无产阶级的激进化，而且早在去年就已经据此对局势作出了估计。这个估计已经完全为（一九二八年）五月德国国会选举所证实。这种激进化正在经历最初阶段，仍然在把群众引向社会民主党的轨道。在二月间，台尔曼拒绝看到这一点；他坚持说：“形势越来越具有革命性。”这样泛泛而谈的论断只是一种空洞的词句。如果作为资产阶级统治的主要支柱的社会民主党正在增强，人们能够说“形势越来越〔？〕具有革命性”吗？

^① 托洛茨基：《论新阶段》。

無論怎么說，群众的“激进化”尚需經過一个工人紛紛从社会民主党轉向共产党的初步阶段，然后才会出現革命的形势。誠然，作为局部現象，这种情况現在正在出現。但是这个潮流的主要发展方向还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把激进化的一个仍然属于半和平主义、半和敌人合作性质的开始阶段和一个具有革命性质的阶段混为一談必然会导致殘酷的錯誤。必須学会如何区分事物。任何人如果只知道年复一年地重申“群众正在激进化，形势具有革命性”，那末他就不是一个布尔什維克的領袖，而是一个只会敲着桌子激昂陈詞的鼓动家；当革命真正到来时，他肯定会失之交臂。

社会民主党是資產階級統治的主要支柱。然而这根支柱本身也包含着矛盾。如果工人們正在从共产党轉向社会民主党，那末人們就可以完全肯定地說：資產階級的統治得到了巩固。一九二四年的情况就是如此。当时，台尔曼和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其他領導人沒有能够了解这一点；所以他們就用謾罵来答复我們的論点和劝告。現在形势已經不同了。共产党的发展已經和社会民主党并駕齐驅，但是它的发展还没有直接削弱社会民主党。群众正沿着两条平行的路綫涌向这两个党；到目前为止，涌向社会民主党的人更多些。工人們抛弃資產階級的政党，从政治上冷漠的状况中觉醒过来——这是造成这种发展的根本原因——显然不能說是資產階級正在得到加强。但是社会民主党的发展也不能說是一种革命形势。必須学会如何区别事物。那末，应当如何說明目前形势的特点呢？这是一种过渡性的形势，其中包含着矛盾，群众还没有分化，还存在各种不同的可能性。必須警惕地注視这个过程的发展，不要陶醉于陈腐的詞句，經常作好准备，以待形势发生急剧的变化。

社会民主党并没有仅仅因为投自己的票的选民人数增加就感到心滿意足；它正忧心忡忡地注視着工人的洪流，因为这股洪流为

它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在工人们开始从社会民主党大批转向共产党以前（这样的时刻是必然会到来的），我们必须预计到社会民主党内部还会出现新的、巨大的磨擦，还会形成更深刻的联合和分裂，等等。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很可能为共产党提供机会，使它可以按照“统一战线”的路线展开积极的、进攻性的策略行动，加速群众革命分化的过程，这主要是说，促使工人脱离社会民主党。但是，如果“策略的运用”结果不过是共产党再一次把注意力转向“左翼”社会民主党人（他们仍然有可能向左走得很远），等待他们变得通情达理一些，那末我们就要倒霉了。我们知道这种“策略”曾经在一九二三年的萨克森^①小试牛刀，而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期間則曾在英国和中国大规模地加以运用。在所有这些事例中，结果都错过了革命的形势，造成了巨大的失败。

台尔曼的论断并不是他本人的；这一点可以从纲领草案中看出来。纲领草案说：

“日益加剧的群众激进化的过程，各国共产党的影响及其权威的增长……所有这一切清楚地说明，在帝国主义的中心地区一个新的革命浪潮正在高涨起来。”

263 作为一种纲领性的概括，这个说法是根本错误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不仅出现过“日益加剧的激进化的过程”，而且出现过群众趋向右翼的时期，不仅有各国共产党影响上升的时期，而且有这种影响暂时下降的时期——特别是在发生程度不同的错误和投降的时候。将来仍然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这里只是根据时局作出判断的问题，那末就某些国家在某个具体时期的情况来看，这种说法或多或少是正确的，而就全世界的情况来看，则

① 一九二三年，德国共产党人曾经和左翼社会民主党人结成统一战线，在萨克森州议会和政府中构成大多数。但是德国共产党在右派分子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麦的领导下，向左翼社会民主党的不抵抗路线投降，终致失败。——译者注

是根本不正确的。即使如此,这种判断也属于决議的范围,而不属于綱領的范围。綱領是为整个无产阶级革命时期制定的。不幸的是,在这五年期間,共产国际領導集团在辯证地对待革命形势消长的問題上絲毫沒有表现出理解力。在这些問題上,它永远停留在經院哲学的范围,不从根本上研究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活生生的阶段就談什么“激进化”。

由于德国在世界大战时期遭受的失敗,德国政治生活的特点表现在,它所經歷的危机具有特殊的性质,使德国无产阶级先锋队面临肩負責任的形势。在战后最初的五年中,德国无产阶级失敗的直接原因在于革命政党特別軟弱;在其后五年中,这种失敗則是由于領導的錯誤。

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期間,有了革命的形势,但完全没有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到一九二一年开始退潮的时候,已經頗为强大的共产党曾經企图发动革命,虽然当时缺乏发动革命的直接前提。后来进行的准备工作(“为爭取群众而斗争”)結果在党内造成了右傾偏向。在整个局势急剧地向左轉的时候(一九二三年秋天),已經丧失革命能力和主动性的領導集团惨遭覆灭。右翼为左翼取而代之。当左翼取得控制权时,革命已在退潮。然而左派拒絕理解这一点,頑固地坚持“准备起义的路綫”。結果产生了新的錯誤,使党遭到削弱,使左派領導被推翻。現在的中央委员会暗中依靠一部分“右派分子”,不断对左派进行无情的斗争,一直机械地翻来复去地說群众正在激进化,說革命已近在咫尺。

264

从德国共产党演变的历史中可以看出,不同派別随着政治曲綫的升降而猝然地、交替地掌握权力的状况:每当政治曲綫陡然上升或陡然下降的时候,也就是說,每当它陡然趋向暂时“稳定”或者相反地陡然趋向革命危机的时候,当时占領導地位的集团就要遭到覆灭,把地位让給和它竞争的集团。右翼集团的弱点恰巧在于

它不懂得如何在形势发生变化时，使一切活动轉上通过革命斗争夺取政权的軌道；另一方面，左翼集团的弱点則在于它既不承认又不了解由于准备时期的客观形势而有必要动员群众为实现过渡性要求而斗争。这两个集团的弱点互为补充。既然形势每出现一次轉折就要更換一次领导，党的领导干部就无法获得更广泛的經驗：既有上升又有下降、既有高潮又有低潮、既有退却又有进攻的經驗。一个真正革命的领导必須了解我們的时代是一个充滿陡然的变化轉折的时代，否則就无法受到教育。以乱碰乱撞的方式通过任命来挑选領袖，这种做法本身必然包含着领导集团一碰到重大社会危机就会遭到新的破产的潜在的危險。

265 领导意味着預見。对台尔曼的阿諛奉承必須适可而止了。台尔曼之所以受到贊美仅仅是因为他从阴沟里挖掘出最污浊的詞句来攻击反对派，正如譚平山仅仅因为把台尔曼的謾罵譯成了中文就在第七次全会上受到寵爱一样。必須告訴德国的党：台尔曼在二月間就政治形势作出的判断是庸俗的、武断的、不真实的。在錯誤造成的伤口愈合以前，必須公开承认过去五年所犯的战略上和策略上的錯誤，并且严肃认真地研究这些錯誤；战略上的經驗教訓必須紧随着事态的发展加以总结才能深入。必須停止由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犯了錯誤就撤換党的領袖，或者由于这些領袖不贊成国家政治保卫局就惩办无产阶级革命家（比利时）^①，就撤換他們作为惩罚的做法。必須让年輕的干部們自己走路；可以帮助他們，但是不要强迫命令。必須停止仅仅以态度端正（即反对反对派）作为依据“指派”負責人的做法。必須永远抛弃中央委员会的委任制度。

^① 这里指的是比利时共产党的领导人。据英譯本附注：比利时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曾經在一九二七年通过決議，反对苏联共产党把加米涅夫等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把穆拉洛夫等开除出中央监察委员会以及把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开除出党的措施。后来，“在斯大林主义者的命令下”，比共这些领导人就被开除出党了。——譯者注

五 苏联共产党目前这种向左轉的 趋势是如何形成的

在这种概括的叙述中，我們必須簡略地談談共产国际的政策及其制度，以便把領導集团向左轉的情况弄清楚。既然这种趋势直接产生于造成苏联經濟危机的那些条件，既然它是按照和国内問題有特殊关系的路綫发展的，那末我們就必须更深入、更詳尽地探討一下过去——直到最近以前——对这些問題的提法，看看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最近通过的決議和措施中有什么新的因素。只有这样做，我們才能看出今后应当奉行的正确的政策路綫的輪廓。 266

* * *

今年(一九二八年)在粮食收购工作中經歷的完全异乎寻常的困难不仅在經濟領域中、而且在政治和党的領域中具有同样极其重要的意义。困难促进了向左轉的变化。这并不是偶然的。另一方面，这些困难本身为长期奉行的經濟政策和总的政策带来的利弊作了結論。

倘若无产階級革命立刻扩大到各个先进国家，从战时共产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經濟本来是无需作很大的退却就能實現的。无产階級革命的扩大已經推迟了許多年。这使我們不得不在一九二一年春天实行影响深远的和长期的大退却——即实行新經濟政策。这种必不可少的退却所应达到的規模不只是从理論上、而且是从实践中逐漸探索出来的。一九二一年秋天就已經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更深入的退却。

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九日，即过渡到新經濟政策的七个月以后，列宁在莫斯科省的會議上說道：

“今年春天我們实行了向新經濟政策的过渡。这种过渡，我們的这种退却……是不是已經够了，我們是不是就可以停止退却，而开始准备进攻了呢？不，这还是不够的……如果我們不想把脑袋像駝鳥那样藏起来，如果我們不想表现得像那些看不見自己的失敗的人，不怕正視危險，我們現在就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我們必須承认我們所作的退却是不够的，必須再退却，再向后退，从国家資本主义轉到国家調节购銷和貨幣流通……因此，我們是处在还不得不退却的状态中，退却是为了在将来最終地轉入进攻。”①

后来，在同一篇演說中，列宁說：

“一九二一年春天，我們在經濟方面实行了退却，而現在，在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二年的冬天和春天，还要繼續退却。如果我們对自己、对工人階級、对群众隱瞞这一点，那就等于承认我們根本沒有觉悟，等于沒有勇气正視現狀。要是这样，我們就不能进行工作和展开斗爭。”②

直到第二年即一九二二年春天，列宁才决定发出停止退却的訊号。他第一次談到这一点是在一九二二年三月六日在五金工人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會議上。他說：

“現在我們可以說，这种退却，即我們向資本家所作的让步已經結束了。……我希望而且相信，党代表大会会以俄国領導政党的名义正式作出这种宣告。”③

紧接着他就以他一貫的坦率和誠实作了真正列宁主义的解釋：

“决不能把停止退却这句话了解为：我們已經打好新經濟的基

① 參見《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會議：論新經濟政策》，《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72—73頁。——譯者注

② 同上书，第74頁。——譯者注

③ 參見《論苏維埃共和国的国内外形势》，《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192頁。——譯者注

础，可以安心地前进了。不，基础还没有打好。”①

以列宁的报告作为基础，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这个问题的下列决议：

“代表大会注意到：过去一年来采取的和决定采取的措施，整个加起来，已经完成了党必须对私人资本主义作出的一切让步。代表大会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退却已经完成。”② 268

因此，这个经过深思熟虑并且——正如我们曾经看到的那样——经过周密准备的决议，预计到党所处的新的起点将提供展开社会主义攻势的可能性，虽然缓慢，但不需要作新的退却。

尽管如此，这个在列宁领导下召开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所表示的期望，在这一点上证明是并不正确的。一九二五年春天又有必要作新的退却：允许农村中的富有阶级通过雇佣劳动和租赁土地的方式剥削比较贫苦的阶级。

这次新的、影响巨大的退却是列宁在一九二二年制定的战略计划没有预见到的。这次退却之所以必要，不仅因为过去为退却规定的时限“太短”（由于最起码的谨慎，这样做是必要的），而且因为在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期间领导集团既不了解形势、也不了解它所担负的任务，在“赢得”时间的幻想下丧失了时间。

然而问题并没有到此为止。一九二五年四月实行的新的、痛苦的退却并没有被称为——列宁会这样称它的——一次深刻的失败和退却，而是被当作结合的一个胜利，被认为仅仅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总结构中的一个环节。正是针对这种做法，列宁一生曾经不断提出警告，特别是在一九二一年秋天——当时已经有必要继续实行并且加深那一年春天开始的退却。

① 参见《论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内外形势》，《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192页。——译者注

② 《记录》，第143页。

列宁在上面已經引用过的、在莫斯科省代表會議上发表的演說中指出：“失敗并不危險，危險的是不敢承认失敗，不敢从失敗中取得一切教訓。……不要怕承认失敗，要从失敗的經驗中进行学习。如果我們接受这种意見，认为承认失敗就会像放弃陣地那样令人沮丧失望，削弱斗志，那就應該指出，这样的革命者是一錢不值的。……無論过去和将来，我們的力量就在于我們对最惨重的失敗也能給以十分冷靜的估計，从失敗的經驗中学习應該怎样改变我們的活動方式。因此应当直言不諱。这一点，不仅从理論的真理来看，而且从实际方面来看，都是极为重要的。如果昨天的經驗教訓沒有使我們看到旧方法的不正确，那末我們就决不能学会用新方法来解决今天的問題。”^①

但是，一俟列宁离开領導地位，这个值得重視的警告就被全部置諸脑后；到現在为止，任何时候也沒有真正記得这个警告。

由于一九二五年四月的决定已經使农村日趋分化的現象合法化，为这种分化敞开了大門，所以結合意味着工人国家和富农之間的商品交換将不断增加。人們不但不承认这种可怕的危險，而且立即制造出让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的卑鄙理論。这种办法第一次作为脫离世界經濟和世界革命而独立地“在一个国家建設社会主义”的办法，以党的名义一古脑儿提交給党的代表會議。由此可知，这种小資產階級反动理論之所以出現并不是因为社会主义建設真正取得了成就——这些成就是不可爭辯的——而恰恰是因为社会主义建設遭到了挫折，从而領導人认为有必要給无產階級提供一种“精神”安慰，以便抵消对資本主义作出的新的物质让步的影响。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一九二六年一月）关于工业化的決議提出了一系列正确論点，几乎是逐字照抄反对派在一九二三年至一九

^① 參見《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會議：論新經濟政策》，《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71頁。——譯者注

二五年期間在這個問題上發揮的某些思想。但是，在通過這個決議的同時，又展開了一個反對被戴上“超工業化分子”帽子的左翼的運動，也就是反對那些不願意使已經通過的決議僅僅停留在紙上的人的運動；我們針對富農危險提出的警告被荒謬地稱為“驚惶失措”；指出農村正在發生階級分化的事實則被當作反蘇宣傳而加以懲處；要求加強對富農施加的壓力以有利於工業的發展則被扣上傾向“掠奪農民”的帽子（斯大林—季可夫—古比雪夫宣言）；這樣一來，關於工業化的決議對實際經濟發展所產生的影響，就和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就黨的民主和共產國際集體領導等等問題通過的某些其他決議所產生的影響一樣，是微不足道的了。

早在一九二三年春天就開始了結合問題的討論。一九二六年，反對派以下列方式概括了這次討論的內容：

“問：反對派的政策是否真有破壞無產階級和農民之間的結合的危險呢？”

“答：這種指責是徹頭徹尾虛假的。結合當前受到的威脅一方面來自工業的落后，另一方面來自富農的發展。工業品的缺乏正在城鄉之間造成裂痕。在政治和經濟領域中，富農正開始控制中農和貧農，使他們反對無產階級。這種發展現在尚處於最初階段。正是這種發展在威脅着結合。低估工業落后和富農增長的意義就無法對兩個階級的聯盟——在我國條件下實行專政的基礎——實行正確的列寧主義的領導。”（《問與答》）

讓我們在這裡強調指出：儘管鬥爭十分激烈，反對派在這個問題上也絲毫沒有誇大。一九二六年，當我們挺身出來反對讓富農長入社會主義的叛徒理論、反對這種只能為使我們長入資本主義鋪平道路的理論的時候，我們說富農的危險“尚處於最初階段”。從一九二三年開始，我們就已經指出危險來自什麼方面。我們指出了這種危險發展的每一個新的階段。如果領導的藝術不是善於及

时认出危险——也就是说，当危险尚“处于最初阶段”的时候就能够看出危险——并且防止它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那末领导的艺术究竟是什么呢？要领导就要有预见——而不是迫害那些有预见性的人。

对党最不幸的是，上面引用过的那些话甚至不可能得到公布。由于传播了那些话，最优秀的战士已经被那些毫无思想、不愿意而且不能够考虑将来的官员开除出党。

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九日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上，布哈林就结合和粮食收购问题谴责了反对派。他说：

“我们的反对派用来反对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最强有力的论据是什么呢（我这里想到的是一九二五年秋天）？他们当时说：矛盾正在疯狂地增加，而党的中央委员会却不了解这种情况。他们说：几乎集中了全部余粮的富农已经组织‘粮食罢工’来反对我们，所以粮食收购情况才会这样糟糕。这是我们大家都听到了的。……按照反对派的估计，其他一切都不过是这一根本现象在政治上的表现。后来，同样是这些同志又插进来说：富农已经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阵地，危险更增加了。同志们，如果第一个和第二个论断都是对的，我们今年就会碰到反对无产阶级的更强大的‘富农罢工’了……反对派诬蔑我们，说我们正在帮助富农发展，说我们在不断让步，说我们正在帮助富农组织拒售粮食运动；实际结果证明情况是刚刚相反的。……”^①

从布哈林嘴里引来的仅仅这一段话，岂不就足以说明领导集团在有关我们经济政策的关键问题上是完全有眼无珠的吗？

可是，布哈林并不是一个例外。他不过从理论上“概括”了领导集团的昏聩。党和经济工作中最负责的领导人竞相宣称我们已

^① 《记录》，第二卷第118页。

經克服了危机(李可夫),說我們已經控制农民市場,粮食收购問題已經成为严格属于苏維埃机构范围的純粹是組織工作的問題(米高揚)。中央委員會一九二七年七月全會的決議宣布:這一年經濟活動的發展整個說來並沒有發生任何危机。与此同时,官方报刊异口同声地断言:农村中缺乏商品的情况如果不是完全消失了,至少已經有了很大的緩和。

为了和這一切意見相抗衡,反对派在給第十五次代表大會的提綱中再次写道:

“粮食收购總額的下降一方面直接证明城乡关系中存在着深刻的混乱,另一方面也是威胁我們的新困难的源泉。”

我們的困难根源是什么呢?反对派回答說:

“近年来工业发展过分迟緩,落后于整个国民經濟的发展……因此,在原料方面、出口貿易方面和食物方面,国营經濟对富农和資本主义分子的依賴日益增加。”

讓我們同时回忆一下:反对派进行的最尖銳的干預就是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节日游行期間进行的那一次;而那次干預提出的最尖銳的口号是:“讓我們把火力轉向右派;轉向富农、投机倒把分子和官僚主义者;轉向破坏粮食收购工作的富农和投机倒把分子;轉向在頓涅茨审判时期做組織工作或在打瞌睡的官僚主义者。”这场涉及革命的生死存亡的、非同小可的爭論在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二八年的冬天由于国家政治保卫局特务的威胁而宣告結束,同时匆匆忙忙地签署了决定,要对那些和一般中派主义者的昏聩、特别是和布哈林的昏聩有所不同的“偏向”分子实行惩办,根据第五十八条的規定予以放逐。

倘若不是反对派在此以前作了一系列的工作——从一九二三年的政綱起到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的标語牌为止;倘若不是反对派事前作出了正确的預測;倘若不是反对派在党内和工人階級

队伍内部提出了正当的警告；那末，粮食收购危机本来只会加速右倾道路的发展，进一步放任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

在此以前的历史上，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甚至先锋队的先锋队，曾经不止一次以自己的毁灭作为代价才使本阶级重新前进一步，或阻止敌人的进攻。

六 进一步、退半步

同中国危机、英俄危机和其他危机不同，粮食收购危机是不能一言不发就轻轻放过的。这场危机提供了一种刺激，使政策趋向一个新的阶段，不仅在整個經濟中，而且在每个工人的日常生活中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因此，新的政治时期是从粮食收购开始的。

274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五日，在和过去毫无联系的情况下，党有幸在《真理报》上拜读到一篇社论。这篇社论很可以说是提交给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反对派政纲》的转述，其中一部分几乎是从《政纲》中逐字照抄来的。

这篇在粮食收购危机的直接压力下写成的出人意料的社论宣布：

“在造成粮食收购困难的一系列原因中，必须特别指出下面这一点。农村已经发展了，发财了。得到发展和发财的首先是富农。三年丰收并不是毫无影响的。”

由此可知，农村拒绝为城市提供粮食是因为“农村已经发财了”。这就是说，它已经尽力实现布哈林的口号：“发财吧！”但是，农村富裕为什么会破坏而不是巩固结合呢？社论回答说：这是因为“得到发展和发财的首先是富农。”这样一来，认为这些年来中农已经增加而富农和贫农则相应减少的理论突然被认为是毫无用处的垃圾而予以抛弃了。“得到发展和发财的首先是富农。”

但是，甚至农村富农发财的事实本身也不能说明城乡交流瓦解的原因。和富农结成的联盟并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联盟。而粮食危机的出现是由于甚至这样一种结合也并不存在。因此，富农不仅得到了发展，发了财，而且并不感到有必要用自己囤积的天然产物来交换金币；至于他所需要并且可以从城市中得到的商品，他只需要付出一部分谷物就可以买到，而这些谷物对城市却是绝对不够的。《真理报》还提出了第二个原因——归根结蒂，这是造成粮食危机的根本原因。

275

“农民收入的增加……在工业品供应相对落后的状况下，使一般农民、特别是富农可以囤积粮食。”

现在情况就清楚了。根本原因在于工业落后，在于工业品缺乏。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没有同属于合作社的贫农和中农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结合，甚至也没有同富农建立资本主义性质的结合。如果把我們刚才引用的《真理报》的两段话和前面一章引用的反对派文件中的话加以比较，那末，必须承认《真理报》实际上逐字逐句地重复了我在《问与答》里所说的话和所表达的思想。而由于写了《问与答》这篇文章，受到的惩罚是开除出党。

但是，《真理报》社论并没有就此止步。它一方面仍然有保留地说富农不是“主要的粮食囤积者”，同时承认富农是农村中的经济主宰，认为“富农和以高价收购谷物的城市投机商形成了结合”，而且“他们〔富农〕有可能吸引中农，使中农跟着他们走。”这段叙述恰如其份地说明了农村中存在的关系的特点。它和官方近年来传播的所谓中农在经济中起着支配的、日益增加的作用的神话毫无共同之处。除此以外，它和被当作反党文件的我們的纲领是完全一致的。在无产阶级专政实行十一年以后，看来富农仍然是“农村中的经济主宰”，而且“他们有可能吸引中农，使中农跟着他们走”——从数字上说仍然是农村中的中心人物的中农发现自己在

276

經濟上受到富农的控制。关于富农并不是“粮食的主要囤积者”的有保留的說法絲毫不能使这种情况有所緩和，而是使它显得更为阴暗了。据说富农現在在粮食貿易中占百分之二十的比重。如果我们接受这个頗为可疑的数字，富农能够使中农在市場上“跟着他們走”、也就是領導他們破坏国家粮食收购工作的事实，就更加突出了。紐約的銀行也并沒占有流通中的全部商品；然而正是这些銀行支配着全部商品。任何人如果企图提出百分之二十这个“并不太大”的数字当作证据，其結果仅仅強調說明：富农只需要拥有五分之一的粮食就足以在粮食市場上夺取支配一切的地位。这也說明，在工业落后的条件下，国家对农业經濟所能發揮的影响是多么微弱。

另外一个必然的保留是：只有几个地区而不是全部地区都出現了富农起“領導”作用的現象。这种說法也帮不了什么忙；相反地，它倒是使目前正在发生的情况具有更尖銳的、令人震惊的含意。这“几个”地区已經足以根本动摇城乡之間的結合。如果这一过程以同样程度扩大到所有的地区，那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我們这里談的是一种活生生的經濟过程，而不是一成不变的統計平均数。这根本不是在我們前进时要从数量上精确地衡量这个极为复杂而广泛的过程的問題，而是必須确定这个过程的性质的問題。这就是說，必須指出这种現象正在朝什么方向发展。今天是百分之二十；明天就可能大大增加。某些地区走在前面；另外一些地区落在后面。事实上，富农在农村中拥有的权威和使中农跟着他們走的可能性并不是直接从过去遗留下来的；不，就后面这一点來說，我們拥有新的事实，这些事实是紧接着镇压富农以后在实行新經濟政策的基础上出現的；在这个意义上，更尖銳更明确地出現这种現象的那些地区的意义仅仅在于它們为比較“落后”的地区指出了道路——当然，这是說如果五年来、特别是从一九二五年

四月以来占統治地位的經濟政策还会繼續实行的話。

新的“苏維埃”富农是損害了誰的利益才在农村中取得权威地位的呢？他們損害了处于統治地位的工人国家及其工具——国营工业和合作制——的利益。如果富农获得了吸引中农跟着他們走的可能性，他們将領導中农来反对誰呢？反对工人国家！**經濟聯盟**之所以出現严重而深刻的**破裂**，其原因正在于此，而**經濟聯盟**的破裂是另一种巨大得多的危險——**即政治聯盟的破裂**——的前提。

和一九二三年春天的情况不同，今天的問題已經不是預測事态发展的問題，也不是理論研究的問題。今天的問題是經過严格核對的事实問題。尽管实行了无产階級专政，尽管实行了土地国有化，尽管成立了受到国家保护的合作社，不过几年，工业发展的迟緩就已經把农村的控制权交給了社会主义建設的死敌。这个事实在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五日的《真理报》上第一次得到了正式承认。

从这一切事实中，完全沒有必要得出灰心丧气的結論。但是，首先必須把全部真实情况清楚地告訴党。不低估任何事实，也不美化任何事实。《真理报》社論虽然作了一些小小的、含糊其辞的保留，仍然是认真迈进了一步，其原因正在于此。仅仅迈了这一步，它就大大縮短了反对派在这个問題上奉行的路綫和过去五年来領導集团奉行的路綫之間的距离。一切反对派人士对此只能表示欢迎。但是，在向前迈出这一步以后，接着至少退后了半步。由于采取了紧急的行政措施，从粮食收购观点來說，形势已經不那么尖銳了。这时，代表官方乐观主义的机器立即重新开动起来。

中央委员会在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发表的最近一次綱領性宣言中說：

“在国内生产力普遍上升的基础上，**尽管經濟中的社会主义成**

分增长得更快，富农的抵抗也增加了。”

如果是这样，如果这种说法是真实的，那就沒有大惊小怪的余地了。那末，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安心地继续建设“一国社会主义”，不要打断行动的路綫。如果资本主义因素——特别是富农——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是在逐年下降，那末有什么理由要在富农面前如此突然地表现得“惊惶失措”呢？这个问题决定于两种互相斗争的势力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力量对比——决定于誰战胜誰。富农可以是“可怕的”，也可以是“无害的”，这完全取决于力量对比朝什么方向变化。中央委员会的宣言徒劳无益地企图在这方面为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挽救点面子。代表大会的决议是以社会主义因素在经济中日益超过资本主义因素、不断取得更大的优势的假设作为出发点的。但是，实行粮食收购制时期所不得不奉行的整个行动方针已经从实践上否定了这个错误的论点，而《真理报》二月十五日的社论肯定是对这个论点的公开驳斥。这在逻辑上怎么说得通呢？

279 如果在这三年丰收期间社会主义成份比非社会主义成份增长得更快，或许我们仍然会发生商业和工业危机，表现为国营工业生产过剩，找不到相等的农产品进行交换。但是我们发生的却是一次粮食收购危机。二月十五日的《真理报》对这次危机作了正确的解释，指出这是由于农产品积累在农民特别是富农手中而缺乏相等的工业品和它交换的结果。粮食收购危机——即结合的危机——由于三年丰收而更形严重。这个事实只能说明：在经济发展的总动力中，社会主义成份同资本主义和一般私有商品的成份比较起来已经削弱。

在一旦发现领导集团的盲目性以后，通过行政压力来纠正这种关系是绝对无法避免的。这种纠正完全不能改变根本的结论。我们这里谈的是一种已经有富农参预——即使仅仅是部分地参

預——其中的政治力量。但是，不得不从战时共产主义的武庫中寻找应急的手段来加以应用，这个事实正好证明經濟生活中的力量对比已經发生了不利的变化。

然而另外还有一种同样具有决定意义的、甚至更重要的准绳：工人階級的物质生活状况。如果国民經济真正是在增长（这是真的），如果社会主义积累真正比私人积累增加得更快（像中央委员会违背事实所宣称的那样），那末就完全无法理解为什么工人階級的状况最近已經恶化，为什么最近簽訂的集体合同变成了严重磨擦和激烈冲突的根源。当非无产階級分子的生活水平日益上升而无产階級分子的生活水平却日益下降的时候，沒有任何一个工人能够說这种社会主义因素已經超过日益增长的资本主义因素而取得“优势”。这种影响工人切身利益的实践的准绳和理論上的准绳是完全协调的，是对中央委员会那种肤浅的形式上的乐观主义的一种駁斥。

在經濟和生活本身提供的这种客观证据面前，一切通过“統計数字”证明社会主义成份的增长更为突出的企图都是荒謬的。这样做等于一支軍隊的司令官在战斗中遭受損失以后，在被迫后撤并且放弃重要陣地以后，却企图利用巧妙的統計系数来证明优势在自己这一方面。不，富农已經证明（他們的論点比为适应乐观情緒而編造的統計数字更有說服力）：在使用經濟武器的范围內，在这场重要的战斗中，优势是在富农方面。劳动妇女的家庭預算也证明了这一点。誰战胜誰的問題已經为活生生的經濟进程所解决。如果数字和这场斗争产生的无可爭辯的結果发生了矛盾，和生活本身提供的证据发生了矛盾，那末这些数字就是騙人的，最多也只能說这些数字回答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問題。

280

的确，我們早在一九二七年就不仅有对粮食收购工作进行完全可以容許的干涉的例子，而且有对統計数字进行完全不能容許

的干涉的例子。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夕，經過中央委员会書記处修飾过的統計資料几乎把富农完全“并吞”了。取得这场社会主义的胜利，只需要几天時間。

和其他一切事物一样，統計数字也受到机构独断独行的做法的損害。即使我們把这些数字迎合需要的性质撇开不談，仍然存在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統計数字，特别是我們所得到的关于最重要的过程的极为零碎的統計数字，总是落后于時間的。統計数字提供了这些过程在某一瞬間的橫断面，沒有抓住它們的发展趨勢。在这方面，我們必須求助于理論。我們对这个过程的发展趨勢作了正确的理論上的評价，事前就預計到：由于工业落后，即使丰收也是对社会主义建設不利的，也会促进农村中富农的发展和城市中排队买粮食的現象。事实发生了，提供了无可爭辯的证明。

从《真理报》二月社論所总结的粮食收购危机的教訓中，我們已經拥有带强迫性的、因此更加不可爭辯的证据，說明随着国营經濟的亏损——即无产阶级专政的經濟基础所占的比重的下降——不平衡的情况也越来越严重了。与此同时，我們所得到的证据也說明农民的分化已經达到如此深刻的程度，以至粮食收购工作的命运、即結合的命运已經处在拥有中农作为追随者的富农的直接支配之下。

如果說城乡之間的不平衡是过去遗留下来的，如果說我們目前的經濟的性质必然使資本主义势力有所增长，那末，过去一年来这种不平衡状态的加剧和力量对比所发生的有利于富农的变化就完全是领导集团奉行錯誤的階級政策造成的結果。领导集团沒有对国民收入的分配进行有系統的調节，不是完全听之任之，就是歇斯底里地收紧繩。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反对派从一九二三年以来就坚持指出，只有在有系統地逐年克服不平衡状态的基础上采取坚定的有計劃的

方針，我們才有可能使國營工業對農村發揮真正的領導作用；相反地，工業的落后必然會加深國內階級矛盾，降低無產階級專政在經濟上達到的頂峰的比重。

因此，同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企圖採取的做法不同，我們並不把富農當作孤立的現象，而是以國營工業和整個農村經濟的私有商品形式之間具有決定意義的關係作為基礎來看待富農問題。在農村經濟的範圍內，我們也不是把富農看成孤立的現象，而是把他們和他們對比較富裕的中農的影響以及對整個農村的影響聯繫起來看。最後，我們不是孤立地看待國內這兩種帶根本性的發展，而是把它們同通過進出口貿易而對我國經濟發展速度日益具有決定性影響的世界市場聯繫起來看。

282

以這一切作為我們的出發點，我們在提交給第十五次代表大會的提綱中寫道：

“既然我們主要是從農村富裕階層那里取得出口貿易所需的糧食和剩餘原料，既然現在極力囤積糧食的正是這些階層，結果就出現了這樣的情況：我們受到了主要是富農和富裕農民通過對外貿易實行的‘節制’。”

但是，可能有人提出異議，認為反對派提出問題的時機“尚不成熟”，因為領導集團已經規定在將來某個時期討論這些問題。有了前面所講的一切，現在幾乎完全不需要討論這種荒謬的斯大林主義的論點——每次出現需要亡羊補牢的情況，他們就向黨提出這種論點。讓我們僅僅提供一件很有說明性的證據。一九二八年三月九日，李可夫在莫斯科蘇維埃的一次會議上就糧食收購問題說了下面這樣一段話：

“這次運動無疑具有突擊工作的一切鮮明的特徵。倘若有人問我：採取比較正常的方式，也就是說，不採取這種突擊運動的方式來克服糧食收購危機是否更好些，那末我就會老老實實地回答

說：是更好些。我們必須認識到，我們已經失去時間，在糧食收購困難開始的時候我們還在睡大覺，我們沒有及時採取為勝利地展開糧食收購運動所必需的一系列措施。”^①

283

如果說這些話是從行政角度來認識這種遲誤，那末從政治角度來加以補充是並不困難的。為了及時實行必不可少的行政措施，就應當及時給黨——國家機構的鼓舞者和指導者——提供有關總的方針的至少是粗略的資料，就像二月十五日的《真理報》社論提供的資料那樣。因此，這種遲誤並不屬於行政的性質，而是屬於黨和政治的性質。反對派提出的原則性的警告本來應當及時認真地予以傾聽，我們建議的實際措施本來應當得到嚴肅的討論的。

反對派去年提出了包括下列內容的建議，要求從百分之十的即最富裕的農民生產單位取得相當於一億五千萬到兩億普特糧食的強制性貸款。當時這個建議受到了嚴厲的攻擊，被認為是一種戰時共產主義的措施。他們教訓黨，認為對富農施加壓力不可能不傷害中農（斯大林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或者說富農並不代表任何危險，因為——你們瞧——他們大概已經被約束在無產階級專政範圍以內了（布哈林）。但是今年就不得不求助於第一百零七條（即強制收購糧食的措施）。^②在這樣做以後，中央委員會就不得不進行解釋，認為關於戰時共產主義的談論是反革命的毀謗，雖然在這樣做的前夕它還把反對派提出的更謹慎、更有系統的建議說成是戰時共產主義。

只要不指白為黑、指鹿為馬，那末正確的观点就應當是使我們有可能理解目前正在發生的事情並且對將來作出預見的观点。反

① 《真理報》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一日。

② 即蘇聯刑法第一百零七條關於在富農和投機者拒絕按固定價格出賣剩餘糧食，得根據法庭判決沒收其全部余糧的辦法。參見《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第十章第三節。——譯者注

对派的观点是符合这个定义的，然而官方統治集团的观点从来不符合这个定义。归根結蒂，事实比最高級的机构还要高出一头。在去年冬天开展了粮食收购运动以后，在这次运动給官方的政策和思想意識带来尖銳的危机以后，今天只有特权階級歇斯底里症发作的人才会要求反对派承认自己的“錯誤”。这种情况还从来没有給任何人带来任何好的結果。

这里的問題并不是誰正确的問題。这个問題只有和什么路綫正确的問題联系起来看才有意义。在領導集团已經开始出现轉变的迹象以后，在最后这个問題上含糊其詞就是对党犯下最可鄙、最丑恶的罪行。党还没有机会查明情况。一切措施、爭論和步驟是否真正有价值，完全取决于党是否澄清了自己的态度。到現在为止还没有贏得原則性的陣地。未来尙未得到保证。每前进一步，接着就退后半步。

七 是机动手段还是新方針?

对目前这种向左轉的变化应当如何估价呢？我們应当把它看成是一种同謀制定的机动手段，还是看成一种严肃的新方針、即恢复无产階級路綫和国际政策的方針呢？怀疑是完全合理的。

仅仅通过一个決議来分散党的注意力——这已經变成目前領導集团使用的根本方法。在工业化問題、貧农問題以及中国革命問題上，他們通过了一个接一个的决定，其目的不是为了澄清事实、說明情况和进行領導，而且刚刚相反，是为了弄虛作假，掩飾实际已經发生的事情。列宁說过，在政治中，只有白痴才相信空話。即使是白痴，列宁死后的这个时期必然也教会他們如何克服这种易受欺騙的毛病。

这究竟是机动手段还是新方針的問題是一个涉及階級相互关

285 系及其在苏联共产党内的反映的问题。作为我国唯一的政党，苏联共产党通过党内各个集团而对不同阶级的压力作出不同的反应。

前面引用的《真理报》二月十五日的“历史性”的社论，在这个问题上，也就是说，在新的阶级集团在我們党内得到反映的问题上，作了值得注意的承认。这一点或许是这篇社论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段。它是这样说的：

“在我們的組織中，無論是党的組織还是其他組織，最近都出現了某些党内异己分子。他們看不見农村中的阶级，不了解我們的阶级政策的基础，企图按照这样一种方式进行工作：不触犯农村中的任何人，和富农和平相处，总的說来是要在农村的‘一切阶层’中保持声望。”

虽然这里指的是党员，但是上面这段话为属于特米多尔反动性质的、讲求实际的新资产阶级政客勾出了一幅几乎唯妙唯肖的画像，和共产党人的形象成为对比。然而，《真理报》完全没有解释这些分子是如何钻到党内来的。他們“出現了”——如此而已！他們从何而来呢？是通过什么門路进来的呢？他們是从党外渗透进来的嗎？他們是怎样钻进来的呢？他們是从内部萌生出来的嗎？从什么土壤中萌生出来的呢？并且，請注意，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党沿着它在农民問題上采取的路綫不断“布尔什維克化”的条件下发生的。社论并没有接下去说明：为什么党居然可以不顾一再提出的警告，直到烏斯特里雅洛夫主义者和特米多尔反动分子已經在粮食收购政策上显露出自己的行政权力的时候仍然加以忽視；为什么直到富农已經取得权威、使中农跟着他們走、并且已經在破坏粮食收购工作的时候，党还允許自己对他們視而不見。《真理报》对这一切完全未予解释。何必伤脑筋！一九二八年二月，我們才第一次听见中央机关报談到我們早已知道而且不止一次指出过的事实，也就是说，在列宁的党内不仅“出現了”而且已經形成一个强大的右翼，要

⑤

玉

求实行一种新的新經濟政策，即逐步走向資本主义的政策。

我在一九二七年接近年底的时候，曾經就这个问题写道：

“官方反对反对派的斗争是在两个基本口号下进行的：反对两个政党和反对‘托洛茨基主义’。斯大林为反对两个政党而进行的虛假的斗争，掩飾了国内出現双重权力和在苏联共产党的旗帜掩护下在苏联共产党的右翼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事实。在一系列办公室和書記的密室里，党的机构的扈从們正在和专家們，烏斯特里雅洛夫主义的教授們举行秘密會議，精心策划对反对派进行斗争的方法和口号。这才是真正形成了第二个政党。这个党拼命想使我們党的无产阶级核心俯首听命于它，并且得到了部分的成功；它还力图鏟除我們党的左翼。机构一方面掩飾这个第二党的形成，另一方面又指責反对派力图建立第二党——正因为反对派力图使党的无产阶级核心摆脱日益增长的资产阶级影响和压力，不这样做就绝对不可能挽救布尔什維克党的团结。如果认为只要使用蛊惑人心的詞句，大談党的不可分割性就可以维护无产阶级专政，那就是彻头彻尾的幻想。究竟是一个党还是两个党的問題（按照唯物主义的、阶级的意义来看，而不是按照文字上的鼓动的意义来看），正取决于党内和无产阶级内部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喚醒和动員进行抵抗的力量。”^①

六月間，斯大林曾經就第二党的問題对莫斯科最高学府的学生作过下述的解释：

“有些人认为出路在于恢复富农經濟，在于发展和扩大富农經濟。这些人不敢說要恢复地主經濟，他們大概知道，現在說这样的话是有危险的。可是，唯其如此，他們也就更乐意說必須大力发展富农經濟，以利于……苏維埃政权。这些人以为苏維埃政权可以

^① 托洛茨基：《論新阶段》。

同时依靠两个对立的阶级，既依靠以剥削工人阶级为经济原则的富农阶级，又依靠以消灭一切剥削为经济原则的工人阶级。这真是反动派才玩得出的把戏。用不着证明，这种反动的‘计划’和工人阶级的利益，和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列宁主义的任务，是毫无共同之处的。”^①

这番话不过是对《反对派政纲》第一章绪言一部分内容的比较简单的阐述。我们并不隐蔽这一点只是由于，照我们看来，斯大林目前并没有因此遭到放逐的危险。诚然，斯大林在讲话中并没有公开提到形成第二党的问题。但是，如果无产阶级党内有些“人”（什么人？）正在走富农资本主义经济路线，如果他们仅仅出于谨慎才不谈大规模地主经济；如果这些没有透露地址的“人”通过这个政纲而互相勾结起来，在粮食收购期间，在制定工业计划、工资标准等等期间以这个政纲作为指导，那末这些人正是新资产阶级政党即特米多尔党的干部。身在布尔什维克党内而不走蒋介石、柏塞尔、富农以及官僚主义者的路线是可能的；应当说，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成为布尔什维克党员。但是身在布尔什维克党内而又奉行发展资本主义的路线则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我们在《论新阶段》这份文件中表达的简单的思想。

由此可知，由于尚不清楚的原因而“出现”的右翼在粮食收购期间第一次受到官方的注意。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再次证明了百分之百的磐石般的团结。然而代表大会开过以后，第二天就发现富农之所以不为市场提供粮食，除了其他原因以外，是由于党内有势力的集团希望按照蒋介石的御用哲学家戴季陶的指示，和一切阶级和平相处。无论是在所谓争论的时期还是在代表大会上，这些内部的国民党分子都没有发表意见。这些勇敢的“党员”当然是首

^① 《在粮食战线上》，《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76页。——译者注

先投票贊成把反对派当作“社会民主主义”倾向分子开除出党的。他們也投票贊成一切左的決議，因為他們早就知道決議是不起作用的。黨內的特米多尔分子不是空談家，而是行动家。他們和新的产业主、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以及官僚集团結成了特殊的联盟；他們从“民族国家”的立場出发指导着最重要的經濟部門和文化部門，甚至指导党的活动。但是，是否能够认为右翼分子十分軟弱，不需要對他們进行斗争呢？

明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对目前向左轉的整个趋势的命运都具有决定性意义。初看起来，右翼似乎极其軟弱。只要上面大吼一声就足以使粮食收购工作和——部分地說——整个对待农民的政策都立刻轉上“左”的軌道。但是，結果来得异乎寻常的輕松，这个事实正应当成为一种警告，要求在有关右翼軟弱性的問題上不要过分仓猝地做出結論。

289

右翼是属于小資產階級、机会主义、官僚主义、孟什維克和調和主义性质的一翼，是拖着人往資產階級方向走的一翼。在一个拥有布尔什維主义的革命干部和几十万工人的政党里，如果右翼居然能在短短几年內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公开按照自己的倾向办事，动員工人階級群众，这将是一种絕對不可想象的現象。当然，这种情况并不存在。作为非无產階級向工人階級施加压力的一种传导工具，右翼是强大的。这意味着党的右翼的力量存在于党外，存在于党的范围以外。它是官僚机构的力量，新业主的力量，世界資產階級的力量，因此是一种巨大的力量。但是，正因为右翼是其他階級的压力在黨內的反映，它目前还没有能力公开提出自己的政綱，动員党的輿論。它需要一种掩护；它必須麻痹党的无產階級核心，使他們丧失警惕。机构的統治使它的两种需要都得到了滿足。机构大談党的磐石般的团结，这就是在革命工人面前为右翼打掩护。同时，它又用打击反对派的方式恐吓工人，而

反对派不过是无产阶级对本阶级专政的命运感到担心的有意识的表现。

机构和右翼之间存在的裂痕使右翼不得不缩短战线，边打边退，暂时观望一下，伺机再起。右翼分子很懂得：如果机构认真邀请党来分析局势，实行清党，铲除特米多尔分子，普通党员就会把右翼彻底清除出去，根本不需要求助于破坏者和暴徒。这样一来，
290 党内就不再存在国内资产阶级和全世界资产阶级可以依靠的杠杆了。资产阶级的进攻肯定不会骤然消失，甚至也不会减少。但是它将不得不直接出面来反对党。这样，党就会面对面地看清敌人，从而可以冷静地估计敌人的力量和意图。资产阶级也就不可能采取秘密的、地下的方式，通过对党和苏维埃政权的渗透而施加压力了。这种情况本身就等于取得了一半的胜利。

右派了解他们现在的处境。但是他们也考虑到另一事实：要求党对自己的思想和队伍进行认真的清洗是办不到的；由于采取的口号和追求的目标都不同于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反对派）至今一直主张的口号和目标，这些思想在最近几年来已经更加顽固得多了。如果要清洗，就必须剧烈地改变对待反对派的整个态度；否则中派主义机构毫无原则的丑态就会暴露无遗。右翼相信中派不敢大胆地改变立场。他们这样想是很有理由的。他们咬牙切齿地实行撤退，从而表明他们根本不願意进行一场对他们自己和对中派都同样危险的斗争。与此同时，他们对中派提出了要求：不要改变党内的现状，也就是说，不要破坏右派和中派结成的反对左派的联盟；向左边倒的程度不要超过为目前这种紧急关头所绝对必须的程度；换句话说，要保持回头走老路并进而实行新的新经济政策的可能性。

右派懂得，他们目前必须尽可能地对向左转的趋势采取忍气
291 吞声的态度。无论如何，对他们来说，这只是一种机动手段。他们

保持沉默，进行准备。他們期望左派进行的試驗將由于外来的階級反应、內部的磨擦、官僚机构的暗中抗拒、特别是中派主义天生的左右搖摆的傾向而以失敗告終。右翼很熟悉他們的同盟者。在此期間，他們还极力損坏中派的名譽，向各方面表明中派並沒有任何創造性，从一开始就只知道拾反对派的牙慧。

就中派來說，为了避免处于难堪的境地，他們繼續把反对派投入監獄。右派知道，机构給左派的打击越多，它对右派的依賴性也就越大。他們打算在左派的試驗以失敗告終时从防禦轉入进攻，实行报复（在目前的情况下，右派是坚决相信这一点的）。会发生这种情况嗎？根本不能排除最后終于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只要轉变以党内保持現狀为基础，就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况。不仅可能发生，而且很可能发生，甚至必然会发生。

这是否意味着目前这种搖摆沒有发展成为左派路綫的可能性呢？讓我們坦率地說：既然这个問題取决于領導的預見性和一致性，不仅領導集团过去几年来奉行的政策，而且它目前的行为都使我們不得不对上述問題作出表示怀疑的答复。但是，中心問題正在于，开始时的机动手段已經发展成为一种深刻的政治上的搖摆，使党内越来越多的人以及越来越广泛的阶层都深深卷入其中。后面这些人对机动手段的运用，对領導集团为艺术而艺术地玩弄的領導艺术并不感兴趣；他們对轉变所带来的客观的經濟政治后果倒是感兴趣的。这方面情况的发展已經达到这样一种地步：开始实行这种轉变的人的善意，他們的一貫性，总的說来是他們的意图，由于广泛得多的人的意志和利益的作用而发生了严重的变化。因此，否认目前这种搖摆有发展成为坚定的无产階級路綫的可能性是不正确的。

292

無論如何，反对派由于自己的观点和傾向，必須尽力使目前这种搖摆发展下去，真正轉上列宁主义的道路。这样一种結果将是

最健康的，也就是說，將使黨和專政只遭到最低限度的震動。這將是給黨帶來深刻改革的道路——也就是改革蘇維埃國家的必不可少的前提。

八 目前危机的社会基础

黨內鬥爭的殺伐之聲僅僅是遠為深刻的動亂的一種回音。各個階級內部日積月累的变化如果不及時在布爾什維主義的語言中得到表現，就會使整個十月革命面臨痛苦的危機。

第十五次代表大會閉幕幾乎還不到兩個月，領導集團就迫不及待地與代表大會期間還認為正確的方針斷絕了關係。這種匆忙本身是一種明確無誤的徵兆，說明和整個國際形勢相聯系的國內階級变化的過程已經達到一個危急的階段，即從經濟上的量變化為政治上的質變的階段。這種情況是事前估計到的，從一九二三年以來已經多次加以闡述。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期間，反對派在提綱中以下列方式表達了這個意見：

293 “在一個小農以至極小農和一般小業主占絕大多數的國家里，最重要的事件在一定時期以內是以極為分散和隱蔽的方式進行的，後來卻以‘出乎意料’的方式突然爆發出來。”

很明顯，僅僅對那些不善于在事態尚處於開始發展的階段就對發展過程作出馬克思主義的估計的人來說是“出乎意料”的。

富農率領中農進行的拒售糧食運動；沙赫特礦區專家和資本家的勾結；國家機構和黨的機構中有勢力的集團為富農罷工提供的保護和半保護；共產黨人對技術人員和職員暗中進行的反革命活動居然能夠視而不見；斯摩棱斯克及其他地方的惡棍在“鐵的紀律”的幌子下所犯的肆無忌憚的罪行——所有這一切都已經是極為重要的無可爭議的事實。沒有任何思想健全的共產黨人胆敢說

这都是偶然现象，说它们是沒有代表性的，说它们并不是过去五年来的经济政治发展和党的领导集团的政策造成的。这些事实是可以而且应当预见到的。反对派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提綱——这是誰都可以拿到的——說：

“富农、业主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仅同国家的而且还同党的官僚制度的許多环节相结合，乃是我們社会生活中最无疑問、因而也是最令人担心的过程。从这里正在产生使无产阶级专政受到威胁的两个政权并存局面的萌芽。”

中央委员会在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发表的宣言或通告承认在国家机构內，在党和工会內部，存在着“最恶劣的官僚主义”。这份通告企图把官僚主义解释为：（1）过去遗留下来的官僚主义的残余；（2）是群众落后和愚昧的产物；（3）是由于他们“缺乏行政管理知識”；（4）是由于沒有足够迅速地吸收群众参加国家的管理。上述四种情况的确是存在的，而且都以某种方式說明了存在官僚主义的原因。但是，它们都不能說明官僚主义会这样疯狂地、肆无忌惮地得到发展。过去五年来，群众的文化水平应当是提高了。党的机构应当已經学会更迅速地吸引群众来参加管理工作。新一代在苏維埃环境中培养起来的人应当已經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旧职员的工作。既然如此，官僚主义就应当减少。但是，关键問題正在于官僚主义已經大大增加，已經成为“最恶劣的官僚主义”；它已經使自上而下通过命令实行镇压等行政手段、恫吓、通过经济手段进行压制、徇私舞弊、干部的互相串通勾結、諂上欺下等等成为一种制度。尽管苏維埃经济已經发展了，群众的文化水平提高了，而旧的阶级机构的这些傾向却异常迅速地重新抬头了。这个事实有它的阶级根源，也就是說，是由于业主的社会地位巩固了，是由于他们和国家机构有了紧密的联系，并且通过这个机构对党施加了压力。如果不理解政权日益官僚化的阶级根源，反对这种罪恶的

斗争常常就像一座只会空转而不能磨粮食的风车。

295 工业发展的迟缓已经在价格上造成令人不能容忍的“剪刀差”。官僚主义者为了降低价格而进行的斗争仅仅扰乱了市场，剥夺了工人而并未给农民带来任何好处。农民从十月革命以后完成的土地革命中获得的大量利益正在遭受工业品价格的吞噬。这种情况损害了联盟，把农村中广大阶层驱赶到大喊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自由化口号的富农那边去。在这种情况下，国内的商人找到了便于发展的土壤和掩护，国外的资产阶级也获得了一个基地。

不言而喻，无产阶级是抱着极大的希望走向革命的；在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中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幻想。因此，在发展速度迟缓、物质生活水平极低的情况下，对苏维埃政权在较短时期内深刻改变整个社会制度的能力所抱的期望必然会减少。

世界革命的失败，特别是过去几年来共产国际已经掌握领导权以后所遭受的失败，也造成了同样的趋势。这些失败不可能不给工人阶级对待世界革命的态度带来新的调子：在期望方面表现很大的保留；意气消沉的分子中间会产生怀疑；而在尚不成熟的人中间则会表现露骨的猜疑甚至激怒。

296 这些新的思想和新的估价会设法表现出来。如果表现在党内，最先进的阶层或许会对国际革命、特别是本国的革命采取不同的态度；他们的态度可能不像从前那样天真，那样得意洋洋，而是比较带批判性，然而另一方面，会比从前更为平衡，更为稳健。但是，这些新的思想、判断、愿望和忧虑都受到压制，不能表达出来。无产阶级五年来生活在这样一个老的、著名的口号下面：“不要思想！领导比你更有头脑。”这种情况起初激起了愤怒，后来造成了消极被动情绪，最后则迫使人们蜷缩到政治外壳里过着限制重重的生活。四面八方的人都告诉工人说、直到工人自己最后也这么说：“要知道，现在不是一九一八年。”

不仅通过国家机构或工会，而且通过日常的经济生活和每天的生活状况，都可以感觉到无产阶级所占的比重下降了。和无产阶级敌对或半敌对的阶级和集团考虑到了这种情况。因此，小资产阶级和日益增强的中等资产阶级中间那些在政治上活跃的阶层表现的自信心增加了。后者已经恢复了他们和整个“机构”之间的友谊，重新建立了亲密的家庭纽带，坚决相信他们的日子正在到来。

苏联国际地位的恶化，世界资本主义在最老练、最疯狂的英国资产阶级的率领下施加的敌对的压力越来越大——所有这一切使国内资产阶级里面最顽固的分子得以重新抬头。

这就是造成十月革命危机的最重要的因素。这场危机在富农最近举行的拒售粮食运动中和官僚主义者身上得到了部分的表现。党内危机是这种危机的最普遍、最危险的一种反映。

因此，不言而喻，现在尚不可能预测，至少是不能遥遥地预测，目前尚处于半隐蔽状态的走向双重权力的过程将在什么时候、以什么形式公开表现到政治领域里来。这主要决定于国际形势，而不仅决定于国内的政策。有一点是清楚的：革命的路线并不是观望等待、东猜西想，一直等到不断增加的敌人抓住有利机会发动攻势；革命的路线要求我们自己在敌人——正如德国俗话所说——大大抬头以前就发动攻势。已经失去的年代是回不来了的。中央委员会对于主要是由于它自己的政策而造成的险恶的形势终于发出了警报。这是一件好事。但是，仅仅发出警报和一般性的呼吁是不够的。甚至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以前，当领导集团还把对富农施加压力的口号纯粹当作文字游戏的时候，反对派就在自己的提纲中写道：

“压制富农和耐普曼的口号……如果认真对待的话，就要求改变整个政策，使所有国家机关奉行新的方针。必须确切而清楚地说明这一点。要知道，无论是富农还是贫农都没有忘记，中央委员

会在两年当中(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和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之間)所坚持的完全是另一种政策。十分明显,提綱的作者們所以閉口不談自己过去的方針,是以为改变政策似乎只要发布新的‘命令’就够了。可是,要想在事实上而不是在口头上实现新的口号,不克服一些階級的激烈反抗和动員另一些階級的力量是不行的。”

298 即使在目前,这些话仍然具有充分的力量。过去使党从列宁主义的道路轉上右派和中派主义的道路并不是不費吹灰之力就办到的。为了在布尔什維克党内建立一个有势力的、不“承认”階級的集团并且使这个集团得到巩固;为了使党不正式注意这个集团的存在并且使领导集团可以多年否认它的存在;为了使这个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没有揭露出来的集团**不是通过党、而是通过……粮食交易所**而正式表现出来——为了这一切就进行了五年的支持新方針的不断宣传,此外还加上斯大林主义者和布哈林主义者贩卖的关于富农长入社会主义和嘲弄饥民寄生心理的成千上万私貨;加上对統計机构的宰割(仅仅因为它们注意到了富农的存在);加上沒有头脑的干部的全面告捷;加上新的“讲坛社会主义者”、馬克思主义詭辯学家宣传学派的形成等等其他許多事情。但是,最重要的是,为了这一切而对无产阶级左翼进行了恶毒的、不顾后果的、粗暴的、背叛性的、专橫的迫害。与此同时,党内一切特米多尔分子已經形成并得到了巩固(用《真理报》意味深长的話来說是“出現了”),为自己建立了各种联系、紐带,取得了各方面的同情,把他們的根远远伸到党外,深深伸进广大的階級土壤中去。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小小一紙通告——无论这份通告写得多么簡短有力——所能消灭的。必須进行再教育。必須进行修正。必須重新排队。必須用馬克思主义的深犁来耕种这片荒草丛生的田地。

企图用反对派軟弱无力的想法来麻痹自己和麻痹党,这和針

对反对派进行的凶猛的斗争是无法调和的。反对派拥有曾经受过事件进程考验的行动纲领以及曾经在迫害的烈火中受过锻炼的、对党的忠诚毫不动摇的干部。这种干部代表着日益上升的历史路线，他们是推不倒、打不乱的。反对派是党的宝剑上的钢刃。破坏了这道钢刃，用来反对敌人的宝剑就钝而无用了。反对派的问题是整個左派路线的枢纽。

只有在世界革命胜利地发展的时候，才能真正地、彻底地解除外部和内部的危机。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是最起码的常识。但是这种看法和布哈林主义的经院哲学给我们描绘得娓娓动听的绝望的宿命论之间存在着一道无法填补的鸿沟。危机是各种各样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本性决定它是无法摆脱危机的。这决不是说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政策无足轻重。正确的政策可以促进资产阶级国家的发展，错误的政策则使它们遭到毁灭或阻碍。

299

官方的经院哲学完全不能理解在机械决定论(宿命论)和主观自我意志之间还存在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宿命论认为：“面临如此落后的状况，什么也办不成。”庸俗的主观主义认为：“这有何难！我们有决心，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如果你意识到自己对世界局势和国内落后状况的依赖，那末，如果采取正确的政策，你就可以爬起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使自己进入胜利的世界革命。”

在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坚定而巩固地夺得政权以前，过渡性的苏维埃政权发生危机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统治政策的任务就是要防止苏维埃政权内部危机的积累，使它不至发展成为整个政权的危机。要做到这一点，首要条件是维护、发展和加强作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的地位和自觉。而一个能够独立行动的、灵活而积极的无产阶级政党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唯一的工具。

九 党的危机

一种正确的经济政策,和一般政策一样,不能仅仅依靠从一九二三年以来就没有得到公认的一种正确的表述来保证。无产阶级专政的政策只有在不断探明一切社会阶层的情况的基础才可以想象。不仅如此,这种探索不能依靠行动迟缓、缺陷重重、态度僵硬而感觉迟钝的官僚机构作为媒介来完成,而必须通过充满活力、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政党,通过共产主义的侦察兵、开拓者和社会主义建设者来实现。在富农的作用日益增长的情况能够通过统计数字予以表现以前,在这种情况下为理论家概括总结并为政治家化为指示以前,党必须善于通过自己的无数触角**感觉出来**,发出警报。但是要**300**做到这一切,整个党就必须感觉敏锐,行动灵活,首先必须敢于观察、敢于认识、敢于说出自己的意见。

由于各个托拉斯和工厂之间的竞争,由于劳动群众所处的沉重的物质地位,由于劳苦人民中占重要地位的阶层的文化水平不够,我国国营工业是极为分散的。国营工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工业的社会性质,在决定性程度上取决于党的作用,取决于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自觉自愿的内部团结,取决于行政管理人员、工会干部、车间核心成员等等有意识地服从纪律,并且通过这一切来加以保证。如果我们承认这个系统正在削弱、崩溃和瓦解,那末任何人都可以不言而喻,国营工业、运输业等等的社会主义性质很快就会荡然无存了。托拉斯和各个工厂就会开始自行其是。目前已经如此薄弱的有计划的开端就会连影子也找不到了。工人的经济斗争将会达到除力量对比以外就毫无约束的程度。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开始将变成法律上的一纸空文,以后连这种法律上的存在也会被一扫而光。由此可知,在这里,问题也归结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必须有意

識地保持團結，必須保護無產階級先鋒隊，使它不受官僚主義的侵蝕和烏斯特里雅洛夫主義的毒害。

作為一種制度來說，一種正確的政治路線是完全無法想象的，如果黨內缺乏制定和執行這一路線的方法的話。在這個或那個問題上，由於某種推動力的影響，官僚主義的領導可能胡亂碰上一條正確的路線。但是絕對沒有任何東西可以保證實際上繼續執行這條路線而不會在明天再次予以拋棄。

在黨實行專政的條件下，領導集團手里集中了人類有史以來任何政治組織也不會單獨掌握過的空前巨大的權力。在這種情況下，保持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的領導方法是極為必要的——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為必要。官僚主義的每一種歪曲，每走錯一步，都會立即在整個工人階級當中引起反響。在此期間，在列寧去世以後，領導集團已經逐漸習慣於把無產階級專政對資產階級假民主的敵視，擴大為對自覺的無產階級民主的重要保證措施的敵視，然而黨要在無產階級民主的基礎上才能繁榮發展，並且只有通過無產階級民主才有可能領導工人階級和工人國家。

這是列寧在生命最後階段最關注的問題之一。他曾經充分考慮過它的歷史意義以及它在日常生活中的具體表現。列寧在第一次生病以後回來工作時，對官僚主義特別是黨內官僚主義的滋長大為震驚。因此他才建議成立中央監察委員會——當然，不是現在存在的、和列寧設想完全相反的這種中央監察委員會。列寧曾經提醒過黨：在歷史上，征服者蛻化變質、接受被征服者的道德原則的例子並不罕見。每當他聽到有故意冤枉好人或掌握權力的共產黨人粗暴對待下級的消息（奧爾忠尼啟澤打人事件）^①，他都會

^① 據英譯本注：據說奧爾忠尼啟澤曾經在一次進行激烈爭論的大會上打過一個反對他的年輕的格魯吉亞人的耳光，列寧曾因此建議立即把他開除出黨。——譯者注

感到怒火中烧。他曾經針對斯大林的**粗暴**、針對內在品德上的**殘忍**对党提出过警告。这种殘忍和不忠誠是血緣姊妹，一旦掌握全部权力就会成为毀灭党的可怕工具。也正是为了这个原因，列宁才热烈呼吁，要求注意文化和文化的发展——不是指布哈林現在玩弄的廉价的小玩意，而是要求共产党人进行斗争，反对亞細亞式的道德原則，反对封建主义和粗俗习气的遺迹，反对干部利用群众的天真无知。

同时，在过去五年期間，党的机构却奉行着刚好相反的方針；它已經彻头彻尾地沾染了国家机构的官僚主义殘疾，更加上資產階級議會“民主”苦心孤詣地造成的特殊歪曲——欺騙、蒙蔽、两面三刀。結果就形成了这样一个領導集团，这个集团不是有意識地实行党的民主，而是：为了加强党的官僚制度而伪造和窜改列宁主义；在对待共产党人和工人方面极端地、令人不能容忍地濫用权力；通过欺騙手段操纵党的整个选举机构；在討論过程中使用一个資產階級法西斯政权可能引以为荣的、然而决不是一个无产階級政党能够加以吹嘘的手段（挑选出来的打手，按照命令吹口哨，擲掄喧鬧，把发言者推下讲台，以及其他类似的令人厌恶的行为）；最后一点然而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在机构和党的关系上完全缺乏同志間的团结和真誠。

党的报刊已經在聳人听聞的揭露的幌子下公布了阿尔乔莫夫斯克、斯摩梭斯克和其他案件。中央委员会发出了对腐化进行斗争的呼吁。問題到此似乎就算了結了，事实上是尚未开始。

首先，党内广大人士不能不感觉到，已經公布的只是一小部分——并没有談正在发生的总的情况，只是談已經暴露的情况。几乎每一个省在不同程度上都有自己的“斯摩梭斯克”事件，而且不是今天才有，甚至不是今年才有的。早在“自我批評”时代以前，赤塔、赫尔松斯克、弗拉基米尔斯克和其他許多地方都爆发了这种

事件，只是立刻就被扑灭下去了；百分之百的区委书记都被揭露出来，他們曾經偷偷地在沒有任何監督的情況下浪費大筆資財來維持自己家庭的僕从。每当这种事件暴露出来，都有无可爭辯的證據表明成百的人、有时甚至上千的人，上千的黨員对这些罪行了若指掌，但是都絕口不談。他們保持沉默的時間常常长达一年、两年，甚至三年。甚至報紙也提到过这种状况。但是，沒有得出任何結論。因为要是这样做，就有必要完全重复反对派文件曾經非常謹慎溫和地說过的那些話。不得出必要的結論，斯摩棱斯克和其他事件的暴露仍然只是聳人听闻的新聞。它們使党感到激动，並沒有起教育作用，倒是分散了党的注意力。

問題的關鍵在于：机构越脫离党的控制而独立，依靠机构为命的人互相之間的依賴性也就越大。相互保險并不是地方性的“瑣事”，而是官僚統治的根本特点。机构的某些扈从尽情干坏事，其他的人則保持沉默。黨員群众呢？黨員群众都吓怕了。真的，在曾經实现十月革命的列宁的党里，工人黨員却害怕大声說出机构的某个百分之百的扈从是一个流氓，一个侵吞公款者，一个恶霸。这是“斯摩棱斯克”事件揭露出来以后提供的根本教訓。受到这种教訓而不感到羞愧，就不是一个革命者。

从社会意义上說，阿尔乔莫夫斯克、斯摩棱斯克等等事件的主角是誰呢？他是一个已經摆脱党的积极控制、已經不成其为无产阶级专政旗手的官僚主义者。他在思想上已經枯竭，在道德上則放蕩不羈。他是一个享受特权、不負責任的干部，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个极为粗野的人，一个酒囊飯袋，一个恶霸。一言以蔽之，是一个杰席莫尔达^①（見列宁論民族問題的信件。这封信沒有向党公布）。但是我們的主角有他自己的“特色”：当他对人拳足交加、

① 杰席莫尔达是果戈里名著《欽差大臣》中一个爱打人的警士。——譯者注

浪費国家資源或者是接受賄賂的时候，苏維埃的杰席莫尔达不是凭着“上帝的意志”而是以“社会主义建設”的名义发誓賭咒。当下面有任何人企图指摘他的时候，他不是像过去那样大叫“造反啦！”而是狂呼：“托派分子！”——于是就胜利了。

五月十六日的《真理报》刊登了中央監察委员会一个领导人写的文章。文章从斯摩棱斯克事件中总结出下列教訓：

“我們必須毅然决然地改变我們对待那些明明知道弊病存在然而噤若寒蝉的黨員和具有階級覺悟的工人的态度。”

“改变我們的态度？”那末，对待这个問題还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态度嗎？**是的。中央監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工农監察代理人民委員雅科夫列夫承认这一点。对于犯罪行为知情不报的人本身也应当被当作罪犯。唯一可以減輕他們的罪过的情况是他們本人愚昧无知或者是被恐怖鎮懾住了。然而雅科夫列夫指的不是愚昧无知的人，而是“黨員和具有階級覺悟的工人”。究竟是什么样的压力和恐怖，居然能够迫使工人黨員对于按理是由他們自己选举出来、并且對他們負責的个人所犯的罪行保持可耻的沉默呢？难道真是无产階級专政的恐怖？不可能，因为这种恐怖是反对党、反对无产階級的利益的。那末，这是否是說：这种压力和恐怖来自其他的階級？显然是这样的，因为超階級的社会压力是不存在的。我們已經明确指出我們党所受的压迫的階級性在于：党的机构的扈从們狼狽为奸；党的机构有許多环节已經同国家官僚机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小資產階級以及农村里的富农成为一体；世界資產階級对国内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施加的压力——这一切凑起来就产生了通过党的机构对党施加压力的社会两个政权的基本因素。这种社会压力几年来已經有所增加；机构正是利用这种压力来威胁党的无产階級核心，迫害反对派，并且通过組織手段从肉体上消灭反对派。这个过程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在一定限度內，外來階級壓力提高了機構的地位，使它站在黨的頭上，加強了它，並且使它具有信心。機構根本不考慮它自己的“權力”來自何處。它沾沾自喜地把它對黨、對列寧主義取得的勝利歸功於自己的聰明機智。但是由於沒有遇到抵抗而日益增加的壓力已經超過這個限度。它所威脅的已經不只是機構的統治，而是比這重要得多的東西。現在已經開始感到尾大不掉之苦。

使絕大多數黨員和有階級覺悟的工人不敢談論黨機構的扈從們所犯的罪行的局面不是偶然產生的，也不是一夜之間出現的。這種局面也不是大筆一揮就可以消滅的。擺在我們面前的不僅是機構內部強有力的官僚主義常規，而且有圍繞這個機構形成的、由各種利益和聯繫交織成的一層硬殼。而我們的領導集團在自己的機構前面是束手無策的。這裡我們看到一種類似歷史規律的東西：領導集團對黨的依賴越小，他們受機構束縛的程度就越大。所謂反對派意圖削弱集中領導的一切說法都是荒謬絕倫的。沒有鐵一般的集中制，就不能想象會有一條無產階級路線。但是，不幸的是，目前的領導恰恰只是由於自己的官僚主義力量才獲得了無限的權力。這就是說，对被人为地分成一盘散沙的黨員群眾，它是有力的，但是對它自己的機構，它却毫無辦法。

306

為了逃避他們自己的政策造成的後果，中派主義者特別強調“自我批評”這種以毒攻毒的療法。斯大林出人意料地引用馬克思的話說：“自我批評是鞏固無產階級革命的一種方法。”^①但是，在引用這句話的時候，斯大林已經接近了他不得跨越的一個界限。因為馬克思所說的自我批評實際上首先意味着無產階級必須擺脫，並且要徹底摧毀這樣一些錯誤的幻想：例如“四個階級的結合”；一國社會主義；保守的工會首領；“我們一定不要嚇壞資產階

^① 《反對把自我批評口號庸俗化》，《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111頁。這句話引自馬克思：《拿破侖第三政變記》。——譯者注

級”之类的口号；东方要建立“两个階級”的政党；以及过去这个时期斯大林和布哈林强迫人們接受的其他反动廢話。过去三年来，他們曾經使用孟什維主义的刀对中国革命任意加以宰割，直到扼杀革命为止。这才是真正应当运用馬克思主义的自我批評的手术刀的地方！

但是，直到現在为止，恰恰就禁止在这里运用这把手术刀。斯大林再次提出威胁，要“用一切力量，用一切办法”^①来反对这种批評。他不懂得，根本不存在足以阻止馬克思主义的批評在国际无产阶级先鋒队的队伍中取得胜利的力量或办法。

* * *

在一九二七年召开的一次全会上，反对派在一篇演說中指出：反对派有权利呼吁党来反对領導。莫洛托夫在回答时說：“这是造反！”斯大林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意見。他說：“要扫除这些干部，就必须发动內战。”^②这是在激烈的斗争中对統治机构的“超党派”、“超階級”、自成一体的性质所作的**最完整最坦率的表述**。这种思想和作为我們党和苏維埃制度的基础的思想完全背道而馳。**官僚主义超人的思想是产生目前这种零打碎敲的篡夺的泉源，并且在无意中为可能发生的全面篡夺准备着条件。**这种思想是在过去五年中形成的，是在永无休止的、虛伪的“重新估計”的过程中，在自上而下地加紧控制、任命人員和进行迫害的过程中，在伪造选举的过程中，在把代表大会和代表會議撤在一边一年、两年或四年……的过程中形成的，簡而言之，是在“用一切力量，用一切办法”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

① 《反对把自我批評口号庸俗化》，《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117頁。——譯者注

② 斯大林原話是：“要‘扫除’这样的多数，就必须要在党内发动內战。”見《国际形势和保卫苏联》，《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50頁。——譯者注

从最上层来说，这是日益和生活本身发生冲突的思想进行的一场殊死斗争；从基础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是争夺职务、争夺指挥权和争夺特权地位的一场疯狂的赌博。在这两种情况下，敌人只有一个，这就是反对派。提出的论点和使用的手段是一样的：“用一切力量，用一切办法。”无需多说，党的机构的大多数扈从是忠诚老实的，是能够自我牺牲的。但是，整个问题在于制度。而制度却是一种必然会产生斯摩棱斯克事件的制度。

善意的干部认为解决最伟大的历史任务的公式是：“我们必须毅然决然地改变。”党必须回答说：“并不是你们必须实行改变，而是必须毅然决然地改变你们自己，在大多数情况下——应当撤换你们。”

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二日

附 录

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

托洛茨基

“工业比較发达的国家給比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出的，只是它自己未来的形象。”^① 馬克思的这个論点，在方法論上不是以作为整体的世界經濟为出发点、而是以作为典型的一个資本主义国家为出发点得出的；由于資本主义的发展已經包括所有的国家——不管它們过去的命运和工业水平怎样——，这个論点已經不能应用了。强盛时代的英国曾經展示了法国的未来，对于德国就展示得很少，而对于俄国和印度則根本沒有展示。但是，俄国的孟什維克却无条件地接受馬克思这个有条件的論点。他們說，落后的俄国不应当冲向前去，而应当虛心仿效現成的榜样。这种“馬克思主义”，連自由派也贊成。

馬克思的另一个同样著名的論点，即“無論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們能容納的全部生产力發揮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②，則恰好相反，它不是以单独一国为出发点，而是以全世界的各种社会制度(奴隶制、中世紀和資本主义)的更替为出发点的。但是，孟什維克却从一个国家的角度来理解它，从而得出了俄国資本主义

① 沒有查到馬克思这段引文的出处。以下全部注释及引文出处都是譯者加的，不另注明。——譯者注

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三卷第9頁。

在达到欧洲或美国的水平以前仍要经历一段漫长道路的结论。不过，生产力不是在真空内发展的！你不能谈论一国资本主义潜力，而一方面忽视由一国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阶级斗争，或者另一方面忽视它对国际条件的依赖性。资产阶级被无产阶级推翻是由于现实的俄国资本主义，这就一笔勾销了俄国资本主义的抽象经济潜力。俄国的经济结构和阶级斗争性质，肯定是由各种国际条件决定的。资本主义在世界舞台上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它再也不能证明它的生产费用是合理的了（不是从商业意义上，而是从社会学意义上来理解）。关税、军国主义、危机、战争、外交会议和其他灾祸等等，正在吞噬和耗费如此巨大的创造力，以致尽管在技术方面取得许许多多的成就，人们还是无法去进一步促进经济与文化的繁荣。

为世界性制度的罪恶而遭灾的第一个牺牲者，是一个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这个似乎古怪的事实实际上是完全符合事物的规律的。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早已对这点作过解释：“猛烈的爆炸先发生于资产阶级机体的四肢，然后才及于心脏，因为在心脏处进行调节比较可能。”一个还没有积累巨额民族资本的国家，世界竞争又没有给它提供特殊优待，在帝国主义的沉重负担之下是必然要首先垮台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崩溃是全世界社会结构的一种局部瓦解。列宁说：“只有从国际的观点才能正确评价我国革命。”

总之，我们没有把十月革命归因于俄国的落后，而把它归因于综合发展的规律。历史的辩证法既不知道有赤裸裸的落后，也不知道有化学般纯粹的进步，这完全是一个具体的相互关系的问题。人类当前的历史充满了各种“古怪现象”，虽然不像在落后国家产生无产阶级专政那样古怪，可是属于同一历史典型。落后中国的学生和工人正在热烈接受唯物主义学说，而文明英国的工人领袖却相信教会的经咒魔力，这个事实无疑证明，中国在某些方面已经

超过了英国。但是，从中国工人对麦克唐納那种中世紀式愚蠢的鄙視，不能得出中国在一般发展上已經超过大不列顛的推論。英国在經濟和文化上的优越性是能用准确数字表明的，这些数字尽管生动有力，却不能排除中国工人先于英国工人取得政权的可能性。而将来中国无产阶级的专政也决不是意味着在万里长城的疆域內建設社会主义。学究式的和迂腐片面的标准或者过于近視的民族标准都不适用于我們的时代。世界的发展迫使俄国摆脱落后地位和亚洲式状态。离开这种发展的錯綜复杂的关系，俄国未来的命运是无法理解的。

历次资产阶级革命既反对封建所有制关系，又反对地方割据的局面。在资产阶级革命的解放旗帜上并排地写着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西方人早已冲破这种童鞋了。我們时代的生产力不仅突破了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形式，而且冲破了民族国家的界限。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都已成为束縛世界經濟的桎梏。无产阶级革命既反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又反对世界經濟的民族分裂状态。东方各国人民爭取独立的斗争包含在这个世界过程之中，而且必然要同这个过程汇合起来。建立一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如果这样一个目的一般能够实现的話——意味着人类經濟力量的大倒退。正因为如此，它是不能实现的。国际主义不是抽象的原則，而是經濟事实的表现。正如过去自由主义是民族的一样，社会主义是国际的。社会主义的任务是要从世界范围的分工出发，使国际間的貨物交換和互相服务得到最高限度的发展。从来沒有任何地方的一次革命完全符合革命参加者原来的想法，它也不可能做到这样。虽然如此，参加斗争的那些人的思想和目的却是革命的重要組成因素。这对十月革命來說尤其正确，因为过去革命者心目中的革命理想，从来沒有像一九一七年那样与事变的实际內容如此密切相近。

党在事变高潮怎样設想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呢？党对它抱着什

么希望呢？——一部研究十月革命的著作如果不能对这个問題作出尽可能符合历史真实的回答，就仍然是一部不成功的著作。逝去的岁月愈是被新的利益所蒙蔽，这个問題所具有的意义也就愈加伟大。各种政策总是要向过去寻找支持的，如果它們不能像获得自願贈送礼物一样得到这种支持，往往就用强力去夺取它。現在苏联的官方政策是用硬被說成是布尔什維克党的传统观点的“单独一国社会主义”論做根据的。不仅共产国际的，而且真正是所有其他党的年青的后輩們，都是用这样一种信念教育出来的：即过去成立苏維埃政权是为了要在俄国建立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历史真实与这种神話毫无共同之处。直到一九一七年，党从来没有容許过甚至这样的思想，即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能比西方先取得胜利。在四月代表會議上，在当时极为明朗的局势的压力之下，党才第一次承认自己的任务是夺取政权。这种承认虽然在布尔什維主义的历史上揭开了新的一章，但与独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前途毫无共同之处。相反的，布尔什維克把孟什維克恶意地加在他們身上的要在一个落后国家建立“农民社会主义”的思想当作一种諷刺而坚决加以駁斥。在布尔什維克看来，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是通向西方革命的桥梁。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問題，被宣布为本质上是国际性的。

这个根本問題只是在一九二四年才发生了变化。那时有人第一次宣布：不管人类的其他部分如何演变，只要帝国主义者不用武装干涉推翻苏維埃政权，在苏联国内建成社会主义就是完全可以實現的。这个新理論立即获得了回溯到既往的效力。不肖后輩們宣称，如果党在一九一七年不相信在俄国能够建立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它当时就没有权利夺取政权。共产国际在一九二六年正式譴責不接受单独一国社会主义理論的人們，而且把这种譴責扩大到从一九〇五年开始的整个过去时期。

从此以后，有三种思想被宣布为敌视布尔什维主义的思想：（一）否认苏联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之内在资本主义包围中支持下去的可能性（武装干涉问题）；（二）否认苏联用本国力量、在自己的国境之内克服城乡之间的矛盾的可能性（经济落后问题和农业问题）；（三）否认能够建立一个闭关自守的社会主义社会（世界范围的分工问题）。按照新学派的說法，即使其他国家不发生革命，用使“资产阶级中立”的办法就可以保障苏联不受侵犯。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合作必须认为是可靠的。对世界经济的依赖性已经被十月革命和苏联的经济成就消除了。拒绝接受这三个论点，就是“托洛茨基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不相容的一种学说。

在这里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恢复一种思想体系的本来面目。他必须把一个革命政党的真正的观点和目的从后来的政治垃圾堆里挖掘出来。尽管这些时期彼此相隔很短，这个任务却很像辨读在刮过的羊皮纸上重写的古书一般。^① 因为不肖后辈学派的手法决不是时时都比第七、第八世纪的僧侣为了伪造神学而毁坏用羊皮纸和草纸写成的古典著作手段高明。

一般地说，我们在这本书^②中始终避免旁征博引，但是，现在这篇文章由于任务重大，不得不向读者提供很多原文，而且要大段大段地引用，以便消除认为它们是被人为地挑选过的那种成见。我们必须让布尔什维主义用它自己的语言说话。在斯大林官僚制度的统治下，根本没有这种可能性。

布尔什维克党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是革命社会主义的政党。但是那时它一定知道自己当前的历史任务是推翻沙皇制度和建立民主制度。当时革命的主要内容是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土地问题。

① 在西方，古时人们在羊皮上写字，重写时，就把羊皮上原来的字迹刮掉，因而比较难以辨读。

② 指《俄国革命史》。

社会主义革命被推到了非常遥远的未来，至少是不确定的未来。只有西方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以后，这一革命才能实际上提上日程，这被认为是无可争辩的。俄国马克思主义在反对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中所得出的论点，是党最宝贵的财富之一。由此就产生一种设想：如果民主革命在俄国具有宏伟的规模，它就能直接推动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将促使俄国无产阶级在以后迅速取得政权。即使按照这个比较顺利的方案进行，总的历史前途仍然没有改变，只是发展进程加速了和期限提前了。

正是按照这些观点的精神，列宁在一九〇五年九月写道：“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且恰恰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①令人奇怪，这段引文竟被斯大林用来证明党对一九一七年事变实际进程早有预测。不过仍然令人迷惑不解的是，为什么党的干部当时被列宁的“四月提纲”弄得大吃一惊呢？

实际上，按照旧的概念，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只有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围内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才能开展起来。困难在于，农民在满足了自己所渴望的土地要求以后，就会失去支持一次新的革命的热情。因为在国内占明显的少数的俄国工人阶级不能用自己的力量夺取政权，所以列宁一贯认为，在西方无产阶级胜利以前，就谈不上在俄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在一九〇五年写道：“现在这个革命的完全胜利就是民主革命的终结和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坚决斗争的开始。今天的农民的要求一得到满足，反动势力一被完全粉碎，民主共和制度一争得，资产阶级的、甚至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就将全部完结，而无产阶

^① 《列宁全集》第九卷第 221 页。

級爭取社会主义的真正的斗争就会开始。”^① 这里所说的小资产阶级，主要是指农民而言。

在这种条件下，“不断”革命的口号是从哪里来的呢？列宁的回答是：俄国革命家，由于具有许多欧洲老前辈的经验，应该“有理想”，能“空前完满地实现一切民主主义改造，实现我们的全部最低纲领……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时候……那时候革命的火焰将延烧欧洲……欧洲工人也将发动起来，并向我们表明‘该怎么办’；那时候欧洲的革命高潮就会反过来影响俄国，使几年的革命时代变成几十年的革命时代”^②。俄国革命的独立内容——即使它发展到最高限度——，也不会超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即使对于俄国无产阶级来说，也只有西方胜利的革命才能够开辟一个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时代。直到一九一七年四月，这种观点在党内是完全有效的。

如果抛开成堆的插话，论战中的种种夸大和一些个人的错误，则从一九〇五到一九一七年間关于不断革命问题的争论的实质，并不是俄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能否建立一国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在一九二四年以前，没有一个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失口提到过——，而是在俄国仍然有可能进行真正能够解决土地问题的资产阶级革命呢，还是为了完成这项任务需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列宁在其四月提纲中修改了他早期观点的哪些部分呢？他从来连一分钟也没有放弃过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性质的学说，以及落后的俄国只有在西方的直接协助之下才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观点。但是，就是在这里列宁第一次宣布，正是由于本国的条件很落后，俄国无产阶级能够比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早日掌握政权。

① 《列宁全集》第九卷第 115 页。

② 同上书，第八卷第 257 页。

二月革命既未能解决土地問題，也未能解决民族問題。俄国的农民和各被压迫民族在爭取实现民主目标的斗争中不能不支持十月革命。只是因为俄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无力完成他們的西方前輩已經实现的历史任务，俄国无产阶级才得到了比西方无产阶级早取得政权的机会。一九〇五年，布尔什維主义企图要到完成民主任务以后才过渡到爭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一九一七年，却在沒有完成民主任务的基础上产生了无产阶级专政。

但是，俄国革命的复杂的性质还不止于此。工人阶级取得了政权，这就自然而然地取消了“最低綱領”与“最高綱領”之間的分界綫。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但只是在那样的条件下！——民主任务必然要发展成为社会主义任务，尽管欧洲工人还没有来得及告訴我們“該怎么办”。

西方和东方之間的革命程序上的变化尽管对俄国和全世界的命运都具有非常大的重要性，毕竟只有历史局限的意义。不論俄国革命向前跃进得多么远，它对世界革命的依賴性既沒有消除，甚至也沒有减少。民主改革轉变为社会主义改革的可能性，是直接由复杂的国内条件——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間的相互关系——产生的。但是，归根到底，社会主义改造的界限要取决于世界舞台上的經濟和政治条件。这个国家的冲力不論多大，它总不可能跳出这个星球。

共产国际在譴責“托洛茨基主义”时，特別大肆攻击这样一种見解：俄国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而得不到西方支援的情况下，“会和那些协助过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即使你們认为历史的实验已經完全駁倒了这个預測（是由托洛茨基在一九〇五年作的，現在批評他的人中間，当时沒有一个人哪怕是贊同无产阶级在俄国专政的观点），即使如此，俄国的所有的馬克思主义者，包括列宁在內，当时都把农民看作是一个不可靠的、

叛卖的盟友，这一点仍然是一个不可辯駁的事实。布尔什維主义的真实传统与认为工农利益預先注定是协调的这种說法，毫无共同之处。相反的，对这种小资产阶级理論进行批判，在馬克思主义者反对民粹主义者的长期斗争中一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列宁在一九〇五年写道：“俄国的民主革命时代一旦成为过去，那时再说什么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意志統一’……那就是可笑的了。”“农民是土地占有者阶级，他们在这个（争取社会主义的——托注）斗争中，也会像资产阶级现在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一样地扮演叛卖的、不稳定的角色。忘記这一点就是忘記社会主义，就是在无产阶级的真正利益和任务問題上自欺欺人。”^①

一九〇五年，列宁在为自己拟訂研究关于在革命进程中各阶级的相互关系的提綱中，用以下的一段話論述了地主所有制消灭以后必然出現的形势：“无产阶级已經进行了为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而保持民主主义成果的斗争。如果没有欧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对俄国无产阶级的帮助，那末，这个斗争对于孤軍作战的俄国无产阶级，几乎是毫无希望的，而且必然要遭到失敗……在这个阶段里，自由资产阶级和富农（加上一部分中农）組織反革命。俄国无产阶级加上欧洲无产阶级則組織革命。在这些条件下，俄国无产阶级能够取得第二次胜利。事业已經不是沒有希望的。第二次胜利将是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欧洲的工人会告訴‘怎样干’，那时我們就与他們一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②

大約同在这几天之内，托洛茨基写道：“在农民占絕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这几句話后来被斯大林

① 《列宁全集》第九卷第 121 頁。

② 同上书，第十卷第 71 頁。

引用來證明“橫在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和托洛茨基的理論^①之間的鴻溝”。^②然而這些引文證明在列寧和托洛茨基的革命觀點之間當時儘管有無可懷疑的分歧，但恰恰在農民的“不可靠的”和“叛賣的”作用這個問題上，他們的觀點早在那個時候實質上就已經一致了。

列寧在一九〇六年二月寫道：“我們要对農民運動支持到底，但是我們应当記住，這是另一個階級的運動，而不是那個能夠實現並且定會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的階級的運動。”^③一九〇六年四月，他又說：“俄國革命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取得勝利，但是沒有足够的力量保持勝利的果實……因為在一個小經濟十分發達的國家里，小商品生產者（包括農民在內）在無產者從爭取自由走向爭取社會主義的時候，必然會掉過頭來反對無產者……要防止復辟，俄國革命必須有非俄國的後備軍，必須有外來的幫助。世界上有這樣的後備軍嗎？有的，就是西方的社會主義無產階級。”^④

這些思想貫徹在整個反動年代和戰爭年代中，雖然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但基本上沒有改變。這用不着多舉例子。黨的革命觀點在革命事變高潮中應該得到了最完整和最明確的表現。如果布爾什維主義的理論家在革命以前就已經傾向“單獨一國的社會主義”，那末這一理論在直接奪取政權的鬥爭時期就必然會發展到完滿無缺的程度。事實真是這樣嗎？一九一七年將作出回答。

列寧在二月革命後啟程回俄國時，在給瑞士工人的告別信中寫道：“俄國無產階級單靠自己的力量不能勝利地完成社會主義革命。但它能……使自己主要的、最忠實的、最可靠的同伴——歐洲

① 斯大林的原文是：“不斷革命”論。

② 參見《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318頁。

③ 《列寧全集》第十卷第163頁。

④ 同上書，第302頁。

和美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易于进入决战。”^①

四月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列宁的决议指出：“俄国无产阶级是在欧洲最落后的一个国家中、在小农的大海中进行活动的，因此，它不能抱定立即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②虽然决议的开头这几句话坚持了党的理论传统，但它向新的道路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它宣布：在农民的俄国不可能进行独立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决不给我们一种权利，拒绝不仅为了民主任务而且为了“实行若干实际上已经成熟的向社会主义迈进的步骤”——如实行土地国有化、对银行实行监督等等——而夺取政权。^③由于“在最发达的先进国家中……”已经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前提”^④，这些反资本主义的措施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应该作为我们的出发点。列宁在他的演说中解释说：“只谈到俄国的条件，这是错误的……全世界的运动使我们面临着社会革命，在这种条件下俄国无产阶级的任务是什么呢？这就是这个决议里所要分析的主要问题。”^⑤显然，在列宁战胜了“老布尔什维克”的民主狭隘精神以后，党在一九一七年四月所采取的新出发点，同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理论有天渊之别！

从此以后，不论是在首都的还是在外省的党的一切组织中，我们都碰到关于这个问题的相同的提法：我们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必须记住，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革命，它未来的命运将取决于各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胜利。这种提法没有遭到任何人的反对，相反的它是大家一致承认的主张，是进行一切争论的前提。

有一位与列宁同乘“密封列车”回国的布尔什维克，名叫哈利

① 《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 381 页。

② 同上书，第二十四卷第 278 页。

③ 参见同上书，第 279 页。

④ 同上书，第 273 页。

⑤ 同上。

东諾夫，曾在七月十六日彼得格勒党代表會議上說过：“我們正在到处讲，沒有西方革命，我們的事業就会失敗。”哈利东諾夫不是一位理論家，而是中級的党的鼓动人員。我們在那次代表會議的記錄中还可以讀到：“巴甫洛夫号召大家重視布尔什維克所提出的总的看法，即俄国革命只有在只能設想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革命的支持之下，才能蓬勃发展。”那时千百个哈利东諾夫和巴甫洛夫正在發揮四月代表會議的这个基本思想。但从来就沒有人想要反对或者修改这个观点。

七月底举行的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說明无产階級专政就是由工人和貧苦农民夺取政权。“只有这些階級才能……促进国际无产階級革命的发展，这个革命不仅应消灭战争，而且应消灭資本主义奴役制度”。^① 布哈林的演說所根据的思想是：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革命是摆脱現存局势的唯一出路。“如果俄国革命在西方革命爆发以前取得胜利，我們就必须……燃起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火焰。”^② 当时斯大林被迫用十分相似的说法提出这个问题：“終究会有一天，工人階級把貧苦农民阶层发动起来并把他們团結在自己周围，高举起工人革命的旗帜，开辟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

①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會議和中央全会決議汇编》第一分册，人民出版社版，第482頁。

② 布哈林的原話是：“这里可能有两种場合；不是我国的农民和无产階級的革命在西欧和其他国家爆发革命以前取得胜利，就是革命在西欧的某个国家中先于我們取得胜利。在第一种場合下，胜利了的工农革命就应当宣布革命战争，即应当对尚未胜利的无产者进行武装的援助。这种战争可能具有不同的性质。如果我們能够控制住遭到了破坏的經濟机体，我們就实行进攻。假使我們无力进行进攻性的革命战争，我們就进行革命的防御战争。那时候我們有权向全世界的无产階級宣称：我們在为所有无产階級的利益而进行神圣的战争，而这就会震响着同志式的号召。我們將用这样的革命战争燃起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火焰。”——参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記錄》一九五八年俄文版第104—105頁。

紀元。”^①

在八月初召开的莫斯科地区代表會議，使我們可以最好不过地看清党内思想的情况。中央委員索柯尔尼柯夫在解释第六次代表大会決議的重要报告中說：“必須說明，俄国革命一定要向世界帝国主义发动进攻，否則，它就会被帝国主义消灭或者扼杀。”許多代表都表示了相同的看法。維托林說：“我們必須准备一次社会革命，它将推动西欧社会革命的发展。”代表別林斯基說：“如果在民族范围内解决这个問題，那么，我們就沒有出路。索柯尔尼柯夫說得对，俄国革命只有作为一种国际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在俄国，社会主义的条件还没有成熟，但是，如果欧洲开始了革命，我們就要跟着西欧走。”司徒柯夫說：“俄国革命只有作为国际革命才能取得胜利的見解，是无可怀疑的。……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才是可能的。”

全体代表都同意下列三个基本見解：西方帝国主义如果没有推翻，工人国家就站不住脚；在俄国社会主义的条件还没有成熟；社会主义革命的問題实质上是国际性的。如果除了七、八年来被譴責为异端邪說的这几个观点以外，党内还有目前被认为是正統的和传统的其他观点，它們就一定會在莫斯科代表會議上和在此以前的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反映出来。但是，不論是主要报告人，还是辯論参加者，或者是新聞报导，都沒有一句話提到党内有一种布尔什維克观点是与这些“托洛茨基”观点相对立的。

在党代表大会以前召开的基輔全市代表會議上，主要报告人哥羅維茨說道：“拯救我国革命的斗争只能在国际范围内进行。在我們面前摆着两个前途：如果革命胜利，我們一定能建立一个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国家，否則，我們就一定會在国际帝国主义的武力下

^① 《斯大林全集》第三卷第 166 頁。

垮台。”在党代表大会以后，八月初，皮达可夫在基輔的另一次代表會議上說：“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們就強調說过：俄国无产阶级的命运完全要取决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进程……因此，我們正在进入不断革命的阶段。”我們已經熟悉的那位哥罗維茨在评价皮达可夫的报告时說：“我完全同意皮达可夫关于我国革命是不断革命的說法。”皮达可夫說：“……唯一可能拯救俄国革命的道路是世界革命，它将为社会变革奠定基础。”也許，这两位发言人是代表少数吧？不，在这个基本問題上沒有人反对他們。在选举基輔委员会时，这两个人得票最多。

因此，我們完全可以断定，后来被宣布为与布尔什維主义不相容的那些观点，在全党的四月代表會議、七月的党代表大会以及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基輔的會議上，已經被闡述得清清楚楚，而且由表决所肯定了。不仅如此，党内沒有一次发言可以用来解释为未来的单独一国社会主义理論的先声，哪怕就像在大卫王的圣詩中发现基督福音的預兆一样。

八月十三日，党的中央机关报說：“苏維埃掌握全部政权虽然还不就是‘社会主义’，但它无论如何已能摧毁资产阶级的反抗，并且能够（依靠現有的生产力和西方的形勢而定）引导和改造經濟生活，为劳动群众謀福利。革命在摆脱了资本主义政权的枷鎖后，就会成为不間断的，即不停頓的革命。就会利用国家政权以便废除而不是巩固资本主义的剝削制度。革命在这条道路上的最后胜利就要取决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这就是过去和現在革命进一步发展的唯一现实的前途。”^①这篇文章是被囚禁在克烈斯特監獄的托洛茨基写的。发表这篇文章的报纸編輯是斯大林。在一九一七年以前，布尔什維克党内已經用“不断革命”这个术语来专

① 托洛茨基：《回顾与展望》，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六日《无产者报》第一号。

指托洛茨基的观点,仅仅根据这样一件事,就已经说明了这段引文的意义。几年以后,斯大林宣布说:“列宁生前一直是反对不断革命论的。”斯大林本人无论如何没有反对过,因为发表这篇文章时,什么编者按语也没有加。

十天以后,托洛茨基又在这个报纸上写道:“对我们来说,国际主义并不是……抽象思想,而是直接指导行动的、有重大实践意义的原则。没有欧洲的革命,我们就不可能有巩固的、决定性的胜利。”^① 斯大林又未加以反对。并且,两天以后,他自己也照样说:“让他们(工人和士兵——托注)知道,只有同西方的工人结成联盟,只有动摇西方资本主义的基础,才能指望俄国革命的胜利!”^② 所谓“革命的胜利”不是指建立社会主义——当时还根本没有谈到这一点——,而是指夺取政权和保持政权而言。

列宁在九月间说过:“资产者叫喊道,如果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那末俄国公社的失败,即无产阶级的失败是必然的。”我们决不要被这种叫喊所吓倒。“俄国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权,完全可能保持政权,并且使俄国一直坚持到西欧革命的胜利。”^③ 革命的前途在这里说得非常明确:保持政权一直到欧洲开始社会主义革命。这个公式并不是仓促提出来的,因为列宁经常反复提到它。他在《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这篇纲领性文章里用这样几句话加以总结:“如果布尔什维克不让别人吓倒而能夺得政权,那末,地球上就没有一种力量能阻挡它把政权一直保持到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④

布尔什维克的右派要求与妥协派联合,认为布尔什维克“单

① 托洛茨基:《国际主义的策略》,一九一七年九月六日《无产者报》第十号。

② 《斯大林全集》第三卷第239—240页。

③ 《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第24页。

④ 同上书,第112页。

独”不能保持政权。列宁在十一月一日即革命以后答复他们說：“他們說，我們单独一定不能保持政权，等等。但是，我們不是单独的，在我們面前有整个欧洲。我們必須开始。”从列宁同右派的这次爭論中，可以特別明显地看出，在俄国单独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甚至从来没有在爭論者的头脑中出现过。

約翰·里德讲到一个从羅馬尼亚前綫回来的士兵怎样在彼得格勒奥布霍夫工厂举行的一次大会上大声叫喊：“我們一定要全力支持到全世界各国人民起来帮助我們的时候。”这个公式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由这位无名士兵或者里德想出来的。这是由布尔什維克鼓动工作人員灌輸到群众中去的。这位从羅馬尼亚前綫回来的士兵所发出的呼声，就是党的呼声，就是十月革命的呼声。

《被剝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用苏維埃政权名义向立宪會議提出的国家基本綱領）宣布，新制度的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組織，使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获得胜利……苏維埃政权将坚定地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直到国际工人起义反对資本的压迫获得最后胜利。”^①直到今天还没有正式宣告作废的列宁的这个《权利宣言》，把不断革命变成了苏維埃共和国的一条基本法律。

被囚禁在監獄中的罗莎·卢森堡正以热烈和羡慕的心情注視着布尔什維克的行动和言論，如果她发现其中有一国社会主义的一点影子，一定会立即提出警告。在那些日子里，她正在非常严厉地（实质上是錯誤地）批判布尔什維克的政策。但是她沒有提出警告。这里是她关于党的总路綫所說的話：“布尔什維克在自己的政策中已經确定了坚决朝着无产階級世界革命前进的方針，这一事实正好光輝地证明，他們具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坚定的原則性和豪

^① 《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第396、399頁。

迈的政治气魄”。

这些由列宁一天天加以发展的观点，这些由斯大林主編的中央机关报宣传过的观点，这些曾經鼓舞过許多大大小小的鼓动人員的演說的观点，这些被遙远的前綫士兵也一再跟着說的观点，这些被罗莎·卢森堡认为是最有力地证明布尔什維克远大的政治眼光的观点，——正是这些观点在一九二六年遭到了共产国际官僚派的譴責。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体會議的一項決議說过：“托洛茨基及其同道在我国革命性质和前途这个問題上的观点，是和我們党的观点、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①这样，布尔什維主义的这帮不肖后輩就抛弃了他們自己的过去。

如果一九一七年有人真正反对过不断革命論，这就是立宪民主党人和妥协分子。米留可夫和唐恩发现“托洛茨基主义的革命幻想”是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齐赫泽在民主會議上致开幕詞时，大罵有人企图“用变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办法来扑灭資本主义战火。”十月十三日，克伦斯基在預备国会說：“現在，对于革命、民主和自由的全部果实來說，再沒有比这样一些人还更加危险的敌人了，这些人在深入革命和变革命为不断的社会革命的幌子下，正在把群众引入迷途，而且看来已經把群众引入迷途。”齐赫泽和克伦斯基都是布尔什維克的敌人，由于同样原因他們也是不断革命的敌人。

托洛茨基在苏維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即在取得政权的时候說过：“如果欧洲人民不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我們就会被打倒，这是肯定无疑的。不是俄国革命将在西方掀起斗争的旋风，就是各国資本家将扼杀我国的革命。”当时會議席上有人喊道：“还有第三条道路！”也許，这是斯大林的喊声吧？不是，这是一个孟什維克的喊

^①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會議和中央全会決議汇编》第三分册，人民出版社版，第239頁。

声。这是在布尔什维克发现那个“第三条道路”以前若干年的事。

由于斯大林派的国际报刊无数次的反复宣传，在许多不同的政界人士当中差不多已经形成了这样的看法：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意见分歧的基础是两种观念。一种观念的出发点是不仅能够支持下去，而且能够依靠俄国的内部力量建成社会主义；另一种观念是把自己的希望只是寄托在欧洲发生起义上面。实际上，这两种对立的观点是在几年以后捏造出来的，捏造者没有煞费苦心做到使自己的发明哪怕是非常表面地符合历史文件。当然，这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所有的布尔什维克在布列斯特时期都一致认为，如果欧洲不在最近的将来爆发革命，苏维埃共和国就注定要灭亡。有些人估计是几个星期的事，另一些人估计是几个月的事，就没有人是估计为几年的。

布哈林在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八日写道：“俄国革命刚开始……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就曾宣布：不是由俄国革命所发动的国际革命将消灭战争和资本，就是国际资本将消灭俄国革命。”而领导主张向德国进行革命战争的主战派，并把自己那一派的观点说成是全党观点的人，难道不正是布哈林吗？这样一种假定不管多么合情合理，却被文献驳得体无完肤。

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一八年初的中央委员会记录（一九二九年发表），尽管经过删节和带倾向性的编撰，也给这个问题提供了宝贵的证据。“在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一日会议上，谢尔盖耶夫（阿杰姆）同志指出，所有发言人都同意这样的看法：在西方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情况下，我们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有毁灭的危险。”^①谢尔盖耶夫拥护列宁的立场，即赞成签订和约。没有一个人反驳谢尔盖耶夫。所有三个进行激烈争论的派别都竞相引用同一个共同

^① 参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记录》一九五八年俄文版第172页。

的前提：沒有世界革命，我們就無法脫離險境。

固然，斯大林在爭論中提出了一個特殊的論點。他主張必須簽訂單獨和約的根據是：“西方沒有革命運動，不存在革命運動的事實，而只有可能性。但是我們不能依靠可能性。”^①他雖然離單獨一國社會主義的理論還很遠，但在這些話中已經清楚地表明，他對國際運動向來缺乏信心。“我們不能依靠可能性。”列寧立即表示“在某些部分”不同意支持者斯大林的見解。他說：“西方革命還沒有開始，這是事實，但是如果由於這一點我們就改變自己的策略，那末我們就會成為背叛國際社會主義的人。”^②如果說列寧主張立即單獨媾和，這不是由於他不相信西方的革命運動，更不是由於他相信孤立的俄國革命的生存能力，因為“對我們來說，重要的是，在普遍的社會主義革命出現以前支持下去，而我們只有締結和約才能做到這一點。”^③在列寧看來，布列斯特投降的意義就概括在“喘息時機”這個字眼裏面。

記錄證明，斯大林在列寧的警告以後，找了一個機會來糾正。“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三日會議。斯大林同志：……我們也把賭注押在革命上，但你們希望在幾個星期內，而我們^④是估計在幾個月內就發生革命。”^⑤斯大林在這裡逐字逐句復述列寧的公式。中央委員會內在世界革命問題上兩派之間的距離是幾星期與幾個月之間的距離。

·一九一八年三月，列寧在第七次黨代表大會上為簽訂布列斯

① 斯大林的原話是：“……但是我們在實踐中不能單單依靠可能性。”參見《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中央委員會記錄》一九五八年俄文版第171頁；又參見《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26頁。

② 參見《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中央委員會記錄》一九五八年俄文版第172頁。列寧的原文是：“當然，西方有群眾運動，但革命在那裡還沒有開始。”

③ 參見《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中央委員會記錄》一九五八年俄文版第172頁。

④ “我們”兩字是托洛茨基加的。

⑤ 同③第213頁，但後半句斯大林的原文是：“而是在幾個月內就發生革命”。

特和約进行辯护时說：“沒有德国的革命我們就灭亡了，这是一个絕对的真理，灭亡的地方也許不在彼得格勒，不在莫斯科，而在海參崴，也可能在我們必須去的……远得多的地方，但是，在一切可能发生的事变中，如果德国革命不爆发，我們无論如何总是会灭亡的。”^①然而，这不仅是德国的問題。“国际帝国主义拥有极雄厚的資本……无論如何……它都不能和苏維埃共和国和平共处……在这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在这里……最大的历史課題就是……必須喚起国际革命。”^②在通过的一項秘密決議中，我們看到：“代表大会认为，只有把已在俄国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轉变为国际工人革命，才是这个革命能够巩固的最可靠的保证。”^③

几天之后，列宁在苏維埃大会上作报告：“世界帝国主义和社会革命的胜利进军，是不能并存的。”四月二十三日，他在莫斯科苏維埃會議上說：“我們的落后鞭策我們前进，我們如果不能坚持到其他各国工人起义来大力支援我們，我們就一定会灭亡。”^④一九一八年五月間他写道：“我們必須（在帝国主义面前）甚至要退却到烏拉尔去，因为这是贏得時間等待西方革命成熟的唯一机会……”^⑤

列宁很明白，布列斯特談判拖延下去将使和平条件更加苛刻，但他把国际革命任务置于“民族”任务之上。一九一八年六月二十八日，列宁在簽訂和約問題上虽与托洛茨基有插曲性的意見分歧，但他仍然在莫斯科工会會議上說：“布列斯特条約談判开始的时

① 《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 86 頁。

② 同上书，第 79—80 頁。

③ 同上书，第 107 頁。

④ 同上书，第 213 頁。

⑤ 參見《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 304 頁，列宁的原文是：“无产者在估計到沒有力量的时候應該（在西方和东方帝国主义面前）退却，甚至退到烏拉尔一帶，这是正确的，因为在西方革命正在成熟的时期中，这是取得胜利的唯一希望……”。

候，托洛茨基同志向全世界进行了揭露，……使敌对国家在战争期间爆发了规模巨大的革命运动，这难道不是我们实行这一政策的结果吗？”^①一星期之后，在人民委员会向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他又谈及这个问题：“通过我们以托洛茨基同志为首的布列斯特代表团……我们履行了对各国人民所负的义务。”^②一年之后，列宁又提起这件事：“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苏维埃政权把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全世界的革命看得高于一切民族牺牲（不管这种牺牲是如何沉重）……”^③

后来，当时已从他的记忆里抹去了这种本来就不很明显的意见分歧时，斯大林却问道：“托洛茨基的关于革命的俄罗斯不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的说法意味着什么呢？只能有一个意义：托洛茨基没有感觉到我国革命的內部力量。”^④

事实上，当时全党都一致确信“在保守的欧洲面前”苏维埃共和国不可能支持下去。但这只不过是在革命的俄国面前保守的欧洲不可能支持下去这种信念的反面而已。它通过一种消极的形式表现了对于俄国革命的国际力量的坚定信心。基本上党并没有错。无论如何，保守的欧洲并没有原封不动地支持下来。德国的革命尽管被社会民主党出卖了，但仍有足够的力量去剪除鲁登道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448页，列宁的原文是：“当布列斯特条约谈判……揭露，正在同其他国家的政府进行可怕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敌国家的人民群众不但不仇视我们而且支持我们，这难道不是我们……结果吗？我们的政府是实行这种政策的唯一政府。我们的革命使敌对国家在战争期间爆发……运动，而引起革命运动的原因仅仅是由于我们撕毁了秘密条约，由于我们说过，我们不怕任何危险。”

② 参见《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475页，列宁的原文是：“在我们履行了对各国人民所负的义务，懂得了和平宣言的意义，并通过我们以托洛茨基同志为首的布列斯特代表团把这个意义告诉了各国工人以后，我们公开建议签订真诚的民主和约，但是这个建议却遭到各国穷凶极恶的资产阶级的阻挠。”

③ 《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124页。

④ 《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320页。

夫和霍夫曼的爪子。倘若沒有这一行动，苏維埃共和国恐怕是不能免于灭亡的。

而即使在德国軍国主义失敗之后，对国际形势的总的估計并没有改变。一九一八年七月底，列宁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會議上說：“我們的努力必然会导致世界革命”^①，“現在的情况是，我們从一方面摆脱了同一个联盟的战争，立刻又从另一方面遭到帝国主义的进攻。”^②八月間，正当国内战争在伏尔加河流域蔓延开来而且有捷克斯洛伐克人参加战争的时候，列宁在莫斯科的一个集会上說：“我們的革命是作为世界革命而开始的……无产者群众将保证苏維埃共和国战胜捷克斯洛伐克人，并能支持到爆发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为止。”一直坚持到西方爆发革命——同以前一样，这就是党的公式。

就在那几天，列宁写信給美国工人說：“只要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其他队伍沒有来援助我們，我們就好像被围困在碉堡里面。”^③十一月間，他表示得更加坚决：“……世界历史……表明，把俄国革命变成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冒险，而是必然，因为当时无法作别的选择，如果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布尔什維主义不能取得胜利，英法和美国帝国主义必然会摧毁俄国的独立和自由。”^④拿斯大林的話來說，列宁显然感觉不到“我們的革命的內部力量。”

革命的第一周年紀念日已經过去了。党有了一定的時間来看看周围的形势。然而一九一九年三月間列宁在向第八次党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再次宣称：“我們不仅生活在一个国家里，而且生活在許多国家組成的体系里，苏維埃共和国和帝国主义国家长期

① 《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8頁。

② 同上书，第12頁。

③ 同上书，第56頁。

④ 同上书，第169頁。

并存是不可思議的。其結局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① 在革命的第三周年紀念日，正值白匪潰敗的時候，在那天，列寧又回憶並且總結說：“如果在那天晚上有人對我們說，再過三年就會有今天這個樣子，就會取得我們現在這樣的勝利，那是任何人甚至極端的樂觀主義者都不會相信的。那時我們知道，只有我們的事業在全世界取得勝利，我們的勝利才會鞏固，因為我們開始我們的事業時，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世界革命上的。”^② 再也不能舉出更加無可辯駁的證據了。十月革命的時候，“極端的樂觀主義者”不僅不敢夢想建立一國社會主義，而且也不相信在無直接外援的條件下能保衛住革命！“我們開始我們的事業時，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世界革命上的。”為了保證在三年的鬥爭中戰勝敵人，無論是黨或紅軍都不需要在單獨一國建立社會主義的神話。

世界形勢表現得比人們原來所預期的更好。群眾表現出為了達到新的目的非常願意作巨大的犧牲。領導者在最初的和最困難的時期內巧妙地利用了帝國主義的種種矛盾。結果，革命顯示了比“極端的樂觀主義者”所預料的更大的穩定性。但是儘管如此，黨仍舊全部保存着它以前的國際立場。

一九一八年一月間，列寧解釋道：“要是沒有戰爭的話，我們就會看到，全世界的資本家都會在對付我們的基礎上聯合起來。”^③ 他在第七次黨大會上問道：“為什麼，在十月革命後……的幾個星期或幾月中我們能夠如此容易地節節取得勝利呢？……只是因為當時特殊的國際形勢暫時給我們擋開了帝國主義。”^④ 四月間，列寧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說：“我們之所以獲得喘息時

① 《列寧全集》第二十九卷第 128 頁。

② 同上書，第三十一卷第 358 頁。

③ 同上書，第二十六卷第 483 頁。

④ 同上書，第二十七卷第 80 頁。

机，只是因为帝国主义的厮杀还在西方继续进行，而在远东，帝国主义的竞争日益激烈——这就是苏维埃共和国之所以能够生存的原因。”^①

客观局势的异乎寻常的凑合，不能永久存在下去。在一九二〇年，列宁说：“我们现在已由战争转向和平，但是我们并没有忘记，战争还会死灰复燃。只要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它们就不能和平相处，最后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不是为苏维埃共和国唱挽歌，就是为世界资本主义唱挽歌。这是战争的延期。”^②

这个本来的“喘息时机”之所以能够变成较长的不稳定均衡的时期，不仅是由于资本主义各集团之间的斗争，而且是由于国际革命运动。德国十一月革命的结果，德国军队被迫放弃了乌克兰、波罗的海沿岸和芬兰。反叛精神之深入协约国军队，迫使法英美诸国政府撤出了在俄国南北海岸的军队。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未曾取得胜利，但是在其走向胜利的道路上在好几年当中保卫了苏维埃国家。

一九二一年七月间，列宁总结了当时的形势：“这样就形成了这种虽然极不坚固、极不稳定，但总还是一种均势的状态，即社会主义共和国在资本主义包围下能够生存，当然不是长期的。”^③ 这样，过了几个星期到几个月，过了几个月到几年，党才逐步地接受了这样一个观念：工人国家能够在一定的时期内——“当然不是长期”——在资本主义包围中和平地继续生存下去。

由以上引证的材料，可以绝对无疑地推出一个并非不重要的结论：如果根据布尔什维克的一般信念，没有西方无产阶级的胜利，苏维埃国家便不能维持长久，那么仅仅这一事实就实际上一笔

① 《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265页。

② 同上书，第三十一卷第416页。

③ 同上书，第三十二卷第442页。

勾消了单独一国建設社会主义的綱領；这个問題本身还在所謂作初步考虑之中就是要打消的。

然而，如果像不肖后輩近年来企图辯解的那样，硬說党认为当时橫在实现一国社会主义社会道路上的唯一障碍物是資本主义的軍隊，那就完全錯了。武装干涉的威吓当时实际上的确被提到了首位，但是战争危险本身只不过是各資本主义国家技术上和工业上优越地位的最尖銳的表现而已。归根到底，問題还是在于苏維埃共和国的孤立地位和落后状态。

社会主义就是为了滿足人类的需要而进行的有計劃的、和諧的社会生产的組織。生产資料的公有制还不是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它在法律上的先决条件而已。社会主义社会問題不能同生产力問題分开，在人类发展的現阶段，生产力实质上是世界性的。单独一个国家对于資本主义已經变得过分狹小，因此更加不能作为完备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地盘。此外，一个革命国家的落后条件，增加它被人拉回到資本主义去的危险。布尔什維克在拒絕孤立的社会主义发展前途的时候，所考虑的不是机械地孤立开来的武装干涉問題，而是与社会主义的国际經濟基础有关的問題之总和。

在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列宁說道：“如果說俄国現在从‘提尔西特和約’走向——无疑它正在走向——国家兴盛……那末这种兴盛的出路并不是过渡到資产階級国家，而是过渡到国际社会主义革命。”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是国际革命，要么退回到資本主义。沒有一国社会主义容身之地。“我們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过渡到社会主义究竟还要經過多少阶段。这取决于真正的欧洲社会主义革命何时开始”^①。

同年四月，列宁在号召改造实际工作的队伍时写道：“我們对

① 《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 118 頁。

于西欧的因为种种原因而迟迟尚未爆发的社会主义革命，究竟能给予何种重大协助，这就全看我们解决我们面前的组织任务的程度如何而定。”^① 进行经济建设的这一初步尝试立即被纳入了国际的计划；这是“协助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而不是在东方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王国的问题。

针对临来的饥荒的问题，列宁对莫斯科工人们说过：“我们……在自己的一切鼓动和宣传中都要……说明：我们遭到的灾难，是国际性的灾难；要摆脱这一灾难，除了举行国际性的革命以外，是没有其他出路的。”^② 列宁说：要克服饥荒，我们必须有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肖后辈回答说：要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只消一个单独国家的革命就够了。这两种意见真是有天壤之别！谁是对的呢？我们无论如何不要忘记，尽管工业化获得成功，饥荒至今尚未克服。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国民经济委员会代表大会用以下的一段话提出了一个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世界无产阶级专政正在变为历史上不可避免的东西……这正在决定着全世界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每一个国家的社会的发展。在其他国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形式，会使得在各国之间建立最密切的经济关系，在生产上实行国际分工，最后，使得组织国际经济管理机关成为可能。”国家高级机构所举行的一次研究纯粹实际问题，如煤炭、木材、糖萝卜等的代表大会，竟然能够通过这样一个决议，这就再好不过地证明：在那个时期内，不断革命的前途紧紧地支配着党的意识。

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合著的一本重版了多次的党的教科书《共产主义ABC》中写道：“共产主义革命只有作为世界革命才能获得胜利……在当工人仅在一个国家获得胜利的条件下，经

① 《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 219 页。

② 同上书，第 434 页。

济建設要碰到很大的困难……为了共产主义胜利，必需要有世界革命的胜利。”

布哈林在一本由党印行了好几次，而且譯成了几种外文的通俗小册子中，又以同样的观点写道：“在俄国无产阶级面前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尖銳地提出了国际革命的問題……俄国的不断革命就发展为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

斯切潘諾夫—斯克沃尔佐夫的一本有名的著作《电气化》是由列宁主編并且作序而出版的，在列宁非常热情地介紹給讀者的其中的一章中說：“俄国无产阶级从来不想建立一个孤独的社会主义国家。自給自足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小资产阶级的理想。如果小资产阶级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占优势，那末在一定的程度上接近这样一种国家，是可以設想的；它設法同外界隔絕开来，以便巩固它的被新技术和新經濟变得极不稳定的經濟形式。”无疑是經列宁看过的这些精采的話，清清楚楚地說明了不肖后輩最近的变化！

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中，規定超出民族斗争阶段的社会主义总任务是：“要估計到按各国无产阶级所調整的总計劃，建立統一而完整的世界經濟体系的趋势，这种趋势在資本主义制度下已經十分明显地表現出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必然会繼續发展而臻于完善。”^①对于这个遗传的和进步的趨勢來說，单独一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观念是反动的。

产生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是不相同的，不相似的，在某些方面甚至是相对立的。俄国无产阶级第一个取得政权的事实，决不意味着它将第一个走到社会主义。引起了十月革命的那种矛盾的发展不平衡状态，并没有随着十月革

① 《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127頁。

命成功而消失。它恰恰是第一个工人国家的基础。

一九一八年三月，列宁說：“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① 这个观点貫穿在列宁历年的許多演說和文章中。同年五月間，他說：“我們的革命是开头容易，繼續困难；而西方的革命是开头困难，繼續容易。”^② 十二月間，列宁对着一群最难以把眼界扩展到国境以外的农民听众又發揮了同样的思想：“在那里（西方），向社会主义經濟过渡……将比我国迅速些，容易些……由于同全世界社会主义无产階級結成联盟，俄国劳动农民……定会克服一切灾难”^③。一九一九年他又說：“与各先进国家相比，俄国人开始伟大的无产階級革命是比較容易的，但是把它繼續到获得最后胜利，即完全建成社会主义，就比較困难了。”^④ 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列宁又坚持說：“俄国……开始社会主义革命是容易的，而要把革命繼續下去，把革命进行到底，却比欧洲各国困难。我早在一九一八年初就已經指出了这个情况，在这以后的两年来的經驗也完全证实了这种論断是正确的。”^⑤

历史上各时代的文化水平各不相同。要超越过去，是需要時間的，但是不需几百年，只需几十年就够了。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列宁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會議上說：“我們的下一代会更发达一些，但也不見得能完全过渡到社会主义。”^⑥ 約两年之后，在农业公社的代表大会上，他把期限推迟得更远了：“我們現在还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劳动制，希望我們的儿子也許孙子能够把这种制度建

① 《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 77 頁。

② 同上书，第 374 頁。

③ 同上书，第二十八卷第 328 頁。

④ 同上书，第二十九卷第 277 頁。

⑤ 同上书，第三十一卷第 45 頁。

⑥ 同上书，第二十七卷第 275 頁。

成也就好了。”^① 俄国工人比其他国家工人动身得要早，但却比他们更迟到达目的地。这并不是悲观主义，而是历史的现实主义。

一九一八年五月，列宁写道：“我们俄国无产阶级……在政治方面……比任何英国和任何德国都要先进……但……在‘施行’社会主义的物质上生产的准备程度方面，却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② 他又通过两个国家的对比表达了同样的思想：“德国和俄国在一九一八年再明显不过地体现了实行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一方面是经济、生产、社会经济等条件，另一方面是政治条件。”^③ 在各个不同的国家中，未来社会的因素可以说是分散的。把这些因素汇集和互相结合起来，这便是构成总的世界革命的一系列的国家的革命的任务。

列宁预先嘲笑了关于苏维埃经济自给自足性的观念。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他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说：“只要我们苏维埃共和国还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一个孤立的边沿地区，那种认为我国经济完全可以独立……的想法，就是十分可笑的幻想和空想。”^④ 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在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列宁发出警告说：我们面临着“俄国和国际市场举行的考试，我们依靠这个市场，同它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这是一次严格的考试，因为在这场考试中人家可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把我们打垮。”^⑤

现在，共产国际竟然把社会主义经济依赖世界经济的这种思想，看成是“反革命的”。社会主义不能依赖资本主义！不肖后辈聪明得忘记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以世界分工为基础，这种分工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得到最高度的发展。一个孤立的工

① 《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 175 页。

② 同上书，第二十七卷第 319—320 页。

③ 同上书，第二十七卷第 314 页。

④ 同上书，第三十一卷第 447 页。

⑤ 同上书，第三十三卷第 243 页。

人国家内的经济建设，无论其本身如何重要，终究是残缺的、狭隘的和矛盾的，它总不能达到一个和谐的新社会的高度。

一九二二年，托洛茨基写道：“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的无产阶级获得胜利之后才有可能。”这些话竟然成了起诉书；然而当时它们却表达了全党的共同思想。一九一九年，列宁说过：“建设工作完全要看革命是否在欧洲最主要国家中迅速取得胜利。只有这个胜利之后，我们才能认真地抓建设事业。”这些话不是说明对俄国革命缺乏信心，而是说明深信世界革命即将到来。而现在，当苏联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之后，“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是在国际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的。这种说法仍然是正确的。

过去，党也是以同样的观点来观察农业集体化问题。无产阶级若不通过一系列的过渡阶段引导农民到达社会主义，便不能建设新社会，因为农民在人口中占相当大的一部分——在好多国家中占绝大部分——，而且在全世界也占很大的多数。一切问题当中的这个最困难的问题的解决，归根到底依赖于工农业之间的量和质的对比关系。城市越是能够卓有成效地使农民的经济和文化繁荣起来，农民就会越自觉自愿地和成功地走上集体化道路。

然而，有没有足够的工业来改造农村呢？列宁又把这个问题推到了国境之外。他在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说道：“就世界范围来说，能够给全世界供给一切产品的发达的大工业是有的……这是我們估计的根据。”^①俄国的工农业之间的对比关系比西方国家的要不相适应得多，这种关系至今仍是在某些时刻威胁着苏维埃制度的稳定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基础。

根据以上所说，可以看出，所谓“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决不是以

^① 《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129—130页。

在一國之內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觀念為基礎的。惟有嘲弄蘇維埃政權的孟什維克才把這樣的計劃算在它的賬上。在布爾什維克看來，因經濟破壞和內戰而不得不實行的斯巴達式制度的未來命運，直接依賴於西方革命的發展。一九一九年一月，正值戰時共產主義處在高潮的時候，列寧說道：“我們還是能夠保持住自己的共產主義糧食政策的原則，並把這些原則堅決貫徹下去，直到共產主義在全世界徹底勝利。”^① 那時列寧和全黨都錯了。後來我們不得不修改糧食政策。現在我們可以斷定，即使在十月革命之後的頭兩三年內，歐洲發生了社會主義革命，俄國沿着新經濟政策的道路後退仍是不可避免的。可是如果回顧一下無產階級專政的最初階段，我們就很清楚地看到，戰時共產主義的方法及其幻想，同不斷革命的前途是多麼緊密地互相交織在一起。

三年內戰結束時所發生的深刻的內部危機，包含着無產階級和農民之間、黨和無產階級之間有發生直接破裂的危險。從根本上重新審查蘇維埃政權所採用的方法，就成為必要的了。列寧解釋說：“我們必須在經濟上滿足中農，實行周轉自由，否則，在國際革命延緩的情況下，在俄國要保持住無產階級政權是不可能的”^②。但是，在採取新經濟政策時，國內任務和國際任務之間的聯系會不會根本破裂呢？

列寧在他的給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寫的提綱中對那時正在開始的新階段作了一個总的估計：“從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發展的整個進程的觀點來看，俄國所處的時代的意義，就是要在實際上考驗和檢驗掌握着國家政權的無產階級對待小資產階級羣眾的政策。”^③ 他對新經濟政策的輪廓所下的定義本身就在一國社會主義

① 《列寧全集》第二十八卷第 377 頁。

② 同上書，第三十二卷第 214—215 頁。

③ 同上書，第 444 頁。

問題一笔勾銷了。

在討論和草拟工业中的一些新方法那些日子里，列宁为自己所写的那些話，也具有同样的教育意义：“只要在十——二十年內和农民保持正确的关系，就能保证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甚至在发展着的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延迟的情况下）”^①。

目标确定了：这就是要使我们自己适应于一个新的更长的时期，这个时期是西方革命成熟所必需的。在这个意义上，而且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才表示确信：“新經濟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②

說在这里国际革命的思想根本沒有改变，还嫌不够；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思想表現得更加深刻更加清楚了；列宁在第十次党大会上解释新經濟政策的历史地位时說，“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里，有在几十年的过程当中形成的农业雇佣工人阶级……只有在这个阶级相当发展的国家里，才能够从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我們在許許多多的著作中，在我們所有的讲演中，在所有的报刊上面，都強調說，俄国的情况不同，这里产业工人仅占少数，而小农則占絕大多数。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两个条件下才能获得彻底的胜利。第一个条件是得到一个或几个先进国家里的社会主义革命对它的及时支持……

“另一个条件，就是……掌握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和大多数农民之間互相協議……

“……在其他国家的革命还没有到来时，只有同农民協議，才能拯救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③ 問題的一切因素在这里都集合为一点。同农民的联盟是苏維埃政权的存在本身所必需的；但这不

① 《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 313 頁。

② 同上书，第三十三卷第 401 頁。

③ 同上书，第三十二卷第 203—204 頁。

能代替国际革命，惟有国际革命能够創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經濟基础。

在同一个第十次大会上，因西方革命推迟而提出了一个关于“在資本主义包围中的苏維埃共和国”的报告。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作报告的是加米涅夫。他十分肯定地說：“我們从来没有給自己提出过要在一个孤独的国家內建成共产主义制度的任务。可是我們处于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即我們必須保持共产主义制度的基础，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础，即被資本主义关系从四面八方包围着的无产阶级苏維埃共和国。我們能否解决这个任务呢？我认为这个问题不切实际。对于用这种方式提出的问题根本无法回答。问题是这样：在現今的关系之下怎样保持住苏維埃政权，并且一直保持到这个或那个国家的无产阶级起来援助我們的时刻？”^① 报告人的提綱无疑經過列宁审查过不止一次，如果他的思想同布尔什維主义传统有矛盾，为什么大会沒有提出抗議呢？怎么竟沒有一个代表指出加米涅夫在关于革命的最根本的问题上发展了一些与布尔什維主义观点“毫无共同之处”的观点呢？怎么全党内竟沒有一个人认为这是异端邪說呢？

斯大林說：“列宁认为革命首先要从俄国本国的工人和农民中間汲取力量。而托洛茨基却认为只有‘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汲取必要的力量。”^② 对于这种臆造出来的对立观念，正如对許多其他的对立观念一样，列宁曾預先作了回答。一九一八年五月十四日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會議上，列宁說：“我們一直这样說，我們沒有忘記，俄国工人阶级比国际无产阶级的其他队伍要薄弱一些……在我們的盟軍——国际无产阶级沒有来到之前，我們应

① 參見《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速記記錄》一九三三年莫斯科俄文版第458—459頁。

② 《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317頁。

該留在自己的崗位上”^①。在十月革命三周年的时候，列宁肯定說：“我們的希望是寄托在世界革命上的，而这是絕對正确的……我們始終強調說，在一个国家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这样的事业是不可能的。”^② 一九二一年二月間，列宁在縫紉工业工人代表大会上說：“我們就經常地，不止一次地向工人指出，我們根本的、主要的任务就是要把革命最低限度扩展到几个最先进的国家中去，这是我們胜利的基本条件。”^③ 不，列宁已經被他頑固地一心想要在世界上寻求力量的事实弄得够声名狼藉了，你不可能替他洗刷干淨。

正如托洛茨基被人弄得同列宁对立起来一样，列宁自己也被人弄得同馬克思对立起来——而且也是用同样的根据。馬克思曾經設想，无产階級革命将在法国开始，而只能在英国完成；据斯大林說，这是因为馬克思那时还不知道不平衡发展的規律。实际上，馬克思拿开始革命的国家同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进行对比的这种預測，完全是以不平衡发展規律为根据。列宁是不允許在大問題上含糊其辞的；他自己無論在任何情况下、任何地方，在革命的国际性质这个問題上，从来沒有发表过与馬克思和恩格斯不同的意見。恰恰相反！列宁在苏維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說：如果“局势与馬克思和恩格斯所預期的不同了”^④，那仅仅是由于各国后来的历史条件的关系。事变的过程赋予了俄国无产階級以“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先鋒队的光荣使命……我們現在清楚地看到革命的发展会多么远大；俄国人开始了，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将去完成，

① 《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 350 頁。

② 这里只有前面那句話是列宁的原文，見《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 359 頁。列宁並沒有讲后面这句話。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只是說：“我們一向強調我們是从国际的观点来看問題的”。

③ 《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 104 頁。

④ 同上书，第二十六卷第 443 頁。

社会主义定将胜利。”^①

有人又从国家的威望的观点中拿出一个論据來說服我們。按照斯大林的說法，否认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論，就会“导致使我們的国家威信扫地”。仅仅这一句話——在馬克思主义者听来是非常刺耳的——就暴露了他与布尔什維主义传统已經彻底决裂。列宁所害怕的不是“威信扫地”，而是民族的盲目自信。一九一八年四月，在莫斯科苏維埃的一次會議上，列宁教导說：“我們是一支工人階級的革命队伍，我們之所以走在前面，不是因为我們比其他国家的工人能干……而仅仅是因为我国过去是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之一……而且我們只有同世界各国的工人一道才能取得胜利。”^②

号召作清醒的自我評价，成了列宁許多演說的主题。一九一八年六月四日，他說：“这个革命的爆发决不是由于俄国无产階級的特殊功劳，而是由于历史事变的总进程，由于历史的意志暂时把俄国无产階級推到第一位，使它成为世界革命的先鋒队”^③。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在工厂委员会代表會議上說：“俄国无产階級在世界工人运动中所起了先导的作用，并不是因为俄国的經濟发达。恰恰相反，由于俄国落后……俄国无产階級……清楚地看到，全世界或某些先进資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的联合发动是他們取得胜利的的必要条件和基本前提。”^④十月革命自然不仅是由于俄国的落后所引起的，这一点列宁了解得很清楚。但是他故意言过其实矯枉过正。

一九一八年五月二十六日，列宁在国民經济委员会——为了建設社会主义而专门設立的机关——的代表大会上說：“我們并不

① 《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第 443 頁。

② 同上书，第二十七卷第 213 頁。

③ 同上书，第 396 頁。

④ 同上书，第二十七卷第 512 頁。

閉目不看这事实：我們是不能够单靠自己的力量在一个国家内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即使这个国家甚至远远不像俄国这样落后。”^① 这里，他好像預見到了未来的官僚主义的盲目的自信的議論一样，所以解释說：“这也不会引起絲毫的悲观失望，因为我們給自己提出的任务，是世界历史上的困难任务”^②。

十一月八日，列宁在苏維埃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說：“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国家内的完全胜利是不可能的，它至少需要几个先进国家（我們还不能把俄国列为先进国家）最积极的合作。”^③ 列宁不仅否认俄国有权利建設自己的社会主义，而且明确地指定俄国在与其他国家一起建設的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只占次等的地位。把我国搞得“威信扫地”，这是多大的罪过呀！

一九一九年三月，在党代表大会上，列宁告誡那些太性急的人說：“我們积累了在一个存在着无产階級和农民的特殊关系的国家里实行摧毁資本主义的初步措施的实际經驗。如此而已。如果我們自充好汉，吹牛夸大，我們就将成为全世界的笑柄，成为純粹的吹牛家。”^④ 这些也許会使得有的人感到难为情吧？一九二一年^⑤ 五月十九日，列宁說道：“只有所有的或者几个最主要的先进国家进行革命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最后胜利，难道有一个布尔什維克在什么时候否认过这一点嗎？”^⑥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在莫斯科省党代表會議上，他又提醒他的听众說，布尔什維克既不期望也不梦想“用俄国一国的力量来改造全世界……我們从来没有瘋狂到这种地步，我們总是說，我們的革命只有在得到全世界工人支持的时

① 《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 386 頁。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二十八卷第 134 頁。

④ 同上书，第二十九卷第 164 頁。

⑤ 系一九一九年之誤。

⑥ 《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 306 頁。

候才能取得胜利。”^①

一九二二年初，他写道：“我們連社会主义的經濟基础也沒有完成。仇視我們的垂死的資本主义的力量，还有可能把这夺回去。必須明确地認識到这一点，公开地承认这一点，因为再也沒有什么比錯觉（和冲昏头脑，特別是在极高的地方）更危险的了。承认这一痛苦的真理，根本沒有什么‘可怕’，即使一点点灰心也沒有任何正当的理由，因为我們始終宣揚并一再宣揚馬克思主义的这个起碼的真理，即要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的工人的共同努力。”^②

两年多一点以后，斯大林想要求人們在这个根本問題上抛弃馬克思主义。根据什么呢？根据当时馬克思还不知道发展不平衡，也就是說，还不知道自然界和社会的最基本的辯证規律。据斯大林說，是列宁根据帝国主义时代的經驗第一次“发现”了这个不平衡規律，可是，列宁却頑固地坚持“馬克思主义的这条最起碼的真理”，那末关于他該說什么呢？我們真是百思而不得其解。

根据共产国际的控訴状和判决书：“托洛茨基主义过去是現在仍然是从这样一个論点出发，即：我国的革命本身(!)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仅仅是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信号、推动力和出发点。”民族主义的蜕化，在这里以純粹的煩瑣哲学掩盖起来了。十月革命“本身”是不存在的。若沒有欧洲以往的全部历史，十月革命是不可能的；它若不在欧洲及全世界繼續发展，又是沒有希望的。“俄国革命仅仅是国际革命鏈条中的一环”(列宁語)。它的力量恰好在于不肖后輩认为是它“威信扫地”之处。正是因为、而且仅仅是因为它不是一个自給自足的整体，而是一个“信号”，“推动力”，“出发点”，“环节”——正是因为这个緣故，它才获得了社会主

① 《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 375 頁。

② 同上书，第三十三卷第 176—177 頁。

义性质。

一九一八年一月，在苏維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列宁說：“当然，在一个国家內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終胜利是不可能的”，但是其他的某种事情却是可能的，即：“在某个国家着手行动这样的活榜样……这就是使各国劳动群众精神奋发的原因。”^①七月間，在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會議上說：“現在……我們的迫切任务……就是保持住这个社会主义的火炬，使它不断地迸发出更多的火花，燃起社会主义革命的熊熊烈火。”^②一个月以后，在一个工人大会上說：“它（欧洲革命）在逐漸成熟……我們必須把苏維埃政权保持到西方革命开始的时候，我們的錯誤应当成为西欧无产阶级的教訓”^③。几天之后，在教育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說：“俄国革命只是一个榜样，只是第一步，許多国家都要发生革命”^④。一九一九年三月在党代表大会上說：“俄国革命实质上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总演习”^⑤。不是“孤独自在的”革命，而是一个火炬，一个教訓，只是一个榜样，只是第一步，只是一个环节！不是独立的演出，而只是一次总演习！多么刚愎固执和殘酷无情的“威信扫地”呀！

但是列宁甚至还不停留在这里。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八日，他說：“假使我們突然被消灭了……我們可以毫不掩飾錯誤地說，我們已經把命运給我們的時間完全用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了。”^⑥在思想方法上和政治心理上，这与那些自认为是地球的永恒中心的不肖后輩的盲目自滿态度相距多么遙远！

在根本性的問題上撒謊——假使政治利益又迫使你坚持这种

① 參見《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第 442 頁。

② 同上书，第二十八卷第 8 頁。

③ 同上书，第 65 頁。

④ 同上书，第 68 頁。

⑤ 同上书，第二十九卷第 128 頁。

⑥ 同上书，第二十八卷第 136—137 頁。

謊言——，会导致无数的其他錯誤，而且逐漸改变你的思想。一九二六年，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會議上，斯大林說：“我們党沒有权利欺騙工人階級，它就应当直截了当地說：对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缺乏信心，就会使我們党放弃政权，使我們党由执政党的地位轉到在野党的地位。”^① 共产国际在其決議中完全接受了这个观点，說“反对派否认这种可能性（在单独一个国家建設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性），就是否认在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前提”竟然不是世界經濟的一般条件，不是帝国主义的內部矛盾，不是俄国各階級的相互关系，而是預先提供的可以在一个单独的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保证！

对不肖后輩在一九二六年秋天提出的这个力求达到目的的論据，我們很可以拿我們在一九〇五年春天駁斥孟什維克时所持的理由来回答。“階級斗争的客观发展，一旦使得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某个时刻面临着两种抉择——要么担負起执掌国家政权的权利和义务，要么放弃自己的階級立場——时，社会民主党会把夺取政权的任务提上日程。它这样做的时候，絲毫也不会漠視更深刻的客观发展过程，生产增长和集中的过程。但是它說：归根到底依赖于經濟发展进程的階級斗争邏輯，迫使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完成其經濟使命以前就去夺取专政……这只不过是表示历史已經把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加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也許无产阶级会在这斗争中搞得精疲力竭，也許会被斗争的重担所压倒。但无产阶级不能因为害怕階級退化、害怕使全国于野蛮状态，而拒絕这些任务。”对此我們現在不能作任何补充。

一九一八年五月間，列宁写道：“如果說，我們既然承认我国經濟‘力量’和政治‘力量’不相适应，‘因而’就不应当夺取政权，那就

^①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第 21 頁。

犯了不可救药的錯誤。所謂‘套中人’就是这样推断的，他們忘記了，‘适应’是永远不会有的，無論在自然界发展中或在社会发展中，这样的适应都是不可能产生的，只有經過多次的尝试——其中每次尝试，如果孤立地看，都会是片面的，都会有某些不相适应的毛病——才能从世界各国无产者的革命合作中，建立起完整的社会主义。”^① 要克服国际革命的困难，不能依靠消极适应，依靠拒絕政权，依靠一国坐等世界起义，而是依靠积极行动，依靠克服各种矛盾，依靠斗争的动力和扩大斗争的范围。

如果把不肖后輩的历史哲学真当一回事，則布尔什維克在十月革命之前就应当預先知道：他們将要抵禦許多敌人，将要由战时共产主义过渡到新經濟政策，而且在必要的时候建立他們自己的一国社会主义。总之，在夺取政权之前，他們就应当把算盘打得清清楚楚，准保賺錢。可是，实际上发生的事情同这种神圣的漫画风馬牛不相及。

一九一九年三月列宁在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說道：“我們往往不得不摸索前进……当我们回顾过去时，这个事实最惹人注目。但甚至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十日解决夺取政权問題的时候，这絲毫也沒有使我們动摇过。我們沒有怀疑：我們必須，用托洛茨基同志的話來說，进行試驗，做实验。我們进行了世界上誰也沒有这样大規模进行过的事业。”^② 往下又說：“好像干一个最伟大的革命可以預先知道怎样把它进行到底似的！好像这种知識可以从书本上得来似的！不，我們的解决办法只能从群众的經驗中产生。”^③

过去，布尔什維克根本沒有寻求过肯定俄国可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保证。他們无需乎这种保证。他們有了这种保证也无用

① 《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 320 頁。

② 同上书，第二十九卷第 128 頁。

③ 同上书，第 130 頁。

处，这种保证是同他們从馬克思主义学說中学到的一切相矛盾的。列宁反对考茨基时写道：“布尔什維克的策略……是唯一国际主义的策略，因为它不是建筑在害怕世界革命的怯懦心理、‘不相信’世界革命的市儈心理上面”，布尔什維克“为了发展、援助和激起世界各国的革命，已經做了一个国家所能做到的一切。”^①运用这样的策略，自然不能預先指出一条絕對不犯錯誤的康庄大道，同时也难以保证一国的胜利。但是，当时布尔什維克知道，危险是革命的因素，正如是战争的因素一样。他們睜开眼睛去迎接危险。

列宁把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敢于大胆冒战争危险的态度拿来給世界无产阶级作实例和訓戒，同时痛罵了那样一些社会主义者，他們“除非取得了容易获胜的‘保证’，就不敢开始战斗……对于这样考虑问题的国际社会主义的吹牛拍馬之徒，资产阶级道德的奴僕，应当給以三倍的鄙視。”大家知道，列宁气愤起来的时候，是不选择字眼的。

斯大林再三問道：“如果国际革命竟来迟了，那又怎么办呢？我国革命有没有什么光明的前途呢？托洛茨基认为没有任何光明的前途”^②。不肖后輩要求让俄国无产阶级享有历史特权，即它应当有一条阳关大道摆在面前，可以笔直朝着社会主义迈进，不管世界上別人发生什么事情。可惜历史沒有准备好这样的阳关大道。列宁在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說：“从全世界历史范围来看，如果我国革命始終是孤立无援的……那末毫无疑问，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沒有希望的。”^③

但即使这样，俄国革命也不会是徒劳无功的。一九一九年五月間，列宁在教育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說：“即使明天帝国主义者把

① 《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 273 頁。

② 《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 318 頁。

③ 《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 83 頁。

布尔什維克的政权推翻，我們一点也不会为我們夺取政权而后悔。任何一个……觉悟工人都不会为这一点而后悔，都不会怀疑我們的革命毕竟是胜利了的。”^① 因为列宁仅仅是从在斗争中发展将在国际上继续下去的观点来考虑胜利的。“新社会……是抽象的东西，它只有通过去建立这种或那种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不完善的具体的尝试，它才能获得有血有肉的躯体。”把“社会主义国家”和“新社会”截然区别开来，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对立起来，这提供了不肖后辈的书报无数次歪曲列宁文章的秘訣。

在夺取政权后的第五年末，列宁非常簡要地解释了布尔什維克战略的意义。“当我们开始国际革命的时候，我們这样做并不是由于我們相信我們能够使国际革命提前发展，而是由于許多客观情况造成的。我們曾經这样想：或者是国际革命来援助我們，这时我們的胜利就可以完全得到保证；或者是去做我們所能做的革命工作，意識到即使遭到失敗对革命事业还是有好处的，我們的經驗将有助于其他国家的革命。我們懂得，沒有国际的世界革命的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还在革命以前，以及在革命以后，我們都是这样想的：或者是其他资本主义比較发达的国家立刻或至少很快爆发革命，或者是与此相反，我們非失敗不可。尽管有这种想法，但我們还是尽力去做，以便在任何情况下保存苏維埃制度，因为我們知道，我們的工作不仅是为了自己，而且是为了国际革命。这一点我們是知道的，我們在十月革命以前，在十月革命刚刚胜利以及在签订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約时期，一再表达了这种信念。一般說来，这是正确的。”^② 时过境迁，事态的发展在許多方面出乎原来的料想，但是基本方向仍旧沒有改变。

对于这些話还能添加什么呢？“我們开始国际革命……”布尔

^① 《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 334 頁。

^② 同上书，第三十二卷第 467 頁。

什維克当时认为，如果西方不“立刻或至少很快”爆发革命，“我們非失敗不可。”但即使如此，夺取政权仍然是对的，因为別人可以从失敗者的經驗当中吸取教訓。“我們的工作不仅是为了自己，而且是为了国际革命。”列宁向共产国际詳尽地闡述了这些充滿着国际主义的思想，当时有任何人反駁过他嗎？有任何人暗示过一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性嗎？沒有任何人。沒有說过一句話！

五年之后，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体會議上，斯大林发表了与此恰恰相反的思想。我們已經知道这种思想了，如果“对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缺乏信心”，則我們党就应当“由执政党的地位轉到在野党的地位。”^①在夺取政权以前我們應該事先有成功的保证；因为可以允許仅仅在一国的条件之下去寻求这种保证；我們應該有可以在农民的俄国建成社会主义的信心；于是，即使对于世界无产阶级的胜利沒有信心，我們也能够安之若素地过下去。这种推理鏈条中每一个环节，都在給布尔什維主义的传统打耳光！

为了掩盖他們与过去决裂，斯大林派便力图利用看来还相当适合的列宁的一些文字。一九一五年写的一篇文章《論欧洲联邦》順便提到，每个单独国家的工人阶级应当夺取政权并着手进行社会主义建設，而不必等待別人。如果在这几行无可置疑的文字背后隱藏着一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那么在以后几年中列宁怎么会这样根本把它忘記了，而且老是固执地同它相矛盾呢？不过我們已經有了一些直接的证据，就无需求助于間接的推理了。同年，即一九一五年，列宁起草的綱領式綱要，精确地而且直接地回答这个問題說：“俄国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要把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以掀起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这第二个任务現在已

①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第 21 頁。

非常接近第一个任务，但它毕竟是一个特殊的任务，是第二个任务，因为这里牵涉到同俄国无产阶级实行合作的两个不同阶级；在实现第一个任务时，它的合作者是俄国的小资产阶级农民，在实现第二个任务时，却是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①不能要求说得更加明确了。

引证列宁的第二个尝试，也没有更好的根据。他的一篇未完成的论合作制的文章说，在苏维埃共和国之内我们拥有“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②，以便在无需乎新的革命的条件下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原文讲得十分清楚，这里说的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和法律前提的问题。作者没有忘记叫读者注意到生产和文化前提都还不够。总之，列宁曾多次表示过这个思想。他在同一时期，即一九二三年初的一篇论文中写道：“我们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虽然我们已具有作到这一点的政治前提。”^③在这里以及在所有其他情况下，列宁都是从这样一个假定出发，即：西方无产阶级将同俄国无产阶级一道而且率领它走向社会主义。论合作制的那篇文章根本没有暗示苏维埃共和国不通过世界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对抗性的革命发展过程、可以用改良主义的方法和和谐地建立它自己的一国社会主义。甚至被写进了共产国际纲领的这两段引证，早已在我们的《纲领批判》中解释清楚了，我们的论敌一次也没有打算替他们的种种歪曲和错误做辩护。这种打算也会毫无希望。

列宁在一九二三年三月，即在他的创造活动的最后时期写道：“现在我们面前有这样一个问题：在我国这种小农和最小农生产的情况下，在我国这种经济破坏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支持到西欧资

① 《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 381 页。

② 同上书，第三十三卷第 423 页。

③ 同上书，第 454 页。

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那一天呢？”^①又看到：时过境迁了，事变的情况改变了，但政策的国际基础仍然沒有动搖。对于国际革命的信心——按照斯大林的話說，是所謂“对于俄国革命的內部力量缺乏信心”——一直陪伴着伟大的国际主义者直至他的坟墓。只有将列宁放进陵墓之后，不肖后輩才能够硬把他的思想一国化。

由于世界性的分工，由于各国发展的不平衡性，由于各国經濟的相互依賴，由于各国文化的各个方面的不平衡性，由于当代生产力的发展規律，社会主义的結構，只有通过經濟螺旋体系統，通过把单独国家的各种內部的不协调交給許多国家来共同解决，通过各国間的互相服务以及經濟和文化的各个部門的相互补充，才能建立起来——这就是說，归根到底，只有在世界范围之内才能建立起来。

一九〇三年通过的旧党綱，是以如下几句话开始的：“交換的发展在文明世界各国間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因此伟大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一定会成为而且早已成为国际的运动。”^②无产阶级为临来的社会革命而进行的准备工作，被規定为“国际社会民主主义”的任务。但是，“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走向这一(共同)目的的道路上，必須各自提出不同的最近的任务”^③。在俄国，推翻沙皇制度就是这样的任务。所以，民主革命預先就被认为是走向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民族的阶段。

这一观念也是夺取政权后所通过的新党綱的基础。在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討論党綱草案时，米柳亭提議把列宁的原案修改一下。他說：“我提議在談‘业已开始的社会革命时代’的那个地方加

① 《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 452 頁。

②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會議和中央全会決議汇编》第一分册，人民出版社版，第 35 頁。

③ 同上书，第 37 頁。

上‘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字样……我认为这无需乎说明理由……我们的社会革命只有作为国际革命才能得到胜利。它不能只是在俄国获得胜利，而让资产阶级制度仍然存在于周围的各个国家中……我提議：为了避免种种誤会，把这一点加上去。”主席斯維尔德洛夫說：“列宁同志接受这条修正，所以就用不着付表决了。”^①这类議會技术上的小插曲（“无須乎说明理由”和“用不着付表决”），就駁斥了不肖后輩篡改历史的手法，这也許比最煞費苦心的研究論文还更加具有說服力！同我們在前面引证过的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諾夫以及其他数以千百計的人一样，米柳亭不久之后譴責自己的观点是“托洛茨基主义”，这絲毫不能改变事物的性质。历史的洪流比人类的脊梁更加有力。涨潮把整整一輩輩的政治人物推上来，然后退潮又把他們席卷而去。可是，另一方面，思想，即使在其代表者在肉体上和精神上死去之后，仍然能够存在下去。一年之后，在通过新党綱的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上，这个問題又引起了列宁和波德別尔斯基之間的热烈的爭論。这位莫斯科代表抗議在十月革命之后綱領仍然用未来时式来談社会革命。列宁說：“綱領的一条中談到了行将到来的社会革命，这一点也受到了波德別尔斯基同志的攻击……这种論据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我們的綱領指的是世界范围内的社会革命。”^②党的历史真是沒有給不肖后輩留下一个阴暗的角落作为藏身之所！

在一九二一年通过的共产主义青年团綱領中，这个問題又以一种特別通俗而簡單的形式提出来。其中一条說：“俄国虽然具有丰富的天然資源，然而在工业上仍然是一个落后国家，其中小资产阶级人口占多数。它只有通过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到达社会主

① 《联共(布)代表大会、代表會議速記記錄，第七次代表大会》，一九二八年俄文版第169頁。

② 《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159—160頁。

义，我們現在已进入了发展世界革命的时代。”这个綱領当时經過政治局批准，参加批准的不仅有列宁和托洛茨基，而且有斯大林，一九二六年秋，当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把拒絕承认一国社会主义算作是該死的罪过时，它仍然保持着全部效力。

在以后的两年当中，不肖后輩却不得不把列宁时代的許多綱領性文件收到档案里去。他們把自己的一个七拼八凑的新文件叫做《共产国际綱領》。如果說列宁的“俄国的”綱領中讲的是国际革命，那么不肖后輩的国际綱領內讲的就是“俄国的”社会主义了。

与过去的决裂，这究竟是在什么时候第一次公然暴露出来、并且是怎样暴露出来的呢？这个历史日期是不难指出的，因为它与斯大林生平中的一个轉折点相一致。迟至一九二四年四月，即列宁逝世后三个月，斯大林还在謹慎地發揮党的传统观点。他在自己的《列宁主义問題》中写道：“在一个国家內推翻资产階級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还不等于保证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即組織社会主义生产的任务尚待解决。沒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能不能解决这个任务，能不能在一个国家內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呢？不，不能。为了推翻资产階級，一个国家的努力就够了，这是我国革命的历史給我們說明了的。为了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为了組織社会主义生产，单靠一个国家的努力，特别是像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的努力就不够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斯大林以下面的話来总括他对这些思想的闡述：“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論的特征大体上就是这样。”^①

同年秋天，在反“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影响之下，忽然发现：俄国是一个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国家，它若不是武装干涉的妨碍，則

^① 參見《斯大林全集》第八卷第 60—61 頁及第六卷第 95—96 頁。

能够以本国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斯大林在同一著作的新版本中写道：“革命获得胜利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既然已经巩固自己的政权并领导着农民，就能够而且应当建成社会主义社会。”^① 能够而且应当！不过要“完全保障国家免除外国武装干涉……至少必须有几个国家内革命获得胜利。”^② 宣布让世界无产阶级担任边防警察角色的这个新观念时，也是以同样的话而结束的：“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论的特征大体上就是这样。”在一年当中，斯大林竟把关于社会主义根本问题的两种直接对立的观点硬栽在列宁的身上。

在一九二七年的一次中央全会上，托洛茨基谈到斯大林的这两种矛盾的见解说：“你可以说斯大林犯了一个错误，后来他自己纠正了。但是他怎么能够在这样一个问题上犯这样一个错误呢？假使真的是列宁在一九一五年就已提出了在单独一个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这完全不是真的），假使真的后来列宁只不过是巩固和发展了这个观点而已（这完全不是真的），那么，我们要问：当列宁在世时，在列宁生活的最后时期中，对于这个最重要的问题，斯大林怎么会持着表现在他一九二四年的引文中的那种见解呢？看来，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斯大林一直是个托洛茨基主义者，只是到一九二四年之后他才不是了。要是斯大林能够在他自己的文章中至少找出一段，来证明他在一九二四年以前曾说过关于在一个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那就好了。他找不出！”这个挑战仍然没有得到回答。

不过我们不当夸大斯大林有什么实在的深刻转变。正如同在战争问题、我们对临时政府的态度问题、或民族问题上一样，在革命的总的前途问题上，斯大林也有两种立场：一种是独立的，他

①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八卷第60—61页及第六卷第95页。

② 同上。

自己所固有的，并非时时表露出来的，或者至少从来没有彻底表露出来的；另一种则是半真半假的，口头上的，从列宁那里剽窃来的。不可能设想，在属于同一个党的两人之间，有比斯大林同列宁之间在关于革命的种种根本问题上以及在政治心理上的更深刻的鸿沟了。现在，斯大林的机会主义本性，被他的政权是依靠着胜利了的无产阶级革命这一事实遮盖起来了。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斯大林在一九一七年三月间所持的独立立场。资产阶级革命已经成功之后，他给党提出的任务，是要“制止资产阶级分裂出去”，这就是说，是要阻止无产阶级革命。如果说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了，那并不是他的过错。可是斯大林，同所有的官僚一起，拿既成事实作了自己立足的基础。既然有无产阶级专政，也就应当有社会主义。斯大林把孟什维克派反对在俄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论据翻转过来，提出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开始挺身而出反对国际革命。因为他从来没有彻底思考过任何原则问题，所以在他看来，情形就只能是，“基本上”他向来同一九二四年秋天的想法一样。又因为他从来不同党内流行的意见相对立，所以在他看来，情形只能是，“基本上”党也同他的想法一样。

起初这种张冠李戴的现象不是有意识的。那不是歪曲捏造的问题，而是理论上失足的问题。然而，一国社会主义的这种教义越是要起来对付有力的批判，当权的机器就越需要运用有组织的、主要是外科手术的干涉。于是，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用命令形式颁布了。它用势不两立的办法，即逮捕那些不同意它的人的办法来加以证明。同时开辟了系统地篡改党的过去的时代。党的历史变成了刮后重写的羊皮书。刮羊皮的勾当仍在继续着，而且越来越肆无忌惮。

然而，决定性的因素，却既不是镇压，也不是伪造。同官僚们的地位和利益相一致的新观点的胜利，有暂时性的但非常有力的

客观情况为基础。苏维埃共和国已经有了可能在国际和国内政策方面起革命前任何人都无法估计到的更加大的作用。这个孤立的工人国家不仅在无数敌人的包围之中屹立着，而且在经济上已经抬起头来。这一有力的事实构成了年青一代的社会舆论，因为他们还没有学会历史地进行思考，也就是说，还没有学会进行比较和预见。

欧洲资产阶级在上次战争中吃够了苦头，不肯轻易发动另一次战争。对革命后果的恐惧，到现在为止还麻痹着种种武装干涉的计划。但是恐惧的因素是不稳定的。革命的威胁还没有变成革命本身。一个危险如果迟迟不实现，便失去它的效力。同时，工人国家和帝国主义世界之间不可调和的对抗，正在日趋表面化。近来的种种事变已经雄辩地说明：要使世界资产阶级“中立化”，直到社会主义制度完成时为止的这种希望，已经被现在的当权派抛弃了；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变成了自身的反面。

在这些和平年代里所取得的工业上的成就，再好不过地证明了计划经济的无比优越性。这一事实与革命的国际性毫无矛盾之处：如果各个单独国家没有准备好社会主义的原素和支撑点，则社会主义就不能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反对一国社会主义论的人恰恰是实现工业化、计划原则、五年计划以及集体化的主角，这绝不是偶然的。拉柯夫斯基以及成千的其他布尔什维克，由于为实现一个大胆的工业创举而斗争，现在正在遭受几年的流放和监禁。可是另一方面，也是他们首先起来反对过高地估计已经取得的成就，反对民族的自满自足。反之，那些顾虑重重和目光短浅的“实践家”，以前认为落后的俄国的无产阶级不能夺取政权，既得政权后又否认实现大规模工业化和集体化的可能性，后来却采取了截然相反的立场。他们把出于自己意料之外的已获得的成就简单地倍乘出一连串的五年计划来，以乘法表代替历史远景。这便是单独

一国的社会主义的理論。

事实上，目前苏維埃經濟的增长仍然是一个对立过程。經濟的成就虽然加强工人国家，但决不自动地导致建立一个和諧的社会。相反地，它們正在准备孤立的社会主义結構的种种矛盾在更高的水平上的尖銳化。同过去一样，农村的俄国需要一个与城市的欧洲共同的工业計劃。世界范围的分工超出于单独一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之上，而且用命令的方式指出它前进的道路。十月革命沒有把俄国排除于人类其他部分发展之外，反而使俄国同他們更密切地联系起来。俄国既不是未开化之邦，但也还不是社会主义乐土。它是我們这个过渡时代的过渡性最强的国家。“俄国革命只不过是国际革命鏈条中的一个环节。”世界經濟的現狀使我們可以毫不迟疑地說：资本主义离无产阶级革命，比苏联离社会主义要近得多。第一个工人国家的命运，是同西方和东方解放运动的命运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但这个大問題需要单独研究。我們希望以后有机会来討論它。

（楊彥君、吳明譯自《俄国革命史》
伦敦 1936 年版第 1219—1257 頁）

